

谨以此书
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

中共句容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 / 中共句容市委
党史工作委员会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98-3706-1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
史—句容市—1949—1978 IV. ①D235.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116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吕佳音

复 审/ 潘 鹏

终 审/ 李青建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排 版/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7.7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8-3706-1

定 价/ 50.00 元

编审人员

主 审 许 文

副主审 商 震 皋古和

主 编 欧红卫

副主编 倪定胜 许朝斌 朱延生

编 辑 许朝斌 朱延生 谭树春 刘明亮

编 务 唐家亮 刘学武

序

党史，记载党政活动，抚昔追今，以展未竟。句容是革命老区，市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发掘党史、研究党史、学习党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1949—1978）出版面世，这是句容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市党的建设和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

1949 年 4 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句容县城，古城句容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9 年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句容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奠定了句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扎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从尊重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态度出发，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这一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记述了中共句容县委领导句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曲折历程。这一历程，既有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喜悦；也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更有在调整和提高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迈进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等严重挫折和惨痛教训。这一历程，既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句容各级党组织巩固地方政权、加强基层建设的执政史，也是党领导句容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在曲折和探索中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发展史。全

书真实系统地反映了句容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探索和总结,热情讴歌了革命老区广大干群矢志不渝建设社会主义的智慧和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1949—1978)的出版,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学习、研究句容党史提供了一份系统、真实、生动的历史资料,是开展党史教育的一本好教材。史志办为组织编纂好此书,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认真学习党史、研究党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凝心聚力、共谋发展,为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建设“强富美高”新句容而努力奋斗!

中共句容市委书记 

2016年6月

编纂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客观、系统、准确地反映句容解放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艰辛探索历程。

二、本书采用章节体,层次结构设编、章、节、目,内容以记述为主,略夹议论,史论结合。

三、本书记述时限,始于1949年4月,止于1978年12月。为了比较完整地叙述部分相关专题内容,记事时间略有前伸或后延。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句容解放之前概况,编写了“引言”置于全书之前。

四、本书记述地域范围,以当时句容县行政区域为准。

五、本书使用的主要社会经济数据,以句容县(市)统计局编印的《统计年鉴》为准,《统计年鉴》没有的,以历史档案为准。

六、本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史志、报刊、口碑,所运用史料一般不注明出处。编纂借鉴了中央和部分省、市、县(市)的党史资料及科研成果。因篇幅所限,于此统一说明,书中不再注明出处。

七、本书数字和计量单位的使用,按现出版物的要求表述,本书引用资料(引号内的资料)的数据,1955年3月1日前为旧币,并以括注说明,其他记述涉及的旧币币值,已按10000:1折算成新币。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编

建立人民政权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4月—1956年9月)

第一章 解放初期党的组织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 (5)

第一节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5)

一、句容县委、县政府机构的建立 (5)

二、接管旧政权 (6)

三、基层政权的改造 (7)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群团组织的建立
..... (8)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8)

二、农民协会的建立 (9)

三、工、青、妇组织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9)

四、工商业联合会的组建 (11)

第三节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社会秩序..... (12)

一、剿匪肃特 (12)

二、组建地方人民武装	(14)
三、打击不法投机,稳定市场物价	(15)
四、减租反霸	(17)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经济秩序的初步建立	(19)
第一节 着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全力以赴完成征粮任务	(19)
一、顺利完成征粮任务	(19)
二、生产救灾	(21)
三、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蓬勃开展	(22)
四、兴修水利	(23)
五、农业互助合作的初步开展	(24)
第二节 争取财政状况基本好转	(25)
一、统一财经	(25)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	(26)
三、供销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28)
四、扩大城乡物资交流	(29)
第三节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30)
一、教育事业的改造、建设及扫盲运动	(30)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起步	(32)
三、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	(33)
第三章 开展“三大运动”,进行民主改革	(34)
第一节 土地改革运动	(34)
一、土改前各阶级占有农村土地情况	(34)
二、土地改革的试点及准备工作	(35)
三、全面土改	(36)

四、土改后农村的巨大变化	(38)
第二节 抗美援朝运动	(39)
一、抗美援朝宣传	(39)
二、掀起参军热潮	(40)
三、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捐献活动	(41)
四、开展拥军优属	(42)
第三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43)
一、解放前后严峻的政治形势	(43)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期准备工作	(44)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45)
四、取缔反动会道门	(47)
第四节 开展其他民主改革	(48)
一、开展禁毒、禁赌、取缔封建迷信活动	(48)
二、宣传贯彻《婚姻法》	(50)
三、水上民船民主改革	(51)
第四章 解放初期党的建设及经济建设成就	(53)
第一节 党的建设	(53)
一、解放初期句容党员队伍状况	(53)
二、整风运动	(54)
三、整党建党	(55)
四、干部的教育与培养	(56)
五、“三反”运动	(57)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59)
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59)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60)

第五章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61)
第一节 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61)
一、传达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61)
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62)
第二节 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63)
一、“一五”计划的提出	(63)
二、“一五”计划的实施	(64)
三、粮食统购统销	(65)
四、粮食“三定”政策	(67)
第三节 带领群众战胜自然灾害	(69)
一、1954 年的抗洪救灾	(69)
二、兴修水利	(70)
第六章 过渡时期政治文化建设	(72)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72)
一、基层普选	(72)
二、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73)
第二节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74)
一、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	(74)
二、句容城区第一届劳资协商会议	(75)
三、加强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	(76)
第三节 过渡时期文教卫生事业	(77)
一、文化艺术事业的初步繁荣	(77)
二、教育事业继续发展	(78)
三、卫生防病事业得到加强	(78)
四、农村扫盲工作	(79)

第四节 审干工作和肃反运动	(80)
一、审干工作	(80)
二、肃反运动	(82)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确立	(85)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	(85)
一、铃塘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	(85)
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86)
三、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试办和全面推开	(88)
四、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及其教训	(89)
第二节 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	(90)
一、对资改造掀起高潮	(90)
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组改造	(91)
三、对资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93)
四、对手工业的初步改造	(94)
五、手工业合作化加速进行	(95)
六、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巩固与完善	(96)
七、信用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96)
第八章 党的建设和首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	(97)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作风建设	(97)
一、党的组织建设	(97)
二、过渡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与领导作风建设	(98)
三、整顿农村党支部	(99)
四、第二期建党工作	(99)
五、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100)

第二节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100)
一、党的干部管理·····	(100)
二、“新三反”斗争·····	(101)
三、干部培训·····	(102)
四、干部提拔与调配·····	(103)
第三节 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	(103)
一、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期准备工作·····	(103)
二、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	(104)

第二编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九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	(107)
第一节 探索的良好开端 ·····	(107)
一、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	(107)
二、贯彻“双百”方针·····	(109)
第二节 贯彻党的八大方针 ·····	(110)
一、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	(110)
二、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111)
三、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112)
第十章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	(115)
第一节 整风运动 ·····	(115)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15)
二、开展整风运动·····	(118)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119)
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119)
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120)
第三节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21)
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	(121)
二、句容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	(122)
三、精简机构与下放干部·····	(123)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	(125)
第一节 农业“大跃进”·····	(125)
一、农业“大跃进”的萌芽·····	(125)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与贯彻·····	(127)
三、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	(128)
四、农业全面“大跃进”与高产“卫星”·····	(128)
五、林、茶、果业扩展的艰苦创业·····	(130)
第二节 工业和其他战线的“大跃进”·····	(131)
一、全民办工业·····	(131)
二、万人上山采矿·····	(132)
三、大炼钢铁·····	(132)
四、“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133)
五、科教文卫领域的“大跃进”·····	(134)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137)
一、公社化运动前的小社并大社与“三类社”改造·····	(137)
二、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	(137)
三、公共食堂等公共福利机构的兴起·····	(138)
四、无偿调拨的“共产风”·····	(139)

第四节 八大水库等水利工程大会战 ·····	(140)
一、兴建水库的提出·····	(140)
二、八大水库的兴建·····	(141)
三、客观认识 1958 年以兴修水库为重点的水利大会战 ·····	(144)
第十二章 从初步纠“左”转为“反右倾” ·····	(145)
第一节 纠正“左”倾错误 ·····	(145)
一、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45)
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体制调整·····	(146)
三、工业及教育社会事业的初步调整·····	(149)
四、纠正数字不实等不良作风的努力·····	(149)
第二节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 ·····	(150)
一、“反右倾”斗争·····	(150)
二、继续“大跃进”·····	(152)
三、三年“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154)
四、宝华事件·····	(155)
五、各级党组织的救灾努力·····	(156)
第十三章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	(158)
第一节 “大跃进”之后的调整和探索 ·····	(158)
一、对人民公社的调整与整顿·····	(159)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161)
三、“三反”整风运动·····	(165)
第二节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 ·····	(166)
一、进一步调整农业·····	(167)
二、进一步调整工商业·····	(168)

三、继续精简机构和职工,下放城镇人口	(169)
四、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70)
第三节 其他领域政策的调整	(171)
一、甄别平反工作	(171)
二、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调整	(172)
第四节 1963年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	(173)
一、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173)
二、加强工业的主导作用	(175)
三、文教卫生事业在整顿收缩后得到巩固	(176)
第十四章 思想文化战线和战备工作	(179)
第一节 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	(179)
一、培训轮训干部、党员	(179)
二、反对干部不正之风	(180)
三、开展向雷锋等先进学习活动	(181)
第二节 学习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	(183)
一、学习理论	(183)
二、学习毛泽东著作	(184)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	(186)
一、以战备为中心的民兵工作	(186)
二、备战工作	(188)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第一节 江苏省委在城东公社的社教试点及面上教育	(192)
一、省委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	(192)
二、1963年上半年面上的社教运动	(193)
三、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	(193)

第二节 贯彻执行“前十条”和“后十条” ·····	(194)
一、后白公社的试点·····	(194)
二、分批系统展开社教运动·····	(195)
三、面上公社的社教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	(196)
第三节 江苏省委在句容开展“四清”运动 ·····	(197)
一、省委在句容开展大规模的“四清”运动的由来·····	(197)
二、江苏省委句容县社教运动工作团·····	(198)
三、“四清”运动的过程及内容·····	(198)
四、县机关及集镇企事业单位的“四清”运动·····	(204)
第四节 对句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评估 ·····	(206)
一、句容社教运动积极方面·····	(206)
二、句容社教运动的消极影响·····	(207)

第十六章 句容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

·····	(211)
第一节 农业在曲折中发展 ·····	(211)
一、水利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211)
二、农村经济的发展·····	(213)
第二节 工业经济在曲折中前进 ·····	(214)
一、资源性工业的发展·····	(214)
二、为农支农工业的发展·····	(215)
三、工业产值的变化·····	(216)
第三节 交通邮电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曲折发展 ·····	(216)
一、交通、邮电·····	(216)
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217)
三、“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多个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 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	(218)

第三编

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内乱开始	(221)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21)
一、批判“三家村”	(221)
二、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	(223)
三、派驻工作组,“文化大革命”逐步向全县发展	(226)
第二节 社会局势全面混乱	(228)
一、红卫兵破“四旧”与“大串连”	(228)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32)
三、造反派全面夺权	(233)
第三节 实行军管稳定局势	(235)
一、成立军管会	(235)
二、军管会稳定局势的努力	(236)
第四节 武斗的爆发与平息	(239)
一、日益升级的武斗	(239)
二、军管会平息武斗的努力	(241)
第十八章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与开展“斗、批、改”运动	(242)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242)
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242)
二、基层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	(245)

第二节 开展“斗、批、改”运动	(246)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246)
二、进行“教育革命”	(249)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52)
四、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劳动	(257)
五、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	(260)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与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263)
一、加强战备工作	(263)
二、“清理阶级队伍”	(266)
三、“一打三反”运动	(268)
四、深挖“五一六”运动	(272)
第四节 党组织的整顿与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276)
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	(276)
二、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277)
三、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280)
四、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恢复	(281)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运动与抵制极左思潮的努力	(283)
第一节 “批陈整风”与“批林整风”	(283)
一、“批陈整风”	(283)
二、“批林整风”	(285)
第二节 纠正极左错误	(289)
一、调整党政领导机构和落实干部政策	(290)
二、整顿经济秩序	(292)
三、群众团体组织的恢复	(294)
四、平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295)

五、落实党的统战、文化、教育、卫生、体育领域政策	(297)
第三节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98)
一、“批林批孔”.....	(298)
二、“评法批儒”.....	(302)
第二十章 全面整顿与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304)
第一节 全面整顿	(304)
一、领导班子的整顿.....	(304)
二、各行各业的整顿.....	(307)
三、抗灾防震.....	(309)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	(311)
一、“农业学大寨”.....	(311)
二、“工业学大庆”.....	(319)
第三节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322)
一、全县干部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	(322)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322)
三、悼念毛泽东逝世.....	(323)
四、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324)
第四节 句容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抗争及历史 反思	(324)
一、句容的国民经济在艰难中发展.....	(324)
二、句容的社会事业在大灾难中艰难地维持生存,在某些 领域也有所发展.....	(325)
三、历史的反思.....	(327)

第四编

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 第二十一章 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331)
- 第一节 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和落实党的政策** (331)
- 一、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清查帮派分子
 和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 (331)
- 二、落实党的政策,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335)
- 第二节 恢复和整顿各职能机构** (336)
- 一、党政机构的整顿和调整及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
 (336)
- 二、县、社机关进行整党整风 (337)
- 三、群众团体整顿及工作的开展 (338)
- 第三节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341)
- 第二十二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初步恢复与发展**
..... (343)
-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343)
- 一、农业的发展 (343)
- 二、工业和交通业的恢复与发展 (345)
- 三、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改善 (346)
- 第二节 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347)
-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 (347)
-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348)
- 三、文化、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351)

结束语	(353)
附 录	(357)
一、大事索引(1949年4月—1978年12月)	(359)
二、中国共产党句容县历届县委领导人名录 (1949.4—1978.12)	(408)
后记	(414)

引 言

古县句容地处江苏省西南部，长江南岸；西及西北与南京接壤，并与仪征隔江相望；东北至东与镇江市的丹徒、润州相连；东南至南与常州市的金坛、溧阳交界。句容地处宁镇山脉与茅山丘陵交替地带，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部低洼，是江苏省典型的低山丘陵区。

句容历史悠久，早在 10 万到 30 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7000 至 6500 年前就有原始农业氏族聚落，3500 年前建造古城，2200 年前西汉置县。旧志称句容为石城（南京）左臂，战略位置重要，古代句容是古战场之一，近代句容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争长达 11 年之久。全国抗日战争中，句容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块之一。

句容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代以来，太平军与清军在句容交战多年，城乡处处皆战场，因而句容遭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人口从 30 多万下降至五六万人。由于地广人稀，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句容在连年兵燹之后，不仅百业待兴，而且土地高度集中到少数豪绅地主手里，整个社会结构失衡，土客籍之间矛盾，以及华侨投资兴办林业同农民垦荒的矛盾，显得非常突出。1910 年，句容发生多起农民暴动，人数最多的一次号称 10 万农民大暴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19 年的五四运动，对句容的革命斗争产生深刻影响。以郭纲琳为代表的爱国进步青年，陆续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1927 年，句容有了中

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在句容地区展开。全国抗日战争中，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中共句容地方组织得以复建，先后建立句容、江句、镇句等多个县级中共组织，协助新四军建立和巩固茅山抗日根据地，组织军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涌现出巫恒通等英烈人物，最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主力北撤，留守句容地区的中共组织，依然在极端艰难条件下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并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并在4月21日展开渡江战役。在大军压境和党的统战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句容国民党县长率部投诚，句容于4月23日和平解放。从此，句容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 一 编

建立人民政权 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4月—1956年9月)

第一章

解放初期党的组织和人民 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4月22日,国民党句容县县长兼句容保安团团团长陈天秩率句容保安团第一、二营正式离开句容城,24日在南京近郊马群向人民解放军三十四军投诚。22日夜,三十四军先锋营在渡江后,经急行军,于23日下午到达句容县城,句容解放。4月25日晚,接管句容的南下人员到达句容县城,迅速接管县、区政府机关和所属机构,逐步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句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句容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此,句容进入了全新发展的新时代。

第一节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一、句容县委、县政府机构的建立

1949年5月2日,中共镇江地委公布洪天诚、迟明堂、程文、储玉祥4人组成中共句容县委委员会,洪天诚为书记、迟明堂为副书记。新成立的中共句容县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和秘书

室。1950年成立人民武装部和纪律检查委员会,1951年8月建立统一战线工作部。

1949年6月12日,镇江专署公布:句容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洪天诚为句容县县长,程文为副县长。新成立的句容县人民政府,下设秘书处、民政科、司法科、文教科、工商科(同年底撤销)、财务科、粮食局、建设科、公安局、税务局。以后又多次改称或增减。

6月,镇江军分区句容县总队组建,何畏任副总队长,洪天诚兼任政委,总队由2个解放军连队和4个新组建的连队组成。

句容地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新政权组织在句容的建立,从此句容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句容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和组织保证。

二、接管旧政权

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中共茅山工委就为茅山地区的解放做准备。为做好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上级组织委派以山东老解放区为主的一批南下干部,并在扬州定编。为加强句容接管工作的领导,上级组织对中共句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机关和区干部作了安排,初定洪天诚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兼任县长,程文任副县长。洪天诚为控制句容城和平解放后的局势,1949年4月24日中午便服简从先行入城。25日晚,由迟明堂、程文带队的南下干部一行与洪天诚见面,并研究部署接管工作。为不扰民众,接管句容的南下干部当夜住进县城“日新池”浴室。26日上午,接管干部移住城隍庙,并于上午10时召开与洪天诚的见面会。会后,县区两级干部立即出发,开始接管县区政府机关和所属机构。

27日,句容县即通告原国民党县政权的旧人员开会,向他们说明形势与政策,并要求他们向人民政府交待过去历史,以达到将功赎罪的目的。28日上午接收人员开始全面接收,接收工作按照

旧机构原封不动、各按系统的原则进行。除接收国民党县政府外，还接收了国民党时期乡政府 20 个，银行 2 处（江苏省农民银行句容办事处、句容县银行），医院 1 所，旧人员 230 名；物资方面：稻 246595 斤，糙米 446856 斤。在移交大体完成，旧人员集中培训后，录用 18 名。原国民党县属军警人员编入人民解放军警备第七旅及句容县总队和公安局。

对旧人员处理原则上采取慎重负责、区别对待的方针，县一级的主要人员送交上级，一般科员、干事、接待人员，无产、无重劣迹者，分别录用，乡镇长一级的开除回家，向群众反省，参加生产。5 月 10 日，全县接管工作基本结束。由于接管工作方法、措施得力，句容的社会秩序保持稳定。

三、基层政权的改造

解放初，保甲制度在句容并没有立即废除，而是暂时利用原保甲长为新政府做事。原乡长由政府培训后，到群众中认识过去的错误，向人民悔过、认错，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有步骤改造国民党时期保甲组织，保长只作个别撤换。新乡、村干部任职后要向群众保证不贪污腐化、有事大家商量办、为人民服务、执行人民政府各种法令。

1949 年 4 月，全县设 9 个区，临时划设 66 个乡镇；7 月，正式公布为 9 个区 55 个乡镇；8 月，八区滨江乡划归江宁县，九区增设宝华乡。解放后，句容干部来源成分复杂，不仅有南下干部，还有新任命的干部、留用的原国民党人员。被划分为新乡的都确定了代理乡长，有的乡是区干部兼任乡长，地方干部协助工作。县级通过城区召开庆祝大会宣传形势、政策，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情况。区级除召开座谈会外，主要召开各种群众性会议和村民大会，培训旧人员。以宽大政策对待旧人员，加强对旧人员的教育与管理，原国民党旧政权下属人员集中学习 5 天，表现积极及有技术的人员

留用；其他人员一般经教育后遣返回家；科长以上人员集体学习。在借粮中对保、甲长进行个别处理，在夏征中对保、甲长有条件进行改造。1949年10月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商讨了改造乡、保政权，废除保甲制等问题。秋征中建立乡村秋征委员会，组织成立乡村行政委员会，以便彻底废除保甲制度，划小乡、取消保、建立村级组织。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而施行的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制度，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因其自身具有的反民主、反社会的暴力和封建色彩，不为民众所容，必然被以新社会建设为指向的新政权所抛弃。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 召开和群团组织的建立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实现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解放初，句容县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和行使权力的组织形式。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曾召开过两次各界人士代表会议。

1949年9月29日，中共句容县委发出《关于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县府召开各种代表性的民主会议……经常运用这种形式来武装进步分子，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应与各阶层代表商讨问题，把党的决定，变成各代表共同的决定，并通过各阶层代表，动员群众共同执行，共同负责，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1949年10月至1953年7月，句容县召开过7届9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0月9日至12日,句容县在县城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会代表135人。县人民政府与各界代表共同商讨了支援前线、消灭残匪、减租减息、肃匪反特、打倒恶霸、生产备荒、建设基层政权、废除保甲制、加强反帝反封建宣传、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工作,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选举产生协商委员会,委员23人,主席洪天诚,副主席程文、赵治和。协商委员会共举行3次会议。

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各界代表的意见、建议,加快了民主建政过程,巩固扩大了民主统一战线。同时,与会代表明确了工作方针与工作任务,树立了当家做主的思想。

二、农民协会的建立

1949年7月,句容县农民代表会议召开,成立句容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剿匪等运动已初步建立自己的组织,九个区都先后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另有10个乡成立乡农民协会。至1949年10月中旬,发展会员30672名,内有妇女会员1116名,工人会员1110名。1950年1月,句容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减租、生产、备荒、冬防、治安等方面工作决议,选举农协委员41人。农民协会成立后,组织农民在土地改革、民主反霸、剿匪肃特、生产自救、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政权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3月土地改革结束时,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已达67212人。1954年农民协会撤销。

三、工、青、妇组织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县总工会的成立。1950年5月,由17名委员组成的句容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分别到城区、天王、下蜀、龙潭等集镇,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同时对职工队伍进行调查摸底,发动职工自愿加入工会。自下而上建立工会组织,年

底,在城区、天王、下蜀、龙潭等地成立了4个镇级工会,13个基层工会,92个工会小组,发展会员1111名。1951年7月,句容县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县总工会。总工会成立后,发动职工群众,掀起增产节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全县职工捐献1.15万元人民币(新币值)购买飞机大炮。1114名职工在“和平公约”上签名,25名工人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县总工会组织基层工会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斗争。在宣传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清查“黑田”,整理赋籍。在全面贯彻落实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工商企业进行生产改革,检举揭发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掺杂作假行为,加强护税和市场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维护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1954年5月,县总工会更名为县工会联合会。

青年团组织的成立。1949年8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筹备句容县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1950年6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青年团句容县委员会。年底,建有基层团总支1个,团支部64个,团员2865人。各级团组织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团员青年投入减租、减息以及生产救灾活动。1954年初,各级团组织在团员青年中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全县353名团干部参加了团县委举办的两期基层团干部训练班,学习和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1956年底,全县8599名农村团员全部加入农业合作社,并带动58124名青年入社,占农村青年总数的99%以上。团员青年成了农业合作社的一支骨干力量,有212名团员担任高级社社长,109名团员担任初级社社长。1956年8月,实行撤区并乡,以生产队成立团小组,以合作社成立

团支部,以乡(镇)成立团委会,共建立乡(镇)团委会 22 个。同时,各级基层团组织结合全县整团建团活动,普遍对团员青年进行了“怎样做一个青年团员”和“以社为家,怎样做一个优秀社员”的团课教育,增强了农村青年对农业生产的信心。

妇女联合会的成立。1949 年下半年,成立句容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1 年 3 月正式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嗣后,区、乡(镇)相继成立妇联会和妇代会。

1950 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各地妇联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宣传落实,反对包办买卖婚姻。1951 年 5 月至 1952 年 2 月,全县有 1005 对青年自由恋爱,101 名寡妇重新组合家庭,349 人解除童养媳关系,因包办买卖婚姻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婚的有 813 对。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涌现出 280 名妻送夫、138 名母送子以及未婚妻送未婚夫参加志愿军的动人事迹。1952 年后,各级妇女组织引导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县有 2456 名妇女参加兴修水利,398 名妇女第一次走出家庭参加田间劳动,23 名妇女学会耕田。

四、工商业联合会的组建

1950 年 6 月,句容县工商业联合会(筹)成立,推荐常务委员 9 人。7 月,接收旧商会,城区工商联发动各行业成立基层组织。1951 年年初,城区工商联(筹)下属同业工会 19 个,小组 7 个,有 464 户参加。11 月,县工商联正式成立,其时全县工商业户发展至 1526 户。县工商联成立后,即开展了增产捐献、爱国主义和“五反”教育活动,积极组织工商界捐献抗美援朝武器代金,推销胜利折实公债 6793 份,募捐寒衣 1046 套,募捐救济米 1262 公斤。1952 年,先后组织特产石灰、沙缸、剪刀、药草等工、农、副产品参加苏南地区的物资交流会和展览会。嗣后,又组织三批工商业户

分赴无锡、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学习及业务洽谈。

第三节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社会秩序

一、剿匪肃特

句容地处宁镇山脉和茅山丘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南京东南门户,石城左臂,宁镇必经之道”。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统治较为严密,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句容大肆搜捕新四军留守人员,残害革命志士。句容解放后,由于匪特的基础尚未完全摧毁,公开的匪特已被消灭,但残留的匪特并不甘心失败,转入地下秘密进行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严重影响了句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此外部分党员尚未彻底清除麻痹思想,逃荒者与外地难民大批来到句容,因此,句容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

1949年10月9日至12日,县政府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与各界代表共同商讨支援前线、消灭残匪、肃反肃特、建设基层政权等工作。县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及公安干部会议,县委书记洪天诚亲自部署剿匪肃特任务和传达学习苏南人民政府公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指示精神,分析敌情,认清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1950年4月7日,中共镇江地委发出《加紧剿匪肃特,切实保护国家资财,保卫生产的指示》,县委及时作了传达贯彻。8月,县委又专门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地委“恢复生产、救济灾荒、剿匪肃特、反霸斗争”的会议精神,同时,成立句容县保卫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肃特工作。

解放初期,句容境内有各种匪特38股、500余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土匪,以颠覆政权为目的,共有21股、460余人。另一类是经济土匪,以掠夺财物为目的,共有17股、100余人。匪特组织的破坏活动相对集中在县区交界、城乡空隙地区,或集零为

整,或化整为零,昼伏夜行,四处流窜。其主要手段和罪行有:

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武装匪特“江南救民总队第二支队”于1949年10月在袁巷一带活动,冒充区中队战士,到群众家中查户口,放枪示威,散布谣言。1950年初,该伙武装匪特在八区东阳镇散布谣言,扰乱人心。

抢劫财物,扰乱治安。1949年4月句容解放,国民党军队溃逃的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土匪乘乱私闯民宅,抢劫财物。1949年全县发生抢劫案21起,1950年发生抢劫案22起。

破坏线路,阻碍通讯。1950年,宁杭公路天王至句容、句容至黄梅、天王至溧水路段数十公里的电话线多次遭武装匪特严重破坏。

打入内部,窃取情报。1950年,匪特“苏南民众反共行动总队部政工大队”在县城周围发展组织,将六区元通乡的一些干部发展为匪特成员,建立情报基地,向农民要粮,妄图开展游击活动。匪特“苏南人民反共纵队第五大队”还在六区将4名区干部、6名村干部发展为特务成员。

煽动群众,哄抢公粮。1950年因春荒群众生活较困难,少数坏分子乘机煽动少数人哄抢国家公粮,仅2月至3月就发生哄抢公粮8次,抢走公粮10万余斤。匪特组织“忠义救国军”四处张贴反动标语,威吓群众不准为政府送公粮。1950年农历正月初八,句容县六区金山、虬山等乡农民到西地粮库运送公粮,匪特赵天福趁开仓之机,带头煽动群众哄抢公粮7000余斤,区乡干部赶到制止时,也被围攻殴打致伤。3月,句容县古隍乡武相村粮库人员在送公粮途中,被匪特煽动群众哄抢稻谷、黄豆5.5万余斤。

针对匪特的猖獗破坏活动,县委县政府和驻句容部队,把肃清匪特,保卫人民政权作为中心工作和首要任务。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成为剿匪肃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并在武装匪特活动猖獗的重点地区派驻部队。乡村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和护村

队,开展夜间巡逻放哨,配合政府清剿匪特。

根据匪特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实行公安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军事围剿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剿匪肃特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总队及区中队,主要负责军事清剿。县总队把武装力量部署在茅山、宝华山,逐步压缩敌人,力求全歼。县公安局负责掌握全面情况,开展侦察工作,对分散小股匪特,有重点有目标地进行突击。县交界区是匪特经常活动之地,则在上级领导下,友邻县区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对在政治、军事围剿中少数闻风潜逃的匪特,则用发通缉令等形式,请兄弟县市公安部门配合,清查残匪,消除隐患。

1949年6月至1951年12月,剿匪肃特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共破获残余匪特20余股,捕获匪特250多人,缴获长短枪105支、子弹2927发,手榴弹29枚,委派令30张等。

剿匪肃特斗争的胜利,是巩固人民政权的一场军事和政治行动的胜利,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全县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组建地方人民武装

1949年4月15日,句容县公安局在扬州市南下干部驻地筹建,褚玉祥为局长。4月26日,褚玉祥从镇江带领7名南下干部到达句容县城。4月27日正式接管句容警察局,接收警察局留守人员58名,同日,句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成立。

1949年6月,镇江军分区从主力部队调派2个连队,与句容县新组建的4个连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总队。7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大队,1951年5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独立营。

1950年1月,苏南军区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指示》。4月,句容县武装部成立,这是中共句容县委领导下的军事部,接受镇江军分区领导,人民武装部的干部由地方党委调配。1951年4月,《苏南区各级人民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行编制》中,武装部列为区县群众团体系列。7月,李永月任县委武装部部长。1952年6月,句容县武装部撤销。12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人民武装部,张新光担任首任部长,中共句容县委书记鲁光兼任政委。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大多来自原县独立营。

地方武装的组建,为句容县收缴散兵游勇枪支、剿匪肃特、抗洪救灾、镇压反革命、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打击不法投机,稳定市场物价

解放初期,社会经济混乱,市场物价仍处在动荡之中。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支援战争的开支巨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公教人员,只要不反抗新秩序的,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恢复生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暂时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1949年长江中下游的严重灾荒,使得物资短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乘机兴风作浪,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为了追逐暴利,大批资金转向金融投机,买空卖空的商家愈来愈多,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1949年5月至1950年2月,县内曾出现3次涨价高潮。

第一次,1949年上半年,金银涨价,不法分子贩卖银元,囤积粮食扰乱市场。县长洪天诚、副县长程文发布句容县人民政府“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规定人民币为唯

一合法货币。自1949年5月15日后,不准伪“金圆券”在市面流通,规定1元人民币折合伪金圆券3500元,如有奸商故违,定于严办。人民银行开展金银、外币的兑换,举办折实储蓄,提高利率,吸收游资;同时调运粮食供应市场,确立了人民币在流通领域的地位,刹住了由金银价格上涨引起的涨价风。

1949年10月又出现以纱布领头的第二次涨价风。从10月1日至11月25日,持续时间近两个月,不法商人乘解放区不断扩大、工业品需求增大、流通加速之机,抬价争购货源。国营公司在11月下旬向市场大量售出棉纱、棉布、大米、面粉等物资,工商部门加强管理,使物价趋向缓和。

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商人见旺季到来,掀起第三次涨价风,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一倍以上。由于国营商业公司三个月前就调集大批物资储备,当涨价风出现时,按市场价格大量出售物资,春节期间还以低于市场价供货,银行收缩银根,双管齐下,给投机奸商以致命打击。2月底涨价风基本平息。1950年3月8日至14日,六区虬山、高阳乡,三区古隍、中心乡及二区伯群乡,先后发生坏分子煽动抢劫国家粮库事件。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煽动抢粮主犯赵某某等5人被处决。1952年,市场物价普遍下跌,日用生活消费品价格一般下跌10%至20%,少数产品下跌30%至40%,农副产品滞销积压。下半年,按照中央的决定,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调整商业网点,收缩国营零售业务,统一安排市场,放宽地区批零、季节差价,提高600多种商品的批零价格,市场萧条局面随之改观。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对资产阶级和反限制斗争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从使用政治手段到使用经济手段平抑市场物价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四、减租反霸

解放前,在长期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利用雇工、地租、高利贷残酷剥削贫下中农。他们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许多农民濒临绝境。解放后,句容县反霸工作于1949年9月上旬开始布置,反霸工作主要是通过阶级教育和群众诉苦相结合进行,大体分为2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以秋收为中心内容,结合反霸来进行,只作了一些宣传动员,对恶霸未开展斗争。

第二阶段由于提高认识及恶霸分子在秋征中明目张胆抵抗,对恶霸分子进行了打击。至年底,共打击对抗合理负担的地主、富农69户,批斗恶霸分子3名,逮捕3名恶霸分子。

减租是为减轻封建剥削,初步改善农民生活,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1950年1月13日,县农协代表大会召开后,各区先后召开了乡农民代表会议、小学教师会议、群众大会、动员大会及佃户会议等贯彻减租。减租大体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思想动员的内容是谁养活谁,结合算账,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路线上是以佃贫农为骨干,团结佃中农和自耕的贫雇农。第二步是算账,同时算要减下的租子,并采用说理斗争的方式进行。第三步是减租要结合各项工作进行。

整个减租工作的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年,在秋收后群众提出了减租问题,干部对减租工作不明确,直到华东局公布了减租条例,虽明确了要减租,但如何减未研究。

第二个时期,秋征结束后,工作上以反霸和减租为中心,但还是偏重反霸。在没有反霸的地区进行了减租。

第三个时期,1950年1月9日,按地委指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反霸应在减租中来贯彻,明确了以减租为中心。2月4日,据4个区不完全统计,已减租的地主、富农415户,田地80379

亩,按减租法令减租后,退回粮食 313690 斤。

减租反霸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发动与组织了广大农民群众,初步改造了乡村政权,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从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适当满足了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三是锻炼与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以后的农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和经济秩序的初步建立

句容解放后,句容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并顺利完成征粮任务,支援了前线。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实施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政策,争取财经状况基本好转。积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着力恢复和发展 农业生产,全力以赴完成征粮任务

一、顺利完成征粮任务

为了支援解放军继续南进,消灭反动势力与建设新中国,国家必须征收公粮。征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实行粮多多交,粮少少出,按赋累进,合理负担的政策。句容县征收公粮主要是通过普遍诉苦的方式进行,确立群众交粮为自己的观念,在合理负担中以查“黑田”、评减免等为内容。在城镇主要是进行筹粮,在乡村是借地主、富农的粮,起借起点为拥有田地 23.5 亩以上。通过借粮,干部进一步认识到支援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群众阶级觉悟有

了提高。

1949年夏征。句容县政府下发《关于夏征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对征粮缓交问题作了规定：“中农以下者的贫农，应减者即减，应免者即免；中农以上地主、富农一般不能缓交”。全县动员小学教师300余人参加夏征工作，在县城集训了10天；召开了3天150多人的农民代表会议，发动农民代表在夏征工作中起骨干作用。全县直接参加夏征工作的区乡干部共有250人。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准备阶段。首先召开区乡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帮他们树立信心，教育当地干部带头交粮。其次是干部深入农村进行政治动员。第三是进行田亩登记，贯彻反“黑田”斗争。重点是通过群众评议检查地主“黑田”。第四是检查粮食准备情况，了解真正困难者，由群众评议减免，同时区负责整理临时仓库，准备收粮。

第二阶段是粮食入库阶段。召开群众会议，动员群众交好粮、快交粮，帮助群众解决运粮工具等问题。

第三阶段是交粮完成的善后工作。主要是组织农会、改造基层旧政权、清理尾欠等。

1949年秋征。句容县秋征从10月初开始布置，到11月22日全面入库，12月20日大体结束。句容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11月制定了《秋季征收公粮公草实施办法》。自上而下的进行了组织准备，培训了助征人员，成立了43个乡、350个保的秋征委员会，建立了14个乡、190个保的行政委员会。建立了永久性仓库29个、临时性仓库741个，提拔了一批干部。村组织了检查组、宣传组、互助组、运粮组。

1949年借粮原任务是150万斤，实际完成171.37万斤。1949年自报夏征原任务是739万斤，实际完成841万斤。1949年，秋征原任务2918.79万斤（上级任务2730万斤），完成3390.49

万斤。征借粮任务虽然完成,但在征粮中减免政策执行的不够好,有的应减而未减,如在 1949 年灾荒中发生农民借粮交公粮的现象。1950 年,征收中发生干部打人、扣人现象。

征、借粮任务的完成,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产救灾

1949 年夏季,因水灾倒圩堤 16.5 米,淹田 12484.5 亩,受灾 698 户、4728 人。虫灾以二、三区最为严重,造成 15760 亩绝收,收成在三成左右的有 39400 亩,灾民 20410 人。其他区虽未成灾,但均受虫害,全县受虫害田有 22.2 万亩,占总稻田 37%,减产 23%。

句容县受灾后,根据上级指示:江堤、圩堤地区以防汛抢险为中心;成立防汛指挥部,领导干部亲自到抢险地区指挥,军队到江堤抢险;抢险器材以群众解决为主,政府协助;运用原有的防汛组织动员群众抢修险堤;已成水灾之地组织排水。经过干部、军队、政府、群众的努力,共抢修险地三段、1000 米,使 5750 户群众、4 万亩农田免受水灾。按上级指示,在干部中提出正确认识灾情,明确以生产自救为主的救灾方针,在群众中宣布禁止强借,开展自由借贷。

水虫灾害后,句容县即开展冬耕杀虫,全县冬耕约 5 万亩,排水种麦 1.2 万亩。在生产自救的方针下,主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发出麻袋蒲包 10395 条、柴油 4000 斤,修筑江堤 22.5 公里,筑坝 80 个,开塘 37 个,修圩 16 个,补漏洞 45 个,共用民工 10.81 万人次,完成土方 8301 立方米,受益农田 10.69 万亩。二是解决种子粮。1950 年共贷出麦种 17 万斤。1951 年又贷放种子 21.95 万斤,解决了 43990 亩田的种子。三是在原有互助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以人工换牛工,解决耕牛不足缺劳力的困难。四是动员群众开荒。共开荒 6074 亩,扩大种植面积。

在救灾方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以工代赈组织运粮。二是政府共发出大米 20.02 万斤，稻谷 21.5 万斤，先后发放 4 次，救济了 29330 人；同时在党政机关开展了提倡节约，支持救灾，全县节省棉被 599 条、蚊帐 320 顶、大米 4969 斤用于救灾。三是开展社会互济。募捐大米 24121 斤、人民币 1076.55 元、元豆 2823 斤，临时募集大米 88646 斤，救济灾民 34244 人。四是提倡种菜种瓜以渡春荒，全县计种豌豆、蚕豆 17905 亩，种瓜 450 万穴。五是领导群众从事副业生产。靠山地区灾民砍柴卖，解决了 3 万人、1 个半月的生活费；江、湖、河地区组织灾民打鱼，解决了 1 万人、2 个月的生活费；组织灾民运柴运油、贩鱼等解决了 5000 人 1 个月的生活费；其他零星的副业生产解决了 1 万人、2 个月的生活费。除此，还反对大吃大喝，拨出了 1 万多斤的救济粮救济灾民。六是开展治螟虫运动。全县自上而下建立了治螟指挥部，全县参加群众 5.2 万人，捕捉螟虫 540 余万只。

生产自救的开展，是句容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取得的伟大胜利。

三、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蓬勃开展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制定了爱国公约。当捐献运动蓬勃开展后，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公约，把具体的增产捐献计划等列为公约的重要内容。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指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发出捐献飞机、大炮和推广爱国公约通告的同时，提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口号，以增加收入作为捐献之款。许多地方把爱国公约、劳动竞赛以及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号召人民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4月5日,句容县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在县互助组组长会议上发起。至4月底,参加向苏南挑战的有2个组,向苏南应战的有24个组。至9月16日,全县有2662个互助组、414家单干户参加,参加苏南竞赛的有26组,参加县竞赛的有328组,参加区竞赛的有2628组。还发起了水稻千斤丰产竞赛活动,参加的有691户,参加竞赛田为1327.2亩,比上年增产四成多。

运动深入至农村后,还有村与村、干部与干部、组与组的竞赛。根据上级指示,以互助组为基础、劳模及积极分子为骨干,采取了自上而下、层层发动、逐步深入、普遍开展的办法进行。从县到村,都写有挑战书、应战书,活动开展面广、有秩序。

11月中旬,句容秋收全部结束,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改进了生产技术,实行了深耕细作,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参加竞赛的水稻田产量打破句容历史纪录,平均亩产量420.7斤。

1952年冬,全县参加冬小麦生产竞赛的有87个乡、408个村、2261个组、26642户。句容县一区大同乡运用典型示范全面推广的办法,推动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开展。

四、兴修水利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因地制宜,常抓不懈。据1949年调查,全县有大小塘坝7.2万个,总蓄水量6900多万立方米,按44万亩岗垆田计,平均每亩耕地获水量不到157立方米。解放后,除改造老塘坝外,修筑坝堰多数是利用自然河道的中、上游分段建筑梯级坝。1951年,派专人协助苏南水利工程局人员与区乡水利委员会,进行勘查和计划。至1951年年底,出动人工24180个,挑土38860立方米,共修塘168个;新开塘12个,挑土13740立方米,共出动人工9105个;修涵洞10座,共出动人工480个;修筑圩堤13个,

挑土 2760 立方米,共出动人工 1930 个;水利工程总受益面积 34982 亩。1952 年冬,袁巷乡兴建了苏南首批小水库—小马埂水库,集水面积 2.6 平方公里,总库容 101 万立方米,灌溉 700 亩。在农业合作社统一规划下,选择一个冲或几个冲的交汇处,筑一道土石坝,拦蓄一冲或几冲上游来水,建成临时水库、屯水库,并从小到大,逐步提高。

五、农业互助合作的初步开展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并未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和状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所有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谨慎、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农业向着社会化、集体化方向发展,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句容解放之初,遭遇了洪水和虫害等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农民组织起来,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兴修水利,完成抢收抢种,农民从中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

1951 年春,全县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县委、县政府利用农民搭班生产的习惯,及时引导农民组成季节性互助组 2605 个,入组 14109 户,占总农户的 16.4%。1952 年全县组成临时季节性互助组 5757 个、35646 户,常年互助组 4292 个、33650 户,合计占总农户的 81.7%。入组田地 31 万余亩,占总耕地的 35.3%。根据华东局 1952 年下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精神,坚决贯彻稳步前进的方针,继续整理和发展互助合作组。通过宣传,整理和发展了互助组,制定计划开展竞赛。1952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1 日期间,开办 2 期互助组长培训班。各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对互助组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了互助组织,使互助组在增产运动中起带头作用。如五区通过增产节约运动后有 44 个组 444 户恢复起来在一

起干活。

句容县农业互助合作大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广泛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深入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认识，解除入社顾虑，达到自愿入社目的。第二步是召开村民大会，开始自报入社，进行民主协商，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明确规定必要制度。第三步是民主选举成立社务委员会，建立组织机构，制订生产计划与社章，做好建社的一切准备工作。第四步是召开社员大会正式宣布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通过社章与生产计划，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至1954年3月中旬，全县有互助组5944个、50083户，其中常年组1990个，18445户。

第二节 争取财政状况基本好转

一、统一财经

统一财政收支。遵照中央决定原则及苏南行署具体精神，句容县迅速进行了传达。句容当时的税收主要是公粮附加及税收附加。公粮附加：按国家公粮正额13%征收。税收附加：按其正额10%征收。

1950年，公粮附加收入，依照农税法依率计征的任务完成，税收附加也完成任务，共征收附加粮（稻）559万斤，已超过1949年公粮附加收入实征数额。税收附加共征收附加现金7098.36元。

供给制标准的执行与经费调度。句容县执行中央规定的各项标准和供给制度，贯彻节约原则。4月，句容县完成供给制标准与人员的编制等工作。做到控制统一编制，核实人数，并加强预决算的审核及经费管理。依中央标准规定，15公里可以乘车，为节省开支，规定县境内来往除特殊情况（病号、体弱、工作紧急、任务重要），并电话请示财委会批准后，才准予报销外，其余一律不准乘车，仅5月差旅费就节余300余元，在全年11月中共节余730.88

元。在发放蚊帐时,严格按照节省开支的原则,结余上解数占预领数 12%。按照无预算不开支,有预算不超过的原则,1950 年(12 月未计算在内)总计结余现金 16137.39 元,大米 7.15 万斤。开支的原则是维持现状,可以缓办的缓办,可以不办的不办。除行政费、乡干粮按提拔的实有人数发给外,其余各科目均有节余。

统一物资管理。1950 年 7 月,县级单位组成清委会(7 人),县长任主任委员,县政府与县委联合通知县属单位与各区分别成立 3 人清查小组,领导参与执行清资工作。7 月 25 日,县清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查各单位清理物资登记表,并要求各单位将已登记的物资上解。计清出大米 575 斤,金戒 2 枚,牲口 3 头,废铁万余斤及其他零星物资等。11 月,招标出售生产救灾中下拨的车胎、废铁等主要物资。出售破旧军衣、军毯给机关供给制干部,清理出售大部分仓库物资,并将出售款汇交苏南行政公署。

统一现金管理。句容县实行经费民主管理。凡是包干制的会议、学习、自行车修理等费,都核定给各单位自行调度,而县财委会仅掌握了医药费的调度。开支是由财委会讨论决定后,财政科具体执行。苏南行政公署下拨的自行车是经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决定后分配的。修建费的分配首先是派专人到各单位了解具体情况,再征求各部门负责同志的意见,根据实际需要与上级批发数,合理分配使用。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

据 1949 年 12 月统计,全县人口约 30.5 万人,工商业 1553 户,按人口比重,工商业不发达。一般消费者如需大量物资,均直接向南京购买,既便宜又方便,因此工商业在发展上受到限制,各市镇商店 90%以上是小店铺,最大商店流动资本只有 5000 元。

1950 年 3 月经济调查,工业方面:八区龙潭镇有水泥公司 1 家,解放前为官僚资本经营,解放后,归人民所有,由南京直接领

导,其余在九区普渡乡,有煤矿 12 家,规模较大的为江南煤矿公司、同成企业公司,大都是农民集资经营。商业方面:布业 111 家,粮食业 129 家,百货业 65 家,烟、茶叶 81 家,麦食业 58 家,豆腐坊 23 家,浴室 12 家等。

句容处在南京外围,到南京交通便利,决定了句容经济上依靠南京,县境内大部分工业物资由南京运来。因此句容各市镇市场物价动态变化受南京市场物价变化影响很大。

1950 年初,物价稳定以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产生了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增加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与共产党关系日趋紧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0 年春夏之际,政府开始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

1950 年,句容县根据当时情况及力量,在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治理摊贩、粮食业管理时,以城区为重点着手进行。

调整公私关系。依照上级指示原则,结合句容实际情况,广泛听取私商意见与要求,与公司、合作社研究后,在兼顾私商合法利润及消费者的利益下,将主要物资的批发与零售价格及货物起售点,均作了适当调整。经过调整,提高商人经营的积极性,并在工作中教育商人,使其对国营公司有正确的认识,放弃过去对国营公司错误看法与不合理的意见,并促使其打消了高利思想,教育其要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同时让国营公司的人员认识到掌握市场物价、领导私营公司,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必须主动团结商人,与他们取得密切联系。

调整劳资关系。句容在工商业登记工作中结合调整工商业。在收购期间,未将粮食业的度量器具进行校准,影响农民的利益。全县主要市镇粮食业进行校准计量器 171 件,衡器 146 件,减少了粮商欺骗农民最主要手段,使市制在粮食业进出上统一了。在城区、下蜀、龙潭组织召开劳资协商会议,劳资间发生的问题,能及时

得到合理与满意的解决,减少过去劳资间存在的隔阂与意见。

治理摊贩。句容县进行摊贩正式登记,并重新整顿,会同公安部门,对每户摊贩严格审查,许可的发给营业证,对投机的摊贩进行教育,坏分子给予取缔。并动员 5 户大的布摊、百货摊转入坐商。取缔投机商人,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如天成布店在市场布卖缺时,囤积隐藏棉布 44 尺,等涨价获取厚利。有的商户吸收存款,隐藏资本后投机,查出后,除分别给予停业处分外,还需在大会上向群众悔过。结合贸易部取缔投机商业的指示,广泛对摊贩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通过时事学习及抗美援朝运动,摊贩订出了爱国公约。

粮食业管理。解放前后,粮行在秋季大量盲目开设粮号,粮商采取投机取巧等多种手段来欺骗农民,对市场秩序、城乡物资交流影响很大。1950 年,县政府对粮食业进行严格管理、限制开设。不批准粮行开设粮号,规定资本 3 万斤至 5 万斤大米,必须经过验资。通过教育,粮商改变了经营方式,树立了为农民服务的观念,没有发生亏空逃跑等事件,投机取巧等非法行为日趋减少。

通过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恢复和发展了私营工商业,保证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

三、供销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1950 年 5 月,县供销合作总社和县城城区供销社成立。初时,主要经营大米、豆油、火柴、香烟、肥皂、土纸、锅碗、布匹、日用百货等,并代销食盐,还受中粮公司委托代购稻谷、代销大米,供应豆饼。1950 年秋,在一区元通、二区陈武庄、四区延福、六区谢桥、七区下荫、九区下蜀等地先后创办了供销合作社。至 1952 年,全县兴建基层供销社 22 个,入股社员 59252 户,股金 88290 元。县供销合作总社初期设总务、社务、业务、会计 4 个股,配有干部 18 人。1954 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供销合作

社章程(草案)和基层社工作人员奖励试行办法。1955年3月全县按行政区划建立10个区社和48个供销社。

四、扩大城乡物资交流

1951年3月,根据华北、华中、华东某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中共中央认为:有计划地召开土产会议或者土产代表会议,组织城市和乡村间,地区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打开国内市场,活跃城乡经济,是解决各地农村日益恢复和发展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问题的关键。并提议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专区,各县(市)、各区和各乡,均应有准备地在两个月以内召开一次土产会议。1952年7月18日,镇江地委发出通知,指示各县(市)分批举行城乡物资会。由于华东、苏南城乡物资交流会的推动,句容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在句容逐渐开展。

1952年7月20日,句容县召集人民银行、百货公司、中粮公司、税务局、公安局等16个单位,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业务处、宣教处,分头负责筹备工作。8月5日至9日,在城区召开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大会的方针以零售为主,批发为辅。交易分三类,第一类是各国营公司与私商的零售交易。第二类是交易所的批发交易。第三类是各国营公司、合作社和私商的收购业务。这三类交易互相结合,成交总额141175元。参加该次交流大会的私营工商界代表27人,国营、合作社代表9人,各区政府代表11人,农民代表27人,参加的群众约12万人。城区物资交流大会有南京、镇江、丹徒、江宁等地商人参加。大会设立了4个服务站,准备了1300多个铺位,接待了2278个路远来不及回家的农民。还设立了工业品与土特产品、农业生产、卫生3个展览室。

1952年下半年,句容龙潭、下蜀、天王等6地也都举办了交流会。句容县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和秋后旺季的特点,11月10日成立了城乡物资交流委员会,下设秘书、业务、宣教、治安卫生等4

个处。

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提高了干部思想认识,明确了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意义,助推了本地工业品下乡。同时使农村工业原料进城,打开了土特产品销路,通过城乡互助,活跃了城乡市场,繁荣了城乡经济,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第三节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一、教育事业的改造、建设及扫盲运动

解放前,农民生活比较困苦,受教育仅是少数地主、富农阶级的特权,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学龄儿童往往因负担不起每年200斤稻子的学费而上不了学,纵然也有上学的,但读到9岁或10岁也多因贫失学。

小学教育。1949年3月,句容解放前夕,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29所,保国民学校257所(其中私立101所),教师475人,学生17267人,工友51人,入学儿童占全县学龄儿童总数的31%。这些学校校舍、教育设备极其简陋。全县教育发展不平衡,558个保中有191个保没有学校,边缘地区、山区空白村比比皆是。新中国成立初,教学活动强调把政治、党的中心工作贯穿到各科教学中去,提倡学习老解放区教学经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句容解放后,在“维持现状,全面开学”办法下,全县城乡公私立小学很快复课,部分学校未曾停课。1949年下半年,全县小学286所(其中民办185所),399个班(其中民办203个班),学生17267人(其中民办9657人),教职工475人(其中民办212人)。原国民党时期的训育制度与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被取消,体育主要以步伐操练、体操、游戏为内容。1950年,伴随着土地改革,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文化翻身,纷纷送子女读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县小学391所、513个班、学生17318人、教职工583人。1951

年后执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四二制”小学教学计划。1952年,县人民政府将356所民办小学中的324所转为公办,使公办小学达到487所。全县共有公、私立小学519所、713个班、教师846人、学生28702人,占全县学龄儿童40926人的70.13%,与1949年小学生数相比增加了66.2%。县创办初级师范培养老师。在抓师资的同时,对教学内容作了调整和改革。对留用教材中的错误内容进行删除。1953年,根据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县制定《句容县小学教育整顿方案》,将511所公办小学调整为495所。

中学教育。1949年4月初,全县除国立豫州临中、省立句容临中、中华三育研究社中学部外,尚有公立县中,以及方济、长江、自忠、建华、述三、省心6所私立初级中学。县中、方济、长江、建华4所初级中学共有教师52人,学生812人。句容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接管学校。县中教导主任王存诚在句容解放前已与中共地方组织发生工作关系,并在城区教育界积极活动,因此解放前后,城区学校一直未停课。解放后,因人手不足,未派专人接管文教科,在王存诚等人密切配合下,顺利地对中等学校进行了改造。自忠中学、建华中学和省立句容临中全部停办,国立豫州临中的学生有的被遣散回家,有的迁往浙江省菱湖上课。1950年,全县有县立中学6个班,私立方济初级中学3个班,私立龙潭初级中学(原述三中学)4个班,私立长江初级中学4个班,计17个班,学生744人,教职员53人。1950年秋,参照部颁《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各中学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等14门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学的修业年限为6年,分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3年,均得单独设立,初中入学年龄为12足岁为标准,高中入学年龄为15足岁。

幼儿教育。解放后,县城镇幼儿园按照教育部提出的“保教合一”的原则,做到既重教又重保,保育员与教养员分工不分家,相互

兼顾。1951年,县人民政府在城镇府君巷创办公立幼稚园,2个班(大小班各1个),幼儿84名,教职员工4人。根据政务院规定,年底前改为幼儿园(1955年改为城镇幼儿园)。1952年,城镇幼儿园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定(草案)》,注意培养幼儿卫生和锻炼身体的习惯,保证幼儿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并对大班幼儿建立出园时健康记录表。1952年,县城、下蜀、天王3所完全小学各附设1个幼儿班,全县幼儿园5个班,171名幼儿,7名教师,隶属文教科。

文化扫盲。解放后,句容县政府十分重视成人教育。1949年12月,县成立冬学运动委员会。在农村开展冬学运动,动员男女老少上冬学、学文化。县举办2期冬师训练班,培训师资206人,开办冬学302所,入学学员1.8万多人。1950年春,基础较好的64所冬学转为常年民校。同时,县城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县机关也办了干部业余学校。1951年,县成立工农业业余教育委员会,举办2期师训班,培训师资422人;年底办起冬学755所,入学4.8万多人。1952年秋,县政府抽调干部、教师7人,参加苏南行署举办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训练班,开展扫盲运动。县、区均成立扫盲办公室。龙潭、天王、下蜀、三岔等集镇陆续开办业余学校10所、25个班。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起步

1949年5月18日,县中学生专门成立秧歌队开展文娱宣传活动。5月下旬,私立方济中学,在校长徐克强带领下,下乡宣传,在张庙大院内举行合唱、跳秧歌舞、打腰鼓、演活报剧,庆祝江南的解放。9月,成立句容县人民阅览室,1950年9月正式成立句容县人民文化馆,并在9个区分别建立中心俱乐部。其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心工作,运用黑板报、幻灯、读报、展览会、文艺演唱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利用夜校、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文艺演唱等。当时读报组遍及县城每个居民组和农村大的村庄,

村村办有夜校或识字班。1951年10月,县设收音站,抄收苏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记录新闻,油印分发,供县城各黑板报使用。1952年9月,前无锡市文力锡剧团由苏南人民政府公署分配到句容,定名为句容县文力锡剧团,为首个专业剧团。

三、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

句容解放后,句容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县公医院,改称句容县人民医院(1951年4月改称句容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并增加了工作人员。1950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县政府又扩建了县人民医院,增添了设备和器械,人员增至17人,开始分设内、外、妇三科和门诊、病区两大部分。

1951年土改结束后,农村集镇的个体中西医医生根据自愿的原则,开始组织联合诊所。1952年9月,县政府在天王集镇建立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乡卫生所。同年,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细菌战”的号召。县成立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县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从城镇到农村,家家户户普遍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层层建立爱国卫生组织,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

1951年4月,县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简称“卫生协会”),承担全县部分预防接种工作任务。1952年春,鼠疫疫苗注射完成128577人,四联疫苗注射一期完成137000人。1952年,各种预防接种670756人次。

新中国成立初,大多数产妇、特别是农村产妇分娩都是采取老法接生,易于感染或出现产后出血等并发症,严重威胁着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1951年开始,改造旧接生人员29人和培养新接生员。1951年6月,在全县选拔了有文化的优秀农村青年妇女27人,举办第一期妇幼保健培训班,经过1年专业培训后,于1952年结业,分配到全县各区新成立的妇幼保健站工作。

第三章

开展“三大运动”，进行民主改革

土地改革是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抗美援朝时期，句容人民广泛开展支援志愿军的活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人民纷纷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及其家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前线战斗。改革封建婚姻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改变。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主改革运动，明显改善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政权，振奋了民族精神。句容人民正是从这一系列民主改革给社会面貌、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切身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荡涤旧社会各种污泥浊水的决心、胆识和魄力，更加努力地投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生活的伟大斗争中。

第一节 土地改革运动

一、土改前各阶级占有农村土地情况

土改前，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大量土地，且土地质量好。雇农拥有土地 66956 亩，占总耕地的 9%；贫农拥有

土地 135032 亩, 占总耕地的 18.15%; 中农拥有土地 254433 亩, 占总耕地的 34.2%; 富农拥有土地 63236 亩, 占总耕地的 8.5%; 地主拥有土地 185245 亩, 占总耕地的 24%; 工商资本家拥有土地 7439 亩, 占总耕地的 1%; 小土地出租者拥有土地 31541 亩, 占总耕地的 4.24%。1950 年春, 县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作初步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占有土地, 自己不劳动或附带劳动, 靠出租土地或雇工剥削者, 约占农村总户数的 4%, 其占有土地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25% 左右。全县佃农共有佃田 17.5 万亩, 山 0.7 万亩, 荡 0.9 万亩, 占总耕地的 26.1%。

二、土地改革的试点及准备工作

1950 年 5 月 14 日, 中共句容县委决定, 成立土地改革工作队, 并决定在四区延福、淮源两乡试点。6 月,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土地改革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县委土改工作队在县农民协会主席魏永贵的带领下, 认真贯彻“谨慎小心, 稳步前进”的方针, 历时 52 天完成工作。同时采取“推、跳、带”的方法, 组织骨干力量, 把试点工作推到附近的王庄、水南乡, 跳到五区蔡巷乡、六区虬山乡及三区敬德乡, 带动每个区一个乡进行试点。

试点中, 通过各种会议, 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 联系农村中地主阶级压迫贫苦农民的罪行, 进行阶级教育, 启发农民自觉, 对罪行严重、对抗土地改革的恶霸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县城北郊, 大恶霸包某某, 曾亲手杀害新四军和群众多人, 解放后在借粮支前工作中, 造谣惑众。城乡 2 万多人集会与之斗争, 受害群众拿着当年包犯杀人的屠刀和血衣, 愤怒控诉其罪行。政府依法惩处, 人民扬眉吐气。四区延福乡 30 个地主, 任职在位的有 15 人, 他们依仗权势欺压百姓, 群众称“上古村一只狼(指地主王某某), 下古村一只虎(指地主张某某), 一狼一虎, 百姓受苦”, 经过说理斗争, 打击

了地主的嚣张气焰,保证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试点同时,1950年6月,县委、各区委领导人和青年团县、区委书记,分别集中到苏南区党委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接着县、区干部119人到镇江地委学习。8月至10月,县里共进行了3期土地改革轮训班,历时58天,参加学习的学员有855名,其中男761人,女94人。11月,镇江地委调配干部95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来学员102人,华东农委调配36人,加上本县干部共同组成土改工作队,共1847人。12月20日,县委在县城举行土改誓师大会,到会干部、积极分子及土改工作队共3000余人,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做好组织和行动准备。

三、全面土改

全县面上土地改革从1950年12月下旬开始,到1951年3月基本结束。发证工作到1951年10月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大体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宣传发动。主要通过召开乡农代会及青年、妇女、民兵等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揭露地主分子的阴谋活动。在宣传发动过程中,对敌人的阴谋活动给予有力的批驳和斗争。全县有53.2万人次参加各种土改工作会议,开会批斗不法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198次,查出瞒报的黑田、黑地22700多亩。

第二步是划分阶级成分。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各乡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小型座谈会,具体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学习划分阶级成分政策,根据土地占有和剥削被剥削的状况,经群众评议分别评出各户的阶级成分并张榜公布。全县农村共70443户,302109人,共划出地主2804户、9814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98%和3.25%;富农1215户、3638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1.72%和1.2%;中农19907户、94420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

的 28.26% 和 31.25%；贫农 37337 户、166685 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53% 和 55.17%；雇农 6204 户、18612 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8.81% 和 6.16%；工商业在农村占有土地 215 户、645 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0.31% 和 0.21%；小土地出租 2459 户、7377 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3.49% 和 2.44%；其他 302 户，包括未划分成分的 75 户。

第三步是没收土地进行分配。阶级成份确定后，乡农民协会按照土地改革步骤，讨论没收征收范围，明确政策界限。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 254677 亩、房屋 45959 间、粮食 31.3 万斤。对土地财产的分配，一般先分土地，后分其他财产。土地按人统一分配，以各户原使用土地为基础，抽多补少，好差搭配，远近就便，高低适宜，注意水口。其他财产多分配给贫雇农，适当照顾困难的中农。分配结果，全县有 6.3 万户、17.9 万人，分到了土地和其他胜利果实，分别占新农户的 75% 和总人口的 59%，地主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和财产。土地改革后，农村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为：雇农 160694 亩，占总耕地 21.6%；贫农 250659 亩，占总耕地 33.7%；中农 283266 亩，占总耕地 38.1%；富农 14552 亩，占总耕地 2%；地主 18628 亩，占 2.5%；小土地出租者 14754 亩，占总耕地 2%。

复查发证。1951 年 3 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在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发证，全县复查出漏划地主 339 户，半地主式富农 55 户，富农 86 户，工商业兼地主 42 户，纠正错划地主 23 户。对部分村干部多分土地、房屋、家具、粮食问题，也在复查中作了妥善处理。1951 年 5 月，县在一区大同乡、七区城东乡先行颁发土地证。全县 9 个区 92 个乡先后分 3 批发证，至 10 月底发证全部结束。共给 84764 户合计发土地证 193557 张，土地面积 1109194.18 亩，房基地 22703.12 亩。另给 738 户全民、集体单位颁发土地使用证 748 张，土地 1949.03 亩。

四、土改后农村的巨大变化

土地改革是一场涉及几亿农业人口和广大社会范围的民主改革运动。句容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句容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4年11月,句容县普渡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中农9户,贫农33户。土改前,大部分农民是受剥削的,生活贫困。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生产,劳动热情很高,战胜了自然灾害。1951年修大堰1个,1952年至1954年修塘19个,能抵御旱灾。生产上获得连年丰收,产量逐年增加。1950年水稻亩产量为180斤,1951年为310斤,1952年为380斤,1953年450斤,1954年为520斤。小麦产量也是逐年增产。

随着生产的提高,农民生活逐年改善。据不完整统计,该社42户,1952年买布862米,1953年买布1156.67米,1954年买布1727米。此外,至1954年9月,还增添卫生衣30件,水瓶10个,棉被39床,毯子4床,蚊帐8顶,衣服(人民装)39套,修造瓦草房17.5间等。

各乡村在发证前,都把旧的土地契约当众烧毁,宣告封建土地制度的废止,新的土地制度的诞生。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句容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土地改革中,由于时间短,执行政策中也出现偏差。如同地主阶级开展面对面说理讲法斗争时,由于忽视了对贫农、雇农的耐心的思想教育,曾出现对地主采取变相的体罚。六区高平乡有57户地主,斗争中被吊打的有50户、60人,复查中接受了教训。

第二节 抗美援朝运动

一、抗美援朝宣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解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10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北朝鲜,迅速朝中国边境推进。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句容县委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工、农、青、妇、文教、医务、工商等各界代表29人,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句容分会”,并先后在全县10个区、3个镇成立支会,其中天王支会还设立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

继苏南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后,句容县召开了308人的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抗美援朝运动已开展的基础上,根据苏南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决议精神,贯彻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六一”三大号召的工作,各区与乡的抗美援朝支会相继成立。

1951年4月22日至25日,句容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通过继续普遍地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决议。5月1日,全县有15万人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广大群众纷纷在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书上签字。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有23.3万人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和平宣言上签名,约占全县总人口的74%。

1953年1月2日,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县委书记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县级机关干部全部参加),布置抗美援朝工作。4日,赴朝慰问团代表张来生作传达报告,全县有4000余人参加。

二、掀起参军热潮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团中央、全国学联于次日分别发出《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国青年团员书》和《为号召同学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加强国防建设告同学书》,要求青年团员和学生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全国青年学生、工人积极响应,把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作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全县有700多名在校初中生报名参加志愿军,因名额限制,只录取356人。1951年3月,全县各乡近万名青年报名参军,967名青年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名参军活动中,涌现出许多争先恐后报名,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参军的动人事迹。第一区青年胡万民,于深夜11点敲区委大门,送交要求参军的决心书。张庙乡烈属汪立保第二个儿子在朝鲜战场牺牲后,又把第三个儿子送去参军。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县有73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光荣献身。

1952年12月29日,县委接地委指示后,制定计划。计划分三步:第一步是1953年1月13日前,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由干部到群众,广泛进行抗美援朝教育,达到家喻户晓。第二步是14日至25日,县开好干部扩大会议、人代会。进行突击动员,对新兵对象进行动员教育。第三步是集中新兵对象,进行体检检查,做好巩固工作。加强教育,主要以抗美援朝形势教育为主,结合阶级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在教育形式上,运用各种组织力量,多开小型群众会,反复教育,深入解决思想问题,造成“参军光荣,拖腿可耻”的氛围。这次参军人员的最大特点是骨干多。新兵条件也较好,全县4392名青年报名,经区检查合格的941名,县检查合格的是636名,第一批送镇江621名,后经镇江检查退回一批,又补送

35名。至月底,运动胜利结束。

参军运动是广大群众永保翻身不受二遍苦的合理要求,是群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自然结果,也是对全县群众进行的一次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教育,扭转了干群的和平麻痹思想。同时推动了拥军优属工作,烈军属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为实行普遍民兵制及其他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捐献活动

1951年6月1日,为了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确保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简称“六一”号召),号召在全国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六一”号召强调指出,各地各界群众已经订立的成千成万的爱国公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具体化,是各订约单位的具体的爱国行动纲领。它要求全国人民抓紧并充分运用这种形式,进一步推进生产、工作和学习及其他各项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建议全国所有各界人民,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按照自己的业务,围绕抗美援朝运动,订出具体的爱国公约;还建议在性质相近的订约单位间开展实现爱国公约的竞赛运动。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句容分会发出履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的号召。7月2日,县召开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从县城到农村,掀起修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拥军优属的热潮。修订爱国公约的多数乡是以户为单位订立的,无一空白村,有的是以组订的,也有户与团体皆订的。全县有92个乡,订立爱国公约的户在90%以上的有36个乡,在80%以上的有31个乡,在70%以上的有15个乡,在60%以上的有5个乡,在50%以上的有5个乡。四区延福乡陶义福互助组订立的爱

国公约保证每亩水稻平均产量 475 斤,最高亩产 800 斤,每亩棉花产量 125 斤,最高亩产 200 斤,每亩小麦平均产量 120 斤,最高亩产量 140 斤。该乡第三村在劳模陶义福的推动下,首先订好增产捐献计划,然后大家积极地耕种、施肥,保证计划的完成。在稻子收割后,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大家一致表示将要捐的 6300 斤稻子赶快上交,以支援前线。全县共捐献 215367.9 元(新币值),可购置 1 架战斗机和 1 门大炮,另有慰劳金 4052.4 元,慰问信 1000 余封。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为自己制订的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行动计划,运动的开展有助于将人们的爱国热情转变为爱国行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四、开展拥军优属

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是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1951 年春节,县委县政府给烈军属及残废军人赠送“光荣灯”2916 个,“光荣牌”4110 块,送慰问品猪肉 1979 斤,鱼 942 斤,糕 1940 条,茶叶 120 斤,人民币 537.6 元。1951 年至 1952 年,对烈军属除在物资上、子女入学方面优先照顾和补助外,对在农村中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实行代耕、代种、代收。通过各种群众运动与教育,他们的政治地位在群众中有了提高,个别村庄还实行了包耕等竞赛活动。

代耕工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与苏南行署关于优抚代耕工作的指示精神,句容县先后于 1952 年 3 月 20 日和 4 月 10 日两次下达代耕工作指示。1952 年句容县制定《评选优抚模范暂行办法》。至 1952 年 12 月上旬,全县有革命烈士家属 514 户、1940 人、4302.45 亩田;革命军人家属(包括一部分转业的在内)3075 户、12343 人、15375 亩田;革命工作人员家属 568 户、2434 人、4208.43 亩田;革命残废军人 136 户、468 人、546 亩田。全县共

4293户、17185人、24431.88亩田。全县享受代耕和包耕的2704户，代耕和包耕田11490.59亩。在先烈军属后自己的号召下，大大提高了代耕田亩的收益，不少代耕田亩产超过了当地群众的生产水平。

发放优属粮。1952年春夏雨季，结合社会救济，先后发放优属临时救济粮4批，计大米27万斤，救济了12933人。从6月至12月，先后评出7个区享受烈军属补助粮的82户、156人，每月补助大米2455斤。二、三、四、五、六、九6个区，有518户烈军属、2152人，得到了老根据地救济经费的补助，共补助人民币2400元。1952年春耕期间，发给二、三、四、六4个区烈军属生产补助金1100元，解决了288户烈军属、1152人生产上的困难。

优抚活动。在1952年春节及“八一”建军节期间，各区均开展群众性的优抚活动，组织了慰问、拜年，赠送慰劳品、光荣牌、光荣灯等。如在“八一”节期间，城区开展了文娱晚会慰问烈军属；八区组织了800余人分别到部队驻地慰问，赠送锦旗7面，晚上放电影进行联欢；农会、工会、工商界送慰问品西瓜1225斤，鸡蛋556个，毛巾125条，肥皂125块，人民币42.78元，慰问信32封。此外，各公私营企业单位在“八一”节也都给予烈军属购买物品的减价优待活动。

拥军优属活动的深入开展，树立了军属光荣的良好社会风气，不但调动了烈军属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鼓舞了前方战士的士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第三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解放前后严峻的政治形势

解放战争时期，句容县党部拟定《收复区共产分子处理办法》，制定报表，实行“助导”，强制所谓“共产分子”申请填报自首，抗拒

者入狱。县议会通过《加强民众团体活动案》，规定句容县商会、工会、农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民众团体都在县党部办公，实际是将民众团体置于县党部的监督控制之下。建立党政工作总队，乡（镇）建立区队，保建立分队，采用法律、军事手段进行反共活动。同时，国民党还培养了很多封建帮会头子，各霸一方。句容山区则驻有特务武装，人民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地下破坏活动相当猖獗，其趁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机，与国际反动势力遥相呼应，疯狂破坏革命胜利果实，企图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残留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影响了句容的社会稳定。句容县政府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及时给予惩办，甚至血债很多的恶霸廖某某、包某某经群众告发虽已被逮捕，但未及时惩办。县区的领导干部思想上虽然对反革命分子有所警惕，但认为全国已经解放，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

针对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句容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期准备工作

1950年12月25日，全县召开区乡干部、积极分子760余人的大会，贯彻上级部署。首先揭露恶霸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激发到会人员的阶级觉悟。接着是开小会控诉。干部、积极分子纷纷诉出了地主阶级是怎样统治搜刮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样残害人民与革命力量的，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组织学习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要求他们逐条根据各地的情况进行审查，审查出来的材料当即进行登记，经人民法庭、公安局、法院审查后，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措施。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公安部于10月15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对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句容公安机关在中共句容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重点打击地主、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5个方面人员,整个镇反运动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这一阶段主要是贯彻“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启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认真贯彻“谨慎收缩”的方针,清理积案,消化战果。其步骤大体分为三步:调查摸底,制定行动计划;结合土改等工作任务,充分发动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举揭发,核实材料,确定捕办对象,经审查批准,组织党政军民力量统一搜捕;召开控诉和公审大会,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判处理。县委按照镇反步骤,三次集中行动共搜捕560名反革命分子。此外,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中,群众控诉揭发查证有罪行的陆续逮捕了994名,在这一期间共逮捕1554名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全国性高潮时,公安部于1951年5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实行适当收缩的方针,严格控制捕人和杀人的权限,集中力量清理积案。中共句容县委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组织21名经验丰富的审讯干部,分成7个组,负责清理在押犯,依法审判执行。1951年7月30日,首次在县城召开审判大会,公开宣判处理案犯80名。其中当场宣判处决3名案犯。

第二阶段(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贯彻9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对尚未发动镇反和镇反不彻底的地区,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斗争。县委于1951年10月27日至31日,召开机关、公安干部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指示。11月上旬抽调精兵强将,建立工作班子,负责清理积案

和到各区乡传达学习贯彻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精神，深入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至1952年4月底，全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再掀高潮，敦促反动党团、特务及会道门骨干分子登记自新，以彻底摧毁反动组织。1952年4月28日，六区破获了隐藏较深的潜伏特务“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第五大队”，挖出潜伏特务52名，其中10人已担任乡村基层干部。经过第二阶段组织干部深入到不彻底的地区发动群众，深挖潜伏较深的敌人，先后又逮捕打击了62名各类反革命分子。

第三阶段(1952年11月至1953年8月)。这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是贯彻1952年10月12日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总体要求是：必须坚持不懈地把镇反工作中不彻底的地区和不彻底的方面搞彻底；一切镇反已经彻底的地区或者接近彻底的地区，结合各项工作，迅速扫清残余敌人，巩固镇反成果，有系统地开展各项业务工作，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2年12月17日，县委召开400余人参加的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和镇江专署召开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重点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问题。1953年2月23日至3月下旬，全面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全县登记办道人员414人，连同前期阶段逮捕的反反动会道门头目，共逮捕惩处有罪恶道首44人，群众退道9718人。对各单位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结合普选开展检查验收，看对敌人打击程度是否彻底，群众是否发动起来了，基层组织是否纯洁了。经检查发现镇反不彻底的有17个乡，不够彻底的有40个乡。对这些乡进行了“补课”，掀起了镇压反革命高潮。结合选民登记审查，深挖一批隐藏较深的残余反革命分子。通过第三阶段取缔反动会道门、结合普选工作，先后又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103人。

在基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于1951年全面清理了机关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历史特务、情报组织的人员进行了自首坦白，清理登记，又侦破现行匪特组织5

股,抓捕骨干分子 67 人,根据党的政策分别给予不同处理。

整个镇反运动中,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历时两年多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反动势力,为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创造了条件,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秩序得以安宁,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此外,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出现错杀的问题。磨盘人周长兴,1938 年参加革命,1945 年 10 月新四军北撤后,奉命打入金坛县薛埠自卫团,担任秘密交通等地下党交办的工作。解放后,周长兴返回磨盘老家,参加土改反霸斗争。由于村上宗族矛盾,被诬陷“携枪投敌,叛变革命,杀害宋亚欣”等罪名,于 1951 年 1 月 15 日遭处决。1965 年原武工队指导员宋亚欣亲自证明事实经过,澄清是非。1979 年句容人民法院经复查,实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四、取缔反动会道门

新中国成立前,句容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有大刀会、一心天道、一贯道、天德道、先天道、九宫道、红三教、太慰会、二十字道等。其中大刀会、一心天道、一贯道组织发展较多,基础最强,范围亦广,分布在全县各地。全县共有道徒 1 万人,办道骨干和办道人员 400 余人。这些会道门有的曾被国民党、日伪机构操纵和利用,从事愚弄残害人民、奸污妇女、骗取财物、制造谣言、破坏革命、危害社会治安等活动。

1950 年 10 月 10 日,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公安局下发《关于取缔会道门工作的几个意见》。1951 年 2 月,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句容公安机关组织人员对全县反动会道门作了调查,据统计:办事员以上会首 177 人,会徒 9470 人。会首大都担任过伪职,有的与日伪及国民党军政部门有联系,有的则是封建地主和游手

好闲的地痞流氓。县公安机关在重点地区开展广泛有力的宣传攻势,教育争取群众,揭露封建会道门的反动面目、欺骗伎俩及罪恶事实。县政府颁布布告,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会道门,查封坛名,严厉惩办罪行重大的首恶分子。经调查取证,全县共逮捕各类反动会道门首恶分子 37 人,其中 15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 人被判处死刑,其他则交由群众管制。1952 年 12 月,句容县委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认真贯彻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1953 年 2 月,在全县又一次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惩办了一批漏网反动会道门首恶分子。

第四节 开展其他民主改革

一、开展禁毒、禁赌、取缔封建迷信活动

贩毒吸毒、聚众赌博、卖淫嫖娼,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

禁毒。解放前,国民政府曾开展肃清烟毒工作,先后成立“句容县戒烟处”“句容县戒烟委员会”“句容县立戒烟所”,但吸食烟毒问题始终禁而不绝。解放以后,句容县委、县政府开展以禁赌、禁毒为中心的专项治理。1949 年 6 月 20 日发布民禁字第 1 号布告,严禁吸售鸦片、抽头聚赌。1950 年 2 月 24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县人民积极宣传贯彻禁毒通令。据城镇、龙潭、下蜀、天王寺、土桥等 6 个集镇统计,吸食鸦片的 333 人,又吸又售的 66 人,专门从事销售贩卖的 47 人。三岔镇有水运码头通南京,是南片几个区、乡运销的结合点。1952 年 7 月,苏南行署政法会议统一部署了禁毒工作。全县开展全面禁毒,号召运、售、制、藏烟毒者自动向公安机关登记,交出烟毒烟具,同时组织力量、大力侦破烟毒案件。查获暗地继续贩卖鸦片、开设烟馆的烟毒人犯 52 名,其中惯犯 10 人,依法逮捕交司法机关判处徒

刑和管制。收缴吸毒烟具 127 件、鸦片白粉毒品 2 两,使境内吸食、贩卖、制造鸦片毒品的基本绝迹。

禁赌。解放后,人民政府即开始禁赌,1950 年人民政府发布通告,严禁赌博活动,并采取多种形式,打击赌头赌棍,取缔赌博场所。特别是通过 1951 年春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群众受到党和政府的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认识到赌博活动的危害性,赌博活动一度几乎绝迹。公安部门通过加强户政管理,对旅栈等特种行业实行治安行政管理,对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严厉打击,旧社会遗留的恶习被铲除,新社会的新风尚大为发扬,是解放后第一个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

取缔封建迷信活动。解放初期,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布告,明令取缔封建迷信活动,查处“巫婆”、“神汉”、“算命”天王、“卜卦”天王等。一段时期,迷信活动很少出现。1953 年 3 月,二区城北乡五村群众王某煽动群众又复起“冲菩萨”到光里庙上香拜神活动。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王某带头叫人扛着会旗、抬着泥菩萨,冲向庙堂上香,之后下甸、怀德、下荫、城东、西岗城北等 6 个乡 20 个自然村的群众近 500 余人,也相继抬着泥菩萨冲向光里庙烧香拜神。第二天和第三天,二、三、七区上万群众络绎而来,因无人管理,秩序混乱,看热闹的儿童被挤入水塘,放铳的人被炸伤头、手,花费 300 余元。句容县迅速组织民警深入到有关村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教育,教育大家破除迷信。同时现场制止迷信活动,对为首者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其检讨,将这一大规模的迷信活动予以制止。9 月,东昌、青山、东荆三乡部分群众又在农历七月三十日为“地藏王菩萨”做生日,设堂烧香敬神。东荆塘村也设堂烧香敬神,以求神灵保佑,赐“仙方”治病为名,进行迷信活动,引起周围 9 个村庄 200 余人参神求“仙”。句容县有关部门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对为首者进行了处理,制止了这些封建迷信活动的蔓延。

二、宣传贯彻《婚姻法》

封建婚姻制度与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交织融合在一起,构成旧制度链条中的重要环节,给大多数妇女和很多男子造成巨大痛苦,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新中国建立前夕,主要存在三种婚姻形态:以强迫包办、男尊女卑和漠视子女利益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在全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占绝对主导地位;形式上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实际上尚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改良婚姻制度,主要体现在城镇,特别是工商业较发达地区的社会上层;倡导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各解放区实行,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旧式婚姻制度的斗争。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家庭生活的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这方面的深入。10月,句容县人民政府抽调力量,深入宣传《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反封建思想,使全县人民初步懂得《婚姻法》的意义和作用。婚姻登记由民政部门负责实施,各区(镇)政府由民政助理办理婚姻登记。据当年统计,全县按《婚姻法》办理婚姻登记84对,离婚29对,解除婚约9起。1951年,民政部门共接受婚姻离异案件91件,其中,经调解无效办理离婚手续的29件,解除婚约的13件。在宣传贯彻《婚姻法》中,县妇联及各基层妇联,主动配合民政等有关部门进行宣传落实,反对包办婚姻。

为推进贯彻《婚姻法》运动稳步健康发展,1953年1月中旬,组织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县长任主任,公安局长、妇联主任、法院院长任副主任。并抽调干部成立婚姻法办公室,抽调7人组成工作组。1月25日至2月5日,在一区前林乡进行《婚姻

法》试点工作。县政府采取了由点到面分批分期进行。1953年3月16日至4月5日,在县工作组试点典型乡活动结束后,各区以参加过县贯彻《婚姻法》会议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先搞一个重点乡,城镇先搞一个户口段或一个村,以便取得经验,这一时期共完成47个乡。接着开展第二批,至4月20日基本结束。

强化干部训练。县级机关干部于1953年3月8日至14日学习《婚姻法》全文、宣传贯彻提纲等,参加的有600人。3月11日,召开了区贯彻《婚姻法》的主管及有关会议,有妇女、民政、宣教等干部50人。培训学习主要是明确运动的方针、政策、目的、《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其他区乡干部都是结合区乡整风扩大会进行的,2期培训了766人。4月5日,召开了乡调解委员会会议,85人参加,主要是解决如何正确处理运动中所发生的案件与纠纷问题。

做好群众宣传。在第一批前贯彻的乡都是先开乡委员扩大会,包括妇女代表、宣传员、积极分子、教师等。后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召开群众会,向群众宣讲《婚姻法》方针、政策、基本精神、新旧婚姻制度对比。第二批贯彻到乡时,结合春耕生产的农代会进行贯彻,到村开群众会布置生产后,即以贯彻《婚姻法》10问10答向群众宣讲。除会议宣传外,还利用幻灯、图片、广播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贯彻。3月到4月22日,共受理婚姻案件147件,已办结的74件,未办结的73件。

通过广泛宣传,全县农村有60%的人受到教育,城镇有80%至90%的人受到教育。贯彻《婚姻法》运动,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加强了家庭的团结,改善了夫妻、婆媳关系。

三、水上民船民主改革

句容解放初期,水域航道有龙潭港和桥头港,其中龙潭港有大

小码头 7 个,桥头港有大小码头 2 个。有民船 393 条,其中运输船 279 条、交通 46 条、渔船 68 条。

1953 年 1 月,句容县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开始对水上民船实行民主改革,由公安局、水上检查站、工会、民政等部门组成民船民主改革委员会,公安局长林堂任主任。在县委有关部门抽调干部 10 名,组成工作队,分龙潭、桥头两个工作组。民船民主改革工作主要分 5 个阶段。一是宣传教育。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船民对民船民主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培养骨干。在船民中选拔、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推动民船民主改革进行。三是开展忆苦思甜。在船民中选择苦大仇深人员召开忆苦大会,通过忆苦激发船民的阶级觉悟,掀起检举揭发坏分子的高潮。四是搜集材料打击不法分子对船民检举揭发的材料,工作队组织专人调查核实,严厉打击土匪、恶霸等。五是建立组织,巩固政权,发展生产。

在民船民主改革中,原有 393 条船只单位,参加民改学习的有 374 条船只单位,占 95.16%。原有船民 1667 人,参加民改学习的有 827 人。通过检举揭发和调查核实,依法逮捕土匪 2 名、恶霸 1 名、逃亡地主成员 1 名、逃亡还乡团成员 1 名。通过民船民主改革,经全体船民、渔民讨论选举,共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2 个,成员 20 名。民船民主改革于 5 月底结束,纯洁了船民、渔民队伍,维护了船民渔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第四章

解放初期党的建设及经济建设成就

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着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思想的侵蚀。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党和建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三反”运动是党在领导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同自身腐败行为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句容县委开展了整风运动,着重解决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带领句容人民发展生产,取得了粮食生产的丰收,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第一节 党的建设

一、解放初期句容党员队伍状况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除铁路干线周围(下蜀、龙潭一带)及敌之据点附近外,一般各区均有一些工作基础,但自新四军及句容县党政机关北撤后,留下来的党员均失去党组织指导。同时因当时政治环境恶劣,部分党员被抓捕,少数党员自首或叛变,一些未暴露的党员暂停了活动。这部分人的党籍,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才得到恢复。

由于以上情况,至1949年年底,全县统计共有党员189人,共有支部14个,其中县级5个,区级9个(1区至9区各1个)。党员家庭成分为工人3人,自由职业者2人,佃农8人,贫农106人,中农67人,富农3人;党员本人为工人20人,职员2人,学生34人,手工业者13人,自由职业者5人,佃农9人,贫农72人,中农34人;党员文化程度为文盲24人,初小90人,高小59人,初中15人,大学1人;妇女党员22人,青年党员64人。

二、整风运动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之后,全党整风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句容县自解放以来,在上级党的领导和全体党员、干部的努力下,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但句容县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只忙于中心工作,对各部门的工作不够关心;总结与检查工作不及时,处理问题拖拉;工作粗枝大叶、全面性差。一般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事前不报,自以为是,并存在以功臣自居的自满思想。

句容县整风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总结,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具体要求是通过总结工作,检查思想作风,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享乐的资本主义思想及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倾向,以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好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工作任务的目的。整风的方法是由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进行动员;学习文件,树立正确的整风态度;通过总结,检查工作,联系检查自己;典型示范,进行全面检查。

句容县机关在职干部的整风,从1950年8月15日开始,至9

月 25 日结束,历时 40 天,共有 165 人参加,分为四个阶段。在组织领导上成立了总学委会,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各设分学委会。城区机关部门作为总学委会领导下的一个直属单位,在分学委会下划分小组;在未进行全面检查前,一般是党内党外未分别划组,是按部门或人数划分小组;在进入全面检查后,除原有在行政上成立小组外,又在党内成立了小组。党员干部的书面检查,在通过方式上,先在党内小组会上通过,再到行政小组会上通过。在内容上除按《共同纲领》检查外,还要按党纲党章标准进行检查。

通过整风,各部门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作制度,工作积极性有了提高,发扬了民主,改善了党群关系、领导关系和南方北方干部的关系。

三、整党建党

1949 年年底,句容有党员 189 名。至 1951 年 12 月上旬,全县共有支部 27 个、党员 293 人。党员分布为:集镇及区以上机关 197 人,农村党员 96 人。全县共有农村党支部 13 个,其中以 1 个乡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支部 7 个,党员 37 人;几个乡合并建立的支部 6 个。句容县党的组织发展不均衡,党员数量不足。

根据上级提出的整理与发展相结合,并以发展为重点的方针,句容县委要求:一是在 1952 年年底前,按中央整党建党的原则对所有党组织进行一次整理,以达到提高党员思想、纯洁党的队伍;至 1952 年年底前,对没有党员的乡要落实发展党员任务。二是在一、二、四、六、八区由点到面分批建党,在三、五、七、九区有重点地建党。

句容县整党工作是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后展开。在学习的基础上,批判了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初步整理了县机关的党员队伍。同时对党员开展党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参加整党学习的党员共 96 人,检查出作风不好、有

强迫命令的 8 人,历史不清楚的 2 人。按照团结、教育、改造、提高的方针,教育了党员。参加“三反”运动的党员 78 人,查出贪污的 13 人,百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 2 人。然后自觉地将个人的历史问题、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等作检查交代。

句容县建党典型试验在城东乡进行,于 1952 年 7 月底结束;共吸收 6 名新党员。句容县委总结经验,于 8 月 5 日至 9 月 1 日,举办了第一期党训班,学员 495 名。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从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学员中吸收 240 人入党,第一期建党共发展 288 名新党员。至 1952 年年底,句容县党的力量已渐壮大,全县有党员 679 人,支部 85 个。

通过整党建党,提高了党员思想认识,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员队伍,并壮大了党的力量。

四、干部的教育与培养

句容解放后,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干部队伍现实状况和句容为适应建立新政权的迫切需要,依据党的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即建立了干部训练班,训练对象主要是乡干部、农村积极分子、税收与征粮的技术人员,学习内容主要是形势、政策、阶级教育,技术人员并有技术学习,共办了 6 期训练班,参训学员共 749 人。至 1949 年年底,提拔脱离生产的干部 384 人,充实到各种组织机构。至 1952 年 5 月,全县共有党、政、群及财经干部 916 人。其中 1949 年 4 月前参加工作的 152 人,解放后吸收的干部 764 人。

经过三大运动和“三反”运动,绝大多数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与提高,全县涌现出 4060 名积极分子,为壮大干部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按上级规定的“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分清主次缓急,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方针和德才兼

备的干部选拔标准,以及历史清楚、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工作积极、富有朝气和有培养前途的条件精神,通过“三反”运动考验后,全县从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77 人,从乡干部提拔为区干部的 39 人,从一般区干部提拔为区委级干部 45 人,从区委委员级提拔为区级领导的 21 人,从区级领导提拔为县级领导 4 人。提拔干部做到了打破论资排辈、本位主义等弊端,正确掌握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五、“三反”运动

解放后,有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行为。句容县虽然在 1950 年 4 月至 5 月进行过一次反对贪污浪费的检查,对发生的贪污问题也已处理,但因认识不足,处理不严,工作不及时,没有发动党内外群众广泛开展,故仍有贪污浪费现象发生。

1951 年 12 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苏南区党委作出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三反”运动的决议。1952 年 1 月,根据上级部署,县委对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工作作了两次研究,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和“三反”运动办公室,统一领导全县的“三反”运动。句容县“三反”运动分为教育动员、集中打“虎”、追赃定案、总结提高四个阶段。

教育动员阶段。首先是通过传达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结合句容贪污浪费的典型事例,说明开展运动的重要性,打破无大问题、小镇、小机关无浪费的思想。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及《人民日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其次是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坦白、检举会,向贪污浪费现象展开斗争,及时解决一些小浪费与贪污较轻的

问题。三是在群众中通过农代会、劳模会、冬学及宣传提纲,进行爱国增产节约教育,并通过订立爱国公约,把运动推向高潮。

集中打“虎”阶段。根据限期发动、点名彻底坦白的精神,1月15日至16日,句容县召开机关区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全体党员会、全体团员会,发动群众广泛参与;18日开始,首先由县委书记、县长、民运部长先后在400余人的干部会上检查,并充分发扬民主,开展了批判;20日,贪污蜕化分子、前中粮公司办事处副主任张某某在全体大会上进行坦白;26日,县级机关召开坦白、检举大会,当场坦白的有33人,检举的有78人;2月10日,召开坦白检举大会,揪出贪污1000元(旧币1000万元)的“老虎”,初步打击了此山无“虎”的思想;20日,在坦白检举大会上初步弄清公营米厂集体贪污18万斤大米的案子,第一次捉到“大老虎”。

追赃定案阶段。至6月底,这次运动,共25个单位参加,参加学习的共533人。除赵和桂专案处理,方必仕悬案外,全部定案。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是根据中央指示“严肃与宽大,惩治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经反复审查,甄别核实材料,进行定案。坦白出的有贪污行为的共290人,占总人数的54.41%,通过甄审定案后,贪污人数下降至228人,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42.77%。另百元以下的62人不算贪污,为公私不分讨便宜。在228名贪污分子中不以贪污论处的189人。“三反”运动中有3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4人受刑事处理。1952年4月,通过前期的“三反”运动,追回赃款59934309元(旧币),票据32722000元(旧币),物折价6000000元(旧币)。中小贪污分子交赃37895170元(旧币)。至7月5日“三反”运动结束。

总结提高阶段。经过“三反”运动,涌现出积极分子158名。同时培养党员对象60名。7月中旬,召开科局长会议,听取“三反”后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各种制度落实情况。召开了全体机关干部大会,肯定了成绩,明确了不足。

通过“三反”运动,分清了敌我,提高了全体干部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警惕,官僚主义作风有一定程度克服,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解放后,句容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稳定经济形势,迅速恢复生产,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营经济。1949年11月,没收大丰米厂,建立国营城镇句容米厂。1950年5月,成立中国百货公司镇江支公司句容办事处;10月,设中国粮食公司句容收购组,1952年改为中国粮食公司句容支公司。同年县城北郊原飞机场废地辟耕地600亩,建立句容县农场。1951年,民生印刷所和文华印刷号合并,成立地方国营句容印刷厂。同年没收原教育林二区广兹林场和没收、征收地主祠堂庙宇林以及附近社队的献山,组建句容县林场。1952年建立优属布厂、句容县轧花厂。

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句容解放后,句容县委和县政府就考虑恢复发展生产。1949年6月,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肃清武装散匪安定社会秩序严禁偷盗恢复生产”的布告。6月中旬,句容县遭受洪灾。7月20日,县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代表34人,讨论发动劝募救济灾民、组织群众恢复生产等问题。当年粮食获得丰收。1950年春,部分因水灾严重地区出现春荒。4月初召开的句容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把以生产度荒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1年,虽然遭受旱情和洪涝,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粮食总产仍比1950年增产42520吨。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从粮食产量看,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为7064万公斤,1952年粮食总产达15856万公斤,1952年比1949年增产8792万公斤,是1949年的2.24倍。农业产值:1949年是4279万元,1952年是6040万元,1952年是1949年的1.4倍。工业产值:1949年为26万元,1952年为76万元,1952年为1949年的2.9倍。商品零售总额:1949年为634万元,1952年为1116万元,1952年是1949年的1.76倍。财政收入:1950年为451.5万元,1952年达599万元。

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与提高。1949年末全县有职工1042人,人均年工资320元。1952年有职工2518人,人均年工资351元。人均占有粮食:1949年为231.9公斤,1952年达497公斤。人均占有油料:1949年为4.2公斤,1952年为12公斤。生猪:1949年饲养量为4.74万头,圈存量为2.91万头,出栏量为1.83万头;1952年饲养量达6.59万头,圈存量达4.03万头,出栏量达2.54万头,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分别是1949年的1.39倍、1.38倍、1.39倍。人均水产品:1949年为0.57公斤,1952年为0.75公斤。城乡居民储蓄额:1949年为0.2万元,1952年为25.61万元。

第五章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句容县委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4年全县遭受特大洪灾，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抗洪救灾，战胜了特大水灾。

第一节 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传达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以及三年的经济恢复，我国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发展得比较顺利。抗美援朝战局在1952年年底时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国家已经获得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党中央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月1日，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宣告：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9月24日发布的庆祝国庆四

周年的口号，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宣部拟定的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纲领。省委会议后，句容在县机关科局长及企业单位负责干部中进行了传达贯彻，并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以党支部为核心，组织机关干部学习，各单位结合各自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1月24日，县委召开565人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议，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2月4日，扩大干部会议结束后，确定大同乡为先行乡，以便创造经验指导全县。各区先后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教育，通过算账对比、回忆、诉苦的方式，明确农村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了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农村今后互助合作的发展方向。12月中旬，省委指示《新华日报》、《江苏农民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宣传和贯彻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材料，报道各地宣传运动开展的情况及其经验。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提出：一是在区乡干部会议上动员和教育区乡基层干部，认真学习《新华日报》和《江苏农民报》精神。二是《江苏农民报》的主要对象是乡村干部及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农村党支部及乡干部的学习以《江苏农民报》为主要材料。12月下旬，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迟明堂到句容作了《关于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县委书记陈建新和县长郭志强分别作了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结和说明。为了全面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12月起，全县共培训3000多名报告员、宣传员，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一化（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精神深入人心。

第二节 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一、“一五”计划的提出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党代会和省党代会会议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全党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也就是说,这个基本任务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环节。1955年3月,江苏省编制了《江苏省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6年4月20日,镇江专署正式下达(不含镇江市)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尚福春作了句容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和当前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实现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句容县必须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努力,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赋予句容县的光荣任务。句容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的主要内容为五年内县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941070元,其中分配比例为:农林水利占74.77%;工业占5.13%;交通占3.61%;文教卫生占

13.23%；城市公用占3.26%。

1956年1月1日，句容县委制订了“1955—1957年的全面规划与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打算”，对句容以后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

二、“一五”计划的实施

工业生产。“一五”期间，句容五年内工业总产值为1524万元，至1955年10月，已完成862万元，占56%。句容县第一机米厂由于工人的努力，改进了设备，提高了出米率。句容印刷厂在各方面也都有了很大改进，其他各项工业也都成绩显著。

农业生产。1952年、1953年这两年粮食连年丰收，1954年虽然遭受百年未遇严重水灾，但全县粮食总产仍超1953年，达155921吨。

合作化运动。为实现农业增产，以支持工业建设，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1953年春，县委在一区大同乡铃塘村试办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丰产。秋后平均亩产水稻554斤。至1955年春发展到594个，占总农户的22%。

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劳动竞赛。1955年3月，句容合作总社附设加工油厂开始推广李川江先进榨油法，经过初步实验，出油率不断提高，以往每百斤大豆平均出油9斤6两，实验后达10斤5两。每天生产24榨，即多出36斤油。此外，冷榨豆饼也在城区推广成功，每百斤豆子可出油8斤，可多出豆腐64块。以每月食用2.5万斤大豆的副食品统计，可提炼出2万多斤油，并可增产16000块豆腐。

做好农村“三定”工作。句容县规定余粮户口粮每人每年留480斤。饲料：生猪每头50斤，母猪每头200斤，公猪100斤，骡、马150斤，耕牛40斤。定销采取全年一次计算分月核定的办法。凡生产粮食的缺粮户，对其供应的标准一般应略低于当地余粮户

的留粮标准。农村缺粮户规定每人每年460斤。余缺粮界限的划分是以户为单位,按其总产量扣除三留,所余粮食不超过40斤的不予定购,超过40斤的按比率定购。

三、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统购统销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保证城市、工矿区及农村人民缺粮的供应,消减富农和粮食投机商的中间剥削,支援灾区而实行的。统购统销工作在稳定物价、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支持工业建设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打击和限制了富农资本家的高利贷剥削。

据1953年10月句容县委关于粮食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村中半农半商这些人,有的从事放债,有的从事粮食投机活动,有的以买卖为名放高利贷。1953年3月有私营粮号44户,经加强市场管理,至10月只剩20户。

粮食统购是根据农户实际粮食产量,扣除公粮、种子、口粮及必要饲料后,按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开展的。句容县统购工作于1953年12月5日开始,县委召开区乡扩大干部会议,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统购工作分三步:第一步是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阶段。区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乡召开了有积极分子参加的人代会。在贯彻到村的同时,又以乡为单位,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分别召开了会议。第二步是出售余粮阶段。经过会议的正面教育和个别协商,反复动员,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全县掀起了出售余粮的热潮,至1954年2月中旬,全县的统购工作基本结束。至2月18日,全县共收购粮食12031万斤,除完成省委分配的11862万斤,超额完成169万斤。第三步是到2月中旬,由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先后召开了会议,进行粮食统购工作的总结。

由于执行了华东局提出的三个条件和省委指示的四个办法,统购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具体有以下做法:一是帮助农民用回忆、对比、算账的方法,分清了土改翻身、生产提高、工农业品差价的三笔账。二是培养积极分子作为运动的骨干。统购一开始,农民大都采取等待观望态度:人家卖我就卖,人家不卖我也不卖。积极分子多的地方,运动便迅速打开局面。全县在贯彻总路线中仅有积极分子 4738 名,自省委指示四个办法后,至全面进入协商时,积极分子队伍扩大到 20527 名,掀起了农村出售余粮的高潮。三是运用典型,以点带面。由典型先行一步,得出成功经验和运动发展的规律,及时推广全面。四是坚持耐心说服的方针,反对强迫命令。五是适时有力地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持运动的健康发展。运动中逮捕了五类反革命分子、不法奸商及刑事犯等 155 名。

统销是根据国家可能,适当照顾缺粮人需要的原则,严禁私商、富农及任何人套购、贩卖粮食等不法行为。统销工作中首先将供应的底摸清(供应面、供应量),做到心中有数,进行粮食统销政策的教育,讲清缺粮户在确实需要、不囤积、不浪费的三个原则下,国家保证供应。其次发动缺粮户订出购粮计划,经评议小组评议,区委审查批准,全年一次核定。缺粮户凭购粮证随时到指定地点购粮,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不需干部开介绍信,各户购粮计划如本月没有买足,可转到下月购买。如因特殊需要,经查实后,也可提前购买,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全年计划供应量。1953 年全年销售原粮 3839.99 万斤,占上级核定数字的 3700 万斤的 103.78%。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了粮价的稳定,打击和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1954 年的粮食统购工作中也出现较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问题。1955 年 7 月,中央监察部农村工作调查组江苏省镇江

小组,对句容县 1954 年粮食统购工作调查后认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是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普遍而严重的基本原因。在统购统销中也暴露少数干部存在封建残余作风,如组织干事夏某某在伯群、上荣两乡共打群众 19 人。在 1954 年冬至 1955 年春粮食统购期间,全县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全县 93 个乡镇有 86 个乡镇发生了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花样有打、冻、站、跪、吊等 36 种之多。

四、粮食“三定”政策

1954 年 7 月至 1955 年 3 月底,共销原粮 2599 万斤,占全年上级分配任务数 3700 万斤的 70%,比上年同期销售数 2380 万斤增加 9%。从全县供应面上分析,按 1955 年 3 月底统计数,全县供应面为 53%,在 30%以下的有 11 个乡,如张庙、春城乡。因此句容县存在供应不合理现象,如不该供应的供应了,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该供应的没得到及时供应。中央指示:既要取得粮食,又要团结农民。结果是粮食取得了,而在某些地区犯了严重的强迫命令,有些干部未按照多余多购的精神办事,而使农民多卖了口粮,造成群众怀疑政府政策。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来,有不少地方农民生产情绪不高。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对粮食“三定”政策的指示:在每年春耕前按照国家计划,把各乡的常年计划产量和统购、统销的数目确定下来,秋收以后只要年景正常,国家就按照春天宣布的数字向农民征购,无论农民增产多少,收购数字都不再变动。这就是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

1955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上午,县委召开关于贯彻粮食“三定”工作的县委扩大会,李永月传达了地委会议精神。21 日下午至 22 日晚,召开了各区区长、区委副书记等 150 余人的会议,进行贯彻。4 月 5 日左右,粮食“三定”工作基本结束。

粮食定产方面。句容县定产的原则是:对于田亩的粮食产量

须估得准确,定产不得超过实际产量,既不能偏高,又不能偏低的原则,要有利于生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有利于整个任务的完成。定产的方法是:以农业税查田定产的方法等为基础(参照土质、水利、经营条件、常年实产等情况),根据不同的等级,采取分别加成的办法,定出常年实产。具体做法是:一是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提高思想,报实田亩产量,树立正确的标准。二是要定多数评少数,一般要定下70%左右。三是要正确做好评增评减,达到基本上公平合理,防止某些干部自私自利、互相包庇和互相报复的产生。在粮食定产的同时,把棉花、油料作物的面积、产量也定下来。

粮食定购方面。句容县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是:既要掌握必需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向余粮户统购的粮食比率:句容县规定统购纯余粮的95%,对富农统购纯余粮的97%。县区农场生产的粮食,除按规定的用粮标准留下必要的粮食外,所有余粮全部卖给国家。粮食统购办法是根据夏秋两季粮食产量,确定夏秋统购比例,分两次进行,夏秋两季一次结算。

粮食定销方面。句容县对缺粮户的粮食供应,应根据何时缺何时供应的原则,具体评定开始供应的时间和分月供应计划,缺粮户不得提前购买。供应缺粮户的粮食品种,应根据国家有什么供应什么的原则,进行供应。灾区的缺粮户口粮、饲料用粮标准,应低于当地正常年景缺粮的标准。

全县“三定”工作大体上分三步,第一步从检查安排生产入手,开好会议,训好骨干,建立评议组织(乡“三定”评议委员会),做好内部方案。第二步是区进一步检查生产,从安排生产入手,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培养骨干,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建立评议小组,进行分户试算,个别串联,协商定案方案送乡批准,出榜公布,分发通知单。第三步是总结“三定”工作,发动以社带组,社组团结全体

农民开展秋收秋种运动,检查保秋计划,确保晚秋作物丰收。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社发展,粮食“三定”以社结算,定产为160135吨,定购62860吨,定销510吨。1957年在坚持“三定”基础上,实行以“以丰补欠”方针,丰欠年可以互相调剂。

“三定”到户工作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消除了群众思想顾虑,又团结了群众。

“三定”工作在定产方面存在单纯的任务观点,用任务去套产量,用留粮去套产量,用平均产量去套总产量等。

第三节 带领群众战胜自然灾害

一、1954年的抗洪救灾

1954年,全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洪水,全县轻重灾乡25个,轻重灾民近10万人,受灾面积20余万亩。特别是八、九区,从5月中旬至7月中旬,连遇3次大雨,山洪暴发,从龙潭到桥头的8个圩乡,东西相距15公里,茫茫一片,广大圩区农民不但丰收无望,成片的草房和部分的瓦房也都被洪水淹没而倒塌。

灾情发生后,有些老年夫妇坚守破屋,要以家为坟,有的群众远走高飞,盲目流入城市。不少乡村干部只看到眼前利益,对灾民放任自流,认为前途无望产生畏难退缩情绪。

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帮助下,县委县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灾区进行抢险,组织群众转移及安置;县里各界人士组织灾区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救急,当时移居到圩堤上、山边上等地的灾民有4000余户,1万余人。由于及时得到政府和非灾区群众的关怀、支持,灾民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发动群众排除积水,进行补种和秋种。经过灾民艰苦努力,排出积水,及时组织种植晚秋作物11773亩,挽回粮食损失2350万斤。在7万亩的田地上种植了夏熟作物,还垦荒751亩(内有油茶

600 亩),种蔬菜 500 亩。这对灾民恢复生产,渡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组织灾民开展副业生产,就地坚持自救,扭转了部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趋势。10 月下旬,洪水渐退,有计划组织灾民重建家园,帮助灾民迅速恢复生产,水退到哪里,就抢种到哪里,到 11 月中旬,灾区已基本完成秋种计划。

国家及时发放各种救济款和贷款。至 1955 年 3 月底,上级拨给句容县的 62813 元救济款,已全部发到灾民手中,其中用于修建房屋的有 2544 元,帮助灾民修建了 290 间房屋;用于补助棉衣棉被的有 2903 元,解决了棉衣 1172 件、棉被 46 条;用于麦种救济的有 1497 元,解决麦种 14790 斤;用于生活救济的有 54893 元,解决了 6134 户、24134 人的生活问题;用于牛草救济的有 977 元,解决了牛草 12 万斤。对于一时困难但以后有偿还能力的灾民,由银行贷款扶助。在生产救灾中,共贷款 4 万元。

二、兴修水利

1955 年冬至 1956 年春,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县委县政府发动广大群众兴修水利,掀起了兴修水利运动高潮,其特点是数量多、动员面广、进度较快。

全县投资较大工程 7 处,如固江口水库工程任务土方达 16 万立方米,首次投资 45000 元,1955 年冬动工兴建。完成其他中小型水利工程有:筑新塘 135 个,修旧塘 9456 个,筑新坝 48 座,修旧坝 2150 座,新建水闸 11 座,修旧水闸 35 座,新建涵洞 75 座,修涵洞 594 座,开浚河道 4 条,修圩堤 31 条。以上工程共完成土方 813 万立方米。共使用投资补助和贷款经费 311924 元(其中贷款 38891 元),占 7 年共用经费 939171 元的约 1/3。以上工程完成后,共增加灌溉面积 2.55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5.5 万亩,防洪控制面积 4.86 万亩,水土保持面积 5.44 万亩。取得这些成绩的主

要经验有：一是建立组织，明确分工。从县到社都建立机构并抽调专职干部领导掌握水利，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如供销社、粮食局、宣教等部门，确保全县水利工程顺利完成。二是发挥互助合作组织作用。依靠互助合作组织，是开展小型农田水利的主要保证；发挥党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安定民工思想情绪，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质量的重要关键。如茅山区以延福乡中心社为基点，该社在秋种完成 80% 时即抽出 40% 劳力开展冬修水利，并组织全乡农业社参加评比，介绍经验。三是训练和使用大批水利骨干，加强技术指导，保证了工程质量。先后培训了 447 名农民水利骨干，其中选用了 108 名优秀的担任区乡工程师，具体帮助各区乡的水利技术指导工作。天王、茅山、下蜀 3 个区都成立了技术小组，每 5 天至 7 天分点召开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解决施工中的困难问题。四是实行定额包工，开展红旗竞赛。如东山河工程，有中队提出定额 4 包办法（包工、包时、包质、包量）和 6 快的口号（挑快、挖快、推快、倒快、铲快、夯快），实行 5 人包 4 部车子，两人包 7 副担子的办法，工效由 1.25 立方米提高到 3.39 立方米。蟒蛇洞水库工程，提出挑土带跑，挖土不站，打夯不停的口号，把工效提高了三分之一。

第六章

过渡时期政治文化建设

1953年,中国成功组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普选。中央和各地方党政机构对这次普选做了精心准备,在先行试点和总结经验基础上全面铺开,从而保证了普选的顺利完成。通过这次普选,各级干部深刻体会到权力来源于人民,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受到了一次政治民主教育,男女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在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五”期间,句容在上级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一、基层普选

1953年1月,根据中央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3年5月23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关于由普选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句容县在城东乡和下蜀

镇进行民主普选工作试点。7月中旬抽调干部200多名和业务人员260名开展普选工作,而后在全县推开。通过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至1954年3月18日普选结束,选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21名,分别召开了乡、镇人代会。

1953年,句容县有93个基层选举单位,1953年7月11日结束了两个试点(城东乡、下蜀镇)。第一批46个乡,从7月15日开展至9月7日结束,平均参加选举的选民占总选民数的89.6%,46个乡有1236名乡委员以上干部,当选代表的有722名,并完成了46个乡的人口调查工作。第二批43个乡、1个区属镇、1个城区单位从10月27日先后开始(城区是11月10日开始)。普选是群众性的人民内部的民主运动,性质上不同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民主改革运动,它主要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在进一步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基础上来做好普选。在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方面,主要是教育基层干部消除思想顾虑,端正态度,积极领导生产,争取当选。在做法上,先从党内到党外,依靠当地组织和当地干部,在提高党员与基层干部的思想基础上,向群众进行普选的宣传教育工作。

基层普选充分发扬了人民民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和主人翁的意识,健全了基层组织。同时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转变了干部作风,加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

二、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基层普选地开展,为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7月11日至15日在县城召开,应到代表213人,实到代表191人。会议审议通过了拥护宪法草案、政府工作报告、贯彻大会精神等三项决议,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突击防汛排涝,做好统购统销等工作,选举县长、副县长,

选举县人民法院院长,同时选举出席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人。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5年4月22日至25日在县城召开。应到代表214人,实到代表192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句容县人民政府改为句容县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3人,选举产生县长、副县长、县人民法院院长。

会议审议通过了《句容县人民政府1954年下半年工作和1955年工作任务》、《句容县195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地方自筹经费收支计划》,并作出了决议。

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既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又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从此,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句容正式确立。

第二节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

句容解放后,句容县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进步知识分子、工商界和宗教人士,团结他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解放初,句容县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和行使权力的组织形式。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1949年4月30日和7月20日,县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邀请工、农、商、教及进步绅士53人参加。听取各界意见、肯定他们在拥军支前、征借粮草任务中所发挥的作用,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协商讨论了召开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事宜。

随着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精神,1949年10月至1953年7月,句容县共召开过7届9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4年7月11日至15日,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由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状态。

二、句容城区第一届劳资协商会议

1952年,句容开展“三反”运动后,资方认为私营企业无发展前途,对政府和工商业的政策认识不足,由此抱着消极经营的态度,不愿意扩大营业,怕生意多、多缴税,忙来忙去都是为政府忙的,抱着卖了吃光、拖光算完的态度。老年工人认为无前途,怕失业。青年工人嫌工资少,在私营商店没出息,导致生产情绪不高,劳动纪律与劳动态度松懈。在劳资关系上也存在不协调的现象:一般表现在工人生活上、经营上与工资上。资方认为劳方的劳动、纪律、技术都不好,而劳方对资方存有保守落后的经营方式不满。有的店乱开支,工人不满,因营业不好,劳资双方相互埋怨,资方克扣工人的伙食。以上这些现象,必须通过协商才能得以解决。

1953年4月,句容城区第一届劳资协商会议召开,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完成1953年的三大任务而努力的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协商精神,经劳资双方代表研究,共同商定,制定了如下决议:

一是关于建立新的劳资关系和改善经营的决议。劳方保证改善服务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发挥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技术,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确立请假制度,商定全年假期以两个月为限(特殊情况例外)。资方坚定积极经营信心,树立新的商业道德,改善经营作风,保证货源供应,以满足群众需要,钻研业务,接受工人合理化建议,以促进业务发展,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累积

资金,扩大经营。

二是关于处理变相工资的决议。明确了变相工资是工人应得的工资,根据实际情况把所有变相工资适当归纳到正式工资内。

三是关于工资改为工资分计算的决议。研究决定一律按原发薪标准改折南京市工资分计算。

四是关于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的决议。经协商双方各推派代表5人组成劳资协商委员会。

三、加强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

1951年10月20日,句容成立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产生委员24名,其中工商联代表18名,国营企业代表4人,城镇工作干部2人。工商联在成立前召开了3次筹备会议,各镇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1月20日至22日,工商联成立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人数110名,大会产生执委27名,常委9名,选举正副主任各1名等。共收集提案204件:劳资提案8件,抗美援朝提案26件,公私提案58件,业务提案31件,生产建设提案36件,文教提案12件,其他提案33件,在大会上逐条对提案作了说明。12月20日成立工商联工作委员会。委员13名。

1953年4月,以城区工商业为重点,召开劳资协商会议的有32户,劳资双方在思想觉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职工劳动态度的转变,劳动纪律的遵守和技术的提高,也给资方很大教育,资方也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6月,重新整理工工商联党组,设有9人,县长郭志强任主任,城区委书记任副主任,决定每月召开一次工商联党组会议。整理集镇工商联组织,取消城区工商联,不另设机构,由县工商联统一掌握。成立工商联分会的有3个镇,成立办事处的有5个镇。其他小集镇成立了工商联小组。

通过商业调整后,国营企业的业务范围缩小,批零差价也作了调整,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私营企业营业额比1952年有显著

提高,如棉布业在 1952 年 5 月的营业额是 5814 元,1953 年 5 月的营业额是 22786 元。

第三节 过渡时期文教卫生事业

一、文化艺术事业的初步繁荣

文化馆、站、俱乐部的建立。解放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1953 年冬,句容县文化馆在石狮乡杜巷初级社试办第一个农村俱乐部,建立了活动室和业余剧团,以后逐步以农业社为单位建立俱乐部。至 1957 年年底,农村俱乐部发展到 558 个,内有图书馆 67 个。1953 年,一区城上、五区天王、六区葛村、九区下蜀分别建立区级收音站,1955 年后,又相继建立了一些区、乡收音站;1955 年春节期间有 30 个业余剧团,179 个文艺小组,前后共演出 739 个节目,观众 72760 人,收听广播 382 次,听众 58025 人。1956 年,县委决定建立有线广播站,发展全县的广播事业,抽调人员,拨专款购买器材和设备,于 1957 年 1 月 28 日正式开播。1953 年,以原夫子庙大成殿为基础,修建了县人民剧场。

解放初期,电影放映主要靠苏南电影放映队和驻军部队电影组进行。1954 年春节前夕,江苏省文化教育工作队派省第五电影放映队到句容,改称句容县电影放映队;1956 年 6 月和 1956 年 8 月,相继成立句容县第二、第三电影放映队。句容县文力锡剧团于 1955 年改名为句容县锡剧团。1956 年 7 月 1 日,中共句容县机关报——《句容报》创刊,《句容报》的出版发行和广播站开播,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增添了新的舆论阵地。

二、教育事业继续发展

1953年,句容县教育事业贯彻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县制定《句容县小学教育整顿方案》,将511所公办小学调整为495所。对小学教育、工农教育、扫盲工作进行了整顿。对不称职的人员进行处理,清理回家的共5人。秋收以后,工农业余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巩固的占60%,学员有6167人,学校175所。随着农业合作社运动深入发展,教育中一些新的问题被提出来,县教育部门因势利导,制定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幼儿园(班)的办法》(草案),农业生产互助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创办幼儿园(班)和托儿组。小学教育中,社办小学兴起。1954年,对学生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特别是劳动教育,除部分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外,有942名高小毕业生,130名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1955年暑假,在全县中小学教职员中进行了学习活动和开展一般坦白检举的工作,提高了教师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纯洁了教师队伍。1956年,有社办小学66所,入学儿童1833名。随着小学教育规模的扩大,扩大中学教育规模的问题也被提出来。1956年,句容县中始召高中一年级新生2个班,成为县内第一所完全中学;与此同时,新建后白初级中学和行香初级中学各1所,接办了私立长江初级中学,改名为下蜀初级中学。全县共有中学4所、38个班、学生2168人、教职员工121人。

三、卫生防病事业得到加强

句容县是江苏省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县之一。流行程度较重的有茅山、下蜀、宝华、亭子4个乡镇;流行程度一般的有东昌、陈武、磨盘、大卓等乡镇;流行程度较轻的袁巷、春城、天王、黄梅、石狮、白兔等乡镇。民间有许多因血吸虫病造成断嗣绝后、家破人亡的悲惨事例。东昌乡高仑村有首民谣:“大肚子,两头尖,不在姊妹

桥,就在高家边。”亭子乡武岐村小上解自然村,原居住 50 多户姓解的人家,因血吸虫病流行,至解放初只剩下 2 户。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疫区人民的健康十分关心。1954 年 3 月,中央血吸虫病防疫总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 54 名防疫队员抵达句容,对重点疫区开展查病。1955 年,共接种牛痘 73866 人,伤寒预防注射 5435 人,白喉头毒素注射 1322 人,接种卡介苗 223 人,为了控制肠胃传染病的传染,计训练饮食业从业人员 208 人。1956 年,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县长任主任。开展防疫人员培训,组织了 1546 人的普查队伍,全面开展查螺及查血吸虫病工作。同年,县根据《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除害灭病”12 年规划,将灭蝇、灭鼠、灭蚊、灭麻雀(后改为臭虫)列为爱国卫生的重点,县委书记任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在大搞爱国卫生的同时,加强了对传染病(重点是疟疾、流感、麻疹、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和地方病(重点是丝虫病)的防治。

四、农村扫盲工作

句容县扫盲工作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毛泽东指示贯彻后,各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

入学人数急剧增加。至 1956 年 1 月 20 日,全县 1590 个社,已办学的社有 1289 个,占社总数 81%。乡级主要干部全部入学,已办学的社的社长和社务委员一般都参加了学习。由于干部带头,大大推动了社员入学,壮年文盲入民校学习的达 41287 人,其中党员入学 1823 人,占党员文盲总数 86%,团员入学 4437 人,占团员文盲总数 85.3%,妇女入学 12833 人,占妇女文盲总数 16%,高小入学 1774 人,参加民校班级教学群师 1407 人。

通过学习和贯彻江苏省文教工作会议精神,有计划地结合兵役法工作进行扫盲规划的试点工作,批判与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提

高扫盲工作的信心。1955年12月下旬,县召开全县完小校长、扫盲干部和区扫盲重点乡文教主任会议,在明确农村新形势的基础上,研究扫盲规划工作,随后各区都进行了试点工作。反复深入地进行扫盲意义的宣传,如东昌区行香乡进行三想四算(三想:一想过去谁有文化,谁没有文化,提高阶级觉悟;二想没有文化的困难,启发了学习要求;三想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更需要文化,以巩固思想。四算:一算办好社要多少有文化的人;二算农业生产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人;三算没有文化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四算有了文化日常生活有多少便利),生动地教育了干部和社员,大家纷纷报名入学,由原来的404人增加到820人,占全乡青壮年文盲的74.5%。

广泛发动社会上有知识的人以及组织学校师生参加扫盲工作,推动扫盲运动的发展。县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扫盲工作,特别是全县大多数学校的师生积极参与,对工作忙、会议多的社干和孩子多、家务累的妇女进行了包教保学。

坚决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认真编印第一部识字课本,全县共编印21996本,基本上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学习要求。在教学方面,由于各区培训了一批群师积极分子,组织群师学习和开展观摩教学等活动,群师一般都能掌握进度和基本教法。宝华区各民校每月在保证上课时间的基础上,一般能增识生字400个左右。

第四节 审干工作和肃反运动

一、审干工作

1953年11月24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认为必须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精神,1954年2月11日至3月1日,省委召开第一次组织工作会

议,会议提出全省各地在两三年内对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8月省委制定《关于审查干部工作的计划》。1954年10月16日,镇江地委对审查干部工作作出部署。

句容县的审干工作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省、地委审干委员会和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从1955年4月开始至1957年12月结束。全县有9个区一个直属镇。县区党政群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159人(不包括临时人员)参加,进行审干的924人,占工作人员总数的42.7%。即除工人、勤杂、营业员、保管员、农金员、医务人员等除外,全部进行了审查,列为审干对象的211人,占924人的22.8%,其中区级以上干部76人,审查对象18人;区委以上干部137人,审干对象21人;党政群区助理以上的干部289人,审干对象87人;企事业一般干部422人,审干对象85人。以上211名审干对象均不包括“肃反”对象。211名审干对象中,属四类性质的16名,脱党脱队伍的15名,参加过反动党、团、军政、警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161名,其他问题11名,被捕、被俘、党籍问题等8名。审查与本人交待完全相符的85名,审查与本人交待基本相符的60名,部分交待的44名,根本没有交待的22名。

领导重视,设立专门机构。句容县建立了审查委员会和审干办公室。审干开始,县委就指定一名副书记兼审干委员会主任,一名组织部副部长专管审干办公室的工作。凡属重大问题都经审干委员会或管审干工作的副书记研究决定,其中有些重大问题都是经县委研究决定的,一般问题都经审干办公室反复研究决定。如区级以上干部性质的决定是经过县委研究决定的,区委以上干部性质的确定是经过审干委员会和主任决定的。同时配备了与任务相适应、政治上完全可靠、作风正派、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的专职干部,负责审干的具体工作。

进行思想动员,启发自觉交待,与收集审阅材料、反复研究排队相结合。审干工作开始时,从各单位收集干部档案材料,对审查

范围内的干部进行动员、组织讨论,启发他们自觉交待。全县属审查范围内的干部听过审干报告的占到90%以上,其中有的人听过数次,在审干结束时也作了总结报告。根据原始档案和本人在审干工作中交待的材料进行分工审阅,对照政策确定审查对象,凡属主要材料都反复看过数次,并采取边审边对照的方法。

专职干部进行分工划片包干,制订切实周密的调查计划。一是调查人边调查、边研究、边分析、边整理。二是明确调查研究的关系,通过调查为研究提供材料,通过研究指导调查。三是明确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问题,因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取得可靠的客观证明材料。

审干结论客观公正。对问题全部查清后,对照政策,正确确定性质,并把这些问题的本人核对,指定专人起草结论。做好结论初稿后,办公室进行认真研究,再与被审查者核实,征求本人意见,采取其意见中正确合理部分,予以修改。

通过审干工作,查清了干部的政治面目;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使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丢掉了包袱,消除了隔阂,为正确调配使用干部提供了历史参考资料和根据。

审干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结论性质变动过多次,有的应作结论而未作结论,也有个别人的结论同调查材料不符等。

二、肃反运动

1955年2月起,针对胡风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展开了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后逐渐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8月25日,中共中央又

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

根据中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句容县肃反运动从1956年6月28日开始，至1957年7月20日全部结束。参加运动的全县所辖党、政、群、企事业、学校等184个单位(小学全县为一单位，企业区级以上为单位)，共3616人，直接参加运动的有2080人，占总人数的57.52%。其余是参加集训教育，前后共集训4次，参加受训人员1151人。全县共接受教育的为3231人，占总人数的89.35%。

运动前排出调查对象228名，通过深入调查，经五人小组审案，确定为肃反对象的114名，已经甄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51名。运动中共收缴反动武装驳壳枪1支，子弹39发，反动证件2件。运动中参加检举的1943人，共收到检举材料3213件。

句容的肃反运动是分批分期开展的。第一批是县级党、政、群等51个单位，特点是党员多，骨干多，领导强。运动中以县人委为基点，政治氛围较薄弱的财粮科为重点，推动全面。学习方法是集体听报告，按系统配备力量，分组讨论。确定没有政治问题的112人。第二批是以县、区企事业和区党、政机关等45个单位，特点是面广、单位分散，直接经营业务。第三批参加单位有农、林场，油厂，米厂、工厂、养路工区和卫生系统等14个单位，特点是基层单位，分散全县各地，业务闲忙、旺淡季各有不同，骨干少，工人档案不全，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采取方法是由县委五人小组统一组成工作组，深入到各单位具体领导，分别开展运动，防止事故发生，同时兼顾生产与业务。完小教师的肃反运动利用1956年寒假一次性完成。

肃反运动具体做法是：一是做好运动前组织、材料、思想准备

工作。成立五人小组，抽调干部健全组织。实行按系统负责，建立“肃反”领导小组。领导分工负责，划片设点，进行研究指导。二是领导统一思想认识，根据不同业务情况，认真进行肃反与生产的安排，保证肃反与生产两不误。三是在运动过程中领导亲自坐镇指挥和严密控制，坚持思想发动，开展政治攻势，充分发动群众，适当运用和平谈判与小组斗争相结合的方法。第四是有计划地将肃反对象进行安排。县委为了减少肃反对象的顾虑，便于审查了解和控制，在摸底排队的基础上，有计划进行安排。

肃反运动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充分发动群众，彻底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又教育了群众。但在以人定案调查中，对个别嫌疑对象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全面分析；在运动中有伤害群众感情（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问题，如银行嫌疑对象王某某，经过6次外调，外调同志片面追查其罪恶，认为有血债（实际与他无关），王在运动中未交待，认为其不老实，派人监护1个多月，造成王用刀自杀（未遂）后，又经过该单位领导亲自调查证实血债与王无关。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确立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伴随着农业合作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对私”改造的进程,至1956年底,基本完成改造任务。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铃塘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以个体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由社实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

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之后，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分配。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应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春，县委在一区大同乡铃塘村试办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原有社员16户、69人，田138.2亩，地40.1亩。该社成立近一年，由于实行深耕细作，全体社员的努力，生产技术的改进，取得了水稻丰收，达到每亩平均556斤，比解放前每亩平均增产226斤，比1951年亩增产105斤，比1952年亩增产61斤，比本村较好的互助组每亩平均多产稻谷46斤，比单干户每亩平均多产稻谷106斤。

合作社的优越性：一是全社土地统一经营，按土地的特性、水利条件，种植各种适宜不同的作物，产量普遍提高。二是统一使用劳力，按技术高低、劳力强弱，统一分工，计分限酬、按劳分红，发挥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三是合作社的集体性较强，人力、财力集中，便于进行互助。四是统一使用水利，根据水利条件，统一调剂使用。

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互助合作运动逐渐有了发展。据1953年统计，全县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个、16户；互助组4983个，参加农户33963户，其中常年组662个。1954年，句容县根据中央关于“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层层试办、重点掌握、以点带面、分批发展的措施，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蓬勃发展。2月13日至21日，县举办首期农业互助合作训练班，参加学员大多是常年互助组的骨干，共举办3期，培训学员919人，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推动和带头作用，成了农村组织起来的主力军。4月19日至

21日,县首次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代表会议,会上贯彻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精神,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运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至1954年11月,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有501个,参加农户13835户,已达到乡乡有社,互助组5219个,45198户,其中常年组2871个、27947户,总共组织农户59033户。按照省委指示的三类社的标准和新办社的三个条件(自愿、骨干、基础)来检查,原有78个社中,第一类44个,第二类29个,第三类5个。新社符合条件的有145个,基本上符合条件的有269个,不够条件的9个。

为了稳步的发展,新社主要是组织搞好生产,老社主要是搞好分配工作。初级社规定劳力、土地、大型农具入社,建立生产、劳动、财务三大管理体系,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初级社从土地、劳力两方面与农户利益挂钩,它比互助组更能克服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1954年,第六区在夏忙中遇洪涝袭击,互助组互而不助,当即有20多个组解散。

由于农业社干部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生产秩序比较混乱,引起社员要求退社。因此,1955年4月,县委决定普遍进行农业社的整社工作。

为了迅速贯彻关于农业合作社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搞好互助组的措施,句容县委于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召开县、区互助合作干部会议,贯彻镇江地委召开的县委副书记会议精神。县委会议指出:全县原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为507个,后改为700个,会议前已发展到996个,并已发展到乡乡有社。虽然数量已超过计划,但质量很差,社内领导能力弱,会计人员缺乏,财务制度和生产秩序混乱,统计有338个社没有党员,53个社没有会计,还有少数的社没进行投资,615个社财务制度不健全,64个社生产秩序混乱,还有不少社在处理具体政策和社员成分方面存在问题。因

此,会议人员一致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的措施。方法是以社为单位召开会议并由社长掌握,没有参加社的农村选区,由村干部掌握,贯彻后及时检查督促。

三、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试办和全面推开

1956年1月,县委作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决议,仍选择三年前创建初级社的铃塘村试办句容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历时20天,把附近5个初级社和少数单干户合并为320户的高级社。2月中旬有6个区各建成一个高级社。县委举办初级社转办高级社培训班,先后培训乡社干部893人。县委另组织26名干部为合作社工作队,选调干部任各区驻社指导员。7月,县委又培训合作社工作队和乡社干部119人,分赴各区乡指导办社。由于急躁思想的指导,年底全县建成高级社368个,入社77994户,初级社尚存77个,5000余户,合计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24%。

1956年,合作化运动的中心任务将原有的合作社,进一步加以巩固和提高。干部普遍缺乏领导经验和经营管理水平,社员思想和生产组织都还存在问题。从整个运动来看,重视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县委抓住每个生产季节,进行了4次整顿:第一次结合春耕生产,进行经济规划,使全年生产有了奋斗目标;第二次在夏收夏种中全面推行了“三包一奖”制,提高了劳动效率;第三次在秋收前开展了民主办社的学习,使干部的领导作风有了改进;第四次秋收后及时进行了秋收分配,体现了合作化的优越性。通过不断的整顿,取得了增产,参加分配的527个社,与“三定”对比增产的有367个,占69%;平产的66个,占12.5%;减产的94个。

高级社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耕畜、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划出1.5%至2%的土地作为社员自留地,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收获物的分配权全归高级集体社所

有。社内分片建立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大型农具)和三包(包产量、成本、工分)及奖赔制(超产奖、减产赔),生产队对社员实行三基本制(劳动日、投肥、口粮),这些政策、措施,促使妇女出勤率和家庭投肥积极性的提高,对水利建设和耕牛制度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四、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及其教训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党中央适时提出农业发展 40 条纲要后,句容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极其广阔的规模和极有深度的高潮。1956 年 12 月 3 日至 10 日,县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县长门盛德在会上宣布,全县农村已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 99.6%,其中高级社占 98.09%。1957 年春,经过整顿,高级社已发展到 440 个、82364 户;初级社尚存 10 个、1645 户。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的经济组织,简称“高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劳动组织,其基本单位是生产队。但是,由于高级社办社时间太短,发展过快,工作粗糙,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存在问题很多:

一是建立高级社后,有的社干部经常不下地干活,摆着干部架子,不深入田间领导生产,群众有意见。

二是乱记工分。社干部开会不该记工分的记工分了,经统计乱记工分的现象达 10 多种。

三是社内财务混乱。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贪污挪用现象时有发生。

四是分配工作处理不当。一般是重视个人利益忽视国家利益。伯群乡茅庄、柳埝、前石坑等社,把好稻留作口粮,次稻出售,芽稻、泥稻等送交公粮。有的社口粮留得多,超过了“三定”标准。

此外瞒报产量,以多报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1957年至1958年,农村全部由高级社组织生产,两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为3.19亿斤和2.54亿斤,比前两年明显下降,各地不断出现闹退社现象。一些中农说:“中央规定,1957年高级社才发展三分之一,现在粮食‘三定’到户,统购心中有数,我们要等几年再入社。”不少社员感到财务混乱,不放心,对农具折价不还本,不称心。高级社之间,社与国营场圃之间,为争夺土地、水源、林木等,不断发生纠纷和毁林事件。

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初级社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速度太快了,带来群众不适应、不理解等问题。1957年5月17日至28日,句容县城东乡铃塘高级农业合作社发生社员停止生产、组织请愿、哄闹分社事件。为查清原因,县委于5月20日召开县城附近4个乡23位社员参加的座谈会,大家反映闹分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高级社分配过大,要求做到联社不联产,以初级社为分配单位。从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出,集体所有制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第二节 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

一、对资改造掀起高潮

1955年12月24日,镇江地委召开了各县(市)区及50户以上工商业的集镇负责人会议,明确对资改造进度和政策,部署了对资改造工作。为加强组织领导,县委建立领导小组,由副书记尚福春负责,建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简称对资改造,下同)办公室。1956年1月,县对私改造领导小组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商界代表会议,通过宣传教育,工商界批准,出现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迎接改造的局面。1月7日至13日,召开各区对资改造工作干部会议,到会191人,其中区乡干部111人,职工45人,船工6人,搬

运工人 15 人,集镇青年妇女积极分子 14 人,传达贯彻地委对私改会议精神。会后,各区均分别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全面贯彻,同时在内部做好摸底排队、查核材料、制定改造方案,成立领导组织机构。根据地委指示精神,1 月 16 日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各区进行贯彻,总的要求:在 1 月 25 日前,要完成全部对资改造任务的 90%,还有 10%拟在 2 月 5 日左右完成,最迟不超过 2 月底。县试点天王镇要求于 1 月 20 日结束。1 月 19 日,试点镇天王镇和句容城镇对私改造已掀起高潮。全县在 1956 年 1 月 19 日左右,掀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群众运动的高潮。至 1 月 22 日申请批准工作全部完成。至 3 月 20 日,全县私营工业 6 户,批准合并 3 户,占总户数 50%,私营商业 1512 户,批准合并 174 户、合作的 439 户、经销代销的 690 户,尚未改造的 209 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分散在农村的小商小贩(半农半商)和集镇上的老弱病残户。交通运输业木帆船 97 艘,批准入社的 74 艘,占总户数的 76.2%;骡马车 38 辆,已全部归农民,人力车 80 辆,批准入社 68 辆占总户数 85%,其余 12 辆归农民。对私改造工作于同年底基本完成。全县城镇有公私合营商店 21 家、137 户,从业人员 146 人,投资入股 18.39 万元,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 10.9%;后经行业调整,组成公私合营商店 26 家。农村对私营商业改造中,组织合作商店 78 家、518 户,占总户的 38.1%,从业人员 631 人;参加经销、代购形式的合作小组 42 个、478 户,占总户的 38.1%,从业人员 514 人;还有分散经营的个体商贩 121 户,占 9.7%,从业人员 137 人。

在对资改造过程中,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生产经营这一环节,开展服务良好月等形式多样的竞赛运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和技术改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改进和提高。

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组改造

1956 年,句容县委遵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开始对私营工商

企业进行了系统的改组、改造工作。

组织定型。对改造私商的组织形式有合营、合作、代销、代购 4 种形式,在有关集镇上和有条件乡集镇上的什货、百货、国药、棉布、文具、加工性的行业,按市场的需要与可能,实行全行业公私合并,成分不纯的一般不参加合作小组,可以代购、经销,有条件还可以参加合营。至 1956 年 7 月 13 日,改造为合营 105 户、267 人,占总户数 37%;保持原有经营形式 322 户、242 人,占总户数 16.4%。

清产核算。在申请批准合并合作后,各地成立合并工作委员会,从 1 月 23 日开始至 28 日进行资产核算工作。核算工作一般采取由资本家自报自填、自评,职工协助监督。同时各区都重视抓紧搞好生产,全县开展了组织货郎担 94 副送货下乡,做到收购、推销相结合和村村跑、社社到的服务措施。批准合并合作及一般商店的经营商品均有增加。有些工业和手工业企业也提出比产品、比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和超额完成竞赛任务。

人事安排。根据上级指示,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分别排队,根据量才录用原则,适当安排,对工商界代表人物要提前安排。对资方在职人员全部包下来的都量才录用,安排工作,全县安排为合营企业的经理 18 人,副经理 19 人,门市部主任 12 人;合作小组组长 82 人,副组长 55 人;集中对私营商业上层分子代表人物安排为合营经理 15 人,副经理 19 人,门市部主任 3 人;合作商店(组)经理组长 19 人,副经理组长 13 人;另安排县工商联副主任(县人民代表)吴良珠为下蜀供销社经理。

实行经济改组。为保证农业增产节约、购销方面的时间,以利生产,因此在农村需有一个方便群众购销的零售网,满足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但原有的商业网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需要合理调整。农村商业网调整工作,是深入农村、改造农村私商、进行经济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句容县积极而稳步地贯彻“大部不动、

小部调整”的方针,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适当调整。按照边修正、边规划、边下伸、边总结,有领导、有计划的分期分批的下伸,全县计划下伸 63 个点、139 人,其中代销组 13 个点、29 人,合作小组 12 个点、49 人,经销户 7 个点、16 人。至 1956 年 7 月 13 日,按照先远后近、先大村庄、后小村庄,大村庄固定、小村庄流动,小村庄中心可以固定下来的原则,已下伸 53 个点、120 人,其中代销小组 12 个点、48 人(流动固定相结合),代销户 22 个点、29 人,合作小组分销点 4 个、6 人,经销户 5 个点、14 人。

三、对资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对资改造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在 2 个月时间内,不仅完成了合并、合作的工作,改变了企业的性质,而且工商界人士的认识有了提高,积极性有了发挥,密切了城乡关系,使市场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但是由于运动来势凶猛,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不够充分,领导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深透,因而,在干部、群众思想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和疑虑。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干部中普遍存在贪多、贪快、贪大的急躁情绪。有人认为:改造就是要并店,不并店就显示不出改造的优越性,归口领导就是统一核算,不统一就不好管理,就无法统筹安排;也有的强调农村集镇比较简单,不像大城市那样复杂。

二是在改造工作中,对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方面做得不够好。新组织的合营、合作企业,由于未能迅速建立生产秩序和必要的管理制度,导致消极经营,贪污、挪用、差错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轻率地改变了原来的经营状况和服务制度,打乱了原有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中断商路,给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群众的不满;手工业产品质量普遍低劣。

三是改造形式仍不够明确,存在混乱现象。如不应该合营的

合营了,应流动的固定了,适宜分散的集中了,不适宜统一核算的统一核算了。有的将流动的皮匠合并为固定生产,对群众的生活影响很大。如赤山区将不应合营的什货合作小组合营了,该流动的农村小商贩组织合作固定了,该分散经营的串乡流动小贩,组织到合作小组来搞统一核算了。

四是在合作、合营企业中,工资问题有待处理解决。已经评定工资的区、集镇或行业,都采取固定工资形式,有的低于原来收入,有的行业虽然维持原来水平不动,但合营、合作后相互悬殊较大,内部不团结;有的行业在评定工资时,采取平均主义或片面照顾家庭生活困难的做法,没有掌握按劳取酬的原则。

四、对手工业的初步改造

解放前夕,句容县的个体手工业有铁、木、竹、纺线、制鞋、刻字、鞭炮、制香等 78 家,从业人员 178 人。解放后,句容县人民政府积极引导恢复和发展生产。1951 年,城镇组织铁业生产合作小组。1952 年,成立木业合作小组。1954 年年底,句容县个体手工业有 28 个行业、1120 户,从业人员 1754 人。主要行业有铁、木、竹、缝纫、棉纺针织等 9 个子行业,从业人员 1172 人。砂缸业在句容属主要行业,产品销路广,很受群众欢迎。该业于 1951 年 11 月组织了 56 人的生产社 1 个。

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有了普遍提高,明确了手工业的发展方向、道路及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纷纷要求供销社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合作社加工或在业务上挂钩。1954 年供销社通过加工订货,即组织了加工组 40 个,人员达 244 人。有的手工业附属组要求转常年组,常年组要求建社。组织起来后,便利了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同时产品质量有了提高,规格有了改进,降低了成本,改进了经营作风,并组织修旧小组下乡修旧,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

五、手工业合作化加速进行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手工业合作化必须加快进行。

1955年年初,开始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2月9日,句容县手工业管理科正式成立。上半年,在巩固提高社组的同时,发展生产社1个、木组2个。轮训干部46人,方法是采取长会短训,为巩固社组培养了干部,同时发展了党员2人,团员1人。生产社、组都与国合贸易建立了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产销问题。3月,召开了产销结合会议,签订了结合合同33件,产品48125件,产值23314元。

1955年5月20日,句容县第一届手工业代表会召开。通过会议,手工业代表有很多收获:一是会议通过总路线和组织起来优越性的教育,手工业代表普遍提高思想觉悟,明确了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二是进一步认识到手工业生产分散落后、资金短缺、工具简陋、季节性差异大,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三是明确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手工业的任务就是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服务。四是初步明确了组织手工业生产的方针、原则、条件、对象。五是加强党与手工业的联系,为逐步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5年第三季度,遵照中央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省、专区工作任务要求,句容县继续贯彻整顿巩固提高生产社、组为主,掌握边巩固边发展的精神,认真抓好典型,有计划有步骤发展新社组,并深入基层了解农村生产情况进行有计划生产,同时做好手工业重点行业的调查,摸清产销情况,逐步做到统一安排生产。重点整顿九区沙缸社:在生产上主要是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增加产量,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降低成本,加强生产计划性,改善经营管理,克服生产上混乱现象,并加强政治教育,

发扬民主办社,克服资本主义与保守思想。至季度末,全县已组织手工业生产社 3 个,社员 84 人;供销生产社 1 个,社员 138 人;生产小组 13 个,组员 125 人。

六、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巩固与完善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在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采用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重点发展铁、木、竹和沙缸业,适当发展缝纫、制鞋、印染、石灰、皮革、造纸等行业。1956 年 6 月,由于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扩招了不少新的社员,新社员入社在处理工具折价入股、股金交纳等方面,还有不少遗留问题。另外,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部分产品质量低劣。所以,对现有合作组织进行整顿十分必要。

在整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句容的基本做法有:根据各社不同情况,分清主次,解决在组织中尚存的一些问题;根据现有组织情况,统筹考虑,提出方案,确定整社重点和分批整顿计划,有领导有步骤进行整顿;各区选择一两个行业进行试点先行,取得整顿的初步经验,并吸收第二批整社骨干参加试点;先农村后城镇,抓两头(问题不大和问题较多的行业或社组)带动中间。到 1956 年年底,全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及整顿工作基本结束。

七、信用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1953 年,县人民银行在全县农村组建信用合作社。1954 年 6 月,郭庄信用合作社首先成立,至年底发展到 73 个,参加农户 43083 户,占总农户 53.2%,股金 57574 元。1955 全县建立了 91 个信用合作社(东阳信用社,1956 年划归南京市管辖),1956 年 4 月随着基层营业所合并为 50 个,8 月又调整为 21 个。

第八章

党的建设和首届党的 代表会议召开

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紧密联系政治路线建设党,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高度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密切了党同群众之间的联系。而句容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作风建设

一、党的组织建设

1955年4月至1956年4月,遵照“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发展新党员1596名,巩固和扩大了党的队伍。党员发展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如在1520名农村党员中,雇、贫农成分的占80.2%,中农成分的占14.9%。1956年4月,全县共有党员3378名,有农村支部92个,分支32个,小组146个,机关支部37个。结合整社进行了整党,将党员情况作了摸底排队,其中工作积极、觉悟高的占67.6%,一般的占23.8%,消极落后的占7.7%,反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占 0.9%，对那些作风恶劣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处理，计开除党籍 15 名，留党察看 6 名，撤销工作 7 名，警告 5 名，劝告 4 名。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领导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进行了干部训练工作，共训练干部 209 名、合作社骨干 10371 名、党课教员 87 名。从而纯洁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确保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二、过渡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与领导作风建设

开展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批判。1953 年夏、秋，中央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1954 年 2 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4 月上旬，镇江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批判。句容县委及时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精神及省委、地委的指示，并将县委在集体领导方面存在问题作深入检查，研究了改进办法。1954 年 11 月，根据上级的决定，县委开始设常委会，这是加强县委集体领导的组织及制度措施。县委自从设立常委会后，逐步形成了一些会议和学习制度，如工作会议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学习会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等。

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工作有辫子可以抓了，工作方法可以简单一些了”，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要求过高过急，容易脱离实际；在布置工作任务时，临时紧急措施多，系统调查研究分析少，结果造成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以粗鲁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对待农民。1956 年，县委先后召开了常委会议、全体县委会议及科局长以上领导骨干会议，推进领导作风的改进。

首先，句容县委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从 1956 年 8 月开始，组织合作部、林业部等 11 个单位，完成 31 项

专题调查。

第二,初步扩大民主生活。县委开始建立思想见面制度,先书记、后常委,再县委委员,加强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

第三,在贯彻工作时,基本上做到依靠组织和相信组织,初步克服单纯追求完成任务的片面观点。

三、整顿农村党支部

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团结群众的核心。1953年11月至1954年2月的农村整党,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为第一阶段,区委对支部情况调查研究。12月中旬到月底为第二阶段,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回忆对比、算账、诉苦等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由支部带头检查缺点错误。针对本人和支部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1954年1月到2月底为第三阶段:进行鉴定。先由个人写出书面材料,然后经支部大会讨论。对于违法乱纪屡教不改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最后总结,改选支部。这次整党,开除党籍的8人,留党察看3人,说服退党2人,撤销职务2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10人,劝告1人,延长候补期20人。

四、第二期建党工作

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句容县委在1952年12月,举办了一次全县的支委训练班,决定定期分片召开支部委员及党员大会,加强党的基础知识教育。1952年12月29日,句容县委制定了第二期建党计划;1953年6月10日,制定了第二期建党(修正)计划,对党员培养对象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第二期建党计划要求,句容县召开组织干部会议,结合具体情况,根据各区不同的类型乡,订出不同的要求。各区制订出第

二期建党计划,通过农村春耕生产工作,结合做好候补党员转正工作,整理互助组,发现积极分子,进行建党。

句容县召开县一级机关总支委员会,贯彻第二期建党计划。根据县机关情况,每个支部订出建党计划。县机关建党着重依据工作情况、学习表现,对积极分子进行排队,具备党员标准的同志,个别吸收入党。

在第一期建党的基础上,将原已登记好的积极分子,由负责联系的党员同志,根据工作表现,教育提高。在参军、春耕生产等工作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审查其历史情况及工作表现,填写积极分子登记表。

第二期建党共发展党员 125 名,全县共有支部 99 个,其中农村支部 75 个,还有 15 个乡未建立支部。

五、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1950 年 8 月,建立中共句容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设专职副书记、干事各 1 人。主要工作是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及党员对土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少数党员的违法乱纪现象。1952 年,“三反”运动开始后,纪委对犯有贪污、浪费、严重官僚主义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党员干部有 35 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4 名受到刑事处分。1954 年,县委受理干部违法乱纪案件 38 件,审理结果,开除公职 9 人(包括受刑事处分 2 人),记大过 3 人,记过 2 人,停职 2 人,免于处分 21 人。1955 年纪律检查委员会更名为中共句容县监察委员会。

第二节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一、党的干部管理

1956 年 6 月 13 日,中共句容县委组织部制定下发《关于分部分

级管理干部的意见》，对党委各部门管理干部的分工问题作出规定：组织部负责管理党委系统的干部等；政法部负责管理公安、民政、司法、人民检察院等；财贸部负责管理财政科、商业局、银行、粮食局、供销合作社等。此外还对工业部、合作部、文化部、统战部干部管理作出了规定。对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复部管理，在党委的领导下由组织部、统战部的统一管理。分部管理，凡属于在财经系统的资产阶级实职人员，由财贸部管理，在工业系统的资产阶级的实职人员由工业部管理。意见还对分管后各部的任务、分管中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6月21日，中共句容县委员会《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决定》指出：健全县委员会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县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分口管理制度、执行文件的审批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规定。正确贯彻党委的统一领导与各个委员的明确分工负责相结合，防止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

二、“新三反”斗争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文件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要将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县委在整党的基础上，由县级机关开始，组织学习反对官僚主义、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等文件。1953年1月27日，召开县级机关干部大会，找出句容典型的官僚主义代表，并要求其在大会上作检查。各机关结合实际进行了讨论，全体干部都作了检

查。通过检查,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新三反”的意义。

3月15日至4月4日,区乡干部开展“新三反”斗争共分两批到县集中集训,以扩大干部会议整风的方式进行。第一批时间8天,第二批10天,共集训642名。首先是通过总结工作,县委检查了因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而造成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其次是区乡干部自觉检查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各种错误做法,批判了坏人坏事。

6月13日,召开县区乡扩大干部会议,通过总结春耕生产、检查夏收夏种,表扬好人好事。7月1日至4日,从党内到党外进行动员,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认真克服农村中的“五多”现象》,县委作了检查,各部门重点检查分析本单位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

通过“新三反”斗争,改进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在干部党员中逐步树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

三、干部培训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业务素质,从1950年夏开始,在县机关进行干部文化补习。6月,组织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机关工作人员20余人,以业余为主,学习文化、配备专职教师1人。1952年,创办了在职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有高小、初中各1个班。1954年,举办4期互助合作训练班,共培训干部1458名;3期会计训练班,共培训298名会计人员;1期(6个月)文化补习班共培训38名文化低的区级干部。1955年,动员组织123名县机关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参加业余文化学校进行文化补习,举办2期文化补习班,学员81名。1956年,对干部全面排队,分类培训;除送省、地委党校学习外,组织567名干部参加业余文化学习。同时,还选送干部参加省里举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学习,建立句容县农业合作干部学校、供销合作干部学校,分期分批地对干部进行短期轮训。

通过培养训练,达到了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与工作能力,保证

了党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正确贯彻落实。

四、干部提拔与调配

干部提拔。在培养训练的基础上,进行继续审查了解,熟悉情况,1954年共提拔区委书记、区长22名,科局长9名,财经企业负责干部9名,县一级干部6名,乡干部67名,信用社主任43名。1955年,通过各项工作与会议,考察了解干部;通过个别谈话,有意识了解干部工作情况;通过写自传,进一步熟悉干部,为以后正确使用、提拔干部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提拔和新吸收的干部中,绝大部分政治品质较好,工作积极热情。1956年1月至6月,共提拔134名干部(不包括一般干部)。1956年干部提拔工作主要是根据其部门所反映的优缺点及社会主义觉悟、日常工作表现、文化程度、政治历史情况、工作需要和可能等。

干部调配。1955年句容县新设机构有手工业管理科、水利科、检察院、食品公司等,干部调配主要是保证新设机构干部的需要。同时,重点加强财经企业和工作薄弱部门的干部配备,调往企业部门35名、文教系统6名、卫生7名,充实、加强了各部门的骨干力量。1956年1月至6月,遵照上级指示按系统稳定下来的精神,结合工作需要,共调配174名干部。

第三节 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期准备工作

1956年2月6日,中共句容县委下发《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区以上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省、市县、区党的代表大会,都应每二年定期召集一次。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党的民主生活的根本制度,也是每个党员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代表名额的

计算办法是每 10 名党员(正式和候补党员的合并计算)产生 1 个代表。由于全县的党员分布不平衡,除按上述规定外,各乡的代表最多不超过 5 人,最少不少于 3 人,凡不足 3 人者,得以增选代表 1 至 2 人;区一级机关以及城镇机关党组,除按以上规定,最多不超过 6 人,最少不少于 4 人,不足 4 人者,得增选 1 至 3 人。此外,还对县级机关和其他单位的代表人数作出了规定。出席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党章规定,由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在选举代表时,应注意包括劳动模范、妇女代表和青年优秀党员,以使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党在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各区委、各乡支部以及县机关直属总支,均认真学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有关文件,同时围绕中心工作向所有党员进行宣传教育,使全体党员明确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重大意义,更进一步的发挥党员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此外,认真做好候选人的审查、收集材料等。为开好支部党员大会,各区委在 1956 年 2 月底或 3 月上旬以前选择一个支部,帮助他们开好党员大会,以便取得经验,在 3 月下旬普遍召开。

二、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

1956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 4 天,应到代表 409 人,到会代表 394 人,列席 46 人。大会听取了李永月代表上届县委所作的《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等决议,选举县委委员 29 人、候补委员 7 人,组成中共句容县第一届委员会。在县委一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李永月、曹云兰、傅众一、宋敏、戎定和、周振森、门盛德、阎发学、张新光 9 人为县委常委,傅众一、宋敏、戎定和为县委副书记,曹云兰为县委第二书记,李永月为县委书记。

第 二 编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上艰辛探索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九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句容初步建立起来。1956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双百”方针;9月,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句容县委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和“双百”方针,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揭开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

第一节 探索的良好开端

一、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4月23日至5月6日,省委召开全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会上印发了《江苏省1956年到1957年知识

分子工作纲要》。

自中央和省委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下达有关指示后,句容先后通过各种干部会、知识分子政训班,教师、医生会议和党训班,贯彻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1957年4月4日,县召开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教师、医生、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知识青年等400余人。会议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拓宽了眼界,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树立了信心;对于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自我改造,有了进一步完整的认识;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增强了团结,激发了积极性;特别对领导机关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交流了先进经验,树立了榜样,大会组织23个大会发言,举办了实物展览会,共有1000多件实物参展。

自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表之后,句容县在贯彻中央和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所取得的成绩:密切了党、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加强了团结。干部克服了宗派主义情绪,尊重知识分子人格,关心知识分子生活,支持知识分子工作,如解决校舍、课桌凳、收缴学杂费,解决困难等;知识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出现了许多关心群众生活、支持生产、尊重干部、依靠群众搞好自己工作的模范事迹。知识分子明确了自己的事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增强了工作的光荣感与责任感,基本上巩固了专业思想,克服了自卑心理,钻研业务、埋头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县人民医院门诊1956年比1955年增加59.2%,1957年内外科门诊量达27144人次;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25位中医公开单、密验方174件。1956年暑假和1957年寒假,先后在中教、完小中,围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查清了一部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清查了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有过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将那些

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和部分学历高、教龄长的教师,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暑假中,先后提拔小学教师担任教导主任的共45人,提拔中学正副校长和教导主任9人,选拔小学教师到中学任教的6人。在生活福利方面,采取若干措施,适当地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在教育方面,中学教师工资增长18.24%,小学教师工资增长27.26%,工农教育教师工资增长14%;卫生系统职工工资增长18.24%,社会医生40余人,补助和救济495元;文化系统职工工资增长13.9%。福利费光教育系统就有730人共享受14000元。关心知识分子的家属,在工作需要与可能的原则下,给予中教3对、小教47对夫妻以适当照顾。

全县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之后,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工作也得到加强。据县委组织部、文教部统计,文教系统中的建党工作,自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以后,各乡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知识分子党员1956年上半年只有15人,到1957年的10月,已有知识分子党员56人。

二、贯彻“双百”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中共中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以后,省委在全省科学文化界分别召开了一些座谈会,进行传达和贯彻。

句容是典型的农业县,1946年成立过农业推广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推广所隶属句容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仅有农业技术员1人。1954年4月成立句容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只有几个人。贯彻“双百”方针,在科学界,主要是农科所学习贯彻。

“双百”方针在句容文化团体中反响很大。句容县在1956年

有县锡剧团,演职人员达 50 多人,花旦高静、小生高菊朋,老生方正、张云鹏,丑角谈锋、杨少朋等,在邻县及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有一定声誉。党的“双百”方针在句容文化界传达后,引起强烈共鸣,调动了文化界创作等工作热情,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1956 年 10 月,由句容县锡剧团整理改编的传统戏《蔡金莲》,参加镇江地区民间职业剧团首次观摩演出,获剧本创作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优秀奖、作曲奖,以及 2 个演员一等奖,2 个演员二等奖。是年,黄梅乡孔家村业余剧团演唱的《句容号子》,参加江苏省民间文艺汇演,获省文化局奖旗一面。

到 1957 年年底,全县有县级文化馆 1 个、6 人;乡镇级文化站 6 个,农村俱乐部 558 个、内有图书室 67 个;电影放映队 3 个,专业剧团 1 个、50 多人,业余剧团 559 个;县有专业剧场(人民剧场) 1 个,古戏台 16 个。

第二节 贯彻党的八大方针

一、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需要与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9 月 27 日,省委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学习党的八大文件精神的通知。

句容县委根据省、地委的通知精神,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

上,迅速部署全县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学习八大精神。10月11日,县委文教部发出通知,要求中小学教师以八大文件作为当前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11月6日,县委文教部又发出通知,对进一步学习八大文件提出具体意见,要求通过学习,了解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文件的基本精神,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研究,为提高教学质量,完成八大交给教育工作者的任务而努力。学习内容以政治报告决议为中心,顺序为阅读开幕词、政治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党的章程。学习方法以自学、认真阅读文件为主,写学习笔记,有计划地组织三、四次报告,并有准备地搞好讨论。在学习时间上,自11月起至本学期结束为集中学习时间,每星期每个教师保持4个小时的学习。

通过传达学习,全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党的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正确认识党的新方针和新设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结合句容的实际,深刻领会八大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总结的经验。

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句容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二、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党的八大前后,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1956年12月2日,省委召开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会议,并为此作了具体部署。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范围,省委研究决定:分类逐步开放,逐步过渡。当时国家将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商品,即国家统购商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生猪(不包括猪苗)等;第二类商品,即国家控制收购商品,如薄荷油、毛竹、菜牛、少数中草药等;第三类商品:水产、蔬菜、耕畜、苗猪、鸡、鸭及蛋等。江苏决定首先开放第三类商品,完成国家统购、收购任务后的多余的第一、二类商品也逐步开放。省委、省人委决定:于1956年

年底首先开放农副产品,1957年再开放工业及手工业产品。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人委的有关规定,县内市场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计划,制止长途贩运,加强集贸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允许社员自有的三类农副产品和国家奖售的工业品自用,有余部分上市场交换。1957年2月19日,县长门盛德在全县1957年工作动员布置大会上,提出“搞好物质供应,开放自由市场”、“加强粮食市场管理,防止投机活动”的具体要求。6月20—25日,县委召开第二次城镇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来安排市场。会后,县抽调12人组成4个工作组,分赴重点集镇进行帮助。7月20日,句容县人委布告,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以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本委决定:“农业社员和个体农民一般不应经营以粮食作为原料的副业,更不准通过黑市购进粮食经营副业。农村在新谷登场至粮食统购工作结束前,凡属统购范围内的各种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准卖给私人。在国家统购结束后,农业社(户)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的剩余粮食,有权自由处理,可以自由存贮,可以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可以在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在农户间互通有无,但禁止任何人以粮食进行投机黑市买卖。不准买卖粮票和以粮食供应证非法牟利”。10月11—14日,县人委召开第一次市场物价工作会议。根据省9月物价工作会议精神,着重分析研究近几年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物价水平、自由市场物价如何掌握与管理,工业产品价格及农副产品价格的掌握等问题。

三、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县委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基本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商业。在农村,从互

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进而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县城和集镇,组建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同时通过加工订货、代购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基本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五”期末(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0622万元,比1952年增长73.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37万元,比1952年增长55.6%,其中对居民的零售占77.7%,对社会集团销售占5%,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17.3%。“一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1.7%,其中工业产值年均递增55.4%,农业产值年均递增10.5%。从农业总产值构成看,种植业产值比率从1952年的96%下降至1957年的80.7%,而林、牧、副、渔业产值从1952年的4%上升至1957年的19.3%。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小学由1952年的519所、713个班、在校学生28702人,发展至1957年的528所、787个班、在校学生31724人。小学教职工由1952年的846人发展至1957年的1035人。中学由1952年的4所、29个班,上升至1957年的5所、40个班;学生由1952年的1632人上升至1957年的2161人。卫生方面,全县住院病床由1952年的20张发展至1957年的50张,千人拥有床位由1952年的0.061张发展至1957年的0.13床。1953年,在“团结中西医”政策的指引下,县举办中医进修班,组织百余名西医学习中医理论。1957年,县、乡两级医院陆续把有名望的中医聘进医院,开设中医科。是年,麻疹在全县大流行,总人口1.45万人的宝华乡,即有1270名儿童患麻疹,7岁以下儿童几乎人人感染发病,全县抽调医疗力量,尚嫌不足,省卫生部门专门组织医疗力量给予支援,医疗队在姚家村设临时抢救病房,组织抢救。血吸虫病防治着手进行,1954年3月,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成立,查螺灭螺主要结合冬春水利工程,采用人工土埋。妇幼保健普遍推广,普及新法接生。1956年县在城镇、天王、下蜀三个点集训新法接生员597名,基本

实现小乡拥有 2—4 名新法接生员。享受公费医疗及劳保医疗对象从 1952 年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公办教师,扩大到 1956 年的县粮食、商业系统职工。文化系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句容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人均年工资,由 1952 年的 2518 人、351 元增加至 1957 年的 4972 人、490 元,增幅分为 97.46%、39.6%。居民储蓄存款,1952 年为 26 万元,1957 年上升至 65 万元。粮食总产、人均占有粮食,1952 年为 15.86 万吨、497.3 公斤,1957 年为 15.99 万吨、437.3 公斤。水产品由 1952 年的 0.02 万吨,上升至 1957 年的 0.13 万吨。

第十章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党的八大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针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和新任务,按照中央、省和地委的部署,句容县委认真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又根据上级的部署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城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第一节 整风运动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矛盾。3月28日,省委发出《关于传达、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通知》。4月上旬,地委发出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的通知。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部署,首先在召开有126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扩大到科局

长以上干部)上传达省委、地委的指示,然后又在春耕生产誓师大会、乡支书和机关下乡工作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贯彻省、地委指示,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贯彻意见。县委3次研究全县各阶层思想动态,根据反映,负责同志亲自找个人谈心。5月15—17日,县委举办县机关正副科局长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班。通过学习,大家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社会发生的大变革有了新的认识;全县党员干部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提高了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月12日上午,郭庄乡来电话称:该乡光明社社员闹事不生产,要斗争社主任周××,并扬言集体到县请愿;同时,在闹事的当晚,发生牛棚的耕牛牛绳被解、1头牛死亡事件。县委接电话后派出县长门盛德等3人前往郭庄乡光明社调查处理。门县长等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分头召开支部党员会、社员群众会,进行教育,对有错误的干部进行处理,对周××挪用公款物资分期归还,对干部之间隔阂进行谈心教育,并立即恢复生产。

5月17—28日,句容县城东乡铃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停止生产、组织请愿,队与队社员互相殴打轰闹分社,合作社组织与党支部一度处在涣散状态。铃塘是句容第一个试点社,为什么会出现严重闹分社等事件,县委曾几次研究铃塘农业社出现的问题。5月27日,全体县委委员用半天时间到该社作调研,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弄清闹分社的原因,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精神,较好地解决了铃塘的问题。7月1日,镇江地委转发句容县委关于处理铃塘农业社社员闹事的报告。

1957年5月至7月,全县21个乡有13个乡49个社中发生大小闹事80起。县、乡、社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在事情没有闹之前,主动加强教育,依靠群众,在分清是非界限基础上,及时处理问题,对存在的问题不“躲”,也不“拖”。通过大辩论,闹退社的农户不但不要退,已退

的 16 户又参加了农业社,除 110 户鳏寡孤独外,所有单干户都入了社。

毕业生工作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如做不好,势必发生事故。1957 年 6 月 11 日,县委作出“关于认真做好毕业生工作的指示”,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即:做好不能升学毕业生的组织安排,特别是家在城镇的非农户,要通过多种渠道给不能升学的毕业生找出路;运用各种形式,进一步开展社会宣传,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加强组织领导,发挥组织作用。1957 年,句容应届中小学落榜学生 2002 人,占应届毕业生 67%。全县普遍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这次宣传的干部、教师达 1300 人。出动 573 个宣传队,直接受教育对象 56233 人;反复核对落榜毕业生安排方案,解决安排当中的实际困难;端正家长、学生对升学或劳动的正确态度;坚持民办教育事业的政治方向,有计划有目的地举办初中补习班。全县高小落榜生 1740 人,安排参加农业生产的 1389 人,其中 424 人兼做技术员、民师等社会工作;初中落榜生 235 人,安排参加生产 211 人,其中 103 人兼做会计、民师等工作,安排参加手工业服务行业 17 人,组织自学 7 人;高中落榜生 27 人,安排参加生产 19 人,其中兼做会计等社会职务 4 人,专职会计 1 人,安排手工业服务行业 3 人,组织自学 5 人。

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县委召开 1957 年第六次三级干部会,会议专门讨论了两类矛盾问题,研究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示在粮食问题上,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

县委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1957 年共接待人民来信来访 12193 件(次),到 1957 年底已处理结案 11993 件,已在处理和尚未处理 200 件。县委领导亲自抓信访工作,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改进信访处理手续,坚持群众路线办案,把信访工作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窗口”。

二、开展整风运动

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于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5月7日至9日,省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整风运动计划。5月16日,地委召开扩大的县(市)委书记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风的指示和计划,布置全区开展整风运动。

6月22日,句容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由李永月、曹云兰、傅众一、魏延堂、阎福泽、门盛德、蒋慧恕七人组成,李永月任组长。6月24日,句容县委召开整风动员大会。

整风学习自1957年6月24日开始,至8月下旬结束。划分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二阶段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城区和集镇参加整风学习的共有11783人。

整风的第二步是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明辨是非。10月24日,县委书记李永月作整风运动第二阶段的动员报告。整风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从县乡到机关部门领导,自己带头摆问题、找原因、挖根源,并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据统计,全县城乡在整风运动中共写大字报106.65万张。为了搞好整风,县委整风办公室编印了《整风简讯》,自1957年12月5日出刊,至1958年7月23日,共出刊59期。

省地委决定,反右派斗争纳入整风运动,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步骤,整风运动也改为整风反右。整风领导小组改为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由李永月等7人调整为李永月等11人组成,李永月任组长,傅众一、戎定和任副组长。整改是整风运动的最后一步。对企事业单位和乡、社干部,按整风、生产两不误的要求,分批轮训,边整边改。在整改阶段,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批评意见,制订

和完善规章制度,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化。

中小学整风学习自1月11日开始,3月12日结束。参加整风学习教职员工共1248人。分为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整改三个阶段。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在全国大鸣大放的高潮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右派分子错误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12日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整风运动的主题由整风转向反右派。5月25日,句容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地委召开的反右派斗争会议精神。6月20日,句容县委召开全委会,落实镇江地委关于反右派斗争计划。7月21日,句容报社收到行香乡樊家下隍社3个暑期回乡学生给县委书记的一封信,提出“农民生活太苦,粮食被弄到哪里去了”等6个问题,要在报纸上公开答复。第二天,乡总支电话汇报:下隍社几个暑期回乡学生在农民中散布右派言论,阻挠夏粮统购,在社员思想上造成一定的混乱。县委当即告知乡总支认真摸清情况,进行教育。并迅速派宣传部长前去处理。首先,进行排队,核实情况;第二,培养积极分子,扩大力量,为驳斥右派言论做准备;第三,加强教育,辨明是非,召开了有全体回乡学生及社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根据和风细雨、严肃认真、以理服人的精神,“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通过现身说法,驳斥散布的错误言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划清了界限。9月4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反右派工作,决定成立由县委书记李永月为组长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9月6日,县委召开全委会,对反右派斗争作统一部署。县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第一批9

月 10 日开始。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先培训骨干。9 月 7 日,县委召开党员科局长会议,传达毛泽东 1957 年 7 月在青岛与各省市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心内容是谈 1957 年夏季形势和反右派斗争。根据上级规定,农村不开展反右派斗争。

学校反右派斗争,由于教学工作的特殊原因,安排在 1958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

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作为整风反右运动的一个阶段。在整风运动中,从上到下,都号召大胆地鸣放,给各级领导提意见,一些同志在鸣放中讲过一些“过头话”和不当言论。而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往往把一些同志讲的“过头话”和不当言论,当作向党进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加以批判,作为定性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依据。反右派斗争中,全县有 76 人被定为右派(不包括反右派斗争初期定为右派,反右派斗争后期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 23 人),57 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右派言论)。其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中被定为右派分子 40 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右派言论)48 名。另外,中小学教职员中,将初期定为右派分子(56 人)中 16 人经群众讨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全县最后确定的 72 名右派分子中,劳动教养 18 人,监督劳动 50 人,留用察看 2 人,免予处分 2 人。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带来不幸后果。党的八大之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见成效,一些知识分子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大显身手作贡献时,在反右派斗争后被戴上“右派”分子等帽子,身心健康遭严重损伤,家庭受牵连,耽搁了为党和人民贡献才华的黄金年龄,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第三节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教育的中心议题是:合作社的优越性,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律问题。中央要求利用生产间隙,采取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8月5日至21日,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进行部署,决定于秋收前全省农村以粮食为中心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地委要求各县(市)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后推开。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分为四步进行,时间30—40天。第一步:安排生产,做好准备,动员鸣放;第二步,开展大辩论;第三步,整顿组织,健全制度;第四步,订出冬季生产计划和1958年生产规划。县委首先抓了城东乡铃塘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从8月12日开始至9月5日结束。铃塘是句容第一个合作化试点社,夏季曾为分社闹过事。在铃塘社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不久,县委还在城东乡的三台阁、北阳门、大南门3个农业社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县委还探索总结推广了城东乡施家边社组织、指导社员田头辩论的做法,城东乡召开妇女干部会议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经验,其中发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大辩论的经验,得到镇江地委的肯定,并向全地区推广。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觉悟,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完善了粮食保管、分配等项制度;改善了干群关系;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也出现一些问题。在向富裕中农说理斗争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

子破坏活动时,有的乡犯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甚至出现有的地主、富农被打、罚跪、被绑等违法行为,县委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二、句容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

1958年2月1日至6日,中共句容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在此前的1月19日至31日召开了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252人,列席代表738人。预备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会议。在1月19日的预备会上,李永月代表县委及常委会作了整风动员报告,以3天半的时间鸣放,共贴出大字报5545张、意见6000多条、90多万字。以乡为单位举行民主讲坛40多次。在鸣放的5545张大字报、6000多条意见中,按性质分为8类:领导作风方面2148张、2346条;统购统销方面749张、865条;干部执行政策方面364张、475条;工农关系方面230张、232条;经济问题方面206张、338条;合作化方面360张、433条;政法方面253张、255条;文教卫生方面109张、121条;其他方面1126张、1279条。在“鸣足放透”的基础上,于22日下午由鸣放转入辩论的动员。辩论主要解决3个问题:一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以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方面的突出错误论点为辩论对象;二是实现“农业四十条”的问题,以批判右倾保守为主;三是党的领导作风问题。

2月1日,正式会议开幕。傅众一、阎发学代表县委作《全党动员起来,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而奋斗》、《农村整风整社的意见》的报告。会议着重批判影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到会代表和列席代表一致保证苦干1年实现全县每亩产粮850斤,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水平;苦干3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要求。

2月6日,会议通过中共句容县一届二次会议决议。李永月在会议闭幕时讲了话。会议提出,为了保证这次党代大会确定的目标实现,必须做到: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开展经常性

的政治思想教育；凡参加会议的代表都要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树立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思想，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严格防止强迫命令，坚决采取说服教育方法。

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县委着重抓农村整风、生产两大工作重点。学习湖北省孝感、麻城、红安三县领导经验，决定建立在统一领导前提下的分工负责制，以确保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的落实。是年7月，县委又制定在集体领导下干部实行分工负责的责任登记卡制度。

三、精简机构与下放干部

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1957年2月，中央连续发出《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提出干部要参加基层劳动，要开辟脱产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

按照中央、省和地委的指示，在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句容县委进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1957年7—10月，县委将工业部与财贸工作部合并为经济工作部，统战部并入宣传部，撤销政法部、林业部，政府机构中，撤销蚕桑科、农产品采购局和手工业管理局，还将计划科、统计科、劳动科与计划委员会合并为经济委员会，文化科和教育科合并为文教局，财政科与税务局合并为财政局。全县党政机构撤销、合并了17个部门，448名干部被动员到农村或充实到生产第一线。11月22日，省级机关27名干部下放到句容当农民。1958年2月12日，县城2500人集会，欢送县机关首批42名干部下乡当农民。这42人中，有党员9人、团员16人，科长1人；这批下放干部中，有的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英勇战士，过去曾拿枪保卫国防，当党需要加强农业第一线时，又带头务农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2月20日，句容县在春节后举行

3000 多人的集会,隆重欢送第二批 71 人下乡当农民。这 71 人中,有党员 25 人、团员 24 人、科长以上干部 5 人,妇女干部 12 人。机构精简,加强基层第一线的干部力量,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行政经费支出,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内逐渐形成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学习和宣传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热潮中,句容县在1957年冬、1958年春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1958年,生产“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出现以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征的“共产风”,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资源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急剧下降,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遭受严重挫折。

第一节 农业“大跃进”

一、农业“大跃进”的萌芽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对全国农业发展作了全面部署。1月25日至2月7日,江苏召开全省农业

高额丰产社代表会议,贯彻“农业四十条”,交流丰产经验,发起高额丰产竞赛。1957年9月20日至10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会议的决定和这个修正草案,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拉开了“大跃进”的帷幕。1957年12月5日,省党的三届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争取1958年农业‘大跃进’,打响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炮……”。

句容县贯彻“农业四十条”,1956年冬春农田水利工程完成813万立方米,占1950—1955年总和1194.5万立方米的69%,扩大了灌溉面积,改善了排水面积,保证了增产,旱田改水田由1956年的1.82万亩,提高到1957年的1.95万亩。1958年2月召开的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对1958—1967年农副业生产等作了规划。“规划”提出①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1958年63700万斤,比1957年增加101%,1962年69575万斤,1967年101025万斤;②棉花:1958年26.2万斤,1962年60万斤,1967年100万斤;③油料:1958年1552.46万斤,比1957年增加87.3%;1962年3450万斤,1967年4325万斤;④耕畜:总头数1958年21721头,比1957年增加19.3%,1962年31160头,1967年46500头。养猪:1958年67万头,比1957年增加660%,1962年100万头,1967年125万头。家禽:1958年93万只,比1957年增加18%。⑤蚕茧:1958年81940斤,比1957年增加16%,1962年130万斤,1967年1200万斤。⑥茶叶:1958年16200亩,比1957年增加298%,1962年10万亩。⑦绿化:1958年4.82万亩,比1957年增加27%。⑧农业总产值:1958年10548万元,比1957年增加307%,1962年15309万元,1967年23656万元。“规划”还对文教卫生、经济工作提出“跃进”的指标。会议认为,在贯彻“农业四十条”纲要中,要克服右倾保守情绪,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生产“大跃进”,掀起高额丰产竞赛热潮,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为1958

年全县实现亩产 850 斤的增产指标而奋斗。

中共句容县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以冬春水利为重点的生产“跃进”运动在全县展开。4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形势跃进,工作方法跃进》社论后,句容县委组织全体委员进行了学习,并用电话通知各乡组织干部学习,县委宣传部将此文翻印成册发给干部阅读。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与贯彻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迫切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提出要在 15 年赶超英国的设想,并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 1958 年的成都会议的酝酿和讨论,在 1958 年 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实际早在 1957 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对周恩来、陈云纠正“左”的做法给予批评,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批评反冒进,开展了“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1958 年 1 月 16—18 日,句容县召开了冬季生产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按照上级要求,错误地开展“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自年初开展“斤粮担肥”运动后,至 4 月 2 日,已积各种自然肥料 70139 万担,占常年积肥任务 164845.8 万担的 42%。是年 5 月 15—18 日,句容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总方针。8 月 16—18 日,县委宣传部在亭子乡召开各乡宣传委员、文化馆(站)干部、小学辅导区主任等 72 人参加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现场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工作,并对下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工作了部署。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与贯彻,“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县兴起。

三、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

根据党的八大确定的方针及省、地委的指示精神与远景规划，句容于1958年7月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总的指导思想是大办地方工业和治理山洪，兴修水利。由于“大跃进”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计划指标严重脱离实际。例如规划总要求提出：“苦干1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生产指标；苦干2年，基本改变句容面貌；苦干3年，全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半年化肥化，1年水利化，2年电气化，3年机械化，4年普及初中，5年达到粮食总产50亿（斤），平均每人1万斤。林业生产：奋战2年实现绿化县，奋战5年达到用材自给有余。工业上5年内基本消灭城市和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建成共产主义的新句容”。实际1958—1962年，粮食总产一直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其中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不及1957年的一半。地方工业的兴起，全民所有制职工大量增加，至1960年底达10992人，比1957年增加6020人，增长1.21倍，致使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61年起，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布局，精简机构，下放职工，充实农业第一线。经过3年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得到协调，生产布局趋向合理。

四、农业全面“大跃进”与高产“卫星”

1958年2月，镇江地委提出1958年农业奋斗目标：稻麦亩产400公斤，水稻单产325公斤，旱谷单产250公斤。句容县委则把1958年农业奋斗目标定在稻麦亩产425公斤。从1953—1957年，句容粮食单产每亩在120公斤左右徘徊。要在一年之内由120公斤达到425公斤是不可能的，但随着“大跃进”兴起的浮夸风，一个个高产“卫星”接连打破纪录。1958年6月16—18日，县委召开现场会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参观了大卓乡云塘社和宝华乡楠江社，其中楠江社9队出现了3.61亩小麦平均亩产1035

斤。现场会提出：“保证水稻亩产 3000 斤，力争秋后上北京”“指标七倍跳，措施十倍跳，干劲百倍跳”；是年 6 月 26 日，县召开 11328 人参加的建设社会主义英模跃进大会。27 日，县公布小麦高产“卫星”：二圣乡西城农业社 21 队 1.56 亩小麦产量为 5091 斤，亩产达 3263 斤（1631.5 公斤）。西城农业社向全省发小麦亩产 3263 斤高产“卫星”以后，大大惊动了新闻界，《新华日报》头版红字标题，并出号外，省广播电台增添“3263”特别节目，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亩产 3263 斤的来历》书，还惊动苏联专家前来考察，西城农业社的代表还上北京参加高额丰产会。在二圣乡西城农业社 21 队小麦高产“卫星”之后，城东乡新河社金竹巷队一块 1.063 亩小麦田，共收获小麦 1840 公斤，平均亩产 1731 公斤，成为江苏省“又一颗卫星”。秋收开始后，各地“捷报”纷纷飞来：茅山公社延福大队王店专业队的近 1 亩 8 分双季稻前作亩产 3302 公斤，后作 1772.5 公斤，共 5074.5 公斤。全县 22 个公社除城镇、磨盘、东昌三个公社没有上报高产“卫星”外，其他 19 个公社都上报了高产“卫星”，其中最高的高产“卫星”，是三岔公社的迎峰大队，上报亩产达 3045 公斤。不仅粮食种植放“卫星”，水产养殖业也放“卫星”。由县委领导带头搞的水产养殖试验田，5.1 亩试验养殖水产收获鱼 9.6 万斤，单产达 18821 斤，为 1957 年全县平均亩产的 392 倍。三岔、郭庄、天王等乡党委书记试验田共 19.5 亩，平均亩产也在 1 万斤以上。这些高产“卫星”是怎么来的？都是弄虚作假的产物。以二圣乡西城农业社亩产小麦 3262 斤这个曾轰动全县全省的高产“卫星”为例，事后调查得知：乡党委有位领导，为了骗取名誉替乡党委“争光”，再三唆使他工作所在地的西城农业社主任孔某某，大放小麦高产“卫星”，孔某某第一次只向他报 1500 斤一亩，这位乡领导说太低了，人家有 1800 斤呢。第二次又向他报 2400 斤一亩，这位领导摇摇头说“不行，不行，再加码”。孔某某第三次把 9 块高产小麦田的麦把合并到 1.56 亩田里，共打下 5091

斤,亩产平均 3262 斤,这位领导拍手道好。为了进一步达到骗取荣誉的目的,还捏造情况写丰产经验总结,叫孔某某等背熟来应付上级的检查和外地的参观访问,并威胁群众要上下一致,不能乱说。二圣乡西城社的小麦高产“卫星”出名后,孔某某和会计顾某某两人上了北京,参加高额丰产会,在会上介绍经验。二圣乡西城社小麦高产“卫星”弄虚作假,骗取了荣誉,刺激了其他乡弄虚作假的歪风,一个个高产“卫星”上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当时浮夸风盛行的写照。1958 年由于遭受夏季旱灾,粮食单产(亩产)只有 118 公斤,比 1957 年单产 125 公斤下降 7 公斤,降幅达 5.6%。粮食单产 118 公斤与 425 公斤的“跃进”目标数相差甚远。从这个角度讲,当时的浮夸风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有关。

五、林、茶、果业扩展的艰苦创业

“大跃进”中的林业有两个突出:一是大炼钢铁,砍伐了大量树木和竹林,给林业带来极大的破坏;二是植树造林也搞“跃进”,搞群众运动。例如栽竹运动,句容解放至 1957 年共有竹 1.7 万亩,1958 年栽竹 3.13 万亩,县委书记李永月、第二书记曹云兰带头参加栽竹劳动。在植树造林运动中,1958 年造林达 7.25 万亩,其中赤山公社在葛村以西的下马岗建立 2.5 万亩的桑树。1958 年,茅山林场函请陈毅题词“东进林”三字,鸿笈飞来,全场职工和茅山人民欣喜相告,是年冬天挑选职工与当地驻军及南京林学院实习生共 100 余人,在大茅峰西坡,用马尾松栽植“东进林”三字。以麻栎镶嵌四周,每个字占地 33.3 亩,翌年春竣工,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后已成为茅山的一大景观。

1958—1962 年,是句容茶叶发展的重点时期。1949 年,句容有茶园 64 亩,产茶 600 斤,多系寺庙种植。解放后,1955 年开始发展茶叶生产。1958 年,县创建或改建了高庙、方山、茅山、九华、浮山、下蜀 6 个茶场,开辟新茶园 1 万余亩,为句容的茶叶生产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新辟茶园时,茶树苗全从外县外省购买。1958年3月,全县组织116人赴金坛县茅麓茶场学习,利用茶树嫩条,进行无性繁殖。中共句容县委第二书记曹云兰亲自带领250名中学生和职工,翻山越岭到茶场剪茶条,并亲自背回茶条47斤,回县后举办500多人的茶条扦插技术训练班。是年全县有22个乡镇、188个农业社、9个国营场圃进行茶条扦插育苗。从6月19日到29日的10天时间里,完成茶条扦插850亩。1959年、1960年又完成茶条扦插986亩。

解放后至1955年,全县有桃果林300多亩,板栗林6000多亩。1958年3月,创办国营浮山果园,面积4700亩;同年,在县城西门建小果园,面积214亩,山区社队建立集体果园。至1959年,全县果园面积达23444亩。

第二节 工业和其他战线的“大跃进”

一、全民办工业

自从省委提出“县县发展工业,乡乡举办工业,社社积极参加”的战斗号召后,地委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大力发展工业。句容县在1958年1—5月已办厂(矿)584个,其中县办22个,乡办12个,社办554个。在584个厂(矿)中,新建的336个。县委于1958年4月下旬和5月中旬连续两次召开工业跃进大会,但仍认为工业“大跃进”干劲不足。是年6月21—24日,县又召开兴办地方工业跃进大会,939人到会;办厂规划指标由原来的18779个跃增至20095个。县千人工业跃进大会后,至7月15日,上报已投入生产的工厂(矿)6469个,其中土化肥厂3288个,生产土化肥895吨。7月16—19日,县委召开工业现场会,为工业跃进鼓劲,对1958年的工业指标又加码并细化,上山搞工业由原3000人增至1万人。南京机床厂在机械化装备设施方面给予句容无偿支援,先

后支援发电设备、刨床、铣床等各种车床设备,为句容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至12月10日统计,全县新办各种厂矿企业16914个,其中社办16812个,工业总产值2018.7万元。后经县统计部门认定,1958年工业总产值为1529万元。

二、万人上山采矿

句容县委认为,句容地处丘陵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民国时期曾有10多家小矿场。从句容的实际出发,大办采矿工业是句容的首选。1958年7月,县成立工业远征采矿团,县委书记李永月任采矿团政委、副县长阎发学任采矿团团。全县以乡为单位共成立22个远征大队;分两批组织万人上山采矿。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先后建立地方国营句容县铜山铝铜矿、地方国营东昌煤矿、地方国营宝华煤矿、地方国营湾山煤矿、地方国营独山煤矿、地方国营句容县高骊山煤矿、地方国营句容县铝矿、句容县九华铁矿、地方国营句容县大理石矿等。是年,全县开采铁矿石15万吨、磷铁矿石0.12万吨、磷矿石2万吨、铝矾土18万吨。

三、大炼钢铁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提高一倍,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省委三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1958年全省产钢20万至30万吨,铁50万至70万吨。北戴河会议之后,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加快钢铁生产和建设速度问题。镇江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从各行各业抽调20万劳动力组成采矿、冶炼大军,保证全年出铁15万吨,争取20万吨,炼钢保证5万吨,争取6.2万吨,全区大炼钢铁会战开始。句容县委要求各公社建小高炉,大炼钢铁。句容县8月份钢铁生产没有完成任务,9月虽普遍开门,但进度不理想,9

月 16—18 日,县委召开钢铁生产会议,决心大搞钢铁之战。会后,黄梅公社立即行动,决定在黄梅大队下东队筹建炼铁厂,全队 48 户社员的 111 间房子全部让出,以“大跃进”的速度建炼铁炉。为了加快钢铁生产,全县抽出 3995 人炼铁,4227 人运输,400 人生产焦炭,1443 人粉碎,334 人炼钢。10 月 9—15 日,县开展钢铁高额丰产周活动,共建各种炉子 908 个,总容积 333 立方米,平均每天点火的炉子达 35 个,7 天共出铁 41.16 吨,共建炼钢炉 202 个,产钢 11.72 吨。

为了加快钢铁生产,镇江地委县(市)委书记会议要求 10 月上旬建成常州、镇江、溧阳、句容 4 个钢铁基地并投入生产。确定每个基地由二三个县(市)共同负责建设;每个基地要在 10 月 19 日前至少建成土炉 2000 立方米,洋炉 400 立方米,经常投入生产的常备民工要达 4 万人以上。会议之后,句容、溧水、高淳三县县委紧急行动,组建句容溧水高淳钢铁联合指挥部(后改名为句容西山钢铁厂),下设政治部、基建部、后勤部、办公室;并从三县紧急抽调 5 万多名常备民工,在句容县城西郊西庙地段建设句容“小土群”(即小高炉、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钢铁基地。为了保证小高炉的使用,山林树木和竹林遭到严重破坏。在“大跃进”背景下的钢产量,实际是以铁锅、生铁和矿石熔合凑成的 280 吨铁团团。句容西山钢铁厂不久关闭,124 万人民币付诸东流。

四、“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交通运输是保证原材料及时到位的重要一环。句容县 1957 年兴建解放后首条公路—后(白)郭(庄)线,1958 年竣工。全长 14.8 公里。1958 年,交通运输方面采取“农闲大干,农忙小干,急事突击”的方针,计完成公路修建任务 254.45 公里,其中矿区道路 63.5 公里,地方道路 96.57 公里,乡村大道 93.2 公里;兴建桥梁 10 座、73 米,洞、涵 233 个;全县共完成物资运输 18.34 万吨、586

万吨公里。

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目标指引下，1958年掀起办电的热潮。是年8月，南京机床厂借给句容电厂美国产的SA型125千瓦交流发电机1台，扩大了发电能力。11月，后白墅建成旋浆式水电站1座，装机容量40千瓦。1959年8月，县城东门房家坝水电站建成投入，安装75千瓦发电机2台。自1958年响应中央发出的“高速发展水电事业”的号召以来，全县共建成容量不等的小水电11座。还有一些为了办电而办电，用人工车水发电，结果只是电灯光闪了之后，发电设备及工程就成了废物。磨盘公社在驻地朱巷东队利用两个水塘的地势高差，建了一个小水电站，发动农民用龙骨水车把低处水塘的水运输到高处的水塘，然后放水发电，虽然电灯也亮了，后因无充足的水源不得不停止发电。

邮电及广播事业的“大跃进”。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影响下，全县新增15个公社邮电局，与1957年比较，农话交换机由8部、230门发展至35部、671门；话机由90多部发展至494部，杆路由223.37公里猛增至547.13杆公里，明线由317.97对公里增长至734.25对公里。县提出每个大队要通电话的目标。在“大办”电话的同时，广播事业也出现“大办”的“跃进”，利用电话线作为有线广播线。1958年有下蜀、大卓、黄梅、白兔、春城、三岔、郭庄、天王8个公社建立广播放大站，广播喇叭由公社驻地 toward 大队及社员家庭扩展。

五、科教文卫领域的“大跃进”

随着工农业的“大跃进”，句容县科教文卫领域也开始了“大跃进”。

1958年4月，为了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县成立技术指导委员会，由李永月等13人组成，李永月任主任；各乡党委和合作社、生产队也必须成立技术组织，乡成立技术推广站，第一书记任站长，

高级社成立技术研究小组,党支部书记任组长,生产队要有技术员。是年7月13日,为促进科学技术革命,县委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建立科学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县科工委由县委书记李永月等28人组成,李永月任主任,科研所由李永月兼任所长,县长曹云兰兼任农科所所长,在科研所内成立工业、农业、林业、水利、社会科学、医药、商业7个研究组,并规定了科研所的6大任务,拟定了研究员的条件和任务。厂、矿、场、校也建立了科研组织,共计有研究室97个,各类专业研究小组615个。这些在“大跃进”期间一哄而上的科研机构,既无研究人员,也不具备研究手段,空有其名。

在教育方面,1958年,为适应公社化的要求,提倡“村村办小学,儿童都读书,实现幼儿、小学、初中教育三普及”。全县办起常年性和季节性的幼儿园和托儿组470个、609个班,入园入托幼儿19731人,教养员806人。教养员由社、队指派,后因自然灾害的影响,各地幼教事业发展超越社队经济承受能力,先后停办。小学也由1957年的528所、31724名学生,猛增至625所、1207个班、54896名小学生。同样由于发展速度超过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导致教学质量下降。1959—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对小学教育也作了调整,1962年比1958年,在校小学生减少2万多人。中学教育在“大跃进”形势下,先后办了东昌、白兔、陈武、天王、二圣、郭庄、葛村、黄梅、云塘、下荫、石狮、城墟等12所初中,70个班。1959年,宝华公社又创办民办初中1所,至此,全县中学已达18所、93个班。此外,1958年创办农业中学68所、74个班,有学生2741人;1959年调整布局,合班并校,保留了21所农中、53个班、学生1867人。1958年,县政府分别在城镇、城镇北门外、黄梅原军马医院,创办了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和农林大学,共招收4个班、153人,8月1日开学上课,学制2年。在县办大学的影响下,黄梅公社、城东公社各办1所水稻大学,共招收2个班、110人,8月15日

开学,学制1年。1959年6月,农业大学改为农业中学,其他几所大学停办。

在文化方面,由于农村大办食堂,一度将原俱乐部办为“三堂一部”即:会堂、课堂、食堂、俱乐部。绝大多数人民公社成立了文工团,人数少的不足10人,多的达40人,1959—1961年先后停办。1958年12月7日,县委发文成立“句容人民出版社”,出版《促进》杂志,1959年元旦出《促进》杂志创刊号。1959年1月3日,在原文化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句容县图书馆,与文化馆合署办公。是年3月,成立句容县档案馆,配备专职人员2人。

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除“四害”(苍蝇、老鼠、蚊子、麻雀)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自1958年春节后就开始,全年共发动并集中行动4次,投入运动184.17万人次,共灭蚊6510斤,苍蝇17000斤,老鼠252万多只,麻雀237万只。针对句容地区是全省血吸虫病流行较严重的县份,1958—1959年,全县开展了查螺灭螺运动,共投入11.57万个劳动日,查清钉螺分布情况,土埋灭螺345.56万平方米;完成丝虫检查20万人次,粪检8万余人次,治疗丝虫病6100人,钩虫病2487人,蛔虫病33221人,检查血吸虫病17.9万人次,对查出6277个血吸虫病人,普遍进行了医治。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全县办公社医院19个,妇产院82个,1958年妇女住院生产1119人,保障了母子的生命安全。

体育方面。1958年,曾仿照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馆,在县城文化活动中心地区兴建一座竹结构(上盖石棉瓦)体育馆,馆内可容纳观众3000人。1959年,县体委举办过农村篮球选拔赛,并与县工会、县团委多次组织职工篮球、乒乓球、田径、射击、越野跑等竞赛活动,参赛者达千人。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公社化运动前的小社并大社与“三类社”改造

1955年12月,毛泽东提出“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许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仅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句容是1956年开始合作社小社并大社工作,即由初级农业合作社进入高级农业合作社。至1956年12月,全县建立368个农业合作社。在小社并大社过程中,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群众工作还不够细。1957年出现多起闹分社事件。因此,根据中共江苏省三届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镇江地委的部署,句容县委开展整社工作,特别是把问题较多的“三类社”作为整社工作的重中之重。到1957年底,全县还有“三类社”37个,县委要求加强对“三类社”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扭转落后状态。为此,县乡分工负责,包干解决。县级机关抽调58人,进驻20个“三类社”搞整改工作,乡干部包干了17个“三类社”的整顿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至1958年3月,全县37个“三类社”中,有17个“三类社”赶上“一类社”的水平;20个“三类社”赶上“二类社”的水平。其基本做法是:出安民告示,争取群众;首先抓生产,带头搞生产联合;干群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发动群众,初步打击了坏分子;边劳动边讨论,解决了生产上的迫切问题。

二、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以公社为经济核

算单位,全社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偿调用。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是年8月下旬,由中共句容县委书记李永月率工作组赴行香试办人民公社。9月7日,黄梅、城东、大卓、石狮4个乡暨国营句容县农场联合召开基层干部会议,宣布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定名为黄梅人民公社。兹后各乡纷纷效仿。此时,全县共有17个人民公社。9月下旬,又推广黄梅公社办大社的经验,把刚刚以乡新建的16个人民公社调整合并为东昌、宝华、茅山、天王、赤山、城镇6个人民公社。此时全县共7个人民公社。同年12月,县委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除四乡合一的黄梅人民公社保留外,其他6个人民公社调整为宝华、下蜀、亭子、天王、茅山、磨盘、袁巷、后白、二圣、葛村、郭庄、三岔、东昌、陈武、行香、伯群、春城、城镇18个人民公社。此时,全县共19个人民公社。1959年3月19—21日召开的句容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规定,决定成立“句容人民公社联社”。曹云兰任社长,阎发学、侯春林、阎福泽、赵治和任副社长;李永月、曹云兰、门盛德、傅众一、周振森、万本文、阎发学、张新光、侯春林、阎福泽、郇祯祥、陈道明等29人任委员。是年5月,黄梅人民公社分为黄梅、城东、大卓、石狮4个人民公社。此时,全县又退回到以乡建立的22个人民公社。

三、公共食堂等公共福利机构的兴起

1958年7月,三岔乡每个生产队办起集体食堂,全乡2358户都参加食堂吃饭。他们认为集体食堂有利于计划用粮;节省劳力,解放妇女劳力,增加家庭收入;节省燃料,又能积肥;便于开展宣传教育与扫盲。办集体食堂群众的顾虑是:喝开水、取暖、生孩子、生病、走亲戚、天凉后洗澡等困难。为此,三岔乡决定建立开水站、男女公共澡堂、新法接生站、乡民办医院,对冬季取暖做了准备,还办

了幼儿灶、规定了临时客饭制度。是年8月,句容县委推广了三岔乡办集体食堂的经验。随着人民公社的兴起,公共食堂迅速在全县兴起。在“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等宣传口号的推动下,句容全县办公共食堂一哄而起。至1958年12月4日,全县已办公共食堂1555个,参加农户84000多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9.4%。此外,还办了敬老院49个、缝纫组710个,洗衣组1018个。还有托儿所、幼儿园等。大规模地举办公共食堂后发现许多问题,不仅不能节约粮食,还造成物资上的巨大浪费。1958年农业上水稻等农作物长势很好,应是一个丰收年,可是丰产不丰收,原因之一是农村主要劳力全集中上了水利工地和工业等大炼钢铁工地,留在生产队的基本上是老、小、病残者,许多田里的水稻等庄稼没有劳力收割;原因之二是有些人认为有了食堂可以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造成一些庄稼无人去收割,烂在田里,粮食损失严重。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本身又造成粮食浪费严重,使解放后刚吃饱饭的广大农民,一下子又面临忍饥挨饿的局面。

四、无偿调拨的“共产风”

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无偿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按上级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当时集体财产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一哄而起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和文教事业,就不能不平调社员的房屋、粮食、蔬菜、炊具、家具、用具、家禽等生活资料,水利、工业多个行业都大搞群众运动,又无偿调拨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资料。从1958年下半年公社化至1960年上半年,句容全县共无偿占用土地41964.2亩,其中县级32873.9亩,社级7909.3亩,队级1187亩;平调劳动力6281992个;其中县级4950034个,社级1293791个,队级38167个;平调各种农具56147件,其中县级34352件,社级9559件,队级12236件;平调房屋14512.5间,其中县级7684.5

间,社级 2952 间,队级 3876 间;平调被伐的树木 2538223 担(每担 50 公斤),其中县级 2002428 担,社级 511397 担,队级 24398 担;平调各种车辆 15268 部,其中县级 11190 部,社级 1414 部,队级 2664 部;共动用私人款 302476 元,其中县级 149048 元,社级 152191 元,队级 1237 元;平调各种家畜 6937 头,其中县级 3348 头,社级 2714 头,队级 875 头;平调家禽 214185 只,其中县级 177216 只,社级 35280 只,队级 1689 只;平调大小家具 54418 件,其中县级 29798 件,社级 10787 件,队级 13833 件;平调建筑材料折合人民币 196742 元,其中县级 128211 元,社级 51438 元,队级 17093 元;平调其他物质折合 133783 元,其中县级 94923 元,社级 23875 元,队级 14985 元。

第四节 八大水库等水利工程大会战

一、兴建水库的提出

1957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农田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各地在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运动中,都部署以大规模的人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1957 年 11 月中、下旬,镇江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开展兴修水利、积肥、造林三大运动。县委根据句容解放前后的实际,讨论研究句容水利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句容是一个多山的丘陵地区,境内北、东、南三面环山,南部及东部为茅山山脉;北部为宁镇山脉,最高的大华山为海拔 437 米。中部为丘陵岗地,西部为秦淮河平原。境内水系为秦淮东支、太湖西支和沿江三个水系,句容的地势与全国西高东低相反,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走势。由于地势高低悬殊、多山,缺水库、湖泊,河床狭小,调蓄能力差。解放前由于山林遭到破坏,雨大成洪灾,无

雨成旱灾。因此过去群众曾称句容是穷山恶水,农业产量很低,要使句容农民翻身,除了植树造林、保护林地外,兴建水库,使大雨能拦住,天旱不缺水,成为句容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共识,是句容县委经过解放后农业发展的实践逐步形成的。1950年,县委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山区挑塘筑坝,圩区则加高加固堤防。1952年3月,苏南行署水利局派员到句容成立水利工程处,着手山区水库规划、勘测设计等技术工作。是年11月,句容南乡的小马埂水库动工兴建,1953年春完竣。1954年特大洪水,使沿江及秦淮河圩区受灾最重。是年冬翌年春,县委发动丘陵山区劳力支援圩区兴修圩区堤防和涵洞,完成土方128.07万立方米。1955年冬,县委发动群众动工兴建固江口水库。固江口水库位于黄梅乡九华山东侧的和尚山与泥山之间,来水面积9.12平方公里,总库容501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万亩,坝顶高程110米,是句容海拔位置最高的水库。该水库工程难度较大,加上其他原因,直到1960年大坝才合龙蓄水。1956年3月,动工兴建民兵、蟒蛇洞水库,总库容92.4万立方米。1957年1月,县成立李塔水库工程指挥部,2月动员磨盘、袁巷、天王、葛村、二圣五个乡劳力分批轮换上水利工地,最高上工人数近5000人。由于工程预算增加,直到1959年才基本完成工程项目。1957年11—12月,石山头、潘冲两座水库动工兴建,总库容895万立方米。至1957年12月,全县塘坝由1949年底的7.8万个增加到9.4万个,蓄水由6900万立方米增加到13000万立方米。

二、八大水库的兴建

在1958年1月底召开的中共句容县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傅众一代表县委作的《全党动员起来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必须贯彻中央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兴修必要和可能的大

型工程的建设方针,根据我县情况,治水原则应从防洪、排涝、灌溉需要为基础,结合水利发电和航运,全面安排,做到3个为主: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依靠群众为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基本达到解除水、旱、洪、涝灾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加快了句容水库工程等水利工程大会战的步伐。1958年1月,仑山(时称大芦塘)中型水库动工兴建。仑山水库位于句容县东北部的宁镇山脉南侧,属太湖湖西流域洛阳河源头,水库原以库内大芦塘村得名。1961年以仑山为名,水库集水面积24.5平方公里,总库容2613万立方米,是一座灌溉效益较高的山谷型水库,灌溉面积达6万亩。仑山水库是句容动工兴建的第一座中型水库。1959年5月合龙蓄水。1958年3月,茅山(原名火炼培)、二圣(原名二圣桥)两座中型水库开工兴建。茅山水库位于茅山西侧,地处赤山湖中河上游,原以库区火炼培村命名火炼培水库,1960年以茅山定名茅山水库。茅山水库承接茅山诸峰来水,集水面积33.5平方公里,水库总库容2029万立方米,计划灌溉3.8万亩,水库修建动工后,6月前完成清基、隔心墙挖填和低涵管道的铺设以及大坝部分土方,后因农忙暂停。是年冬,组织后白、茅山、天王、袁巷、磨盘五个公社1万余劳力突击进行大坝土方施工,到1959年2月,大坝合龙蓄水。二圣水库位于秦淮河流域赤山湖上游北河中段,承受市境中东部丘陵来水,集水面积103.5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和水库上游提水灌溉为主的中型水库。水库总库容6530万立方米。二圣水库是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淹没面积较大,跨了3个公社15个大队、32个生产队,淹没面积近1万亩,拆迁涉及24个自然村、965户、5541人。是年冬,发动二圣、三岔两个公社5000余劳力进行施工,1959年6月大坝合龙,当年蓄水高程10.5米,蓄水量49万立方米,1959年冬又增派春城、郭庄两个公社劳力,工地最高上工人数达1万余人,1960年大坝高程至21米。

1958年4月,句容(原名戴家边)、北山(原名普渡桥)两座中型水库动工兴建。句容水库位于句容城区东北约4公里处,原以坝址附近戴家边村命名。句容水库开工兴建后,至6月完成大坝清基、隔心墙挖填以及低涵洞身管道铺设等工程,为大坝土方施工做好准备。是年冬,发动城东、黄梅、石狮3个公社8000多劳力进行以大坝土方为主的施工,至1959年4月底,坝顶平均高程达27米,5月上旬大坝合龙蓄水,是年水位22.78米,蓄水量144万立方米,灌溉农田800余亩,1960年水库大坝高程达30—31米。北山水库位于句容北部宁镇山脉南侧的句容河源头,距句容城区14公里,集水面积59.5平方公里。水库原名是因库区近坝位置有一座普渡桥得名,1960年定名北山水库,在中型水库中,北山水库是地理位置高、坝身最高、兴利库容最大、效益最佳的山谷型水库。是年4—10月,北山水库施工进行大坝清基、低涵铺设涵管以及挖填隔心墙等前期工作,是年11月底展开大规模施工,大卓、宝华、下蜀、亭子4个公社万余劳力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北山水库是当时句容县8大水库施工的“龙头”,县委书记李永月坐镇北山水库,以有线广播统一指挥其余7座水库的建设。1960年1月15日,句容县委集中干群近万人进行大坝合龙,驻句容某工兵团500名官兵赶来支援,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大坝胜利合龙。

1958年8月13—23日,以全县抽调5800名共青团员和青年民兵组成的青年民兵突击团,大干10昼夜,完成小马埂水库渠道、天王红土山流域治理、李塔水库土方工程扫尾3项工程。是年10月,虬山水库动工兴建,原设计标准为中型水库,后改为小(一)型水库标准(总库容1099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万亩)施工,1959年春合龙蓄水。是年11月,位于白兔的幸福水库动工兴建,总库容776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万亩,幸福水库大坝于1959年春合龙蓄水。是年11月下旬,全县组织1万劳力支援大运河拓浚工程。次年春节后缩减为2000人,4月停工撤回。

1958年12月,墓东水库动工兴建。墓东水库位于句容东南茅山北麓、墓东村南,属太湖湖西流域,水库集水面积17.4平方公里,总库容1176万立方米,是句容6座中型水库之一。墓东水库开工后,在完成大坝清基、坝身部分填土(约2.5万立方米)以及低涵铺设后,因劳力不足、资金未落实等原因于1959年停工缓建,直至1972年冬开始续建,1976年春大坝合龙蓄水。

1958年12月,其规模位于句容第一、第二的南河天王坝和句容河房家坝先后动工兴建。天王坝和房家坝蓄水量相当于小(一)型水库,天王坝是天王公社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也是袁巷、磨盘公社早年翻提江水的中转调蓄库。天王坝和房家坝工程于1959年春完竣。

三、客观认识 1958 年以兴修水库为重点的水利大会战

综观 1958 年以兴修水库为重点的水利大会战,第一,修水库是句容水利工作的重点,方向正确。1958 年全县完成 12 座中小型水库,3 处河网化工程、9001 处小型水利项目,同时,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参加全国性大运河治理工程。句容的水库特别是句容的 6 座中型水库(北山、二圣、句容、仑山、茅山、墓东),都是在 1958 年开工兴建的,除墓东水库外,其他 5 座中型水库都是在 1958—1960 年大坝建成合龙蓄水。因此,1958 年水利大会战成果应当肯定。第二,广大干部群众那种早日改变家乡面貌的热情和干劲、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可敬可贵,值得发扬光大。第三,1958 年水利大会战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特定的政治形势下进行的,水利工作偏离了年初县党代会上确定的“以小型为主”的方针,搞了“八大水库”(北山、仑山、句容、茅山、二圣、虬山、幸福、墓东),因急于求成,计划脱离实际,财力、物力难以承受,劳力不足,粮食短缺,移民安置等问题相继出现,是有些水库不能按时完工的重要原因,有些水库(例如墓东水库)不得不停工缓建。

第十二章

从初步纠“左”转为“反右倾”

1958年11月，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句容开始初步纠“左”，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调整公社的管理体制，压缩工农业的过高指标，并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开始纠正。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合称庐山会议），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即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反右倾”斗争。句容根据中央、省和地委的部署，在党内进行“反右倾”斗争，并继续“大跃进”的错误，给句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句容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第一节 纠正“左”倾错误

一、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9年2月18—25日，句容县召开全县第二届党代大会。正式代表546人，县、社、队和厂矿列席代表663人；6天的预备会议，2天的正式会议。

李永月在会上传达学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省三届三次党代大会的精神。

曹云兰代表上届句容县委在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

工作报告。报告指出：1958年自5月30日起严重干旱68天，部分地区百日无雨，受旱面积193979亩，与1934年干旱相似，但1958年粮食总产达3.6亿斤（实为2.54亿斤），工农业总产值5230万元，比1949年增加241%，比1957年增长28%。关于1959年的任务，报告提出：决战年大决战，赶吴县赛金坛，苦干一年粮食亩产翻两番，总产超过八亿三，工农业产值肩并肩，林特生产夺冠军，副业生产大发展；社员的平均收入由1958年的69.5元增加到120元；工业主要以开采为主，1959年采煤6.5万吨，铁矿石22万吨，铜矿石30万吨，铝矾土矿32万吨，炼铁1000吨，炼钢轧钢100吨，炼粗铜300吨，工业总产值3600万元。

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会，李永月等29人当选为中共句容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梁栋才等4人为候补委员。在中共句容县二届一次全委会上，李永月、曹云兰、门盛德、傅众一、戎定和、万本文、周振森、阎发学、张新光、侯春林10人为县委常委委员，门盛德、傅众一、戎定和、万本文、周振森为县委副书记，曹云兰为县委第二书记，李永月为县委第一书记。

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体制调整

针对大办人民公社以后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多次召开重要会议，特别是1959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严肃批评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给农民算账退赔，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省委于3月10日至19日召开了全省六级干部大会，揭露与分析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矛盾，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地委于1958年12月上旬在溧阳召开各县县委分管书记和农工部长参加的整社工作会议，对整顿公社作了部署；1959年1月10日，地委召开第二次整社工作会议，总结、检查整社试点情况，确定今后整社分三批进行。句容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和部署，在省委农村整社工作组的帮

助指导下,于1959年1—2月进行整社试点,3月普遍展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一结束,句容县委于3月22—30日召开全县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与会人员6005人;会议学习和领会省委召开的六级党员干部大会上所贯彻的郑州会议精神,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实现句容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会议在充分肯定1958年“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展开了大鸣大放,提出了5万多条意见,特别是1958年秋季人民公社成立后,刮了一阵“共产风”,表现为: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影响生产,影响群众生活,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会议认为,要妥善地坚决地纠正工作中的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两种倾向,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有关政策作了初步规定,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会议决定:调小大队管理区和生产队规模,大队由原来159个调为182个,生产队由原来1536个调整为1873个。在收入分配关系上,会议决定:社员收入部分占总收入的55%,国家和集体占总收入的45%。在全县劳动力使用分配上,会议决定:全县14万男女劳力,分配在农业生产上75%—80%,林业占5%,副业占5%,社办工业占10%,服务业占5%。为了密切干群关系,会议对干部参加劳动作了规定:县科局长以上干部每年1—2个月,一般干部1个半月至半年;公社干部每月10天,大队干部每月15天。

县委四级党员干部大会之后,从4月下旬至9月中旬,全县分四批(第一批黄梅等7个公社,第二批东昌、赤山、茅山片共11个公社,第三批下蜀片2个公社,第四批天王、袁巷、磨盘3个公社)召开党员干部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县委3月下旬召开的四级党员干部大会精神,会期在7—10天。会议开法:第一步总结检查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第二步鸣放算账;第三步民主选举。下蜀、宝华两个公社于8月5—12日在句容农校召开了第三批党员

干部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达 1106 人。会议的收获有 5 条:1. 检查总结了郑州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① 调整体制,管理区(大队)由原 14 个增至 24 个,由平均 611 户变为 357 户;生产队数由原 122 个增至 216 个,规模由原 70 户减至 49 户。② 恢复自留地,两个公社已分自留地 2630 亩,每户 0.3 亩,但仍有 845 户尚未分到自留地。③ 发展家庭副业,特别是家庭养猪恢复较快。④ 粮食分到户,是自炊还是吃食堂则根据群众自愿。⑤ 占用私房处理,共占私房 727 户、1874 间,已退 446 户、1217 间,未退的是房屋已拆(281 户、657 间)无法退还,但已作安排。⑥ 干部作风大有转变。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由过去 179 人减少到 41 人,经济手续不清的由过去 200 人减少到 75 人。2. 初步算清 1958 年的经济账,进一步消除了群众对“一平二调”的顾虑,使暗账变为明账,包括:对 1958 年的收益分配账、国家占用集体和社员的物资账(宝华、下蜀两公社共 7.14 万元,会前已付 1.94 万元)、干部经济手续不清账(有贪污行为 124 人,贪污现金 5976 元、粮食 3130 斤;挪用 161 人,挪用现金 4828 元、粮食 6833 斤)。3. 算清到会干部的思想作风账,与群众加强了团结。4. 检查了新的右倾思想。5. 选举三个委员会(公社党委会,公社管委会,总支、支部委员会)。

从全县看,自贯彻中央郑州会议和全省六级干部会议精神以后至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传达之前,初步形成纠“左”的氛围,县委带头检查自己的问题:学习外地经验死搬硬套;大兵团作战,用于水利、运输、修马路还可以,但搞生产不行;搞形式主义、作风不深入,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群众批评说:“种田人做不了种田主,反而不种田的人做起主了”。

从生产看,社员出勤增多,工效提高;副业生产有了新发展;生产运动推向新高潮;从整社看,后进社面貌改变明显。全县已有 119 个管理区(大队)、1196 个生产队落实“三包一奖”(包工、包本、

包产、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

1959年5月19日,句容县委向江苏省委、常州地委提出申请,解散原四乡合一的黄梅公社,仍回到原一乡一社的模式,全县由19个公社调整为22个人民公社。

三、工业及教育社会事业的初步调整

1958年,为了工业“大跃进”,句容县委组织万人上山找矿,开采矿业。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传达后引起县委深思,1959年2月5日决定,为了尽快改变1958年搞工业的“人海战术”,县属34个厂矿由16615人削减至6697人,裁减近万人。是年5月,全县工交系统在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的开展清仓运动,共清理出物资价值69.9万元,包括钢材27吨、木材1532立方米、生铁8吨。为支援农业战线,全县工业系统在年初裁减近万人的基础上,又减少2870人。到是年7月,撤并工业企业26个,裁减职工1374人,至此,全县县属企业职工留用4228人,其中本县工人3751人,占本县劳动力总数的2.75%。

教育战线1958年也出现“大跃进”,不仅幼儿园(班)数量猛增,普通中学和农业(职业)中学数也大量增加。特别是农业(职业)中学一哄而起。从1959年2月起,县对农业中学进行整顿,农中由1958年的68所、74班,裁减至1959年的28所、44个班。对农中学生年龄超过17周岁的1058人中,劝退回家务农767人;对现有22所农中实行半日制的9所、实行隔日制的13所、经费自给的2所、部分经费自给的18所。是年,1958年创办的工业、农业、农林县办大学先后停办或改为农业中学;在文化方面,1958年成立的“句容人民出版社”和《促进》杂志,也裁撤停刊。

四、纠正数字不实等不良作风的努力

在1959年2月召开的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县委对

干部作风有初步检讨,对干部参加劳动提出要求,规定县科局长以上干部保证一年当好一个月的农民,保证每月10天劳动。是年4月,县委针对公社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又研究了五条规定,作为公约,自觉执行。内容包括:对上级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走群众路线;人人搞试验田,个个学农业技术;参加体力劳动;严格组织生活,共5项17条。6月2日,针对出现虚报和隐瞒现象,县委作出关于各级党员干部对待统计数字的六项规定:要求加强教育,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一切统计数字必须真实准确,不得任意冒估或假报;使用统计数字,一律以党委或统计部门核定的数字为准;各级统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统计报表和数字的管理制度;各级统计部门,必须坚决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统计任务;有意谎报,不负责任乱报和有意捏造数字的人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给予批评或处分。

第二节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

一、“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意是要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结果却发动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原先准备的纠“左”的主题变成了“反右倾”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党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实行“大跃进”。

1959年8月26日,地委召开各县(市)委电话会议,对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作了部署,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倾”斗争。10月5—10日,句容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与会89人,其中党委委

员 22 人,科局长、公社党委书记等 67 人。会议首先由李永月传达江渭清在省委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然后分片(组)讨论。10 月 7 日下午,由县委领导同志传达县委常委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情况,开始批判所谓的“右倾”思想,批判包产到户和商业投机活动等,进一步鼓足干劲。

1959 年 11 月 16 日,镇江地委召开了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对整风“反右”提出要求。11 月 17 日,县委常委的整风学习转入重点批判阶段。11 月 24 日,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永月任整风领导小组组长。11 月 19 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县级机关的整风学习,从 12 月 9 日全面进入重点阶段。10 日起列席县党的二届二次大会,直到 24 日结束。自开始批判以来,全县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 21 人,其中省管干部 1 人,地委管理干部 7 人,县委管理干部 13 人。

1959 年 12 月 10 日至 24 日,中共句容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参加会议共 1711 人。15 天会议中,14 天为预备会议,1 天正式会议。会议中心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进行反右整风。

中共句容县二届二次代表大会,错误地开展对县委第二书记、县长曹云兰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曹云兰对 1958 年以来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发生的“左”的错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个人意见,这不仅符合组织原则,而且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曹认为“总路线中‘多快好省’是矛盾的”、“大跃进是浮夸、吹牛,不实事求是”、“人民公社究竟有什么优越性?”,曹总结分散吃饭有 12 条好处,正由于他(曹)这种思想,句容的 2171 个食堂一下子散掉 1519 个,实际曹云兰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把曹云兰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句容的代表进行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由十四级降为十六级。直到 1963 年 6 月 27 日,经镇江地委批准,曹云兰

才被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原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改为党内警告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分配适当工作。

根据镇江地委的部署，句容农村开展了以两条道路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风整社运动。试点工作于1959年12月底结束。县委在中共句容二届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专门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对整风整社作了部署，要求在1960年2月底前结束。整风整社分为三步：第一步，进行正面教育和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点对象的批判；第二步，制订生产规划，推行“三包一奖”三结合；第三步，组织建设，包括选举公社、大队的党委会、管委会，处理应处理的党员干部，吸收新党员，组织好阶级队伍。

根据地委的指示，句容县委部署在1960年上半年开展以反官僚主义、反右倾保守、反企业管理混乱、反技术革新保守落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参加单位49个、职工4662人，占实有人数的80.76%；共贴出大字报30723张。根据边整边改精神，共整改21895条，占鸣放意见总数的71.27%。

“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受到打击，助长了不坚持原则、不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不正之风，使刚刚开始的对“左”之路中断，对“左”成果毁于一旦。

二、继续“大跃进”

农业上继续“大跃进”。首先表现在计划指标上，1959年，句容全年粮食总产只有14227万斤，而在1959年1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句容二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提出1960年保证49201万斤，1961年保证61200万斤，1962年保证73000万斤。1960年的粮食总产指标是1959年粮食总产的3.46倍，实际是不

可能达到的,实践的结果是: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15815万斤,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15112万斤、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22552万斤。分别只有原计划指标的32.14%、24.69%、30.89%。其次是水利工程的“大跃进”。由于1958年开工的水利工程过多,且多数是中型水库,多数水库大坝合龙都在1959年、1960年,并且水库工程在大坝合龙之后,配套工程作业量仍很大。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句容共有10万劳力上水利工地。共分两块,一块是小型水利工程有5万人,另一块是大型水利工程,共有12个水库工地、5万多劳动力。1960年4月11日,县委决定抽调全县总劳力的6%共8203人,对几项大型关键性工程进行常年施工。到1960年10月,“大跃进”以来兴建的10座中、小水库,8座已合龙蓄水,疏浚句容河下段3.2公里,整修了塘坝,使全县总库容达2.8亿立方米,但还有4座水库存在安全不达标、库渠工程不配套等问题。县委决定,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仍集中全县10%的劳力(13000人)大搞水利工程,其中1万人是干本社本队水利工程,3000人由县统一调度使用。三是进行作物布局大革命。总的要求是大面积连片种植,做到一大二好三整齐;在品种上,根据地区特点,以粮食为主,大量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全县的主要农作物,划分四大生产区,即水稻生产区、山芋生产区、棉花生产区、花生生产区,每个生产区以一个品种为主,几个品种为副,根据土质等条件,一般不超过三个品种。四是农田肥库基本建设。总的要求:5亩一个草泥塘,10亩一个沤肥坑,100亩一个贮粪池,达到遍地草塘化、农田肥库化。

工业上继续“大跃进”。1960年1月19—23日,召开句容县全党全民大办县社工业誓师动员大会。会议分析了1959年工业形势,制定了1960年持续跃进的规划,评选出7个红旗先进单位、530名先进生产者。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到是年12月底,全县大、小厂矿已发展到68个,产业工人3115人,1960年工业总产

值 2522 万元,比 1959 年工业总产值 1812 万元增加 39.2%。

三、三年“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1958 年至 1960 年的三年“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大搞行政命令,“一平二调”,不讲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句容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句容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

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大跃进”期间,句容农业各项指标年年加码,实际是年年减产,由于劳力都上了全县大的水利工地、工矿企业,实际投入本生产队的农田水利、施肥、田间管理的劳动力大幅减少,加上水利和工业占用农田过多,劳动力缺乏又使一部分农田“抛荒”。这样,1958 年至 1960 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亩产,都比 1957 年下降。统计数字显示,1958 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107.60 万亩,比 1957 年 128.14 万亩下降 19.08%,单产 118 公斤,比 1957 年的 125 公斤下降 5.6%;1959 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85.10 万亩,比 1957 年下降 33.59%,比 1958 年下降 20.91%;全县粮食单产 84 公斤,单产比 1957 年下降 32.8%,比 1958 年下降 28.8%;1960 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97 万亩,比 1957 年下降 24.30%,比 1959 年增加 13.98%;粮食单产,1960 年为 82 公斤,比 1957 年下降 36%,比 1959 年又下降 2.38%。实际粮食总产,1958 年为 127135 吨,比 1957 年 159851 吨下降 20.47%;1959 年粮食总产为 71135 吨,只有 1957 年 44.50%,比 1958 年下降 44.05%。1960 年粮食总产 79077 吨,比 1959 年略有增产,比 1958 年下降 37.8%,比 1957 年下降 50.53%。

工业、交通盲目发展,比例失调,造成极大浪费。句容经济原以农业为主,工业相对落后,发展工业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但盲目求快,劳民伤财,像“万人上山找矿办矿”,全民大炼钢铁,挤占了农业的大量劳力,平调了人民群众大量房屋、农具和生

活用具,毁坏了山林树木,浪费了十分紧缺的财政资金。据统计,全县因大炼钢铁等工业和水利工程,被砍伐平调的树木 25.38 万担,竹子 70 万斤。1960 年,全县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当年轻重比为 1 : 1.3。

文教事业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由于发展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加上片面理解“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过多过滥,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导致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下降。人均占有粮食,1957 年为 437.3 公斤,1959 年降至 199.9 公斤,1960 年为 225.4 公斤。粮食、副食品的供应,由于产量大幅减产,再加上留种粮翻番,以及水利、工业、运输“大军”实际需要使口粮标准提高,1959 年,一般留在社、队食堂的口粮供应原粮标准,每月只有 15 斤左右。由于粮食严重短缺,农村大量发生消瘦、浮肿人群,句容最多时达 8000 人,营养不良造成许多人胃下垂,妇女不来月经,全县在 1959 年、1960 年出生人口下降,非正常死亡明显增加。据人口资料统计:1959 年,出生 5444 人,比 1958 年的 9019 人下降 39%,人口增加为 -1.62%。;1960 年,出生 4636 人,比 1959 年又下降 14.8%,人口增长为 -11.13%。在当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负增长,反映出因粮油短缺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之严重,也是解放以后至 20 世纪末唯一出现的两年人口负增长。

四、宝华事件

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的仓头、铜山两个大队,1958 年 2 月至 1959 年 1 月中旬发生非正常死亡几十人的严重事件。早在 1958 年 8 月,省委曾将人民来信反映非正常死亡的信件转给句容县委,句容县委虽两次派人调查,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致八九月又死亡多人。1959 年 1 月 23 日,江苏省委批转句容县委关于宝华人

民公社仓头、铜山两个大队近一年来人口死亡情况及其原因的调查报告。省委指出：“某些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竟然达到这样的严重程度，以至于对群众生死漠不关心”，“这个事件，虽然是一个个别的突出事件，但从这个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则带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希望所有干部都仔细读一读这个调查报告。务必防止再发生这类令人痛心的事件”。

五、各级党组织的救灾努力

宝华人民公社仓头、铜山两个大队非正常人口死亡事件教育了句容县委。1959年1月下旬，县委组织干部学习省委对宝华人民公社仓头、铜山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指示，举一反三，检查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是年5月15日，句容县委对防治浮肿、干瘦病作出紧急指示。包括：必须加强对防治浮肿病的领导；对浮肿病人的生活要认真照顾；大力发展副业生产；管好食堂等。全县原有浮肿病人1800多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已有811人恢复健康，先后出院，县对6月10日至8月底计划供应粮食1428万斤，第一类地区每人每月吃粮25斤，第二类地区每月每人口粮23—24斤，第三类地区每人每月口粮22斤。秋粮句容大幅减产，群众口粮问题面临严峻形势，省、地委对句容县征购任务从6500万斤调整为5500万斤，至1959年12月中旬，除去种子、饲料、口粮需要，对照库存共缺4020万斤，实际指标仅存1049万斤，安排后尚缺2971万斤，免上交任务1912万斤，还相差1059万斤。为此，县委采取了6条措施：一是核实产量，核实库存，弄清家底；二是贯彻“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精神；三是大抓瓜、菜代食品的生产管理和搭配使用；四是恢复与巩固公共食堂，建立健全粮食管理制度，全县恢复食堂1572个，共1745个，共有农户50754户，计划通过整社逐步实现食堂化，根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集体保管，发给粮票，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积极办好食堂；五是大搞多种经营和副业

生产,解决部分生产生活费用;六是加强领导,书记挂帅,积极做好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等疾病的治疗工作。

据1960年1月2日统计,全县清仓多出粮食38.36万斤,小秋收45.92万斤;增加种菜1.48万亩,已有菜5.62万亩;食堂1975个,参加吃食堂共74150户、291544人;安排吃粮水平一般每人每月15斤;寒衣已解决8679户、17755人、16030件;房屋修理已完成7795户、15463间;已治好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共3454人,还在治疗2694人。

1960年4月,县委在贯彻省六级党员干部会议精神中,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办好公共食堂,大抓瓜菜代食品,按照“麦前千斤菜,麦后千斤瓜,秋后千斤胡萝卜”的精神,建立蔬菜基地。是年5月,句容农村食堂总数达1984个,参加吃食堂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6%。食堂也经营副食品的生产。据统计,至1960年5月,食堂养猪8388头,养家禽4346只,饲料地6382亩,种莴苣8893亩,马铃薯1278亩,蔬菜29244亩,其他瓜菜1242亩,南瓜1040万塘(棵)。

1960年8月,句容县委常委通过整风,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来加强救灾、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工作的落实。县委主要领导亲自搞调查研究,讨论救灾治病的对策,对本县不能解决的困难,及时向地委、省委反映,使患病群众能保证基本营养,尽快康复。至1960年12月,全年(1960年)共治愈浮肿、干瘦和妇女子宫下垂病人28227人,占发病总人数31149人的90.6%,仍在治疗的浮肿、干瘦病人3434人。

第十三章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句容县经济遭到很大损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全县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最困难时期。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句容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农业、工业、商贸、教育及政治思想等领域进行调整，以摆脱困境，恢复经济，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句容县的调整，按照省和镇江地区的部署，分为两个大阶段：1961年、1962年为“八字”方针从初步实施到全力贯彻阶段。1963年至1965年为三年继续调整阶段。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句容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略高于“大跃进”前的生活水平。

第一节 “大跃进”之后的调整和探索

为了扭转“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自1960年11月至1962年7月，先后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

条”),以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进入调整的新轨道。根据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省委决定首先集中力量调整农业,进行纠“左”,逐步解决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一、对人民公社的调整与整顿

1960年10月底,江苏省委工作组句容小组进驻句容县城东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城东公社共有12个大队、1个农场,4393户、1.67万人口,3.88万亩耕地,是句容县委直接掌握的基点社,一直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水利、土质较好,1957年前,每年出售余粮600万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余粮社都变成缺粮社,粮食产量年年减少,社员收入年年减少,口粮标准年年减少。据统计,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67%,社员平均收入减少75%,口粮标准减少36%,1960年春天,不少大队农民每天人均口粮只有0.35斤至0.38斤,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大增,干部社员十分痛心。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五风”:以“共产风”为中心,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严重破坏了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按劳分配、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是年11月开始,城东公社整风整社分为算账兑现、集中整风和民主选举、建立制度三个阶段。12月10日前完成前两个阶段,然后进入制度建设阶段。在整风整社中,句容县委书记和城东公社书记带头检查,承担领导责任;省委工作组依靠当地组织,依靠干部自觉,放手发动群众,查问题、找原因、订制度,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1960年12月18日至1961年1月3日,句容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与会人员共5093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

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句容三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实事求是进行总结，初步揭发了“五风”的表现、危害、原因，进行了整风；研究了在句容具体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办法。会议鸣放意见 21884 条，其中县和公社占 86.71%，县级机关无偿调拨土地占 78.2%、无偿调拨劳力占 78.7%、无偿调拨农具占 65%、无偿调拨房子占 52%、无偿调拨家禽占 47.1%。会上初定退赔方案（225 万元）。

县四级干部大会之后，各公社贯彻县四级干部大会精神，揭发“五风”危害，进行算账退赔。至 1961 年 2 月 12 日，全县已有 182 个大队在搞算账退赔，18 个公社已开兑现大会，有 22 个生产大队第一批现金 91222 元已兑现到社员。在落实政策方面，全县在 2030 个生产小队中，初步搞好“四固定”的有 1479 个生产小队，占 72.8%；搞评工记分和定额包干的有 1725 个生产小队，占 85%；经常执行小段计划的有 1383 个生产小队。

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算账退赔，破产还债。在具体秩序上抓住了自报、评议、审查、定案、复查五个环节。算账结果：句容全县平调总额为 474.78 万元，其中县以上单位平调 320.25 万元，公社平调 101.83 万元，大队平调 30.39 万元，生产队平调 21.8 万元。平调中，属于集体生产资料为 293.51 万元，属于收益分配 57.05 万元，属于社员个人 123.52 万元；被调的财物有：土地 72356 亩，房屋 15211.5 间，大中型农具 38818 件，小型农具 107211 件，生猪 4046 头，耕牛 145 头，其他家畜 922 头，家禽 832 只，各种生活用具 54854 件，以及建筑材料和其他物资。截至 1961 年底，所有平调的财物已经退赔兑现，其中实物退赔占 49.5%，包括土地 2.899 万亩，房屋 9771.5 间，各种农具 3186 件，耕牛 139 头；退赔现金 242 万元。所退资金来源：省支持 191.4 万元，县财政自筹 49.8 万元。

根据中央“农业六十条”规定，遵照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

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出发,1961年9月,句容县委同意新划生产大队120个,生产队的规模,由2468个调整为3662个,其中20户以下的1431个。1962年1月1日,经报省委、省人委同意,新划出后莘、太平、长城、张庙、虬山、高阳、谢桥、浮山、唐陵、北山、仓头、白兔12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由4172户下降至2699户,人口由1.59万人下降至1.03万人。

1961年11月下旬,句容县委根据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在杨塘岗、三台阁、西庙3个大队进行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县委又在城东公社进行全面推开的试点。试点的中心内容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由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了生产与分配,经营与核算,耕牛、农具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不统一的矛盾,生产队和社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出现出勤人数增加、种植面积扩大、队与队之间的劳动竞赛自觉开展起来了,社员关心集体、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是年12月15—24日,句容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和全面部署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调整农业政策,精简下放人员。1961年1月,地委决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促进农副产品流通,增加社员的收入和市场副食品供应。4月19日,江苏省委、句容县委在城东公社进行讨论和实行“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调整生产队规模,妥善解决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和家庭副业存在的问题,实行生产队拥有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等“四固定”权。试点至1961年6月结束。城东公社大队由原来12个调整为27个,平均每个大队由366户调整为162户,生产队由原来145个调整为174个,调整后平均每个生产队25户。是年4月28日至5月5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了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讨论了“农业六十条”,会议

在总结检查中央“十二条”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分期分批试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案。会议认为，中央“农业六十条”的中心问题，是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句容办食堂的条件比较差，会议决定，当前主要做好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社员自炊，并切实做好分户自炊的善后工作。6月，中央发出取消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通知，句容农村公共食堂已全部解散。县委从1962年夏季预分工作中，就开始兑现党的多劳多得政策，到是年7月底，全县参加分配的365个大队、3598个生产队，已全面兑现结束。应分配给群众的粮食、现金已分别全部兑清，粮食计划也落实到户。年终分配在是年12月底结束。1962年，全县集体粮食实收总产200565吨，征购56121吨，占集体粮食总产的27.98%；拿出1899吨粮与国营商业、供销社换购生产资料；集体提留22669吨，占集体粮食总产11.30%；集体分配粮食117514吨，占总产的58.59%，每人平均口粮343.7斤，除了社员换购和归还预借后，实有口粮每人329斤，比1961年增11.5%。全县全年集体总收入2373.3万元，扣除实际开支的生产费用672.5万元，占总收入28.3%，每亩平均9.41元，比1961年增加1.53元。实交农业税170.8万元，占总收入7.2%，比1961年增加77%；提留公社累计116.6万元，占总收入4.9%，比1961年增11%；社员分配1381.11万元，占总收入58.2%，每人平均40.4元，比1961年增31.6%。

由于“大跃进”中相当一批农村劳动力进入企事业单位，造成城镇粮食供应紧张，农业因缺乏劳动力难以恢复。1960年9月12日，镇江地委根据中央相关指示，初步下达整顿劳动力的规划，句容县委立即行动，首先从精简机关及直属企事业单位入手。县级机关由原来的40个减少至33个，直属企事业单位由原来的70个减少到54个，新定编制为2247人，比原来人数减少19.84%。其

次,从是年9月,全县开始调整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和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至年底,全县共精简下放职工1466人,接收外地回县的下放职工184人,人民公社内部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力13300多人。1961年1—2月,继续整顿、压缩城镇供应人口,至2月底又有345人回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到1962年9月,全县共精简职工4434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1618人。精简人员直接回农村的有4038人,占精简总数的91.07%,减少定量人口3528人,占任务数的74%。精简活动减轻了城镇粮食供应的压力,充实了农村劳动力。

调整工商业政策。句容县地方工业,1957年有17个工业企业,362名职工,到1960年,全县厂矿企业49个、5538名职工,1961年遵循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精简机构、下放农民工、缩短战线,至1961年7月底,尚有厂矿企业18个,职工3371人,其中农民工2131人。根据江苏省委和镇江地委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再次对工业布局作调整和下放农民工的工作,10月底,全县又下放农民工983人,至此,全县除东风煤矿外,尚有职工1023人,其中农民工221人。

商业。1958年公社化以来,句容的商业体制几次调整。1958年春,全县共设6个批发单位、562个零售单位、2668个商业人员,其中国营人员980人,合营人员210人,合作人员1326人,小商贩152人,每个商业人员平均劳动额为5733元。是年下半年,基层国营商店改为公社供销部,合营、合作商业也并入公社供销部。统一核算。1959年8月以后,合营、合作商业又划出恢复原有组织形式。1961年1月,又将农村合作商店和合作商贩并入供销部,建立国营大队采购供应站,当年全年共有商业人员186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52%,比1958年减少799人。自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指示和商业工作40条以来,句容的商业体制又全部作了调整。首先将国营与供销社分开,成立供销社,通过社

员代表大会已分别恢复 22 个基层供销合作社,计 466 人,县商业局与供销社也分开核算,国营、供销社时有 653 人,比调整前 595 人增加 58 人。把原并进国营企业核算的公私合营、合作商贩仍然划出,重新恢复原有组织形式,走合作化道路,单独核算。全县由原来的 113 个核算单位、324 个门市部、1837 人,调整为 185 个核算单位、375 个门市部、1837 人。工资形式也由固定工资改变为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多种工资形式。1961 年 12 月底,句容全县生活用品、工业品库存 256.5 万元,比 1960 年 12 月 212.8 万元上升 20%,比 1957 年少 60 万元;商品周转,1961 年是 80 多天 1 次,比 1960 年加快 27.3%,与 1957 年相近。商品供应好于 1960 年,但部分商品品种的供应较紧张,约 300 种,最紧张商品是铁锅、草纸、瓷碗、肥皂、烟、酒、糖、棉线、胶鞋等 80 种。

市场管理工作,本着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县采取三项措施:首先健全组织领导。县成立市场管委会,并在城镇、下蜀、天王 3 个公社也成立市场管委会,其他公社成立市场管理小组。第二,加强市场物资管理。第三,保障合法贸易,取缔非法投机,对小商贩普遍进行审查登记,做好换发证工作。为改善市场物资紧缺状况,1961 年 2—3 月,在省委工作组的指导下,句容县委发动全体机关干部,以整风精神,全面清理了物资。全县库存煤炭 4162 吨,有 833 吨可以用于制造、修理农具,而全县农具用煤,每月不过 200 吨,库存煤可烧 4 个月,还有 3329 吨可以用于生活与市场;全县库存钢材 211.6 吨、库存木材 370 立方米,此外,还有毛竹、桐油、麻丝等物资。此次全县共清理出物资 112363 件,价值 145.7 万元,占县级机关总资产 473.4 万的 30.7%。此次清理,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破产还债问题;解决了农具制造和整修所需的原材料,支援了农业生产;缓和了市场供应,改善了供销关系;进一步整顿了机关作风。句容县农用物资和检查清理的报告,先后被江苏省委、中共中央华东局转发。

加强工业支持农业,安排市场和人民生活。全县的手工业,1957年共有58个社、组,14个自然行业,1033人。“大跃进”中,手工业合并中改为社办工业或地方国营工业,1959年底发展为85个单位、3355人,由于当时大办工业的目的不明确,办了一些不完全适合当前迫切需要的企业,制造了不少废品,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尤其是有些手工业转行,使手工业产品、品种、数量下降,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经过两年的整顿,到1961年10月,全县的手工业共有61个单位、1512名职工。其中为农服务的农具厂23个、1065人,占全部职工的70.44%;从事生活服务的38个单位、447人,占全部职工的29.56%。在市场方面,自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以来,句容先后恢复了以公社所在地为中心的农村集市贸易,且贸易额趋上升势头,例如天王集镇1961年1月25日市场总成交额达3.46万元,其中农民自贸达1.69万元。县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支农及安排人民群众生活方面。1959—1961年,县财政给困难社员抢修危房1.13万间,给困难社员治病5601人。

教育卫生事业也初步得到调整。1959—1961年,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大跃进”期间社队办的幼儿园、托儿所,后因经济困难以及公共食堂解散而先后停办。小学从1958年的625所下降至1961年的562所,在校小学生从1958年的54896人下降至1961年的43791人,还有46所小学高年级学生延长农忙假。卫生工作中,像1958年那种除“四害”式群众运动已停止。

三、“三反”整风运动

1960年5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改善领导工作作风,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清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根据镇江地委的部署,6月22日,县委首先在商业局试点,8月10日在县机关全面推开,9月底基本结束。参加“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共 866 人。通过学文件、整材料,训练骨干,转入鸣放阶段。鸣放中,共贴出大字报 23526 张,书面意见 23998 条、口头意见 3545 条。按内容分,属官僚主义方面 7529 条,贪污方面 1046 条,浪费损失方面 2939 条,工作作风方面 8010 条,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 1595 条,其他 6324 条;按层次分,对县委领导的意见 7452 条,对部委科局的意见 8457 条,对本单位的意见 8679 条,对一般干部的意见 1196 条,其他方面的意见 1786 条。鸣放后,运动进入制度建设阶段。机关有 130 名干部下基层,机关干部家属中,应迁回原籍回乡的 42 人中,除 4 人因病未回,其他 38 人已迁回原籍。这次运动,共揭发重点人 18 名,主要问题有:不服从党的领导;严重官僚主义;严重缺乏群众观点;严重违法乱纪和盗窃国家财物;特权自私;贪污公款公物等。

农村“三反”和改造整治落后队工作,镇江地委于 1960 年 7 月底召开了试点工作会议。根据地委的部署,句容县于是年 10 月下旬完成农村“三反”和改造政治落后队(政治落后公社 1 个、政治落后大队 30 个)工作。

第二节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多人参加大会(通常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我党在执政后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七千人大会以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共句容县委书记蒋继奋从北京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根据会议精神,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进一步调整农业

根据在城东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试点经验,1962年在全县全面推开。到6月底,已分期分批推行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和商品等价交换的政策;在粮食分配上,实行粮油定产、订购三年大包干,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分散集体土地。1959—1961年经济困难之后,各地对土地政策都有一些调整和探索,到1962年9月统计,全县3602个生产队,分散集体土地的有988个生产队,占27.4%,分散集体土地6751.1亩,占集体土地的0.95%。其类型有:借田不还又借大田,全县1961年秋借出大田25589亩,未归还的808亩,占分散集体土地的12%;转让:全县共有399亩,占6.9%;社员私自占用大田,全县共1054亩,占15.6%;私人开熟荒地:全县1737亩,占25.7%;社员扩大自留地:全县有1392亩。句容县委曾作了一个调查,1962年8月,县委共调查山区、丘陵、平原不同类型的8个生产队,私人种的土地,除了开荒、十边种植以外,单占集体大田就有250.4亩,比1957年增加214.9亩,社员自留地总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8.2%,私人所占耕地增长的手段主要是采取集体分田到户的办法,使人人皆有,大家欢喜,无形中形成半公开半合法的状态。其手段主要有:社员借田未还;分田给社员栽秧;补足社员自留地;灾后划给高岗田给社员种。根据社员分散集体土地状况调查,句容县委客观地分析了原因,对其合理部分给予保留,对于不合理部分,进行教育引导,对于在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形成的分散集体土地的做法,是在特殊时期克服困难的一个措施,表示理解。

在农村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同时,句容农村的一些地区自发地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经历了农业“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后,再加上 1959—1961 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社员群众生活困难,一些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了信心。受安徽省部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影响,1961—1962 年,句容共有 177 个生产队,实行部分作物包产到户。张庙公社南亭大队,把集体的 132 亩大田下放给社员,每人平均 0.5 亩。全县包产到户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油菜包产到户,二是三麦包产到户。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能增产,长城公社芦干大队 6 个生产队,1962 年有 2 个队油菜包产到户,结果单位(亩)产量七八十斤完成了,其他 4 个队反而没有完成 70 斤亩产指标任务。对于部分队实行部分作物包产到户,句容县委的态度基本是默认的,但对其做法,包括上级机关也有一些争议。1961 年 10 月 21 日,镇江地委“批转地委工作组关于句容县天王、行香两公社包产到户问题的情况汇报”〔镇发(1961)261 号〕中谈到,句容县天王公社的西漂、前进和行香公社的马里大队,在秋种中实行一部分按劳动力、人口划田到户、包产到户,“少数地方在今年(1961 年)夏种时已对某些作物实行包产到户的,现在不要马上收回,以免引起新的混乱……但在秋种前要收回归集体”,“有些地方打算在秋季实行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的,则应一律停止”。但到 1962 年 9 月统计,全县仍有 13 个生产队实行夏季油菜、秋季山芋包产到户。直到 1963 年在农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产到户”才全部停止。

二、进一步调整工商业

工业。1961 年年底,句容县属厂矿共有 30 个,其中矿 6 个、工厂 11 个、油米厂 13 个。通过 1962 年精简调整后,撤销下蜀铁矿、铅矿、大理石矿、水泥厂、陶瓷厂、造纸厂 6 个单位,3 个单位改变体制,原 13 个油米厂合并为 7 个。至此,全县共撤并 15 家工业企业,保留 15 家工业企业。

社办企业。1961 年年底,全县社办企业共 215 个,从业人员

3298人,还有集体所有制单位56个,从业人员1869人,两者相加,共271个单位,5167人。1962年以后,进行一次比较大的整顿,至8月底,尚有社(队)办企业114个,从业人员1722人,比1961年年底减少101个单位,占47%,减少从业人员1575人,占47.7%。

财贸。1962年,将全县划为7个经济区,以区建7个基层供销社,26个分社属7个基层供销社领导。6个购销站属分社领导。银行共设8个营业所、6个服务储蓄所。粮食系统按经济区划设7个粮管所、1个城镇粮站、21个购销站,2个税务组。

三、继续精简机构和职工,下放城镇人口

1962年4月至10月,全县开展精兵简政工作。整编前,全县行政机关共有县级机构单位40个(党委11个,群团4个、人委25个),区工委5个,公社34个,县直属企事业单位70个(工业15个、文卫15个、财贸5个、生产31个、党群政法3个),全县整编前实有行政、企事业人员2928人,其中行政879人,企事业人员2049人(不包括工人、教员)。通过整编,县级机构合并了3个(人事科并民政科,工业局并入工商局、卫生科并入文教卫生局),撤销了财贸部、劳动工资部、工业交通部、科委、物价科等6个单位,新设统计科和科协2个单位,整编后共设33个单位(党委7个,群团5个、人委21个),减少7个机构。县属企业保留54个,比原来减少16个。全县行政、企事业合计新定编制2347人,比原来2928名减少581人,精简19.8%;整编前,实有人员2928人,经过整编实有人员2288人,精简640人(回乡生产264人,退职73名,退休2名,开除过去曾受处分的32名,转集体184名,转工人34名,调外县12名,编外学习11名,编外休养28名)。

1962年,全县共计精简职工4529人,其中全民性质的1713人,社办企事业695人,集体性质102人,居民和家属554人,学生

1378人,县外单位87人,与1962年上级分配的任务看,精简全民职工超任务数(900人)90.3%,减少城镇人口数(1500人)超34.6%,超减少定量人口任务数(3500人)2.7%。

1962年,经过调整下放后,农村劳动力有了显著增长。据统计,至1963年3月,全县农村劳力共有128828人,比1961年年底123023人上升4.7%。同时全县精简职工后,全年可减少国家粮食定量供应58万斤,减少工资支出31万元。工业方面扩大代农加工能力,全县代劳加工粮食9420吨;交通1962年完成农用物资运输65000吨,占货运量59%;商业方面,通过调整,组织货物下乡,方便了群众。由于给农村增添了人力、物力、财力,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直接支援的作用。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首次从1959—1961年连续三年在7万多吨徘徊中突破出来,达11.28万吨,接近1958年粮食总产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由1961年的212.9公斤上升至305公斤;油料总产829吨,比1961年712吨增产16.43%。

四、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2年,句容县自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后,国民经济形势大有好转。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58人,列席80人,还有241人参加旁听。1962年12月28日至1963年1月8日为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分两段召开,1962年12月28日至1963年1月4日,由县委蒋继奋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党的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结合句容县的情况,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党的建设四个问题,作了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并大会小结;预备会

第二阶段4天(1月5—8日)时间,由县委宋敏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党的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句容县如何争取1963年农业全面丰收和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作了报告。正式会议为3天(1月9—11日),由李永月代表中共句容县委员会向党的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潘湘云代表中共句容县委监察委员会向党的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监察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县委正式委员25人、候补委员4人,成立了中共句容县第三届委员会。在县委一次全委会上,蒋继奋、李永月、门盛德、宋敏、潘湘云(女)、葛钊秉、张新光、戎定和为县委常委,蒋继奋为县委书记,李永月、门盛德、宋敏为县委副书记。

第三节 其他领域政策的调整

一、甄别平反工作

摘掉“右派”帽子工作。最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1958年7月前,是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将运动初期评定为“右派”分子、运动中表现好的23人(其中教育系统16人)摘掉“右派”帽子。1959年9月18日,镇江地委组织部召开各县(市)委组织部长和公安局局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要求在11月底前完成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句容县委于是年9月底,决定摘掉5人“右派”分子帽子。到1964年,又先后摘掉40人“右派”分子帽子。这样,句容先后摘掉68人的“右派”分子帽子。此项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其工作被迫停止。

对“大跃进”后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1961年9月开始对“大跃进”后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工作,1962年月30日,镇江地委发出《关于对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句容全县在“反右倾”斗争中受过处分的党员共1583人,经甄别,认为全错的占42%,部分

错的占 28%，均给予平反和纠正。但这次纠“左”仍不彻底，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彻底纠正。

二、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调整

教育。首先是贯彻执行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农业。1962年6月停办了句容师范和药材学校，精简职工50人，下放学生441人，家住农村的368人，都回队参加农业生产。下放1958年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146人；改变农村学生口粮供应办法，减少国家统销粮6万斤。再次，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全年全县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7531人，初中毕业生1196人，高中毕业生167人，他们大多安心农村生产。

卫生。调整医药卫生队伍，妥善安置下放人员，公立医院下放83人，其中充实到集体医疗机构29人，下放农村劳动54人；集体医疗机构精简70人回农村参加劳动。一年中，共治疗浮肿、消瘦病人7600多人，占发病人数的93.3%，消灭钉螺面积9.21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1134人，大力进行各种预防接种工作，几种主要传染病有显著下降，如白喉发病人数比1961年下降68.6%；加强了妇幼保健工作，新训和复训接生员77人。

文化。合并图书、文化馆，撤销3个文化站，紧缩编制，共精简12人。根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剧团、电影放映队上山下乡巡回演出和放映，以文化馆为阵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财政。1962年全县财政收入348.3万元，比1960年财政收入516.4万元下降168.1万元；比1961年财政收入346.9万元，略增1.4万元；财政支出，1962年为291.7万元，比1960年的681.5万元下降389.8万元，比1961年的488万元下降196.3万元。

第四节 1963年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并将1963年至1965年这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在三年继续调整阶段,句容县委按照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都比较好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一、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在1962年底至1963年初召开的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党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客观地分析了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有利条件;经过前两年的调整,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多;人民生活相应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日益加强。会议提出“今后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在1962年粮油猪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巩固成绩,扩大胜利,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认真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加强生产队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两三年内达到正常年景的粮食生产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两三年内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实现农业生产新高涨”。县委接受“‘大跃进’中高指标的教训,谨慎地把1963年全县粮食总产定在24500万斤,油料总产400万

斤,生猪年终圈存量达到7万头以上;林、牧、副、渔、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要有相应的发展”。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全县5个区委分别召开了党员大会,传达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落实1963年的任务。较好地开展冬春水利、积肥、技术革新等工作,特别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落实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工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年底,全县粮食总产达35496万斤,超原计划指标10996万斤,超产44.88%;油料总产309万斤,未达指标数;年终生猪圈存量达7.05万头,略超指标数;棉花总产45吨,是1963年棉花总产20吨的2.25倍;水产品总产625吨,比1962年的514吨增产111吨,增产21.60%。1963年1—9月副业总收入285万元,比1962年全年实收243.43万元增加17%。

1964年,农业生产在1963年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全县粮食总产37540万斤(其中国营、集体粮食总产36374万斤),比1963年增产5.76%,每亩粮食单产达165公斤,比1963年的155公斤提高1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471.7公斤,比1963年的461.9公斤增加9.8公斤;油料总产394万斤,比1963年的309万斤增产85万斤,增产27.5%;棉花总产45吨,与1963年持平;水产品1600吨,达解放以来历史最高水平,比1963年增产近千吨;生猪圈存量达9.83万头,比1963年增加2.78万头;蚕茧394担,比1963年增11%;造林1.63万亩,比1963年增12%。

1965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00.96万亩,比1964年的113.58万亩减少12.62万亩,由于亩产达188公斤,比1964年提高23公斤,所以全年粮食总产仍达37863万斤,比1964年增产323万斤,增产0.86%;人均占有粮食458.6公斤,由于人口增加迅速,人均占有粮食比1964年下降13.1公斤;油料总产2440吨,比1964年增加470吨,增产23.86%;生猪圈存量12.28万头,比1964年增加2.45万头;水产品584吨,比1964年下降千余吨;造

林面积 1.36 万亩,比 1964 年下降 0.4 万亩,零星植树 258.3 万株,比 1964 年的 6 万株增加 252.3 万株。

二、加强工业的主导作用

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同时,句容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省和地委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紧紧围绕为农业服务来发展工业,并进一步加强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工业方面,根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合理地调整布局,加强了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加强了市场迫切需要的轻工业。通过贯彻执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改善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初步整顿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63 年以来,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整个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水平逐步上升,工业的产品、产值都基本上达到预定的计划,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特别是农具的维修质量提高,在不误农时季节,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量的修理了农船、水车、犁、耙等农具。此外,各工业部门在大力支援农业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生活资料的生产,适应了市场的需要。1963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 1020 万元,基本保持了 1962 年的水平;1964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 1374 万元,比 1963 年增 34.7%;1965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1787 万元,又比 1964 年增产 30.1%,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15.8%,比 1963 年提高 5.4 个百分点。

在交通邮电事业方面,调整了布局,加强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邮电网络和运输工作,改进了企事业的管理体制,加强了集中统一;整顿了民间运输业,调动了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1963 年,完成地方交通货运量 12.2 万吨,其中支农物资占总运量的 51%;客运量 45.6 万人次;1964 年,完成地方交通货运量 15.3 万吨,比

1963年增25.41%，完成客运量64.2万人次，比1962年增40.79%；1965年，完成地方交通货运量22.1万吨，又比1964年增44.44%，完成客运量76万人次，又比1964年增18.38%。

在财贸方面，重点保障支持工农业生产，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1963年，全县财政收入370万元，支出243.9万元，有力地支持了生产和建设。根据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继续严格控制了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了信贷监督和现金管理。1963—1965年，银行共发放农业贷款1118.4万元，占银行贷款总额4549.73万元的24.58%；发放工业贷款131.86万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90%；发放商业贷款3255.47万元，占贷款总额的71.55%。在商业上，进行了所有制的调整，整顿了合营、合作商店（组）和流动商贩，按照经济区划，增加了零售网点，加强了服务修理行业。1963年以来，生猪、家禽、蛋品、蚕茧、茶叶和棉花等主要农副产品，也都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原订的收购计划。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情况逐年好转，商品供应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多，许多原来凭票供应的商品，逐步敞开供应，市场价格继续稳定。在生产资料上，商业部门千方百计地争取货源，有力地支持了生产。1963年，全县供应化肥456万斤，农药55万斤，农用木材926立方米，桐油6.7万斤；1965年，全县供应化肥1291.2万斤，农药127.8万斤。此外，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国家出台了用工业品向余粮较多的生产队换购部门分粮食的政策，这样既有利于粮食调剂，支援了受灾地区，又适当满足了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

三、文教卫生事业在整顿收缩后得到巩固

教育。1962年11月，茅山、白兔、郭庄公社按照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根据丘陵山区特点，举办了18所简易小学，后改办耕读小学。耕读小学办学形式多样，有全日制、半日制，早班、午班、晚班、巡回教学班、农闲班等，适应当地生产情况和农民

生活水平,很受群众的欢迎。1963年,县成立普及教育办公室,公社辅导区配耕读教育辅导员1名,加速普及小学教育,在全县推广耕读小学的办学经验。1964年,全县耕读小学达407所,学生11580人,占全县学龄儿童总数(77842人)的14.87%,占全日制公办学生总数的41.6%。1964—1965年“四清”运动中,江苏省委句容县农村教育试点工作组,以大卓公社为试点,探索如何面向农村实际,办适合农民需要的学校。总结出:“学校设置,因地制宜,大村设班,小村设点;教时安排,因时制宜,跟着生产走,随着季节转;教学形式,因人制宜,向女儿童开门,便利放牛娃入学”。这套办学经验,在全县推广后,1965年下半年,全县耕读小学发展到890所、899班、学生20155人,中央教育部〔66〕第10号文件,将《句容县大卓人民公社巩固耕读小学的初步经验》转发到全国各地。普通中学教育中,1965年,行香中学、下蜀中学、郭庄中学增设高中班,至此,全县有完中5所,初中12所、76个班、学生4688人,高中24个班、学生1288人。农业中学,1959—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全县农中先后停办。1963年,宝华公社新办农中1所、2班。1964年,全县农中增加至5所、6班。1965年,农业中学大发展,全县有农业初中75所、115班;农业高中4所、5班。共有学生4349人,占全县中学生人数的48%。农中教学时间,实行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假,学习时间每年3—5个月,学生半耕半读,教师半教半农,农业中学对满足农村高小毕业生继续升学的要求,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农村技术后备力量和管理人员起了积极作用,很多农中学生毕业后成为社、队的干部、会计、记工员、技术员、业余文化教员等。

卫生。血防工作,60年代初,全县查螺灭螺工作断断续续,声势不大。1964年,全县消灭钉螺面积16.78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人1653人,粪检22907人次,查出阳性病人1725人。1965年9月,国家卫生部和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军区从23个单位调集

了 85 名卫生血防专业人员,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队,指导句容县开展群众性的血防工作。血防队从东昌公社衣庄大队、黄梅公社南巷大队为山区灭螺试点,翌年初扩大到茅山公社,发动和组织社员突击查螺灭螺。黄梅、东昌两地驻军,也派出近 2000 干部战士,投入近 1 万个工日,帮助当地突击完成土埋灭螺 8.4 万平方米。这一次全县查出山区有螺面积 676.9 万平方米,共灭螺面积 236 万平方米。查治血吸虫病方面,60 年代初,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血防工作受到影响,一些地方血吸虫病病情回升,1964 年,下蜀公社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 175 人,幸及时抢救治疗未发生死亡。1965 年 9 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率工作队来句容蹲点,福建、上海、江苏等省、市血防办公室也派专业人员参加实际工作,现场指导查病治病,至 1966 年 9 月,仅用一年时间,全县收治血吸虫病 6269 人。防疫方面,1964 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县内大流行。1965 年夏秋,流行性乙型脑炎在县内流行,县及时组织力量抢治,并控制了疫情。

由于生活好转,人民群众体质增强,1963 年,全县人口出生达 16365 人,超过句容解放后人口出生高峰 1954 年的 15694 人的水平,为控制人口有序增长,县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推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1964 年,城镇公社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各居委会先后成立计划生育技术推广小组。是年,城镇公社人工流产 97 人,输精管结扎 8 人,输卵管结扎 42 人,上节育环 136 人。1965 年,全县上半年施行输精管结扎、输卵管结扎、上环、人工流产四项手术共 9921 例。

第十四章

思想文化战线和战备工作

随着 1960 年 9 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句容县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结合起来，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63 年后，学习雷锋、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向先进人物的学习活动迅速在全县展开，促进了句容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雷锋等英模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涌现出许多助人为乐、爱岗敬业的雷锋式青少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句容地处丘陵山区，驻军多，战备任务繁重。特别是 1962 年台湾的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期间，句容县委及驻军认真做好反空降、反空投等战备工作，确保了地区稳定和国防安全。

第一节 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

一、培训轮训干部、党员

1959—1961 年，县委以“反右倾”整风和贯彻“农业六十条”为主要内容，办轮训班 18 期，训练企事业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 3073 人（其中党员 2645 人）。1962 年，县举办党校培训班，轮训区、社干部以及机关股长级干部和大队书记、主任共 1585 人，占应训人数 91.6%。全县城乡 442 个党支部，从是年 4 月起，以按中央编

发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上了党课。1963年初召开的句容县第三次党代大会上,县委明确提出加强干部教育,有计划轮训全县大队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到是年3月,办干部轮训班9期,共轮训干部1773人,占应训干部91.6%;加强党员教育,全县33个公社党委办党训班,训练党员3822人;420个党支部上了党课,受训党员5488人,占党员总数的82.94%。全县还培养和建立了一支党课教员队伍。1965年9月镇江地委扩大会议后,句容县委在下蜀公社办党校教育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广;这次党校教育对象以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主,同时吸收部分支委和积极分子参加,重点学习毛泽东有关著作,同时交流支部工作经验,讨论工作。是年12月,句容县委在城东公社进行大队、生产队干部冬训的试点。冬训试点分两步:第一步,从12月4—9日,集训大队党支部委员为主的领导骨干,共172人;第二步,分片训练生产队骨干。这次冬训,增强了干部的革命人生观,部分干部较好地放下了“四清”运动之后不愿当干部的思想包袱;加强了干部之间的团结;尝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甜头。

二、反对干部不正之风

在1959—1961年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发生了特殊化的歪风:有的违反上级规定,变相扩大特需供应标准;有的通过各种不正当关系,多买多占;有的占用场圃、生产队土地,生产粮食、蔬菜归自己。1962年上半年,句容县委坚决贯彻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作风的指示”,从县委常委起带头学习省委的指示,并先后在区工委、公社书记会,县级机关科局长会议上传达省委的指示,揭发了县级机关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的一些问题,通过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和省、地委历次指示的贯彻,干部特殊化作风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是年,全县开展反对商品“开后门”运动,改进商品供应办法,建立干部外地就医和保健制度,取消了

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是年10月下旬,县委从会计训练班上统计资料发现,全县各社队干部乱开支粮食130.5万多斤,项目有几十种之多。及时出台了制止粮食乱开支的意见。1963年7月,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走后门”、反对干部特殊化)运动,全县共有164个单位、5619人参加,从是年7月5日开始,9月中旬结束。全县共分三批进行。“五反”运动强调以增产节约为中心,首先解决领导干部问题。是年底,全县1963年行政事业单位实际购买额为30.5万元,比1962年的40.8万元下降25.2%。1964年1月11日,县委转发县委农工部“关于张庙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调查报告”的通报。张庙公社三级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变了生产落后面貌,1963年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比1962年增产87%,超过历史最高产量的15%,是上交任务的1.8倍,密切了干群关系,转变了工作作风。1965年11月18日,针对“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社队财务不清、助长贪污腐化等问题,句容县委制定印发了《关于在所有社队建立“四大民主”制度的意见》(试行草案),《意见》提出:根据中央“二十三条”的指示,“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所有社队试行建立“四大民主”制度。县委印发的“四大民主”制度共4个大方面、20条,对落实基层民主制度、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有一定积极作用。

三、开展向雷锋等先进学习活动

学习雷锋活动。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迅速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是年3月29日,县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介绍雷锋事迹,县委书记蒋继奋在大会上号召全体职工向雷锋同志学习。宣传文教部门利用幻灯、板报、专栏等

形式介绍雷锋事迹；县文化馆还编演话剧《雷锋》在城镇、东昌煤矿等地演出16场，观众达1.8万人次。县工会、团委、妇联等群众团体响应县委号召，在全县迅速掀起“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县公安局在学雷锋活动中，于1964年1月20日至2月20日开展“爱民月”活动，共为民办好事474件。县教育部门在各学校广泛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通过举办雷锋事迹报告会、故事会，观看电影《雷锋》，教唱学雷锋的歌曲，使雷锋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学风，很快变成学生的实际行动。学校班级组织学雷锋小组，涌现了一批热爱集体、公而忘私、团结互助、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雷锋式好学生。驻句容部队在学雷锋活动中，一直起模范带头作用。驻句容部队广大官兵积极参加助民劳动，义务为驻地群众理发，卫生队开展便民门诊等，把为民服务活动推向高潮。

学习解放军活动。1964年2月6日，句容县委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把主题定为学习，响应党中央号召，学习人民解放军。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学习了《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的《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的社论；会议就向人民解放军学什么、怎么学达成共识。是年，县委还请驻句容小农庄部队政治部张主任介绍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有的社队也请了当地驻军作事迹报告。黄梅区的同志表示，学习解放军在工作上要做到“四个一样”、“四个化”，即：出勤坏天和好天一样，坏活和好活质量一样，无干部在和有干部在一样，工作碰到困难和工作顺利情绪一样。“四化”是生活大众化、参加劳动持久化、亲自动手做到试验化、工作做到深入化。

学习王杰活动。1965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向王杰学习的号召，接着，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等相继发出向王杰学习的通知。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社论。句容各地迅速掀起向王杰学习的

热潮。县教育部门在各学校开展向王杰烈士学习活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出生于春城公社的县东风煤矿子弟小学学生吴兴春,1967年6月18日中午,为救落水遇险的同学吴玉宏不幸牺牲,年仅13岁,1976年6月,吴兴春被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为革命烈士。

第二节 学习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

一、学习理论

句容县委学习理论是从1957年开始的。是年3月8日,县委专门请了倪道正为县委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讲哲学,重点介绍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一些合作社社员闹退社事件中,县委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60年4月,句容县委根据上级要求,拟定了科局长以上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计划,其学习内容是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文件为主,参照苏联政治经济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学习时间为160天,至10月中旬结束,共28个学习日;学习方法是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为线索,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用,学用一致;具体方法有:阅读、笔记,举办读书会,写学习心得。是年7月12日,句容县委拟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意见》,《意见》提出:县、公社成立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委员会,大队成立学习毛泽东思想领导小组;大搞思想运动,大造声势,大树标兵;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学习要求、内容和方法;加强理论队伍建设。是年12月25日,句容县委印发《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农村整风整社有关文件的意见》,《意见》提出:县委常委结合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

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篇；县机关干部以及公社党委委员、县委党校，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若干文章；整风整社中除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关文章外，还要学习中央有关的 10 个文件。

1961 年的干部理论学习，县级机关共有 44 个单位、706 人，划分 17 个小组，原则上是以党支部建组，党支部党员较多的再划若干小组。集体学习每周 4 小时，多数定在星期二下午，少数企业单位安排在晚上。社队干部是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学习。1961 年学习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中央“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刘少奇在《庆祝我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通过理论学习，干部支农思想加强了，政策水平提高了，作风转变了。理论学习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发展不平衡，机关干部学习坚持的较经常，但下乡干部学习理论放松了；学习中干部敞开思想不够；学习辅导不够。

1962 年 4 月 24 日，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的指示，句容县委对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提出四点意见。是年 10 月 5 日，县委针对前阶段在职干部学习中存在的集中讨论多、自学少，工学矛盾处理得不够好，理论学习少等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加强对中央 8 月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学习，学习与任务结合起来，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学习的意见，县委成立学习领导小组等。

二、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4 年 2 月 20 日，江苏省委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八项规定》。2 月 28 日，句容县委、县政府请驻军首长作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并在县级机关干部中传达省委《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八项规定》。是年 3 月，全县开始出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据县新华书店统计，3 月 1—12 日，仅县门市部就售毛泽东著作 1441 册，比 2 月份全县销售总数增 2.7 倍。4 月 22 日，句容县委

对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5点计划:① 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总的是,凡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读毛泽东的书。县级正科(局)长以上干部,和专职宣传理论干部,要在1964年、1965年内,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发表的著作分别进行温习或者通读一遍。县机关副科(局)长、一般干部今明(1964年、1965年)两年内,选读《毛泽东选集》中的42篇文章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19篇文章;其他一般干部选读毛泽东有关著作;凡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的干部,在读过毛泽东著作以后,还应当选读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② 建立领导干部自修班;③ 学习方法,应当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有目的地进行……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④ 学习组织与学习时间。县委恢复学习中心小组,县级机关干部以部门或支部为单位建立学习小组,订出具体计划,每星期三下午为集中学习时间,每周要挤出3小时自学;区、社干部每月集中二、三个半天集中学习;学校每周固定4小时学习时间;⑤ 加强领导,加强辅导。组织和培养一支业余辅导员队伍;培养典型,树立标兵。

1965年6月27—30日,在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和中共句容县委,共同召开全团、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出席会议共511人,其中社教工作队员255人,县、区、社级企事业单位干部164人,不脱产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92人。镇江、扬州两地委及镇江专区所属的市、县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据会议统计,江苏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句容工作团共2.1万多名工作队员,建有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共2800多个;句容全县有3万余人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共组织2500多个学习小组。这次大会,总结了前阶段学习情况,对进一步学习作了动员;会议交流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和体会。在大会发言中,肖德龙的发言特别给人以教育与启发。

肖德龙是复员军人，曾在战场上负伤，双目失明，复员回乡后，继续为党工作。从1964年冬天起，肖德龙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盲文版，初读盲文本时，手指感觉不敏锐，一篇文章往往要读好几遍才能领会。数九寒冬，手指冻得麻木，他就把手放在被窝暖和一下再摸，夜以继日，终于读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盲文版共7分册）第1—3分册。肖德龙从毛泽东著作里找到了力量，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正确的工作方法。他是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许多同志赞肖德龙是一个“方向明确、立场坚定、目光远大”的好同志。肖德龙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事迹在全县传播后，也激发了一大批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

一、以战备为中心的民兵工作

1958年9月23日，句容县委印发《关于全民皆兵组织形式的意见》，提出全民皆兵要达到：“人人会打枪，个个会打仗”。县委决定，县成立民兵师，下设8个团、1个直属营。城镇单独成立1个团，铁矿、铜矿单独成立1个团，县机关为师直属营，其他6个大公社（黄梅、宝华、东昌、赤山、茅山、天王）各成立1个民兵团。是年10月14日，县委对民兵训练作出安排：全县共参训民兵5800人，其中句容河水利工程和钢铁师各1500人，其他6个公社2800人。

1959年，根据江苏省委批转省军区《关于结合整风整社整顿民兵组织的意见》，对民兵组织进行整顿，将民兵组织同生产劳动组织分开，纠正了1958年“大办民兵师”中产生的以民兵组织代替生产劳动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做法。是年，除安排民兵进行步兵的共同科目训练外，首次进行专业分队训练，是年10月11—23日，进行卫生、侦查专业分队民兵集训。

1962年，为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和训练，从是年1月起，各

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武装部，配备专职部长或副部长 1 人。是年 4 月 25 日，句容县武装委员会复建。是年，民兵训练增加反空降、反空投、反空袭的科目。

1964 年，县人武部在年度民兵训练工作意见中提出：1964 年全县民兵训练总任务是 6700 人，其中民兵干部 2700 人，训练时间 60—80 小时；通过训练，使他们逐步达到五会（会打枪、会打手榴弹、会利用地形地物、会站岗放哨、会发现小股武装匪特），民兵干部提高指挥能力。县委在批转县人武部 1964 年年度民兵训练意见时强调：1964 年民兵训练……在服从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提下，利用农闲季节、生产空隙和业余时间，坚持小型、就地的方法，严禁大集中，坚持勤俭练兵，防止铺张浪费，并保证训练中不发生任何事故。是年，根据江苏省委 1964 年 5 月 26 日批转省军区党委《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整顿民兵组织的意见》以及镇江军分区有关运动中民兵工作的指示，句容县委在运动中把民兵工作列为整个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基本上做到统一领导、统一安排、统一检查、统一汇报、统一总结，段段有结合，步步有要求，较好地发挥了民兵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促进了运动和生产，加强了民兵的组织建设。据 5 月底对 35 个民兵排的检查，组织基本落实的 9 个，占 25.6%；一般落实的 18 个，占 51.4%，不够落实的 8 个，占 23%。

1965 年 8 月 1 日，句容县举行民兵建师大会，省委常委、副省长欧阳惠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林，镇江军分区司令员余庆腾，镇江地委宣传部部长周亚民，以及驻句容部队代表莅临大会。8 月 1 日上午举行军事表演，8 个公社的 81 名优秀男女民兵选手，表演了射击、投弹、刺杀、武装泅渡、对空射击等 9 个项目，驻军部队也参加表演了喷火、捕俘等项目。下午举行民兵建师仪式。镇江军分区司令员余庆腾代表省军区宣读了民兵师干部的任命，并把“句容县民兵师”的师旗授给了民兵师；接着，欧阳惠林代表江苏省委

和句容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刘林代表省军区、周亚民代表镇江地委及专署对大会作指示;县委副书记、民兵师副政委宋敏代表民兵师作表态发言。建师仪式结束后,民兵师政委、县委书记蒋继奋作民兵工作报告,大会表彰了66个先进单位和69个先进个人,并给参加军事表演的单位和个人授了奖。是年10月6日,句容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四清”运动以后民兵建设巩固提高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加强战备观念,认清民兵的战略地位,做好民兵的备战工作;加强民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典型,树立样板,实行以点带面的领导方法;继续做好民兵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建立、健全各级武装委员会和民兵师、团的活动制度,发挥民兵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扬党管武装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民兵工作的领导。是年11月27日,句容县委批转句容县人武部关于1966年度民兵军政训练工作意见,要求通过训练,进一步提高民兵的阶级觉悟、国防观念和军事素养,使民兵干部和民兵分别逐步达到“三会”(会领兵、会带兵、会用兵)和“六会”(会打枪、会投弹、会利用地形地物、会站岗放哨、会防空、会游泳)的要求,和敢打、想打、会打、能打的目的。

二、备战工作

1956年,县委及县人武部,对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和国庆期间战备及安全保卫工作作了部署,突出了重点地区:对沪宁铁路句容段的警备;茅山、宝华山等山区的对空监视;城镇及粮仓的警备;机动力量的组织等。1957年9月至10月,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先后两次在茅山上空过境,茅山、袁巷、磨盘、天王、葛村等乡积极参加反空降斗争,两次出动民兵七八百人次。国庆期间,下蜀、宝华等乡17个农业社,每个社3—5人上沪宁铁路线巡逻。1958年8月21日夜,1架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在茅山上空空投反动传单、部分日用品以及小孩玩具等,茅山、磨盘、天王、葛村等5

乡,半个小时内出动 500 余民兵,包围现场,封锁交通要道,2 个小时内查清收缴反动传单 14 种,数量达 6 麻袋之多。是年,句容加强了茅山、磨盘、袁巷等山区防空哨的建设,增派了民兵巡查。1959 年 4 月 8 日晚 9 时多,得知敌机侵入句容上空情报,茅山、磨盘、袁巷、天王、葛村等公社,在半小时内出动民兵 300 余人搜山,收集反动传单、漫画、报纸等 7 种,数量达 3 万余张。是年,敌机先后 3 次侵犯茅山地区上空,投放一批反动传单,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进山搜索。1959 年,县委在茅山地区召开 3 次联防会议,与溧水县共和公社组成民兵联防,召开了联防会议。1961—1962 年,面对台湾国民党军队要反攻大陆的叫嚣,句容县人武部制订了反空降和平息反革命分子发动暴乱的作战行动计划,加强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学习步兵战斗条令和诸兵种联合作战条令,进行手枪预习和打靶;各公社组织民兵机动排,作为战时作战的机动力量。1961 年上半年,发生敌机飞越句容下蜀、亭子、郭庄 3 个公社上空,散发反动传单 1 万余张,事后,县人武部与公安局配合,派干部动员群众收集传单,进行正面教育,消除负面影响。1962 年 6 月 14 日,镇江地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精神,句容县委于 6 月 15 日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专门进行传达,尔后逐级在党内进行贯彻。全县训练报告员 1635 人,并在大卓公社杨塘岗大队进行宣传教育试点,并通过宣传员向全县人民进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精神的宣传,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做好战备工作及支援前线的准备。驻句容各部队在做好战备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战前应急训练。是年 8 月,驻句容某部队奉命配合某军某师向浙东预战区机动,一昼夜强行军 300 多公里,轮渡飞云江时遇大雨,山高谷深,部队车炮共行程 16.17 万公里,安全无事故,为大部队机动摸索了经验。驻句容的某部队,根据上级指示,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开展应急训练;是年底参加了南京军区工程兵组

织的团、营两级首长率领机关携带通讯工具的实地军事演习；担任国防施工的驻句容某部，加快了施工进度，以实际行动落实备战工作。在防空方面，根据句容低山丘陵多的特点，县除了在茅山、磨盘、袁巷等山区增设防空哨外，城镇、下蜀、宝华等交通要道也增设了防空哨。1963年6月16日，句容县委批转县人武部《关于继续加强战备措施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强广大干部、民兵的战备教育，提高警惕，增强斗志；切实掌握敌情，及时发现敌人；切实加强民兵建设工作；加强联防工作，周密部署兵力。1965年10月6日，在句容县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四清”运动以后民兵建设巩固提高工作的决定》中，对民兵的备战工作提出要求，“决定”指出：句容县是全省重点山区之一，担负着反空降、防暴乱的重要任务。因此，民兵的战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首先，要把民兵师直接抓的三至五个武装民兵连，在今冬明春建设好；各公社的武装民兵连，要尽快巩固提高；各重点公社还必须进一步做好战备预案，把“四定”（定任务、定力量、定措施、定指挥与通信联络）工作落实到民兵营（连）、排、班，落实到人，切实加强联防工作。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江苏省委于1961年11月提出结合农村的冬春季工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句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从1961年10月开始,在10月底、11月初,县委召开5个区的大队干部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在全县开展国内经济形势教育,向广大群众讲解当前大好形势、还有什么困难、如何克服困难。11月底、12月初,一个以分配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县展开。12月15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会议通过总结成绩,接受教训,分析形势,大鼓干劲,比较全面地宣传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开始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又称“小四清”,中央“二十三条”中改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称“大四清”)运动。句容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12月省委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试点开始,先后三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是1964年底至1965年7月省委在句容开展的系统“四清”运动,其“社教”工作团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句容是空前的,在全省也是数

一的。

第一节 江苏省委在城东公社的 社教试点及面上教育

一、省委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批判。之后,根据中央的部署,江苏省委于1962年12月20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加强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指示》,对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部署,并决定由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工作组到句容县城东公社试点。

1962年12月下旬,句容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一道,在城东公社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这次试点,先开公社党员大会,后开社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着重解决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社员代表大会着重进行以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学习政策、讨论生产。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是从总结工作着手,抓住这两年迅速恢复生产的事实,大讲集体化优越性;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试点中,以全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中心,着重解决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切实整顿社队干部的思想作风,并划清若干具体政策界限,要求不把正当的家庭副业、正当的集市贸易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以免造成混乱。试点中讨论了生产任务,坚持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城东公社积、追肥完成95%,水利工程完成80%,1963年2月11日,省委转发了句容县委《关于城东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

二、1963年上半年面上的社教运动

句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12月底开始,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社员,由点到面,原原本本地宣读和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央“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化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联系实际,进行形势教育,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教育,进行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教育。到1963年4月底,社教运动已告一段落,受教育的干部、社员共17.7万人,占全县成年人18.9万人的90%以上。通过教育,比较完整地认清了形势,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按照“农业六十条”处理了有关政策问题,又一次整顿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进行了组织建设,全县365个农村党支部已有244个党支部按党章规定进行了改选,并培养了2100多名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县3683个生产队有3577个生产队民主选举了队委、队长、会计和监察员,并改善了经营管理,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冬春生产。

据统计,到1963年4月底,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县已整改退赔的公社干部208人、大队干部1160人、生产队干部3599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共退出粮食13.43万斤,占应退数32.9%;共退出人民币65539元,占应退数的23.1%。

三、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

省委农工部在城东公社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后,又在该社三台阁大队进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在生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可以把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起带头作用;可以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建立贫下中农代表小组,党在农村中阶级路线更加鲜明。贫农、下中农代表组织的任务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带头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团结社员,努力完成生产任务;联系贫农、下中农社员;团结其他中农。1963年5月8日,江苏省

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句容县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试点情况的报告。

省委农工部在城东公社进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结束后,句容县委立即部署,在全县 3577 个生产队,普遍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

第二节 贯彻执行“前十条”和“后十条”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前十条”发布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是年 9 月 6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根据各地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又指出团结 95% 以上的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后白公社的试点

后白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 1963 年 7 月 11 日开始,至 11 月 22 日结束。试点是以中央“前十条”精神和省、地委试点工作的经验进行的。共分四步:第一步,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提高觉悟;第二步,全面彻底进行“四清”;第三步,民主讨论,处

理问题,边整边改;第四步,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巩固“四清”成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生产面貌、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都继续发生新的变化,突出的表现在干部的坚决整改和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支部战斗力的提高,贫下中农组织作用的发挥,以及公社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支农等方面,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保证了1963年秋熟增产丰收,为1964年争取更大的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3年,全公社粮食总产1420多万斤,比1962年实绩816万斤增产74%,比历史最高年产粮食(1346万斤)增产5.5%。

二、分批系统展开社教运动

根据中央指示,除了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外,又组织专门队伍,分期分批系统地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组织训练了242名工作队队员,自1963年11月9日至1964年2月9日,在行香、太平两个公社进行了第一批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春节过后,县委把社教工作队扩大到524人,自3月4日开始,在白兔、春城、长城、陈武、东昌6个公社和高庙繁殖场、赵庄麻场和仑山水库管理所进行第二批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年5月24日结束。社教运动中,贯彻了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注意了思想教育和群众发动,运动与生产结合较密切。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的阶级关系、干群关系、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貌、基层组织面貌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好的变化;清理了1963年“四不清”问题;普遍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大寨的先进经验,有些地方还学习了毛泽东著作,树立了标兵,层层搞了样板队和样板田。据第二批6个公社统计,参加“四清”的干部3427人,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3284人,占干部总数的95.8%。其中犯有贪污盗窃错误的608人,占“四不清”干部总数的18.5%,共清理出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粮食39.26万斤,现金13.86万元,根据中央

“前十条”和“后十条”及省委补充规定,落实退赔粮食 15.51 万斤,占总数的 39.5%,运动中已经退赔 48%,落实退赔现金 7.86 万元,占总数 56.7%,运动中已退赔 40.6%。

三、面上公社的社教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

在全县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大卓公社先行一步后,其余公社于 1964 年 1 月 3 日起相继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到 1 月 18 日全部结束。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应到人数 12735 人,实到 12286 人,占 96%,其中党员 4162 人,占实到人数的 33.8%。会议对文件学习较好,公社领导核心在会上作了检查,思想发动比较充分,忆苦思甜活动搞得比较成功,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较好地解决了革命意志衰退问题。

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按照中央、省委和镇江地委的部署,在城镇也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全县开展“五反”的单位共 105 个,4831 人,分四批进行。党政民机关从 1963 年 7 月开始,11 月基本结束。企事业单位“五反”运动分三批进行,从 1963 年 11 月 10 日开始,每批大约 3 个月。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特别是企业的“五反”运动,一般都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在开展增产节约、抓好生产的基础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首先学习中央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有关“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诉苦思甜、回忆对比,在此基础上,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检查),一般干部查上当放“包袱”,进行自我革命。据第一批企事业单位“五反”统计,参加查上当放“包袱”的共 282 人,共放下大小“包袱”2079 个。在查上当放“包袱”的基础上,运动转入第二步,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大张旗鼓

地发动群众,向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

第三节 江苏省委在句容开展“四清”运动

一、省委在句容开展大规模的“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4年3月7日,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个问题的总结》。3月13日,又就江苏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向中央和华东局作了报告。4月14日,省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的“四清”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是年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上,中央对全国社教运动作出严重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7月2日至8月8日,江苏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7月中旬,刘少奇到江苏视察了“四清”运动。9月7日至13日,江苏省委又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全会决定重新调整城乡社教运动的部署,从1964年秋冬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农村社教在各专区集中力量搞好1个县,全省搞好7个县,句容是全省社教试点县。镇江地委于10月28日起召开为期11天的常委会议,学习中央领导有关信件和省委领导讲话精神,联系实际,对一年多来城乡社教运动中的“右倾”错误进行检查。是年11月,句容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地会议精神,总结自1963年7月以来城乡社教运动情况,认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不论在对待干部、发动群众、对敌斗争、部署做法以及运动与生产的关系等几个问题上,均存在“右倾”错误,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待干部问题。

由于在一年多的社教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错误,“四清”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不彻底,按照刘少奇“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江苏省委决定,句容仍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四清”运动的试点县。

二、江苏省委句容县社教运动工作团

人员构成。省委社教运动工作团共有工作队员 20618 人。由镇江、扬州两个专区,南京、常州两个省辖市的 25 个县、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省级机关、人民解放军、大专院校抽调的干部,以及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大队干部组成。其中:中央机关干部 441 人;省委机关干部 811 人;地、市级机关干部 514 人;县级机关干部 7603 人;人民解放军干部 744 人;大专院校干部、教职工 869 人;新吸收的知识青年、下放职工、复员军人和大队干部 9576 人。在工作团人员中,有省委领导 2 人,地委书记 2 人,县委书记 19 人,大专院校党委书记、部队大校以上干部 43 人。

组织领导。江苏省委句容县社教运动工作团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欧阳惠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句容县天王公社蔡巷大队蹲点。省委句容县社教工作团在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作团下设 34 个分团、1 个直属工作队;工作团团部设办公室、政治部和 5 个调查组(即组织建设、生产建设、文教建设、集镇建设、政策研究)。县级机关工作队下设党群、文教、政法、农水、工交等口共 5 个工作组。各分团的组织是:各大队设工作队,各生产队有工作组。

进出时间。江苏省委句容社教运动工作团大部分人员是 1964 年 12 月中旬进入句容,1965 年 7 月底离开句容。在句容搞“四清”运动约 7 个月时间。

经费开支。省委在句容开展的“四清”运动,共开支经费 172.8 万元,占句容县 1965 年总支出的 30%。

三、“四清”运动的过程及内容

摸底发动,搞好当年“四清”。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央的“前十条”、“后十条”为武器,充分发动群众,查出干部当年“四不清”的问题,搞好年终分配。工作队人员来句容前,在镇江、扬州两

地进行了50多天的集训,反了“右倾”思想,所以这一阶段的“四清”“左”得出奇,发生的问题也最多。这阶段开始最早的1964年10月上、中旬,大部分社队是1964年12月中旬开始的,约在1965年1月结束,即中央“二十三条”下来前结束的。其主要工作:

- ① 夺取领导权。“四清”工作队一入村,首先宣布农村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权由“四清”工作队领导,实际上所有干部都先“靠边站”,被剥夺了领导权。
- ② 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选择依靠对象,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重新组建阶级队伍。
- ③ 深挖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全县各工作队做法各有差异,如有的单位开展“四封”斗争,宣布“九个不准”,即:封账、封仓、封钱、封票证;宣布不准造谣生事,不准威胁打击群众,不准阻挠和破坏工作队的活动,不准消极怠工、躺倒不干,不准破坏生产,不准涂改和烧毁账目、单据,不准转移赃款赃物,不准搞新的“四不清”,不准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各工作队、组都召开了以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的批斗干部会,搞逼、供、信,打、吊干部,体罚干部的事较为普遍,使干部与工作队的对立情绪很严重,甚至发生一些干部想不通而自杀的事件。省社教工作团第2期简报刊登的张庙分团奇干工作队当年“四清”运动的做法是:(1964年)12月13日下午工作队进村,15日下午,从大队到生产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展以夺账为中心的封账、封仓、封钱、封票证的“四封”斗争,这个斗争采取了3个动作,第一,召开了全大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会,所有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工作队队长说明来意,强调说明当前阶级斗争及干部和平演变的严重性,宣布“四封”;第二,会后全面进行“四封”,把经济管理权从“四不清”干部手中夺回来;第三,“四封”后,召开社员大会,发动大家揭发问题。省委社教工作团简报还介绍了铃塘大队工作队、石狮河桥工作队等地一些极“左”的做法。
- ④ 以抓当年“四清”为突破口,搞好年终分配。省委社教工作团发动群众开展“三比一看”活动,揭发干部当年“四不清”问题。即:一比“四不清”干部参加工

作前后的经济情况,当干部后比过去富了就有“四不清”问题;二比贫下中农和“四不清”干部现在的经济情况,在劳动力差不多情况下,干部家里经济状况比贫下中农好就有“四不清”问题;三比“四不清”干部同过去地主、富农、伪保长的所作所为,认为“四不清”干部比地主、富农、伪保长在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还厉害。天王公社前进大队在当年(1964年)“四清”中,查出“四不清”干部50人,占干部总数89%,称这些干部都是剥削钱、剥削粮、剥削草的“三剥削”干部。据省委社教工作团党委会议简报称:统计了11个公社当年“四清”成果,共清出粮食111万斤,现金55万元,工分290万分,平均每人可分粮食8.8斤,现金4.34元,工分22.9分。

学习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全面开展大“四清”。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明确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月下旬开始至4月中、下旬,以中央“二十三条”为武器,句容展开大“四清”。①集训社教工作队员。这次集训,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1965年1月21—26日,在南京集训社教工作队队长以上干部,共1084人;第二个层次是以各分团为单位,用5—7天时间,集训社教所有工作队员。这次集训工作队员,是以学习领会中央“二十三条”为精神武器,总结1964年底开展的当年“四清”运动,大家对前阶段“四清”工作组“左”的做法有了一定的认识,感到中央“二十三条”再迟来一个月,“四清”运动的发展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但中央“二十三条”仍是一个“左”倾错误的文件,因此,这是带着“左”的观点去纠正“左”的错误。②召开三级干部会。从1965年3月上旬起,句容县34个人民公社,陆续开展为期2周的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开展全面“四清”运动。参加会议的共30797人,其中社队干部14587

人,工作队员 6519 人。会议分为三段:第一阶段学习中央“二十三条”,大讲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进行政策教育;第二阶段由公社主要领导干部在会上作检查,由大队、生产队干部典型示范放“包袱”(顾虑),掀起与会干部放“包袱”高潮。据县社教工作团简报称:与会干部共交待贪占粮食 319.5 万公斤,钱 215 万元。有些干部确实检查贪占钱物问题,但有不少是为了“过关”而被迫“交待”自己或夸大“四不清”问题的。会后统计,与会干部没有问题或只有小问题占 10%,而 90%的干部犯有“四不清”错误;会议的第三阶段是落实春耕生产,干部交心通气。③ 核实定案,组织退赔。公社干部会后,召开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生产队社员会议,分别组织大队、生产队干部向群众见面作检查,交待“四不清”情节,找根源、查危害,表明改正决心。通过群众讨论,把大多数问题已经搞清或基本搞清的干部,分批解放出来;然后集中力量批判重点对象,解决性质严重的极少数人的问题。定案工作中,允许干部翻案,允许上诉,允许补充交待,并力求做到群众揭发、干部交待和查账查证“三对头”,然后经群众讨论,确定退、减、缓、免的数字,分配“四清”果实。据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统计,全县 1.8 万多名干部,好的占 34.2%,比较好的占 47.5%,问题较多的占 16.6%,性质严重的占 1.7%,共清出粮食 322 万公斤,钱 308 万元,运动中已退粮 163.5 万公斤,退款 157 万元。

开展对敌斗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时间在 1965 年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中下旬,约 1 个月。主要工作有:① 发动群众,作好思想、组织、材料等准备工作。普遍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敌情”教育,发动群众摆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② 全面评审,重点斗争。在评审中,对戴帽子的“阶级敌人”有摘有戴,有升有降,瓦解“敌人”,孤立少数。并对 341 名重点对象进行说理斗争。在评审中,新摘“阶级敌人帽子”的有 1054 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 12.2%,重新戴“阶级敌人帽子”的 26 名,占原摘“阶级敌

人帽子”总数的 3.1%，逮捕 9 名、劳动教养 3 名，收监执行 1 名，送回原籍 7 名，其余在本地监督改造。这一阶段，“四类分子”交出长期隐瞒的长短枪 12 支、手榴弹 53 枚、各种子弹 881 发、刺刀利刃 25 把。在评审斗争阶段，出现一些“左”的做法，一些“四类分子”害怕恐惧，怕过不了关，先后发生多起自杀事件。③ 整顿健全治保组织，落实监督改造措施，进行民主总结。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整顿健全 411 个治安保卫组织，同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3240 个监督改造小组，并制定了监督改造措施。④ 检查补课，解决遗留问题，巩固斗争成果。这一阶段，除了对已“带帽”的“四类分子”进行评审外，还对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分析，包括有无错划、漏划“四类分子”问题。据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有关对敌斗争总结称：“全县通过对原有 8606 名‘四类分子’的全面摸底，反复核对，查清了漏报的 444 名，纠正了错管的 779 名，在全县 826 个单位、7534 名国家工薪人员中，清查 out 隐藏的‘四类分子’59 名”。

搞好组织、生产等各项建设，巩固“四清”成果。做好思想、组织、生产、制度等项建设，既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又单独作为一项任务重点抓落实，全县大约从 1965 年 5 月中下旬至 7 月底。

① 思想建设。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党委要求在运动中，各方面的建设都要高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之纲，突出政治，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整个建设之纲。各工作队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还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系统的“四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进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教育，学习大寨精神，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的教育。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针对句容地处山区、革命老区，文化落后，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帮助发展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四清”运动中及结束时统计：全县新办

农业中学 61 所、耕读小学 464 所,学龄儿童入学率由 63% 增加至 82.1%,俱乐部由 148 个增加至 1008 个;群众卫生保健组织初步建立,共培养卫生保健员 3752 人。② 组织建设。根据“四清”运动反映出来的问题,本着解放绝大多数干部的原则,对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班子进行调整,对干部本人作了定案处理:全县在 18093 名参加运动的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中,属于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予以清洗的共 59 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 0.33%,受各种纪律处分的 1033 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 5.7%,其中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以上处分 247 人,占 1.37%。根据在运动中的表现,由群众民主选举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有 75% 的干部连任,25% 的原有干部落选。在“四清”过程中进行了整党建党。主要内容有:一是对犯错误的党员作组织处理,并开展党员登记工作。在全县 468 个基层党支部中,共有党员 6954 名,准予登记的 6130 人,占党员总数的 88.15%,暂缓登记的 373 名,占党员总数的 5.36%;不予登记的 373 名,占党员总数的 5.36%,其中 81 名预备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二是对 4483 名发展对象进行考察,发展 1422 名新党员,占原有党员总数的 20.5%。三是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在原来 8 个没有党支部的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原来 850 个生产队没有党员,整党建党后下降至 438 个。群众团体建设。加强了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全县组织了 1700 多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有 2 万多名青年参加学习,在运动中整顿和建设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开除团籍 67 人,劝其退团 92 人,发展新团员 7900 人,同时办理 5640 名超龄团员离团手续。妇女组织发挥了作用,带头破除“妇女栽秧不发棵”的迷信,夏种有 3600 多名妇女下田学栽秧,1 万多名妇女参加文化学习,3.3 万名妇女参加贫下中农协会,4.54 万名妇女参加民兵组织及其妇代会,全县有 0.97 万名妇女搞了试验田、种子田、样板田 3056 亩。③ 生产建设。根据县委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及发展纲要,各公社制定出远景发展规划。全

县 1965 年夏收总产比 1964 年夏收总产增 69%，比历史上最高收成的 1956 年夏收总产增 15%。冬春农田基本建设完成水利工程 800 万多立方米。镇江、扬州两专区农业上许多先进经验和先进操作技术在句容推广运用。④ 政治工作制度建设。根据中央“二十三条”中“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的规定，逐步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的政治工作制度。县社教工作团团部经研究讨论，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四大民主、监督和政治工作制度等几个草案，经修改后试行。

四、县机关及集镇企事业单位的“四清”运动

县级机关的“四清”运动。县级机关社教工作队在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下按各口成立工作组。工作队由镇江、扬州两地委及省直机关干部组成，共 88 人。1964 年 12 月 15 日进入句容县机关，1965 年 7 月底撤离返回。运动开始时，基本上按农村“四清”路子，后逐步根据机关特点作了调整。大体上可分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春节前，主要是思想发动，揭句容县委的问题。1965 年 1 月 15 日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主要目的是解决县委常委的工作问题，通过县委常委带头检查，推动科局长和区、社党委负责人早日“下楼”，以便县、区、社领导干部早日解放出来，领导运动和工作。原来的意图是县委正副书记、县长大会检查，常委到各口检查，会议即结束。但会议一开始领导意图与群众意见不一致，包括县直机关社教工作队的部分同志在内，把句容县委和县直机关的问题看的多一些、严重些，发生了把一些人的政治历史、男女关系、出身成分写成大字报上墙等偏差，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决定暂时休会，春节后再开。第二阶段是春节后至 5 月中旬，以学习中央“二十三条”为武器，全面开展机关“四清”。根据机关的实际，以清政治、清思想为主，着重抓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阶级路线中发生的偏

差,不突出政治、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主要做法是:① 学习准备。春节后集训了工作人员,同时组织机关干部继续学习中央“二十三条”,总结春节前的运动,肯定成绩,检查缺点。对干部和机关中的问题作全面排队,并组织力量有重点进行调查核实。县机关 39 个单位、577 名干部,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占 91%,58.6%是共产党员。② 全面“四清”。自 3 月中旬起分批进行,5 月中旬基本结束。第一批是银行、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先行一步,其他单位 4 月上旬陆续展开。在此期间,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就集体领导和个人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四清”运动,机关干部受各种纪律处分的 14 人,占干部总数的 2.4%。第三阶段是 5 月中旬至 7 月底,主要内容是以突出政治、面向基层,实现机关革命化为中心,进行全面系统地整改。5 月 21 日,召开了第二次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内容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对运动的看法,研究整改措施。机关整改期间,经研究决定,撤销区一级建制,把 34 个公社缩为 22 个公社,县委、县人委机关由原来 33 个部门合并为 10 个部门,即党委部门的 12 个单位合并为政治部、纪委、县委办公室(即一部、一委、一室),县人委部门由 21 个单位合并为农委、文委、财委、计委、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即四委二室),另成立一支 20 人的工作队,搞调查研究。行政干部编制由 278 人减为 140 人。撤区并乡工作是 1965 年 10 月经省人委批准后实施,机关机构精简于 1965 年 12 月实施。

集镇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句容共有集镇 34 个(即每个公社 1 个),人口 18132 人。参加集镇“四清”运动的企事业单位 839 个,1.5 万人,居民及个体劳动者 7342 人。为了加强对集镇开展“四清”运动的领导,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有 1 名副团长分管集镇的“四清”运动。各分团也有 1 名副团长分管集镇“四清”运动。城镇专门成立了分团,其他集镇成立工作队,较大的企事业单位设工

作组。集镇的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做好思想上、组织上、材料上的准备。第二阶段为清理阶段，进行全面“四清”。第三阶段是建设阶段，主要是思想、组织、政治工作制度、生产四方面的建设。集镇各单位有不同特点，“四清”运动中侧重点各有所不同。机关企事业单位主要抓革命化问题，改变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财贸商业系统管钱管物的人多，以清经济为主，端正经营方向；文教卫生系统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预防为主医疗方针。集镇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同农村一样，1964年底前“左”的做法比较突出，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左”的错误有所纠正。全县集镇企事业单位属于清理对象共4253人，占总人数的23.4%，其中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共2388人，占总人数的13.1%，清理出钱809658元，粮207572公斤，布证33496尺。

第四节 对句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评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上述论断完全符合句容县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

一、句容社教运动积极方面

有利于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主要是“四清”,重点是清经济,过去干部对多吃多占,捞一点集体的财物不以为然,“四清”运动则通过群众运动方式,把干部多占集体财物、多吃多占问题揭露地比较彻底,还挖了干部产生贪占的思想根源。虽然无限上纲上线地分析是错误的,但对广大干部的触动很大,有的检查自己开始是怕劳动,到后来厌恶劳动,越歇越懒,越吃越馋,慢慢脱离群众。有的检查自己只顾个人发家,不顾集体利益,从占小便宜到贪污集体财物。1964年12月至1965年7月这次“四清”运动,在2万余名社教工作队队员中,有省、地委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到句容后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无疑给句容的干部带了一个好头,上了一堂联系群众的党课。

传播了一些科技知识,改善了经营管理。省委句容社教工作队成员来自苏南苏北几十个县市,许多人又都是农村或某一地的负责人,他们到句容后,把他们家乡许多先进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句容人民。如沤制草塘泥,合理密植、评工记分,财务制度上可行的做法等。商业财贸等系统在“四清”运动之后,经营管理工作得到加强,为农支农的思想作风得到改进。

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树立了农村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社会新风尚。“四清”运动虽然在定案中有冤假错案,但这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无疑对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法之徒是一个沉重打击。工作队员带头破除迷信树新风的行动,给句容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农村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大队建立卫生室,培养出“赤脚医生”,也都是从“四清”运动之后开始的。

二、句容社教运动的消极影响

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7月这次“四清”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正是“左”的错误所产生的恶劣影响。

混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教工作队进村前,就已经反了“右倾”,从上到下都带了这样一个框框:现在基层已有不少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干部有“四不清”问题就是“四不清”干部,就要打倒,就要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所以工作队一进村,第一个任务是夺权。城东公社戴家边大队由一个生产队长说:“工作队一进村,就把我们通称为‘四不清’干部、‘特权阶层’,和‘四类分子’一样看待,宣布8条纪律,只许我们规规矩矩,不许我们乱说乱动。与群众讲话,说是拉拢群众;与干部在一起,说是互通情报,定攻守同盟;与工作队队员接近,说是探听消息;去抓生产,说是伪装积极;不管工作,又说是躺倒不干,弄得我们走投无路,哭笑不得。”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对于纠正前阶段“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做法,解放绝大多数干部起了关键作用。但文件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四清”运动中斗干部的做法,确给“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提供了“榜样”。

打击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四清”运动,重点是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应该讲,这些吃农村粮的干部,工作最辛苦,“四清”运动开始前,全县基层干部的状况是好的,个别同志有一点多吃多占、贪占集体财物的现象。但“四清”运动一开始,就把基层干部队伍看成一团漆黑。一般的大队,当年“四清”中斗争干部的面都在20%—30%,部分高达70%—80%,干部情绪动荡,许多干部都想不通,发生多起干部自杀事件。社教工作队在学习中央“二十三条”、总结前阶段“四清”运动时说:“当时有一个公式:是干部就是‘四不清’,‘四不清’干部就是烂掉了,烂掉了就要夺权,夺权就要斗,斗就要狠”;“政治上没有问题经济上有问题,经济上没有问题生活上有问题,本人没有问题家属亲戚有问题”。所以“四清”运动开始后,干部先是靠边站,他们工作做得多,得罪人也多,意见也多,“四清”运动中被斗争的就多。“四清”运动中那种斗干部、整干

部、打干部的做法，伤了基层干部的心。虽然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一些干部被解放出来，通过领导做工作又重新挑担子，但有一些干部想想运动一开始的做法，感到寒心，有些怕以后再挨斗，不愿当干部了。据运动后期统计，大队、生产队干部更新面高达 25% 以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基层干部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不满情绪。

违法违纪的做法违背了党的一贯方针。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对犯错误的干部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论是对干部还是对戴帽子的“四类分子”，都是禁止打、骂、体罚等违法行为，不许搞逼、供、信。但在“四清”运动中，尤其是 1964 年底前的当年“四清”中，一些工作队员为了早出“成果”，取得“大成果”，怂恿、支持某些人对干部打、绑、罚跪、拘留、查封财产等违法行为，对“四类分子”的斗争也出现打骂、体罚等逼、供、信行为。这些是造成自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实事求是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思想路线，而在“四清”运动中，特别是运动初期，简直是无实事求是可言。有些工作队听说人家搞出大队或小队干部贪污 500 公斤粮，自己只搞到 250 公斤，觉得不光彩，而且相互影响，形成压力，于是不顾实际情况，采用各种手段，来扩大“战果”。有个女生产队长在大会上被斗争，万般无奈，她承认抱了队里两捆豆秸，上面有 60 公斤黄豆。而工作队不仅相信，而且嫌少了。有个生产队只有 60 亩田，干部被斗时承认贪污 1.2 万公斤粮，按此计算，每亩被干部贪污就有 200 公斤，这明显是假的，但都信以为真。在计算干部贪污财物时，有的算账方法简直可笑，如有个干部拿了集体 200 棵山芋苗，以 1 棵结 1 公斤山芋计算，200 棵山芋苗要退赔 200 公斤山芋。有些干部被怀疑有问题，但又没有材料，社教运动工作队就采用“斗斗看”的办法，在斗争中不断“加温”，干部受不了就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有的干部被迫把数字加码，有的虽属无中生有也承认下来，以求过关。有些大队干部被

斗争面高达 70%—80%，有个公社的小学教师共有 36 人，其中 10 人被定为贪污性质，数量小的只有 2 元。

撇开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省委社教运动工作团根据中央“后十条”规定，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工作队领导。1964 年 12 月中旬省委社教工作团进入句容，到 1965 年 7 月底，这期间句容的工作是由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领导，从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切事务都由工作队领导。从县到生产队，要办什么事，必须获得工作队的批准同意，才能去实施。工作队怎么说，县委就怎么办。一切由工作队说了算。“四清”运动这种撇开当地党委、政府，以社教工作队代党代政的做法是不妥的。如果当时“四清”运动能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至少可以多听一些不同意见，减少失误。

第十六章

句容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

从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召开至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 10 年,是党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 10 年。句容同全国一样,党的八大后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全县国民经济发展的秩序,破坏了国民经济结构比例,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经过贯彻中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全县的国民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战胜 1959—1961 年“三年经济困难”之后,人民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提升。

第一节 农业在曲折中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抓经济工作的重点仍在农业。句容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县份,农业的兴衰对句容经济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水利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句容是丘陵山区为主的县份,水库建设又是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八大之后,即 1957 年初,小(一)型水库—李塔水库开工兴建,标志着句

容水库大规模建设拉开帷幕。1958年“大跃进”的政治形势，促使句容水利建设超常规发展，句容水库建设的骨干工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山、二圣、句容、仑山、茅山、虬山、东荆塘（未建成）、墓东八大水库，都是在10年建成或开工始建的。句容后来所以能保证粮食稳产高产，能达到全国水利先进县的标准，没有这10年的水利建设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党的八大前，句容只有1座小（二）型水库，兴利库容只有70.5万立方米，到1966年的5月，句容水库的兴利库容已达9175万立方米；机电马力排灌设备从无到有，到1966年5月，内燃机633台、11460.5马力，电动机196台、10177马力，合计21637.5马力。这些水利设施对抗御旱涝灾害，保障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

句容水利建设这10年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1957年只开工1座小（一）型水库，人力物力财力是可以承受的，但1958年一下子再开工兴建“八大水库”等水利工程，因急于求成，计划脱离实际，财力、物力难以承受，劳力不足，粮食短缺，移民安置等问题相继出现，1959年，句容县委决定停建东荆塘水库，缓建墓东水库，缩小虬山水库规模，集中力量建设5座中型水库，1959年2月至1960年1月，所建水库先后合龙蓄水。20世纪60年代初，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句容县委认真总结党的八大以来水利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真贯彻水利部制定的“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县委成立了退赔工作五人小组，认真处理“大跃进”中的遗留问题，主要是对中型水库移民进行退赔、安置。同时进行水库的配套工程建设。充分发挥水库的功能。这期间，机电提水工程建设拉开了帷幕，为水库配套的干支渠道建设全面展开。句容水利1956—1966年这10年建设的实践证明，选择以水库建设为句容水利建设的重点是正确的，但怎样建水库，不能违背客观实际，必须量力而行，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

二、农村经济的发展

粮食产量一直是农业经济的核心。从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的粮食产量,走过了一个马鞍形。1955年、1956年,是句容解放后50年代粮食产量的最高年份,达16万多吨,比1949年的7万吨翻一番还多,这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及农业科技推广密切相关。从1957年开始下降,但很少,1958年“大跃进”三年下降了3万多吨,1959—1961年的年粮食总产量与1949年差不多,只有7万多吨;其原因,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大炼钢铁等工业“大跃进”严重冲击了农业生产,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又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天灾人祸造成1959—1961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使解放后刚刚解决吃饭问题的广大群众,又面临忍饥挨饿的境地,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贯彻了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后,1962年全县粮食产量开始回升,1963年又创句容历史记录,比1956年多1.7万吨。直到1966年,全县的粮食产量又一直在17万—18万吨粮之间徘徊。

林、牧、渔、副业的发展,1956—1966年这10年也经历了马鞍形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句容虽是丘陵低山为主的县份,但在1949年句容解放时,森林覆盖率只有4%。公私林场19个、5.6万亩成片林地,解放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调动了个人和集体植树造林的积极性。1951—1955年,合作营林达12.52万亩。党的八大之后,广大山区群众植树造林积极性提高,以专业队伍为主营林方式,1956—1957年,全县共造林5.56万亩。1958年“大炼钢铁”,对林木造成大量砍伐。天王公社共有劳力1.7万人,调出1万人大炼钢铁,4000劳力砍树、烧炭、办食堂,镇江地区调用3000名劳力上山砍伐树木,致使境内森林覆盖率陡降至2.8%。但句容的茶树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发展的,1958—1961年为句容茶叶发展的重点时期,以6个国营茶场为主,新辟茶园1万亩。

1962年后,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提高。生产、生活用具急需修理、添置,木、竹供不应求,从而促使林业生产逐步恢复。据资料统计,1956—1965年,全县造林25.62万亩,零星植树1052.3万株。畜牧业的发展与粮食产量状况有些相似。1949年,全县饲养量为4.74万头,圈存量为2.91万头,出栏量为1.83万头,到党的八大的前一年(1955年),生猪饲养量7.65万头,圈存量4.69万头,出栏量2.96万头。1957年,生猪饲养量15.55万头,圈存量9.54万头,出栏量6.01万头。1958年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同1957年相似。1959年后由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加上吃公共食堂,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都大幅下降。1961年,生猪饲养量为5.78万头,只有1957年的一个零头,圈存量3.55万头,出栏量为2.23万头,与1950年相当。1962年在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后,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三个指标开始恢复,1966年达到20世纪60年代的最高值,全县生猪饲养量为23.54万头,圈存量14.44万头,出栏量9.10万头。

1956—1966年,农业产值是以粮食为中心的,所以农业产值与粮食产量的变化是一致的。1956年的农业产值为9348万元,比1955年增23.7%。1957年的农业产值为9934万元,比1956年增6.3%。1958—1961年,农业产值连年下降,与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相一致。1962年农业产值为6070万元,比1961年增长25.6%。到1966年,农业产值达11207万元,这与粮食产量的上升也相一致。

第二节 工业经济在曲折中前进

一、资源性工业的发展

句容矿产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加快句容工业发展的步伐,首先从资源性工业入手应该说其思路是正确的。但1958年

“大炼钢铁”期间,组织万人上山,揭开地表,寻找矿藏,一哄而起办了“地方国营句容县铜山钼铜矿”等9个地方国营矿山企业,1960年发展到13个矿山企业,产值超47万元,由于农业粮食产量大幅减产,而吃供销粮人口又大幅增加,1961年贯彻调整方针,县委下决心压缩城镇吃供销粮人口,停办10个矿山企业,只保留句容县铜山钼铜矿等3家矿山企业。1962年6月,铜山钼铜矿归省冶金局领导,1963年6月隶属国家冶金部,1970年又下放给句容县领导。1985年,该矿形成年产500吨的采选规模,年产铜金属296.61吨、钼精矿107.55吨,产值241.51万元。1994年7月因资源枯竭闭矿停产。

二、为农支农工业的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县级基层,特别在以粮食为纲的年代,各行各业都把为农服务作为重点。“大跃进”初期,省委提出“县县发展工业,乡乡兴办工业,社社积极参加”的号召,句容在1958年1—5月就办厂(矿)584个,其中县办22个、乡办12个、社办554个。在乡办的12个企业中,“农”字口占11个,社办554个厂中,除了6个造纸厂外,其他如农具修造厂、农药厂、土化肥厂等,基本都是为农服务的。这些乡办、社办企业,虽然办工业的方向是对的,但缺乏技术和资金,又多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1959年后因吃粮困难就逐步歇业;1961年贯彻调整方针,除公社的农具厂外,绝大多数公社和大队所办企业,纷纷关门走人。但县办支农企业情况就不一样。句容机械配制厂,前身为句容县城镇铁木生产合作社,生产锄头、镰刀、铁锹等小农具和生活用具,1958年后添置车床、刨床、冲天炉等设备,改称机械配制厂,转向生产柴油机配件和修理柴油机和水泵。1959年又将锻造车间、木工车间划出,新成立句容县第二农机修造厂。这两个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发展却很火红,特别是机械配制厂,后来转产生建

筑工程机械,成为句容工业的骨干企业。

三、工业产值的变化

1956年,句容县工业产值为581万元,比1955年的282万元增长106%;1958年工业产值达1529万元,比1957年的688万元增长122.2%;1960年,全县工业产值为2522万元,达到20世纪60年代的最高峰。1961年贯彻调整方针后,当年工业产值下降至1138万元,1962年到达低谷(1014万元),1963年工业产值开始回升,1965年工业产值达到1787万元,接近1959年(1812万元)的水平。1966年下半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工业产值下降至1427万元。

第三节 交通邮电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曲折发展

一、交通、邮电

党的八大召开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0年间,修建了句容解放后新建的第一条路,即后白至郭庄的14.8公里的公路,“大跃进”中县组织近万名公社社员改建句容至下蜀公路,新增矿区公路63.5公里、乡道23.2公里、村道96.75公里,10年间,全县公路里程增加到322.867公里,是1956年的2.7倍;机动车船从无到有,汽车保有量38辆,拖拉机103台,货运量从9.8万吨增加到30万吨,客运量从38.8万人增加到82万人,水上货运量从3.5万吨增加到6.4万吨。但“大跃进”时新修的公路因当时要求速度快、用工少,缺乏科学勘测设计,只为节约土方,造成坡陡、弯道多、曲线半径小,一条句蜀线30多公里有310多个弯道,最小曲线半径仅10米左右,造成养护困难,留下先天缺陷。

邮电的发展也是在曲折中前行。从机构看,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新增15个公社邮电局,1960年初又因公社数量的撤并

而撤并。从设备看,1958年始配莫尔斯电报机1部,1959年始设长话专用设备,1962年增装波文收报机。农村电话设备,1957年,全县电话交换机由1952年的50门扩大至230门、话机90多部、杆路223.37杆公里、明线317.97对公里,至1965年,全县农话交换总机23部、800门,话机242部,杆路总长315.82杆公里,线路总长728.32对公里。从业务量看,函件:1958年为84.48万件,比1954年的53.16万件增58.9%;1965年函件为137.85万件,比1958年增63.17%。订销报纸累计份数:1958年为199万份、1965年为262万份。电报:1958年为5369份,1965年为9897份。长话电话业务量:1958年为1164张、1965年为37724张。农话去话业务量:1958年为13万张,1965年为26万张。

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事业的发展是受经济发展制约的,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发展。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开展的各种“大办”,虽然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或进步有好处,一度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但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持,是难以持久的。从教育看,全民大办教育,对教育普及是一个大推动,即使在今天,教育事业仍需全社会、全方位的支持。在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也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种普及教育的好形式,应予肯定。从文化看,报纸、档案馆、图书馆、广播事业的普及,都是这10年里兴建或大有发展的。卫生事业更是这样,1958年各公社新建了卫生院,“四清”运动中大队又建起了卫生室,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的“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骨干力量。“除四害”虽有些形式主义,但毕竟掀起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高潮。

三、“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多个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使不少干部群众,特别是教师等知识分子蒙受其冤,身受“左”的错误之害,时间长达20年之久,使一批想用自己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血青年,无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党员被戴上“右倾”帽子,后来虽然进行甄别平反,但不彻底。1964年10月开展的“四清”运动,更是打击了许多基层干部党员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从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里,有过上述3次大的政治运动,有3000多名干部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或被戴上“右派”、“右倾分子”的帽子,不仅身心受伤害,而且被迫去“劳动改造”,生活上也发生严重困难。实践证明,当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时,特别是“左”的思想起作用时,就会发生“整人”的悲剧。

第 三 编

十年内乱及对 “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内乱开始

1966年5月,正当全县人民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及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运动初期,句容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本着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朴素感情,按照上级部署开展运动,并为控制局面,确保工农业生产正常运转,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但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大多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造反派纷纷夺权,县内武斗迭起,派性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陷入全面混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批判“三家村”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等秘密策划、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2月,江青与林彪配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基本

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

在江青等人的鼓动下，批判斗争不断升级，批判不仅涉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还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此前，吴、邓、廖三人曾以南星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专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写《三家村札记》。这些杂文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其中一些文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三家村札记》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指责《三家村札记》等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此后，其他一些报刊也闻风而动，响应声讨。一时间，“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黑帮”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讨伐之声。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本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

在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报道批判“三家村”的形势下，江苏省句容县中学、后白中学、句容工读中学、江苏省劳动大学、陈武中学等单位，也先后召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县级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组织职工学习有关材料，开展批判“三家村”的活动。6月，县委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认真进行教育工作，组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报纸上有关文章，对“三家村”的主要论点积极组织反击，并大造声势，掀起批判“三家村”的热潮。县委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突出政治，搞好生产，用实际行动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此后，批判“三家村”运动在全县城乡全面

推开。按照县委的部署,全县机关、工厂、学校纷纷进行发动,号召广大干部、职工和教师认真投入运动中去;在农村,则对基层干部和群众普遍进行教育活动。开展运动的单位,先组织学习,后组织反击。学习的文件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5篇著作,以及《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华日报》刊载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刊载的高炬、何照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等文章,还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反击的中心主要是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中所谓“攻击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腐蚀青年”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机关和各公社纷纷召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截至是年7月底,磨盘公社累计召开大小声讨会171次;葛村公社以片召开声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近万人,有527人进行了声讨发言。全县各中学、中心小学和机关单位,还运用广播、黑板报和墙报等形式,播放或刊登声讨“三家村”的文章。

二、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停止或撤销了他们的党内职务,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系统表述了1957年后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6月17日,镇江地委召开第三批农村社教运动分团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根据中央和江苏省委、镇江地委的要求,7月5—8日,县委召开由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主任、国营厂矿、场圃负责人及县级机关部、委、室、组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及其他有关中央文件,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并通过《中共句容县委全会(扩大)会议决议》,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号召,动员全县干群和广大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斗争,横扫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彻底破除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把全委扩大会议精神迅速传达下去,紧接着,10日至14日,县委又召开包括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共有605人参加的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作进一步的传达、贯彻。会上,县委副书记黄选能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并以公社为单位分组进行了讨论。

7月29日,县委出台《中共句容县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就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部署。提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开展运动。县级党政机关和文教单位一定要重点整深整透；生产大队要分别不同情况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集镇和厂矿企业要认真搞好”。县委决定在秋前开展运动的有县级党政机关、文教、卫生等 26 个单位；集训初中教师；搞一个公社的试点。参加运动的干部、职工共 837 人，学生 712 人。具体是：（一）县级党政机关中参加的单位有县委政治部、监委、县委办公室、县委工作队、党校、农委、计委、财委、文委、人委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农干校、档案馆、教研室、耕读办公室、函授站共 16 个，干部 176 人、职工 29 人。（二）中学中县中和后白两所完中，在校搞运动，共有教职员 110 人，参加运动的高中、初三学生 712 人。初中 14 所，有教职工 275 人，暑假中集训。（三）文化系统有电影队、广播站、新华书店、文化馆（站）、剧团等 5 个单位，共有干部、职工 102 人，其中临时工 10 人。（四）卫生单位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 3 个，共 145 人。（五）农村中在大卓公社搞试点。全公社 15 个大队，190 个生产队，5167 户，23009 人，其中农业人口 22453 人。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由蒋继奋、宋敏、潘湘云、王玉亭、唐均一、柳林、宋有桐 7 人组成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蒋继奋任组长，宋敏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由 11 人组成的“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县委要求，不论开展运动或暂不开展运动的单位，都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搞好生产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要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促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三、派驻工作组，“文化大革命”逐步向全县发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及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发表,省城南京和地委所在地镇江陆续出现大字报。矛头开始指向党政干部,学校秩序开始混乱。离南京和镇江仅40多公里的句容,也开始出现大字报。到6月中旬,句容大多数中学的师生都投入了运动。一时间,大字报刷满了校园。激情飞扬的学生们无所畏惧地向着一切他们认为不合理、不正常、或者看不惯的现象开火。大字报的矛头多数指向学校领导,也有指向一般教师的。其间,有对他们当年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笔伐,有对他们平时片言只语断章取义的批判,有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指责等。广大师生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下同),揭发问题,并揪出了一些所谓“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在这种猛烈的批判浪潮中,多数学校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或半瘫痪,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维持,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为了加强文化教育单位运动的领导,维护正常秩序,7月中旬,根据中央、省及地委要求,句容县委采用外地做法和工厂、农村搞“四清”运动的老经验,抽调174人(地委分配的原“社教”运动留守工作队员155人,县机关抽调19人),组成“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组),编为3个队7个组1个室,即大卓公社一个队81人,初中教师集训班一个队40人,县机关、文教系统一个队20人,5所完中5个组15人,卫生系统2个组7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11人(包括检查组5人),分批进驻县委决定开展运动的单位。工作队进驻学校等部门后,主持了对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工作组认真宣传中共中央的八条要求,要求造反派“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学校外面”、“大字报不要上街”、“不准打人

和侮辱人”、“对历史问题和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不要写大字报,学生不要揭发学生,不要泄露国家秘密”等,力图使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工作组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乱揪乱斗的现象,缓解了学校内的紧张气氛,赢得了大部分师生的支持和拥护,但也引起了少数情绪偏激的造反学生的不满。他们有的公开批评工作组,有的张贴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抨击,还有的要求工作组撤离学校。

7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6日,中共镇江地委发出通知:“全面撤销工作组,市县委可在一部分学校派驻联络员”。8月10日,中共句容县委作出《关于撤销句容县中、后白中学工作组的决定》,并指出“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工作组的人员仍留在学校,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中央的决定;听取广大革命师生的意见,听取批评,总结经验;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地向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支持‘文化大革命’。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需要他们回去随时可以回去”。“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句容县中、后白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由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进行充分酝酿,充分讨论,提出候选名单,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负责领导。可以先成立筹备组织,负责筹备召开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工作”。至此,县内所有工作组全部撤销,由各校师生和单位职工自己开展运动。工作组成员以联络员的身份参加运动。8月22日,县委下发《关于集训全日制中学教职员的通知》,决定:全县除县中、后白两校外,各全日制中学教职员集中来县训练,时间约两个月。集训期间,各校除推选一部分学生代表本月底来县参加集训班外,其余学生均在校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学习。集训班各校所带的学习材料为《毛泽东选集》、“十六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纸及其他有关资料。9

月6日,下蜀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22人);后白中学亦于同日成立,公社及周围大队都派人参加,共选出委员15人,其中学生11人,教工4人。至10月20日,全县在学校和单位参加运动的联络员有82人。

撤销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进一步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自工作组撤离后,句容各地本已混乱的局面越发不可收拾。

第二节 社会局势全面混乱

一、红卫兵破“四旧”与“大串连”

1966年5月底,北京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自发集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着,北京的其他中学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学生组织。6月24日和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中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8月中旬后,句容各个中学也纷纷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有的中学还人为地以出身成分划为“红五类”、“黑五类”,分别成立不同名称的造反组织。如行香中学,有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有以中农为主体的赤卫兵,还有以非劳动人民出身为主体的革命造反派。县中也有“黑七类”子女组织的革命造反派。

1966年8月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煽动性地提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破‘四旧’)”。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

“四旧”的消息，随即破“四旧”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句容的红卫兵也很快冲向社会，掀起一股破“四旧”的狂潮。

8月25日，县中红卫兵来到县城南大街，冲砸建立已达54年（建于1912年）之久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招牌。同日，城东半农半医学校红卫兵，毁掉牙摊游医和三台阁针灸医生招牌，没收医疗器具及药品，并将牙摊游医戴高帽游街。26日，县中60多名红卫兵冲上茅山道院捣毁神像，将250多公斤经书、98件道服及若干幅帐幔等物品付之一炬；55件贵重道教器具、物品及“茅山四宝”被带回交县保管。27日，县中近600名红卫兵前往宝华山大破“四旧”。对隆昌寺的泥塑菩萨进行大铲除，对数千卷经书和一切佛教物品进行了彻底摧毁。佛教物品被砸成废铜600多公斤、废锡210多公斤拖回句容，清出来的金、银、玛瑙、玉器等贵重物品带回句容，上交县保管。红卫兵在隆昌寺大肆砸、毁、烧后，乘6辆卡车到龙潭镇进行游行示威。29、30日，县中红卫兵和县机关、邮电局、县医院、印刷厂及街道居委会部分干群共400余人，押着34个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戴着高帽子进行游街示众。随后，红卫兵在全县城乡大破“四旧”。臂带“红卫兵”袖套的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而盲从。他们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以简单、粗鲁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他们无所顾忌地闯入民宅，翻箱倒柜。雕有龙、凤、花、鸟、虫、鱼图案的花板床被铲毁；砌有烧制图案砖的墙体被捣毁；家具上铜质扣件、铜盆、铜制手炉和脚炉等生活用品被砸毁；绣有龙凤等图案帐沿、门帘等被撕毁，金、银及其饰品、挂件被抄走；许多珍贵文物和有价值的古书资料被毁弃。8月31日上午，城镇公社组织了6所中小学、19家社办企事业单位和各居委会居民约800人的破“四旧”报喜队伍，把抄收来的家谱、古书和字画、金银及器皿、带龙凤图案的帽、鞋、褥、帐沿及寿衣、各种质地的菩萨像、祖宗亡位牌、神台神位、香炉烛台等所谓“四旧”物品，挑的挑、抬的抬、推的推，涌向县委和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

室报喜。同日下午,石狮公社也组织 700 多人的队伍,挑着约 170 担横扫出来的“四旧”物品来县委报喜。各地农村亦仿效之,逐户过堂破“四旧”,然后向上一级单位报喜。强行剪妇女辫子、挖祖坟、毁棺材等在城镇、大卓、天王、磨盘等公社都曾发生过。茅山公社“造反派”还炸毁葬在茅山脚下的康有为母亲的墓,劈开棺槨,墓前汉白玉石碑也遭砸,使很多字无法辨证(残碑如今放在茅山道院印宫内,得到了保护)。

在破“四旧”同时,全县出现所谓打破“四旧”名称,改换具有“革命”意义名称的行动。当时改名的有 14 个公社、113 个大队、35 所学校、220 多个企事业单位。如茅山公社改为东进公社、后白墅中学改为东进中学、天王公社改为四清公社、云塘中学改为红卫中学、城镇鲜鱼巷口改为红旗街口,等等。城镇公社将 4 个居委会、26 条大街、小巷和马路名称在 8 月 24 日一天全部进行了更改和重新命名。

据统计,从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全县破“四旧”扫除所谓的封建迷信物品和工具有 40 余万件,缴获地、富、反、坏、右的变天账 370 多本,枪支(包括土枪)15 支,弹药 690 多发,刀、匕首 115 把,反动证件、证章 200 多张(枚),反动诗词 14 册,伪币 1 万多张,贵重浮财 100 多件。

席卷城乡上下的破“四旧”狂潮,后果极为严重。全县不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被毁灭,宗教信仰被取缔,社会秩序被破坏,民主法制被践踏。

红卫兵的另一狂热行为是“革命大串连”。早在 1966 年 7 月,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的唆使下,北京已有多批学生来江苏“煽风点火”,谓之“传播北京的造反经验”;南京、镇江有部分学生来句容传播所谓“革命种子”。江苏亦有部分学生奔赴北京,学习“造反经验”。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

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组织师生分期到北京参观、学习，交流“革命经验”；进京参观一律免费，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先后 8 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共 1100 多万人次。在这种大环境下，各地红卫兵潮水般地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的红卫兵也赴各地“点火”，谓之“大串连”。9 月 20 日，句容县革命师生赴京参观领导小组成立，由韩圣才等 5 人组成。同时，在各单位抽调 6 人组成组织赴京师生参观“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赴京办公室。21、22 日两天，召开各公社文教指导员和各中学联络员会议。23 日又召开了 11 所初级中学在县集训班学习的各校文革筹委会正副主任和联络员会议，研究部署红卫兵赴京的具体工作。10 月 12 日，全县组织的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近 1000 人，与江宁、高淳、溧水、溧阳 4 县学生教职工代表组成一个方队，乘车赴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于 18 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检阅（属第 5 次）。在此前后，外地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也先后到句容“煽风点火”，名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在句容设立了“红卫兵”造反联络站。在红卫兵串联热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句容所有中学及部分小学实行“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和教职工纷纷离校参加大“串连”，涌向首都北京、毛泽东家乡韶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八一”起义地南昌、革命圣地延安和上海、西安、杭州等地。

在大串连期间，句容县成立了“文革接待站”，负责接待外地到句容串连或串连路过句容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并免费安排食宿。

红卫兵的大串连，使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同时，由于红卫兵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串连，鼓励基层干部群众造反，使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大串连，给原本就紧张的交通运输造成空前压力，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轰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鉴于此，中共

中央于10月29日、11月16日、12月1日,连续三次发出大中学校师生暂停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大串连之风逐渐刹住。

大串连虽然渐止,然而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的做法却得以合法化。1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规定。随后,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极左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此后,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四大”,到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并同大中学校的造反浪潮相互结合。此后,在句容城乡,“井冈山”战斗队、“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红旗战斗队”、“反到底兵团”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多达几百个(仅县城内大小造反组织就有80多个,县中一校就有8个)。这些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干部)。于是上至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下到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大多受到冲击,或被批斗,或“靠边站”,经济工作的运行已经十分困难。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仍没有得到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消除党内高、中层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首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向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的干部施加压力。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句容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刷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幅标语。此时,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造反派从各个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矛头对准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攻击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对一切越轨行为的干预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从而使整个社会更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

11月3日,后白中学部分红卫兵来到县城,以斗大字样口号形式的大字,分别在汽车站、句容大街、县委门口等处张贴。其主要内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宋敏”(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等,并在县委大字报栏内张贴一张宋敏的大字报。这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中较早贴县委主要领导大字报、冲击县委的大字报。此后,句容县中和在县城的一些中学和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贴县委大字报,提出“炮轰县委”的口号。此时,多数县委领导被冲击、受批斗,县委已不能正常行使职权,生产无人抓,城市秩序混乱。

在县委机关瘫痪的同时,全县各部委办局,各公社党委政府领导,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乃至生产队长,各中学、中心小学的党支部书记、校长乃至完小校长,几乎全部受到冲击,他们的一切企图使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纳入正规的言行措施,被斥之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许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劳动模范分别被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保皇派”受到批判,甚至被戴上高帽、挂牌游斗。至是年底,全县所有行政机关全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部分工厂停工,大多数学校停课。

三、造反派全面夺权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1月4日、5日，上海造反派先后宣布接管《文汇报》、《解放日报》。6日，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篡夺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造反派发去贺电，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夺权”。

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全面夺权的风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从地方到中央，从学校到机关，从工矿企业到城市街道、农村社队，夺权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争相占领党政机关，抢夺机关公章，批斗、关押甚至绑架党政领导干部。

句容也不例外。早在1966年7月初，陈武中学造反的师生就要求停课，撤掉校长职务，说校长是邓拓黑帮，要一个姓孙的炊事员来领导运动。8月下旬至9月初，全县在破“四旧”过程中，大队、生产队干部被农村红卫兵擅自“罢官”、“停职”就有8人（“罢官”5人、“停职”3人）。9月9日，东进中学（原后白中学）师生向校长要印，写了一张夺印大字报。当晚10点多钟，该校负责人被迫把印交给学生。9月15日，该校117名学生从后白步行来县城，要求罢免该校副校长兼文教党支部书记王镇安的职务。至1966年12月上旬，被批斗、“罢官”、“停职”的各级干部共125人（其中未被县委列入秋前开展运动的单位干部87人）。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句容造反派紧跟上海造反派，开始对许多领导干部进行“罢官”、揪斗和戴高帽子游街。据统计，1967年1月至3月初，从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到机关部分委办局领导和部分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属省和镇江地委管干部），被造反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者计21人。党、政、企事业各单位的领导权相继被夺，组织机构陷于瘫痪，句容陷入全面混乱之中。

第三节 实行军管稳定局势

一、成立军管会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全面夺权”的热潮。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维持起码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保障造反派顺利地“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1月21日,毛泽东作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批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至此,大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且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任务。

1967年2月,句容县人武部开始介入句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月4日,江苏省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成立。生产办公室下设秘书、政治、生产、抗旱防涝、后勤5个组(后又增设文卫组),各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在县人武部党委领导下,担负全县生产组织指挥职能。当时,主要是召开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抓了春耕生产等工作,至3月24日结束。3月28日,江苏省句容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新光任主任,王孝庆、李锦秀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取代县委、县人委。原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并入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军管会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县“文化大革命”;生产委员会主要监督原县人委有关科局抓好工农业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革命委员会内设秘书、组织、政法、宣传文卫等组;生产委员会内设

秘书、政治、农业、工交、财贸等组。是日，县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告》，通告宣布：“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镇江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对句容实行军事管制。”通告提出了句容县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让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二）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斗批改；（三）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促进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即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四）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全力完成1967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安排好人民生活”。之后，句容县军管会又几次发布《通告》，宣布对句容县公安局、句容县人民检察院、句容县人民法院、句容县邮电局、化肥厂、人民医院、广播站、人民银行、交通局、粮食局实行军事管制。后又成立了句容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职权。

县人武部介入句容“文化大革命”和句容实行军管后，初期形势较好。但“二一九”大会（批判县委书记蒋继奋、副书记宋敏等大会）后，句容造反派逐步分裂成两大派，双方日趋对立，甚至发展到武斗，句容军管会陷于瘫痪状态。

1968年2月，为稳定句容局势，促进句容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进驻句容，成立以部队为主体、县人武部参加的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句容继续实行军管。

二、军管会稳定局势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句容地区形势混乱，一方面造反派组织全面夺权；另一方面，造反派组织之间相互争斗，并不断发生摩擦。

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或混迹其中,或幕后操纵,煽动武斗,搞打砸抢,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工农业生产也不正常。军管会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稳定局势。

取缔部分造反派组织。1967年3月29日,句容县军管会发出公告,宣布县文化馆“鲁迅战斗队”为反革命集团组织,予以取缔,2名负责人予以拘捕;县“农机五金厂红色工人造反派”为右派组织,予以取缔,1名负责人予以拘捕。3月31日,宣布县城“西南山砖瓦厂红尖兵纵队”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5名负责人及骨干予以拘捕。9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宣布对这些组织和被拘捕人员予以平反。

在取缔部分造反派组织的同时,县军管会先后派出人员帮助群众组织整风,对群众组织中存在的小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指导他们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和注意斗争策略,解决分歧,加强团结,促进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军管会成立后不久(6月8日),即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意见》,认真宣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意义,建立健全“一条线学习指挥系统”,县和公社成立“学习《毛泽东选集》办公室”,大队成立“《毛泽东选集》中心学习小组”,生产队配备《毛泽东选集》学习辅导员。同时,恢复和健全了《毛泽东选集》学习制度。6月5日至9日,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0月30日,县军管会同意新华书店发给职工《毛泽东选集》,发给农村社员《毛主席语录》。全县培训了一大批《毛泽东选集》学习辅导员,参加《毛泽东选集》学习的群众,约占成年人的60%以上。

抓革命,促生产。县军管会认真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通过各种会议、广播等途径,反复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从上到下建立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4

月 12 日至 15 日召开全县工业、交通、财贸工作会议,544 人参加,列席听报告的有 445 人。会议贯彻镇江专区召开的工业、交通、财贸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革命和生产形势,落实 1967 年度和二季度工作任务。16—19 日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780 多人参加。此外,县军管会还先后召开了多种经营工作会议、农业生产会议、文教卫生工作会议、植保会议、棉花会议等,贯彻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布置“抓革命,促生产”各项事项。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县军管会还在 5 月 3 至 6 日、11 月 14 日分别召开了水稻落谷和“四秋”工作现场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全县工农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思想。1967 年 12 月 13 日,县军管会举办为期 10 天的“句容县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句容两大造反组织勤务组负责人(各 10 名)、公社干部(每个公社 2—3 名)、县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每单位 1 名)参加。通过举办学习班,统一思想,稳定局势。以后又多次举办学习班。

整顿秩序。针对一些群众组织乱用印章的状况,军管会发出通知,规定各部委办局上下行文时,暂用原部委办局的印章,不得再使用造反派组织的印章;下达任务,必须将文稿送军管会有关部门审查,有军管会统一行文。针对一些造反派随意将干部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的现象,县军管会发出通告,宣布在运动中凡属未经正式批准而由群众组织自行决定罢官、开除党籍的一律无效,扣发工资的要补发,下放劳动的要调回,强占房屋和公物的要归还原主。军管会组织师生学习毛泽东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耐心做师生的思想工作,促使教学秩序正常化。1967 年 12 月 8 日,军管会发出决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和职工要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在生产工作岗位”。

军管会采取宣传、发文、抽调专门人员检查等方法 and 手段,贯

彻落实省军管会制定的《关于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意见》，并将此纳入群众组织整风的重要内容，反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维护经济秩序。此外，军管会还组织大批判，揭批句容县委以蒋继奋、宋敏为首的所谓“走资派”，并对广大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干部“亮相”，促使干部站起来，参加生产领导班子。1968年2月，某部队一部进驻句容重新调整组成新的军管会后，推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平息了两大派的武斗，促成了县及县以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基本稳定了社会与生产秩序。

进驻句容的人民解放军，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来句容执行任务的，他们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得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给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第四节 武斗的爆发与平息

一、日益升级的武斗

军管会的工作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一些造反派的头目一面造谣惑众，污蔑攻击说“军管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搜集材料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造反派两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扩大，其实质是为了争权夺利，想利用中央文革小组或部队支“左”人员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军管会对两派造反组织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两派通过整风吸取教训。但由于两派之间利益冲突，双方之间由辩论、争吵，很快发展成武斗。一部分军管人

员也被陷入派性斗争中,他们观点不同,各支一派。在江青7月22日“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急剧升级,省城南京和镇江也不例外。受其影响,句容的造反派内部也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个造反派系统,即以红色造反军县级机关总部和政法总部为核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以句容县中学井冈山公社、东进中学赴句造反纵队、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为核心的句容县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筹),简称“革联”。在南京、镇江造反派的支持下,句容的“红联”与“革联”,派性斗争日趋严重,县内武斗不断发生。

1967年6月30日,句容县中学和后白中学的数百名造反派,自带斧头、老虎钳分三路,为找广播喇叭和所谓“黑材料”,冲砸县机关的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档案馆、计委、文委等单位,抢走了一些书籍、文件资料。7月下旬至8月上旬,造反派借“文攻武卫”之名,成立“武卫营”,在有的地方挖工事,在有的单位设电网,打造大刀、长矛等武斗工具进行武斗准备。8月12日晚,两派造反派组织在革联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生武斗。同日深夜,1000多名造反派冲砸县人武部、县机关、公检法、城镇派出所、城镇公社等单位,并抢夺人武部武器弹药和部分单位物资,造成国家和私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同时将130名无辜群众关押、审讯,有的还受到毒打。8月13、14、17、18日,造反派几次冲击某部队,抢夺武器弹药。特别是8月18日在冲击某部队时,为抢夺汤山炮校“革联”一辆卡车,与炮校解放军和周边农民发生冲突。造反派扔手榴弹两颗,炸伤解放军指战员7名,其中重伤3名。是年国庆节后,“红联”操纵在县城召开由6000多人参加的所谓农代会,“革联”前去冲会场,引起武斗,有3名解放军战士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殴打。此外,造反派还3次冲击军管会和革委会举办的两派头头学习班。多次绑架军管会负责人,将刀、枪架在军管会负责人脖子上游街示众。

武斗的发生,闹得人心惶惶,一些工厂停工,商店关门,部分地区交通一度中断,生产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二、军管会平息武斗的努力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通令》(即“六六”通令)。《通令》指出,“严禁乱抓人、私设公堂和变相私设公堂;严禁抢夺、窃取和破坏档案文件;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不准非法抄家”。《通令》要求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执行,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和凶手,依法惩处。7月12日,江苏省军管会发出《重要通告》,要求各地造反组织立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武斗,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此后,句容县军管会也发出了有关严禁武斗《通告》。要求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执行、宣传、捍卫“十六条”,立即制止武斗。

1968年2月,县军管会成立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并派出若干小分队,深入城乡宣传中央“九五”命令和“七一三”通知,收缴各种武器。经过艰苦的工作,2月上旬,句容县“红联”和“革联”签订《句容县两大派关于立即彻底上缴武器的协议》。先后收缴了两派各种枪械、子弹和自制武斗器械。2月中旬,在军管会主持下,两派签订了《全面制止武斗协议》。2月22日,句容县两大派代表赴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双方签订《句容县两派实行革命大联合协议》。2月24日,句容县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县军管会的敦促下,全县56个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同时“解放”了部分县委领导干部。此后,全县工人、农民相继回到自己的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教师和学生陆续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武斗被全面平息,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渐趋稳定。

第十八章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与开展 “斗、批、改”运动

经过县军管会和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句容社会与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全县上下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形式多样的大联合。句容县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县革委会按照上级部署，组织开展“斗、批、改”运动，派工宣队、贫宣队进驻中小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放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等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整党建党”，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召开了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句容县委。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后，造反派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以此取代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2月23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凡经夺权产生的各级政权

和行政事业单位乃至企业的领导机构统一定名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1968年2月,句容群众组织、地方干部、军队干部代表赴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快全县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进驻句容后新建的县军管会(1968年2月18日调整新建),先后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000多期,参加学习的有10万多人次,为促进句容两派的大联合和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自2月中旬起,先后组织两派造反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分别成立了工人、贫下中农、学生和县级机关“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全县上下掀起“革命大联合”的高潮。截至3月中旬,全县105个单位和系统(公社22个,厂矿、场圃18个,企事业单位和系统65个)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达56个,占53.33%(其中22个公社全部实现了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实行“三结合”的单位8个,占8%,有的革命委员会在待批。与此同时,县军管会组织群众认真落实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解放”了一批干部。原县委的“当权派”在检查“亮相”之后,经过群众讨论,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原克振,副书记王延序、副县长阎发学等人获得“解放”,并议定结合到即将成立的县革委会中。有许多单位积极筹建革命委员会。此时,社会秩序渐渐平稳,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3月,县军管会在举办“三结合”学习班的基础上拟就了筹建句容县革命委员会的方案,并于17日向镇江专区军管会和某部队党委提交了《关于成立江苏省句容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据此,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委员会作出批示,同意建立句容县革命委员会。按照“三结合”的原则,县革委会由军队代表、地方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共45人组成(暂缺7人)。在县革命委员会45名委员(暂缺7人)中,军队代表8人(某部队驻军和县人武部),占委员总额的17.8%;地方干部8人(原县级领导3人,

中层干部 2 人,公社级领导 3 人),占委员总额的 17.8%;群众组织代表 25 人(工人代表 8 人,贫下中农代表 9 人,学校代表 3 人,机关代表 2 人,其他单位代表 3 人),占委员总额的 55.6%;机动 4 人,占委员总额的 8.8%。革命委员会由杜孟祥、邱学臣、金成义、陈树良、原克振、王延序、阎发学、陈志伯、赵志龙、梁尚富、虞元勋、史锦才、肖德龙等 15 人(暂缺 2 人)组成常委,并有杜孟祥任主任委员,邱学臣、原克振等 4 人(暂缺 2 人)任副主任委员。县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群众专政组(1968 年 12 月 5 日改为政法组)。办事组内设秘书、总务二组;政工组内设秘书、组织、宣传、群众工作等组;生产指挥组内设秘书、计财、农林水、工交、文卫、人民生活服务组;群众专政组内设秘书、政法、群众保卫等组。实行党、政、财、文的一元化领导。

3 月 28 日上午,在县体育馆召开句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县人民书》。会后,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解放军驻句容部队指战员近万人举行了庆祝游行。

3 月 29 日至 4 月 7 日,县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学习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围绕实现革委会思想革命化和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问题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并作出会议纪要。会后,县革委会向全县贫下中农赠发《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3 篇著作),要求各地进一步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新高潮。期间,县革委会常委会研究确定了县革委会机构建制人员名单。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多为原机关人员和军队干部,适当吸收了一些群众组织人员。5 月 3 日至 7 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第一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明确当前主要任务,就落实省、专区革委会决议贯彻措施作出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加强革委会思想革命化的暂行规定》。

二、基层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

县革委会成立后,着手基层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工作。3月31日,茅山、宝华、郭庄3个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1日,二圣、后白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至8月27日,全县有110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公社革委会15至27人组成,设常委7至9人,主任1人,副主任2至3人;中学革命委员会由9至11人组成,不设常委,设正副主任各1人,有的只设主任1人。在农村,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又组织力量,帮促基层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1969年2月8日,石狮公社平桥大队成立革委会(在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全县大队第一个成立的革命委员会),10日,该大队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全部成立。3月6日,石狮公社光明大队革委会成立。

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以抓阶级斗争作为自身的基本职能,将其定格为“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指挥部”,因而不可能把管理社会经济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而且,在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一些造反派骨干进入各级领导部门,这些人大多既无党政领导工作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又残留着派性。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各级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句容“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局面,填补了县、社、队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的责任,使句容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和展开。

1968年,全县工农业生产结束了1966年、1967年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工业产值达1509万元,但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低15.6个百分点;1969年工业产值为1770万元,接近1965年的水平;1970年工业产值为1940万元,比上年增长9.6%,才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业水平。农业生产方面,造反派虽然对农业生产发展有很大破坏和影响,但“农业六十条”仍在发挥作用,农业产值:1967年、1968年、1969年虽没有出现负数,但只增长2.1%、

1.8%、1.2%，1970年比1969年下降了4.3%。粮食产量：1966—1969年，一般都在17万多吨至18万吨之间徘徊；1970年达20.5万吨，为解放后21年的最高历史纪录。

第二节 开展“斗、批、改”运动

早在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就已经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简称“斗、批、改”。

在“文化大革命”中，句容县军管会、句容县革委会，按照上级军管会、革委会部署，始终把领导群众进行“斗、批、改”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句容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以“革命大批判”来开路的。因此，无论是军管会时期，还是县革委会成立后，都把“大批判”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不遗余力地去抓这一项工作，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换“大批判”的内容。

1967年3月县军管会成立后，将“斗、批、改”列为自身的重要职责，领导群众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及一度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县革委会成立后，按照上级革委会的指示，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上批所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批以蒋继奋、宋敏为正副书记的县委的各种所谓“罪行”。各级革委会运用大批判小分队、大批判专栏、路线分析会、小评论等多种形式，深

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据统计,截至1968年7月底,全县各级出大批判专栏848期,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429次,斗所谓走资派767人次,召开批斗其他各种“阶级敌人”大会524次,斗争阶级敌人1215人次。其中由县革委会主持召开全县较大的批判会就有94场次,计160余万人次参加。1968年4月下旬,句容造反派在县体育馆组织空前规模的万人批斗大会,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等16人被批斗,其中2名科技人员轮流头顶《韦氏英语大辞典》,以示对所谓“崇洋媚外”思想的惩罚。批斗会结束,又将批斗对象戴上高帽子,到大街游斗。5月19—23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有750多人参加。会议期间,三级干部专门召开了批斗所谓句容地区头号走资派、原县委书记蒋继奋的大会。8月18—23日,县革委会举办由各公社基层单位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对敌斗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交流所谓对敌斗争经验,又对上述对象进行斗批。11月18—24日,县革委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要求全县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以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以后,县革委会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组织群众重点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修养”和“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在农村,重点批判“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在工厂重点批判所谓“不合理规章制度”,将其视为“束缚工人手脚的条条框框”,是“管、卡、压”;在学校重点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厂以及农村,都把“革命大批判”作为自身必须常抓不懈的工作重点。“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

等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在田头、场头、车间,批判会此起彼落;墙壁上、黑板上,引人注目的大批判专栏随处可见。1970年1月9日、10日,江苏省级机关造反兵团,金坛、句容县工、贫、红代会在句容县城镇、天王两地联合召开了所谓“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彻底清算刘少奇及其在江苏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在农村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滔天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和当地驻军等2万多人。1971年,开批斗会(大会)272次,批斗对象32人;参加批斗会总人数7.77万人次,出批判专栏152期,写小评论830篇。1972年,开批斗会963次,批斗对象124人,参加批斗会总人数15.84万人次,出批判专栏808期,写小评论7977篇。

“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完全混淆了敌我关系,混淆了是非,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党的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更加严重。

在发动全民广泛开展大批判的同时,还开展了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运动。1966年12月,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主席语录》向社会发行,引发了“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出版部门和印刷厂的主要任务,就是出版、印刷毛泽东的著作和领袖像。学习“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开展每一项工作(甚至吃饭、睡觉)前必须做的一件事。社会上普遍流行“红海洋”(将墙壁用漆刷红、书写标语)、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形式主义盛行,个人崇拜到了极点。1968年4月11日,县革委会全体委员专程前往天王公社参观天王公社革委会举办的“忠字化展览”。26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发给每户贫下中农《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各1册。句容县革委会贯彻镇江专区革委会的通知要求,到处都有“红本本”(指《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最新指示一发表,常常是搞传达、学习、宣传不过夜,把毛泽东讲的

每一句话,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当作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据统计,至1969年年底,全县发行《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甲、乙种本、单行本115.9万多册,《毛主席语录》18万多册,毛主席像78万多张。有关部门还举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展览”,全县各级各部门还多次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推选出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典型。

在这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是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而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的。但由于林彪、江青等将其庸俗化、绝对化,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学习方法不对,没有弄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和精神实质,再加上所学的大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使得这场群众性学习运动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

二、进行“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句容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全方位的“教育革命”。

宣传队进驻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运动。绝大部分学生和部分教师在“造反有理”口号的煽动下,组织红卫兵和各种名称的造反组织,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造反狂潮。学校停课闹革命,校内外派别林立,武斗频起,一片混乱。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学校混乱的局势并未根本改变,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没有回校。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以优秀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校,帮助、

促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同月，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布置各县(市)组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月24日，县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组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到9月4日，句容县革委会组织了79人参加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工人40人，农民21人，解放军18人)，进驻县中、劳动大学、城镇工读中学、银行、供电所、化肥厂、综合公司等7个单位；全县22个公社组织了52个、共504人(其中工人76人，贫下中农346人，公社革委会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82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和公社管理范围内的医院、供销社、手工业合作社等所谓“老大难”单位。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取消校长制，组织师生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风”，进行“斗、批、改”。1969年1月25日，省革委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句容，分3个小组分别进驻石狮公社的光明、河桥2个大队和公社机关，参加农村“斗、批、改”的试点工作。党的九大召开后，“斗、批、改”工作再掀高潮。是年8月，县革委会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508人，进驻12个所谓“老大难”单位开展“斗、批、改”运动；11月下旬，又进驻工交、财贸、文卫、农林水等系统，继续进行“斗、批、改”运动。宣传队员们虽有满腔的工作热情，但由于文化素质比较低，有的还带有严重的派性，致使学校的教学工作仍处于不正常状态。

公办小学下放大队。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侯振民、王庆余两名教师提出的“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此建议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掀起了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热潮。是年冬，全县公办小学全部下放给工厂、公社或农村生产大队管理，各公社、大队分别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三结合的教育革命委员会或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中小学分别由公社、大队领导，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镇各校由“工宣队”

管理(当时全县有 915 所学校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句容籍公办小学教师全部回本大队任教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家住城市在农村任教的就地落户,以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公办小学下放大队以后,彻底打破了教育教学资源的配置,致使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大乱,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

学制与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从 1969 年起,句容中小学进行学制改革。小学学制由 6 年改为 5 年,初中和高中学制由原来的三、三段改为二、二段,即由初中、高中各 3 年改为初中、高中各 2 年。城区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农村中小学实行“七年一贯制”,很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在进行学制改革的同时,精简课程设置,小学由 9 门改为 6 门,删减了自然、地理、历史 3 门课程;中学由 16 门改为 8 门,删减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增设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

在教材方面,全县中小学停止使用“文化大革命”前的部编教材,改为县和公社的自编教材。至 1970 年 2 月,全县自编 1 至 7 年级教材 36 册,乡土教材 2000 余篇。郭庄公社从 1969 年 1 月至 4 月上旬自编农村七年制学校教学大纲和教材 34 本,其中包括“毛泽东思想”课 3 本,“农业生产基础知识”课 3 本,“语文课”14 本,“数学课”14 本。

与此同时,改闭卷考试为开卷考试。招生制度中,取消了文化考试,实行小学毕业生直接升初中;高中以“推荐与选拔”的办法招生;高校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按此办法,有关高校在句容逐年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

教育教学打破所谓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讲师团走上学校讲台。至 1970 年 7 月,全县共组织 329 个讲师团,有 2429 名工人、农民参加学校讲课。同时选拔和推荐了 895 人充实教师队伍,培训 139 名军体人员。至 1976 年,全县 2127 人

担任民办教师,还有一批工农兵任兼职教师。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全县各中小学组织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并积极创办工厂和农场。至1970年6月,全县共有学农基地253.7亩,与工厂、农村挂钩的学校411所。各学校先后办起文教印刷、胶木、电机修配、五金、化工、电器、模具等厂。县还组织了134名教师到农村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学校布局上,按“上小学不出村,进初中不出队,读高中不出社”的原则,对全县中小学设置进行大幅调整。全县21所公社中学都设有高中班,还增设39个高中点。1973年,全县有中学106所,其中完中22所;初中84所,275班,学生15737人;高中77班,学生7684人,造成中等教育事业“虚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教育革命”,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助长了“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的错误观念。然而,即使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句容大多数教师仍然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很多学生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总的来说,这种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所谓的“教育革命”,极大地破坏了党的教育事业,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句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1963年即开始进行。当年,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抽调有关人员在城镇开展压缩人口试点(包括下放知识青年)工作。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发动,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投身革命,为发展农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经过自愿报名和批准程序,当年10月份首次动员少量知识青年到石狮公社插队务农。1964年9至12月,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速度加快,范

围扩大,城镇、天王、下蜀等大集镇的 602 名知识青年分别到二圣、黄梅等公社插队落户,参加生产劳动。期间,曾有镇江、南京、常州、无锡等城市少量知识青年下放到句容插队务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发展停滞,致使大量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分配。他们或滞留学校继续造反,搞“斗、批、改”,或流落社会,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句容县革委会根据省、镇江专区革委会指示,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口号声中,组织动员城镇户口初、高中毕业生 689 人到有关公社、农村场圃插队插场,安家落户。同时,接收安置外地下放知青(大多是 1966 年、1967 年、1968 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简称“老三届”)来句容插队落户 4748 人。在外地下放知青中,南京市下放知青 3450 人,多数安置在郭庄、三岔、石狮、黄梅、宝华等公社或场圃;镇江市下放知青 926 人,多数安置在东昌、陈武、下蜀、白兔、行香等公社插队插场;无锡、常州市下放知青 372 人,被安置在磨盘、袁巷等公社。1970 年国家恢复招工,1969、1970 和 1971 年,县城中学毕业生基本留城分配工作。1973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掀高潮。全县组织动员知青 1541 名到农村劳动。句容县中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一夜之间便打好背包,冒雨坐车到县城南部有关公社插队落户。每个知青配给一张竹片钉的板床,两条支床用的竹马,一根扁担,一副挑箕,一张钉耙,一把锹。6 月 28 日,镇江地区革委会向全区转发《关于“句容县动员一九七三年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情况汇报”的通知》,对句容做法予以肯定。同年,下放到句容的外地知青,南京市有 2676 人,镇江市有 1558 人,无锡、苏州、常

州市等有 241 人。这期间还先后接受句容籍上海市回乡知青 61 人,外省市下放回乡知青 543 人。至 1973 年年底,本县下放知青共 5173 人(含 1974 年后零星下放 536 人和其他原因下放的),外地下放到句容的知青约 1 万人(南京 6126 人,镇江 2484 人,无锡、苏州、常州 613 人,其他约 200 人),总共 1.5 万人左右。

“文化大革命”期间,句容各级党委、革委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十分重视。1967 年 5 月,句容县军管会内设机构中就设有上山下乡办公室,指定专人加强对下乡知青的领导。1969 年 1 月 21 日,“句容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同年 1 月 30 日,县革委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插队知识青年动员和安置工作的意见》,对做好知识青年安置工作提出 7 条具体要求。6 月 16 至 20 日,县革委会在大卓公社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革委会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以及贫下中农、下乡、回乡知青代表。省、专区革委会、常州市和南京市玄武区革委会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毛泽东有关指示,座谈对知识青年“再教育”和知识青年接收“再教育”的实践和体会,明确当前着重要做好的工作:第一,突出政治,进一步大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舆论。第二,进一步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第三,落实政策,增强团结。第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领导。7 月,省革委会组织知识青年慰问团到句容对知青进行了 20 多天的走访慰问。8 月 2 日,县革委会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情况和意见》,通报省慰问团走访慰问情况,总结知青“再教育经验交流会”后全县知青工作情况,肯定成绩,提出问题,明确要求。9 月 9 日,县革委会又批转“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调查小组的调查意见”,要求各公社和有关单位根据情况,“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和总结”,过细地做好工作,把落户知青的住房、生产、生活用具等具体问题解决好,更好地做好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工作。1969 年和

1970年11月,县革委会两次召开上山下乡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000人和770人分别参加)。1971年5月3日至7日,县革委会召开下放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1973年6月22日至24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毛泽东给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员李庆霖的复信和中央、省委有关知青工作通知,联系句容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检查。会议期间,从县级机关抽调50多名干部,组成22个调查小组,由各组、局负责人带队,深入社、队了解上山下乡知青情况。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表彰先进典型,研究部署下一年度工作。

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以后,虚心向农民学习各种知识,积极参加各项艰苦的生产劳动,希望在农村这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过低及一些其他原因,一些知青在住房、口粮、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甚至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以“26号”文件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在下乡知青较多的社队,都建立有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并抽调一批干部到知青那里去,协助社队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5月底,镇江专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贯彻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和省有关会议精神。随后,县革委会对下放人员的自留地、蔬菜地和口粮作出了统一规定,对下放人员的生活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排。11月,句容县革委会召开“上山下乡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发扬先进,巩固运动成果。

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未根本解决问题。1973年初,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识青年生活困难的问题。4月,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信中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

解决”。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指示精神，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拟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此后，省和地方先后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中央会议精神。据此，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进行学习和讨论，并组织400余名县、社干部，深入基层，向广大干群进行传达贯彻，同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9月21日至24日，县委又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进一步传达讨论中央、省、地委会议精神，学习、对照中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分析全县知青上山下乡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工作，讨论省委关于“统筹解决”的具体实施办法。县委决定，成立由政工组、劳动民政局、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单位参加的县委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周亚民任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得力的办事人员。要求大队建立健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会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些存在的生产、生活和思想上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在知青安置形式上进行改变。决定建立以场圃为主的知青教育点，组织力量，选派青年专职干部，加强对知青教育和管理，变分散为集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分散在生产队的知青分别集中到高庙茶场、张庙茶场、赵庄苗圃场、下蜀茶场、大卓俞家山、环城吉里、石狮林业队、黄梅群力大队、浮山果园、茅山林场等处，统一规划扩建住房，建立相应的教育管理措施，执行劳动纪律和考勤记录，评工论分，经济好的场圃，每人每月发放26元工资，部分经济条件差的企业，动员社会各界给予支援，使他们稳定思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中，句容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知青工作中的问题。但由于它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提下采取的局部调整措施，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1978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逐步安排他们回城就业，这个问题才根本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培养青年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改变农村文化素质低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大批的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使学校中的红卫兵运动名存实亡。但广大青年正是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的最佳时期,让他们中断进一步学习的机会,造成了国家一代人的知识贫乏和社会人才结构的断层,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再加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措施、方法都存在严重错误,依靠行政手段,不顾许多知识青年家庭的困难,许多地方搞强制下乡。另外,在对知识青年的使用、安排和教育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遗留下许多需要长期解决的社会问题。

四、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将干部下放作为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的经验加以推广。

10月15至16日,县革委会召开由各公社、县属企事业单位、国营场圃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主任(组长)联席会议,学习和研究落实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的10多天里,县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并举办两期学习班,研究精简机构和干部下放劳动具体事项。同时决定在石山头茶场兴办“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成立领导小组,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专案组。10月20日,县机关和公检法干部共370多人,带着30多个所谓“活靶子”,开赴“五七”干校,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进行“斗、批、改”运动。在此期间,县文化馆、剧团等文教单位干部下放到句容麻场;县粮油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充实到基层第一线。

县革委会在职人员,分五批轮流下放劳动,第一批7人。22个公社,一般都下发了50%左右的干部。下放的形式大多数是小型集中,2—3人一组,落户在后进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有小组集中,以边劳动边工作的形式下放的,还有个别公社采取大组集中,固定一个生产队,自己起伙等。至12月底,全县县、社两级行政干部计915人,除留县、社两级革委会工作的396人外,其余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下放劳动。其中下放农村插队的115人,下放场圃的62人,下放工厂的10人,去“五七”干校的315人,充实基层一线的17人。

1969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上山下乡干革命的高潮。同年5月,县东山良种场、小果园、高庙茶场划归镇江专区办“五七”干校;12月,陈武公社赵庄苎麻场的全部土地、人员划归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体育学院等3所院校办“五七”农场,镇江和南京不少干部和教授被迫在句容土地上的“五七”干校(农场)搞“斗、批、改”运动。

1969年11月25日,县革委会在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欢迎省、专区下放同志和欢送本县本年度首批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去农村插队落户。是年冬,全县经过三批(分别是11月25日、12月2日和12月21日)共有机关干部431人,城镇居民590户、2315人,下放到农村落户,同时还接受外市县干部396人(南京市53人,省级机关107人,镇江地区48人,镇江市145人,其他县市43人),南京、镇江、常州等地城镇居民1096户、4461人到句容农村插队落户。上述干部下放时,大都带家属一同在农村落户,并由原单位送至下放地点,拨款代建房屋,作长期定居打算。干部下放后,多数被公社调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派到生产大队和企业协助“抓革命、促生产”,或参加“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等运动。

1972年开始,遵照中央指示,下放干部陆续调回原单位或就

地另行分配工作。至1974年底,句容的下放干部全部得以安排。

在干部下放的几年中,县革委会根据上级指示和句容实际情况,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妥善安排下放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并就下放人员的口粮、燃料、自留地、蔬菜地等安排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县、公社、大队分别建立了有贫下中农、社队干部、下放人员组成的三结合“五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下放人员会议,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问题。如:1969年12月10至15日,县革委会组织由162人参加的上山下乡慰问团(下设5个分团、21个慰问小组、随同慰问团一起对下放人员进行慰问的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共4150人),对有下放人员的21个公社、253个大队进行走访慰问,慰问了654户、1778人。对早期下放的5000余人,召开座谈会547次,进行集体慰问。18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的5000余人大会,并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40余万干群进行慰问汇报,反响很大。1971年5月3至5日,县革委会召开下放干部、下乡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城镇居民、“再教育”单位和“五七”干校的代表参加的“下放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学习毛泽东指示,讲用下放后的心得体会,讨论进一步贯彻“五七”指示的措施。1974年6月6日和11月28日,县革委会两次发文,对石狮公社和袁巷公社做好下放人员工作的做法给予肯定并予以转发,对全县做好此项工作予以推动。

实际上,干部下放是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干部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县革委会精简机构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干部的需要。干部下放以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和科研工作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宝贵时光,给句容的经济、文化建设

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1968年冬起,句容在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同时,还将一些城镇居民全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此影响下,句容将一部分城市居民强制动员下放农村。至1974年年底,全县共有下放居民1694户、6811人。从下放类型看:插队的1256户、5167人,回乡的59户、227人,就地转农的120户、420人;外地迁进的259户、997人。从下放地点看:本县下放的598户、2350人,镇江下放的730户、2834人,南京下放的41户、171人,常州下放的18户、66人,其他市下放的307户、1390人。外地下放句容的居民多为指定下放,也有的是自愿回原籍落户。另外,1961年至1969年精简下放和就地转农的约529户、2185人,合计2223户、8996人。

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后,都不熟悉农业劳动,且有的缺乏劳力,有的孩子幼小,故多数居民生活不能自给,靠政府拨款救济和由生产队给予照顾。有的则重返城市,有的层层上访要求回城,给社会造成一定影响。

五、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

1968年,毛泽东批文肯定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创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举办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当年,句容县天王、下蜀、行香、黄梅等公社相继推行了合作医疗。1969年4月14至18日,在县革委会召开的全县卫生工作会议上,亭子、城东、后白、袁巷等社队交流了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会议对全面推行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争取在5月份各个公社都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同时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即公

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室(有一至二名大队赤脚医生),生产队有不脱产卫生员”。9月13日,县革委会发文,转发亭子公社合作医疗的做法。在此推动下,是年11月,全县各大队卫生室均实施了统筹合作医疗制度,形成县、社、队三级医疗卫生网络。

合作医疗形式有社办、社队联办、队办三种类型。1970年至1975年是全县合作医疗最盛时期。全县21个农村人民公社中,实行社队联办的1个(宝华公社),队办社管的2个,队办的18个。322个大队中,参加社队联办的15个,参加队办的307个。全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462356人,约占全县农业人口的95.95%。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年初按人预交1.5元—3元的医疗费,年终分配时按人代扣,从集体公益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一般与个人缴纳数同等,统一使用,年终决算。社员平时在卫生室就诊,经济条件好的队一般不再收取诊疗药费。大队卫生室无法救治的疾病,转至公社卫生院或县级医院治疗。

县管理合作医疗的组织机构先为县教育卫生系统革委会的卫生办公室,后改为文卫系统服务处。1971年1月卫生局恢复后,改由县卫生局管理。公社成立由公社干部、医务人员、贫下中农代表组成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大队成立由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赤脚医生、生产队卫生员代表组成的合作医疗管理小组,分别承担公社和大队合作医疗的管理职能。

赤脚医生的报酬,县里统一规定,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年终分配时由大队统筹发放。

县委、县革委会对合作医疗制度这一“新生事物”比较重视。1973年11月12日,县革委会下发《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意见》,要求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加强对公社医院的建设和领导。

1974年3月26日,县出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章程》,分

总则、组织领导、卫生组织、医疗基金、中西医结合、管理制度、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社队联办共 8 章,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规范。5 月 5 日至 10 日,县卫生局组织各公社医院负责人和赤脚医生代表,对全县合作医疗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至检查止,全县赤脚医生总数 661 人,平均每大队 2 名。1973 年合作医疗垮了 36 个大队,1974 年整顿恢复 25 个大队。全县有 116 个大队合作医疗办的较好;有 98 个大队筹足了 1974 年资金;有 203 个大队做到资金专款专用;有 50 个大队办起了土药房,开展了使用中草药的群众活动。7 月 24 日,县革委会下发通知,批转县卫生局《关于全县农村合作医疗情况和进一步做好整顿巩固工作的意见》,对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提出要求。1976 年 5 月 4 至 7 日,召开全县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201 人,列席代表 17 人,还邀请了句东农场、湾山煤矿等单位参加。县革委会和各有关科局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县委书记王云海作会议动员,宣传部长董曙晨传达省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代表大会精神并作工作报告,12 名代表在会上发言交流经验,会议还表彰了 29 个先进单位和 33 名先进个人,县委副书记宋敏在闭幕式上讲话。会议还向全县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赤脚医生、医药卫生工作者等方面同志发了倡议书,并对“句容县社队联办合作医疗管理章程”进行了讨论。

据统计,至 1976 年 8 月,全县合作医疗办的较好的大队 105 个,停办的大队 9 个;全县有赤脚医生 747 名,卫生人员 2849 人;种植中草药 256.9 亩。

合作医疗适应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方便农民医治疾病,因而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因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难免出现“一哄而上”、“一刀切”的现象。同时由于各级领导缺乏经验,医卫力量不足,资金管理比较混乱,超支过多。后通过整顿,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一些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了

解决。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与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一、加强战备工作

1969年,国际形势突变,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在中国北方边界陈兵百万,向中国进行新的战争威胁。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中共中央决定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8月27日,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的命令。9月9日,江苏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形成《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突出党的领导,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会议纪要。9月27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负责人会议,要求全区人民坚决响应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贯彻落实中央“八二八”命令,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备形势教育。

1969年8月29日,句容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下发《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要认清形势,准备打仗,切实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突出政治,狠抓根本,大力加强民兵的思想建设;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搞好民兵组织整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更大的胜利。9月5日,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的决议》,提出七条具体贯彻意见。9月15日至23日,县革委会召开由1000余人参加的贯彻落实中央“八二八”命令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文件,进行形势战备教育,对照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影响其贯彻执行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无政府主义,部署革命、生产、工作、战备任务。10月5日至20日,县革委会举办机关干部

落实党中央“八二八”命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摆和大揭机关内部违反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要求通过斗私批修,加强组织纪律,增强革命团结,提高战备观念,促进机关革命化。10月23日至31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卫生战线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当前要抓紧建立战备医疗队,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建立群众性献血网,对民兵、干部、医务人员普遍检验血型;医务人员要学会防化学、防细菌、防原子和外伤救护,并做好战备药品的储备”。

1970年1月17日,句容县民兵独立团建立。“民兵独立团”连队的建立已在1969年12月30日前后完成。2月16日至19日,县革委会召开系统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大队革委会领导成员共15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上进行了战备形势教育,要求全县各级领导成员学会用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形势,认清当前国内外形势,增强战备观念,坚持常备不懈;贯彻中央指示,开展对敌斗争。此后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还专门召开战备会议,要求“以临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把一切战备工作做到敌人前头,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用战争的观念检查战备工作,明确战备任务,落实战备措施”,“以战备为中心,带动其他工作”。会后,各公社、工厂、单位都对战备形势教育进行贯彻安排,广泛开展以“三视”(仇视、蔑视、鄙视)为中心的战备形势教育,举办以战备为主题的学习班和展览会,以增强敌情观念,树立常备不懈和敢打必胜的思想。县革委会还组织力量对工厂、学校、公社等各单位的战备教育情况逐个检查。

是年,县人武部还组织7个武装民兵连1300余人,参加县境内的国防工程施工,至1971年结束。

1971年3月,县委决定由兰挺、宋敏、奚华凤、金成义、阎发学、倪俊杰、潘廷斌七人组成战备工作领导小组,兰担任组长,宋

敏、奚华凤任副组长，下设办事机构，由县人武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日常工作，从组织上加强对全民备战工作领导。同月 11 日，县委批转县人武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备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公社党委(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做好战备工作。第一，必须坚持经常性的战备形势教育。第二，认真抓好通信保障，切实做好“四路”(铁路、公路、水路、线路)的维护工作。第三，加强重点目标的保卫，进一步做好联防工作。第四，严密控制空情、注视敌情，加强敌社情研究工作。第五，加强战备值班，随时准备对付各种情况。为了适应战备要求，县组成前线指挥所，由奚华凤、潘廷斌等 8 人组成。第六，从实战需要出发，认真搞好战备训练。3 月 31 日，县革委会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县内有关工厂国防、军工产品生产的领导，确保完成生产任务。11 月 11 日，成立“句容县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 5 人组成，兰挺任组长，奚华凤、阎发学任副组长，下设战备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革委会。此后，县革委会提出，为利于战时防空指挥，要构筑县委、县人武部永久性指挥所各 1 所；县工矿企事业和城镇单位，均应抓好必要的防空工事的构筑，其要达到五能(能打、能防、能疏散、能生产、能生活)、三防(防空、防原子、防化学)的要求，重要工厂、车间要以疏散为主或重点的亦可转入地下(进洞)。

1972 年至 1973 年，结合各种会议，进行形势战备教育 7 次。如 1973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县革委会召开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县委书记兰挺作《认清形势，加强战备，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形势报告。要求在大好形势下，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特别警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要进一步克服和平麻痹思想，随时准备打仗。全县除了 22 个民兵团、304 个民兵营、1 个独立团进行了整组外，还组织了 2.6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军事野营拉练，培训赤脚医生和战地救护员 500 多人，采制中草药 6 万多斤。

同时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结合农业学大寨,修建中小型水库和平战结合的渠道。为战备植树造林3万亩、四旁绿化500万株、新修战备公路42公里。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物资供给等战备后勤等有所准备,粮食储备大大增加。除国家储备粮858万斤、杂粮10万斤、大豆10万斤、食油5万斤外,生产队还储备粮3204万斤。期间,根据句容地处南京城郊、茅山地区重要战略位置,县委书记、副书记亲自到茅山、磨盘山、宝华山察看地形,制定了城防和反空袭、平暴乱、反空降等四条战备方案,各公社、单位也进行了全民性的战备动员和根据本地区特点制定了军政训练、地区联防、战备后勤和全面开展全民备战的措施。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战争全面爆发的迹象减少,全国高度紧张的战备工作开始有所和缓,句容县一些备战工作的措施落实逐渐中止。

这次备战工作,对县内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紧张的战备气氛和一系列战备措施,对于当时消除派性、抵制武斗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成为“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主要动因。同时,备战工作也对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的元旦讨论,提出要查清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精神,句容县革委会在全县开展“清理阶

级队伍”。4月25日，县革委会召开对敌斗争誓师大会，要求广泛发动群众，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混入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九种对象”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大会后，各公社都相继召开了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会，同时成立群众专政队伍，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到6月底，全县揪斗的所谓阶级敌人和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1747人。其中所谓的叛徒304人、特务280人、历史反革命28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69人、侵犯军婚的27人、投机倒把的230人、流氓阿飞66人、搞迷信活动的140人、赌棍210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16人、右倾翻案的18人。6月20至22日，县革委会召开由各公社、场圃、企事业单位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和群众专政组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交流和总结前阶段对“敌”斗争经验，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扩大专政队伍，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敌人”，“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句容的代理人蒋继奋之流的罪行，肃清其流毒”。6月27日，县革委会转发陈武公社革委会《关于在清理外来户中发现的阶级敌人情况汇报》。7月5日，转发磨盘公社革委会《关于当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要求各公社“加强对敌斗争领导，要去掉怕字，敢字当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年7月19日，县革委会转发《句容邮电局革委会关于当前对敌斗争的汇报》，要求“主动地、持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7月22日，县革委会又转发春城公社《认真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对“敌”斗争经验。8月18日至23日，县革委会又一次举办由各公社、基层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对敌斗争专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交流经验，斗批原句容县委书记蒋继奋。是年6月至9月底，县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在小裔庄部队营房，举办“斗、批、改”学习班，又有一

批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和残酷迫害。有关资料显示,至1968年年底,“全县揪斗各种类型阶级敌人7219人,其中叛徒402人,特务483人,自首变节分子336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0人,地、富、反、坏、右分子4483人,其他1475人”。至1969年7月22日,仅郭庄公社在清队中就揪斗717人,其中老五类分子410人,新揪出来的307人。对新揪斗的307人,初步确定为敌我矛盾的24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280人,还有的人要继续调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部委办局负责人也在“叛徒”、“特务”之列。

1969年至1970年初,县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以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动力,采取批转先进单位做法、办学习班等形式,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掀起“斗、批、改”高潮。

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但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理由。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岁月里,全县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社队都抽调人员组成“专案组”,举办学习班,很多干部和群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小爬虫”、“黑干将”、“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混进组织里的坏人”等帽子而遭到揪斗和隔离审查。有些还被“专政队”、“专政组”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是今天斗别人,明天被人斗。还有的人一夜之间就变成“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可见,敌我界限混淆到何等程度。后来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全县计有10156名干部和群众遭到批斗、“专政”。

三、“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

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自此,一场全国性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迅速展开。

根据中央和省、专区革委会部署,2月16至19日,句容县革委会召开有1500余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在进行战备形势教育的基础上,传达贯彻中央三个文件和省、专区革委会对贯彻这三个文件的指示与意见,动员和部署在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三级干部会议期间,还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有代表性的6个“活靶子”,组织了一场批判大会。会后,全县从上到下,从城镇到农村,层层条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党员干部会、广播动员会、宣判会、批判会(据统计:全县参加县、社二级三级干部会议的领导骨干就达20400人),运用各种工具,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的指示,以点带面,开展“四大”(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全县运动高潮迅速掀起。期间,县革委会抽调42名干部,组成8个蹲点小组,分赴工厂、商业部门和农村大队先行一步。各公社革委会的一、二把手48人,带领339名干部,搞54个点。许多大队也抓1—2个典型生产队。3月2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有5万多人参加的批斗宣判大会,其中枪毙的1名,判刑的6名,批判的7名,教育释放从宽处理2名。4至5日,县革委会召开经验交流会,总结点上经验,推动面上运动。

3月18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地猛烈地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3月22至26日,县革委会召开有系统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大队革委会领导成员共1100余人参加的全县“突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亲自批示的中央三个文件和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及有关阶级斗争论述;传达贯彻省、专区会议精神和首长的重要指示;

交流前一段各地开展运动情况和经验；研究进一步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的措施。会议期间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到会同志参加了县批斗宣判大会，参观了打倒新沙皇的图片展览。至3月底，全县揭发出反革命案件80起，破获新案36起，侦破新发生的反革命案件14起，挖出所谓反革命集团1个，挖出历史反革命分子45个，现行反革命376个。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31万元，粮食近12万斤，布票9800余尺。还揭出浪费金额近160万元。

5月7至11日，县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一打三反”运动继续进行要求。9日上午，参加会议的1500余人又开了批判大会。22—24日，县革委会召开政法会议，传达专区办（定）案会议精神，要求深入开展运动，提高办案质量，搞好定案定性和经济退赔工作，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是年上半年，全县仅教育系统就揭出所谓重大问题32865条，其中涂写反动标语195起，长期收听敌台的46人，同时也揭发出大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犯罪事实。各地中小学开辟大批判专栏1518个，共3384期，写大批判文章12570篇，召开批斗会3896次，参加大批判会的达46万人次。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许多公社革委会又组织了30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农村、集镇企事业、场圃等38个“老大难”单位，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亭子、行香2个公社根据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组织了11个宣传队，进驻农村大队，把“一打三反”运动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在一起。10月6日和12月24日，县革委会两次召开全县政法会议。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作《抓住今冬明春有利时机，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讲话，部署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至年底，全县共破案件588起，其中积案309起，新发案279起；各种政治与刑事大要案23起。揭发出反革命集团线索5个，涉案的反革命分子46人，现行反革命221人。期间还多次召开公判大会，根据党的政策，从重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61万多元，

粮 40 多万斤,布票 2 万余尺(以后定案没有这么多)。

1971 年元旦前后,全县各公社又组织了 108 个宣传队,共 1502 人,进驻 95 个农村大队和 21 个企事业单位,有计划有重点地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又挖出叛徒 3 人,特务 10 人,历史反革命和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 50 人,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 53 人,其他犯罪分子 66 人,破大小案件 790 起,缴获枪 1 支,子弹 514 发。

1971 年 1 月 12 日,县革委会主任兰挺在全县政法会议上作“关于继续抓紧、深入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的讲话,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对今冬明春运动提出要求。9 月,县政法会议后,全县又集训和组织了一批宣传队,新进驻 38 个农村大队和 14 个企事业单位。至 1972 年 11 月,县、社宣传队共进驻了 222 个农村大队和 152 个企事业单位。1972 年下半年开始遵照毛泽东关于“对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的教导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进行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定案政策复查工作。12 月 7 日至 1973 年 1 月 26 日,县革委会抽调县有关组局和各公社、厂矿主持政法工作的 75 名同志组成小分队,历时 50 余天,对大卓公社的 9 个农村大队和 6 个集镇单位进行了清队、“一打三反”定案政策复查试点,以后在全县推开。

据统计,1970 年 2 月至 1973 年 4 月,全县“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共揭出所谓有政治问题 725 人,其中叛徒 7 人,特务 12 人,历史反革命 112 人,现行反革命 305 人,其他 289 人。作敌我矛盾处理的 116 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455 人,尚未处理 154 人。破积案 512 件,占原积案 714 件的 71.7%;破运动以来案件 655 件,占运动以来发案 755 件的 86.76%;缴获枪 3 支,子弹 1421 发。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方面,揭发出现金 76.21 万元(已退 39.99 万元),粮食 44.16 万斤(已退 14.09 万斤),布票 1.43 万尺(已退 0.85 万尺)。在铺张浪费方面,揭发出浪费金额 72.10 万

元,其中基建方面 18.11 万元,生产方面 33.88 万元,生活方面 9.64 万元,其他方面 10.47 万元。

“一打三反”运动,虽然打击了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刹住了贪污盗窃、铺张浪费之风,但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群众因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意见,或不慎污损了毛泽东画像,或反对林彪、江青集团,或说错话喊错口号,或背诵毛泽东语录有误,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些群众因小偷小摸、占小便宜,被扣上“贪污盗窃”帽子;有的群众因搞长途运输,经营小宗商品,被视为投机倒把。“一打三反”运动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许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甚至被判刑坐牢或被迫自杀身亡。

四、深挖“五一六”运动

1970年,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深挖“五一六”的运动。所谓“五一六”是指一度存在的名为首都“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在1967年8月间秘密活动,散布污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大字报,但并不存在一个遍及全国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林彪、江青集团借机大做文章,煽动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在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时,重点应该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1970年4月,江苏全省由点到面地开展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清查过程中,逐步升级,并改“清查”为“深挖”。

1971年1月11日至12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市革委会主任会议,传达省革委会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同时下发了《关于当前全区“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和意见》。

1月15日,句容成立由21人组成的深挖“五一六”的专门机构“第二运动办公室”(简称“二办”,设在县公检法内,专案的工作地点为原县防疫站、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城镇派出所),全面清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1971年1月7日,县委在县体育馆召开“进一步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大会”,各级、各系统、各单位领导和骨干以及城镇群众2000余人参加大会,县委书记兰挺作动员报告。会后,由点到面,深挖“五一六”运动在全县展开。2月7日,县革委会组织工人、解放军等48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句容县中学校搞点。2月10日下午,县委再次召开动员大会,干部、工人和城镇居民共5000多人参加。县委书记兰挺作动员报告,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高潮。至此,县级机关各部门、各公社、厂矿企业和文教系统,相继成立深挖“五一六”领导小组,以及总部和小分队,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五一六分子群众运动的高潮,重点排查1967年造反组织的骨干人员。1月1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关于“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运动的有关政策。全县各单位纷纷对“重点对象”办专题学习班。4月29日,县革委会在县体育馆召开“批斗‘五一六’分子和‘五一六’分子坦白交待落实政策大会,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校师生和城镇居民共400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批斗了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参谋、黑干将;4名“五一六”主要骨干分子、骨干分子在会上现身说法,交待参加“五一六”的经过和其“三指一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县公检法军管会分别宣布给予4名“五一六”分子免于处理、2名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名依法拘留的决定。此后,深挖“五一六”运动进一步掀起了高潮。至5月底,全县办重点专题学习班67个,审查重点对象81人(其中经地区“二办”批准的13人,县“二办”批准的45

人,同意单位列为重点帮助的18人,还有主动投案的5人),突破“五一六”分子44人。开“五一六”分子坦白认罪、落实“坦白从宽”政策大会3次(3月23日、4月3日、4月29日),处理15人(其中不作“五一六”分子看待的6人,免于处理4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2人,定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1人,戴上帽子的1人,依法拘捕的1人),还有一批“五一六”的一般成员,问题已基本弄清,准备把他们放到原单位去边工作,边继续揭发交待,观其表现,听候处理。

1971年6月至1972年5月,全县深挖“五一六”运动调整部署,采取加强领导分线作战方法。县“二办”下设办公室、材料组、指导运动组、战斗组。除指导运动外,重点抓主要骨干学习班,中层骨干放到条线去办。全县分五条线,即工交(工业、交通、粮食、物资、水机电等,以工业为主)、商业(商业、财政,以商业为主)、机关(县级机关、县五七干校,以机关为主)、教育卫生(教育、卫生等,以教育为主)、城镇(城镇公社)。每个条线成立运动领导小组,组织专业队伍。据统计,全县抽调领导骨干力量参加运动的总人数319人,其中“二办”49人,各条运动领导小组成员32人,办事人员34人,小分队204人。这期间,召开了两次专案会议。第一次是1971年8月31日至9月8日,时间10天。主要是贯彻省政法组召开的地、市清查“五一六”座谈会议精神,确定了“抓罪行、抓骨干、抓重点单位”。并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加强请示汇报制度;办学习班要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以下不办学习班;不搞点名批判,不搞重点帮助等。第二次是12月18日至21日,时间4天,着重突出抓重点。12月25日,县委公布了六起重大事件即句发(1971)226号《关于公布“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我县犯下的六起重大反革命事件罪行的通知》(所谓六起反革命事件罪行是:对抗中央指示冲砸机要部门,抢劫机密档案,制造“六三〇”事件;大造反军舆论、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杀伤解放军指战员;

为积极配合南京、镇江“五一六”建立反革命基地的需要制造“八一二”反革命事件；炮制“黑认识”，拼凑黑班底，阴谋篡权；另立山头，分裂革命委员会，妄图搞垮红色政权；组织发展“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并进行清理。

1972年6月至1973年10月，根据省、地区政法会议精神，全县深挖“五一六”运动缩短战线，强调进一步突出重点。6月，撤销了条线运动办公室。这期间又召开2次专案会议。第一次是5月26日至6月2日，时间8天，贯彻省第六次政法会议和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座谈会议精神，解除一般人员的学习班，重点搞“三种人”（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第二次会议是1973年3月8日至9日，时间2天。主要传达学习毛泽东对清查“五一六”的批文，即“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发现得早，头子关起来了，面不要太宽，批判还是要批判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会议还贯彻了1972年冬省、地区政法会议精神。

1973年10月16至17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五次专案会议，贯彻地区定案会议精神，对定性不当、处理过严的进行复查。

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县被隔离审查对象达376人，其中定案处理269人，自杀3人。在这批人中，有地管以上干部7人，县革委会委员15人，公社革委会委员1人，厂矿革委会委员22人，大队革委会委员2人，单位革命领导小组成员2人；党员74人，团员32人。另外，全县各单位还有一些以举办走读学习班等不同形式而被审查的对象，未作具体统计。以上人员中，有的是造反派头头，有的是历史上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大多数是一些被无辜“牵连”的一般群众。这些人被审查的时间少则几十天，多达两年之久。后来经甄别，当时清查出来的所谓“五一六”分子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罪名均为“莫须有”；把“文化大革命”中因派性而导致的、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定为“六起重大反革命罪

行”也完全是错误的。

句容县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斗争的扩大化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大批人蒙冤受屈,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运动不仅伤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后果极为严重。

第四节 党组织的整顿与中共句容县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日夜,县革委会在城镇召开了3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附近的城东、石狮、大卓等公社的群众和南京师范学院分部的1000多名师生也赶到县城参加会议。2日,全县21个公社都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14日晚,党的九大第二个新闻公报发表,县革委会连夜在城镇组织了3万多人的集会游行,第2天又继续冒雨庆祝游行;全县各公社分别在当夜或第二天上午组织万人集会游行,庆祝九大召开。

5月9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大会,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要求立即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高潮;按照中央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认清形势,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5月21日至24日,县革委会召开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公社、厂矿、场圃革命委员会委员、公社“三代会”(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专区和县“五七”干校的干部,县属各单位行政管理干部以及城镇公社所属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共2382人。会议学习九大政治报告,并由镇江出席九大的代表浦风根到会传达九大盛况和毛泽东在九大开幕时和九届一中全会上作的两次重要讲话。会

后,各基层革委会都相继举办贯彻九大精神学习班,掀起传达、学习、贯彻九大精神的热潮。全县按照九大决议,认真搞好“斗、批、改”,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风、精简机构、干部下放”等工作。

事实说明,党的九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集中体现;九大制定的各项任务,都是不符合当时党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错误的。

二、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1967年初造反派夺权后,全县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也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是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要求各地在整党中,“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并且“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1968年7月17日,江苏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通知》,要求把“整党建党”同“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整党”。是年8月5日,镇江专区革委会下发《关于当前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革委会在整党建党工作中要认真学习 and 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认真学习上海市“整党建党”的先进经验,由点到面地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9月4日,句容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初步意

见》，要求整党建党必须从思想整顿入手，经过组织整顿，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方法；要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0月，全县21个农村人民公社，已有20个公社进行整党建党试点工作。12月26日，县革委会转发郭庄公社百丈大队整党建党情况报告。1969年2月，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此后，全县各公社相继成立党的核心小组。

在整党建党中，全县各级党组织根据县革委会核心小组要求，一是突出思想整顿，认真组织学习新党章和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组织开展“三忆、三比、三查”活动（即“忆旧社会无权之苦，比新社会有权之甜，查继续革命思想；忆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之苦，比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甜，查对毛主席的态度；忆党对自己的培养，比自己对党的贡献，查革命干劲”）。二是实行开门整党，即由全体党员、革委会成员、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及党外积极分子对党支部工作和支部领导成员进行评论，由党员和党外群众，对普通党员进行评论。支部领导和党员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制定改进措施。三是搞好组织整顿，做好“吐故纳新”工作。在整党建党工作中，各级党组织还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积极筹建新的基层党委、党支部。至1970年5月，全县原有491个党支部，已有489个通过整顿建立了党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还有运输公司和城镇合作商业两个支部尚未结束。通过整党，开除、清洗出党22人（其中定为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清洗出党的1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出党的3人，定为坏分子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开除出党的6人），因刑事犯罪取消预备期的3人，59人未定性处理（其中所谓的叛徒7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44人，历史反革命4人，现行反革命4人）。

党的九大以后，按照上级部署，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学习新党章的意见。是年4至5月，县革委会举办2期由公社

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大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参加的新党章学习班。截至1970年上半年,全县县社二级办新党章学习班62期,参加学习的有35026人次。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织力量在城东公社西庙大队搞试点,发展了4名新党员。全县“四清”运动中发展的3200多名新党员,至1970年9月,有3010名办了转正手续。

1970年5月17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座谈会议精神的意见》,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必须首先学好中央会议精神,立即在全党开展大动员、大宣传、大学习的运动;认真抓好典型,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党支部和新党委的建立工作,并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5月21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座谈会精神的意见》,要求各县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分析,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找出差距,研究措施。5月28日至6月1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办有公社和县属单位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以及各系统革委会负责同志等37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学习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五二〇”庄严声明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改造世界观》,学习新党章,根据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意见,分析全县整党建党工作情况和基层组织状况,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强调: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支部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好的和比较好的支部要进一步巩固提高,总结他们的经验;比较差的需要补课和重新整顿的,各地要认真进行一次摸底排队,作出打算,报县备案。凡是需要补课的要争取在六月份秋季大忙之前,用3、5、7天的时间,集中地有领导地有组织地进行一次整顿补课。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在大卓公社进行整党组织处理试点的同时,还在天王公社抓了对整党较差党支部的补课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8月26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进一步搞好全县整

党建党工作计划》，提出在 10 月中旬，基本把基层党委建立起来，为在 10 月份建立新县委创造条件。

这次整党建党工作，对恢复各级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恢复党员的正常组织生活，稳定局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整党建党”工作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有的老党员、老干部以“吐故”的名义被清除出党，一部分打砸抢分子以“纳新”的名义被吸收入党，使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党的建设受到影响。

三、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69 年 2 月，经中共镇江专区党的核心小组同意，成立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杜孟祥，副组长邱学臣。

1970 年 8 月下旬，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着手筹备召开县党代会、建立新县委的工作。8 月 26 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省、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了句容县《关于进一步搞好全县整党建党工作计划》；9 月 22 日，又向省、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上报《关于召开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建立新县委的请示报告》。11 月 22 日至 28 日，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 822 人（实到 813 人），其中军队代表 22 人，革命干部代表 133 人，工人代表 74 人，贫下中农代表 559 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和其他劳动者代表 34 人。在代表总数中，妇女代表 162 人，占 20%。会上，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兰挺作《高举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根据中共九大精神，大会提出了四项任务：一是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是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三是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四是继续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会由 45 人组成，其中正式委员 41 人，候补委员 4 人。第四届县委委员中，军队委员 5 人，

革命干部委员 25 人,革命群众委员 15 人;妇女委员 8 人。党代会结束后,召开了中共句容县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正副书记和常委。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兰挺、阎发学、宋敏、金成义、杨诚、赵志农、奚华凤、曹扣珍(女)、谭桂林 9 人为中共句容县委常委;兰挺任县委书记,宋敏、奚华凤任副书记。

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九大错误路线指导下召开的。会议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极左做法,贯彻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方针。但此次大会的召开产生了新的县委,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句容经济发展和稳定句容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恢复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各级党组织相继停止活动,进而全面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1968 年县、社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党组织并未立即恢复活动,党的建设也未能走上正轨。1968 年 9 月份开始,根据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以及省革委会《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通知》精神,句容县着手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和重建工作。

1970 年 1 月,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织由 5 人组成“三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卓公社进行建立新党委试点。是月,中共大卓公社委员会成立。同年 2 月,行香、黄梅公社进行筹建新党委工作,并于 6 月成立新党委。接着,县抽调部分干部和省、专区“五七”干校 15 名同志以及当地驻军组成 46 人宣传队,分别到各单位帮助建立新党委工作,每个公社去 5 至 6 人。至 1970 年 11 月,下蜀、宝华、天王、城镇、城东、东昌、陈武、亭子、后白、二圣、袁巷、石狮、三岔、葛村 14 个公社和铜山钼铜矿相继成立了新党委。11 月 22 日至 28 日,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了新县委。此后,茅山、磨盘、春城、郭庄、白兔 5 个公社和矿

山指挥部也先后成立了新党委。至 1971 年 8 月,全县 22 个公社和铜山钼铜矿、矿山指挥部全部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会。各级基层单位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党总支)。

全县各级党组织的重新建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句容长期没有地方党组织的不正常局面,为加强党的领导、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运动与抵制 极左思潮的努力

为了批判陈伯达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和林彪叛国罪行，根据中央和省、地委部署，句容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此后，全县批判和抵制极左思潮，调整党政机构，落实干部政策，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群众团体的活动，平反所谓“五一六”分子，使得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全县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受挫，生产和工作秩序再次受到影响。

第一节 “批陈整风”与“批林整风”

一、“批陈整风”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林彪、陈伯达破坏原定议程，搞“突然袭击”，提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妄图实现其抢班夺权的野心。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8月31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毛泽东在文中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针对一些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在这场斗争中受骗上当的情况，11月6日，中共中央发

出通知,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1年春,中共中央又就陈伯达问题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5月19日,句容县委和人武部党委按照省、地委关于“批陈整风”的部署,制定《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计划》,部署在全县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根据计划,全县分三批进行。第一批5月26日至6月13日(其中因突击抢收暂停3天),参加县委全委、县人武党委(扩大)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各组党员组长、各局党员局长、公社书记,厂、矿、中学党支部书记,县人武部党委委员,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军内外的党员干部,共88人。第二批,6月29日至7月12日,参加这期学习班的有县革委会副组长、局长,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及县直属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共79人。第三批10月7日举办,参加学习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县机关、县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干部,厂矿、场圃、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共871人。学习班计划办10天,后因贯彻中央5个重要文件精神,提前3天于10月13日结束。三批参加学习班的对象共1038人。每批“批陈整风学习班”各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批陈,第二阶段整风。在批陈阶段,首先组织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他关于批陈方面的重要批文以及中央有关重要文件,传达关于陈伯达的第一、二批罪行材料。然后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重点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及其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整风阶段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和时局》、《整顿党的作风》和中央〔1973〕3号文件,为开门整风打下思想基础。第二步,在批陈(伯达)的基础上,联系自己整风,反骄破满,肃清陈伯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同时进行开门整风,发动群众对县委和人武部党委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第三步,制定整改措施,

研究和部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事项。

8月16日至19日,县委召开县委常委“批陈整风”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文章,认真讨论前两批“批陈整风”学习班对县委、县革委会所提的有关领导作风、政治工作、体制与政策、工农业生产、教育卫生等五个方面共482条意见,同时常委们各自联系思想实际,进行“斗私批修”,互相交心通气。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研究了县委常委思想革命化方面的措施。在此期间,响应毛主席多读点马列著作的号召,从县委到基层,普遍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原著,即读书活动。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县委和人武部党委一起批陈(伯达),分开整风。全县“批陈整风”运动于10月中旬结束。

二、“批林整风”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以后,乘飞机外逃叛国,在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因飞机坠毁被摔死。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接连发了几个通知。1971年10月16日至18日,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1188人出席),传达中央〔1971〕65、57、61、62、64号文件。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揭露林彪叛党叛国阴谋。10月30日至31日,县委召开各组负责人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集团的7个重要文件,对扩大传达林彪叛党叛国文件范围作具体部署,并进行分工。全县各公社、各单位培训骨干52人。11月1日和2日,在全县传达了中央68号文件,有282049人听了传达,占全县应听传达人数292873人的96.3%,其中补课的22875人。整个过程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反复宣讲,组织讨论,吃透文件精神;第二步,列罪状,剥画皮,议危害,忆苦思甜,肃清流毒;第三步,畅谈体会,吸

取教训,总结提高。是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开始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根据上级关于“批林整风”的意见,句容县委把传达中央文件,深入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列为当前的首要任务。12月18日,县委召开县委委员、公社书记、各大组组长、各局局长和县属厂矿、场圃负责人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77号文件。19日、20日两天,在培训骨干的基础上,将文件贯彻到群众。县委要求,在传达中央77号文件中,要狠抓两个结合:一是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二是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即“一抓三促”)结合起来。要掀起大学习、大批判的新高潮,掀起“一抓三促”新高潮。

1972年1月11日至2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全体委员,各组、局党员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属厂矿、场圃党支部书记,共452人。会议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深入“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在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入揭发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揭发批判他们所鼓吹的“黑四论”。在学习批判的基础上,县委进行开门整风。发动与会同志向县委提意见。县委对所提意见进行分析讨论,各自斗私批修、反骄破满,进行自我革命;并采取措施,狠抓整改落实。第二步,县委作工作报告,总结1971年工作,部署1972年的任务。大会结束以后,各公社分别召开党委会和支部会,传达大会精神,组织学习中央77号文件,研究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步骤和方法,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派骨干宣讲中央文件、组织开展大批判。2月3日至6日,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4号文件和批判地讲解了文件附件,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

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县委委员、县机关的四大组长、各局局长，县属厂矿、场圃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人武部和一名有宣讲能力的公社干部，共 125 人参加会议，县级机关、县人武部和出席县教育卫生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共 300 多人，也参加听取文件，组织讨论。2 月 7 日起，各公社以 4 天左右时间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为向群众宣讲贯彻中央 4 号文件培训骨干，全县参加会议的共 12212 人。县委还抽调 44 名干部、公社组织 450 多名干部，深入大队、生产队帮助贯彻文件。至 22 日，中央 4 号文件贯彻到基层群众，全县有 269000 万多人听了传达。

同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大队三级主要负责同志，和县属厂矿、场圃、水库、财政、粮食、商业系统的基层领导，共 588 人；县革委会机关干部 350 多人一起参加听报告，分别组织讨论。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传达宣讲中央 12 号文件，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全国、省计划会议精神，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革命《“571”工程纪要》，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清路线，清除流毒。第二段，县委作工作报告。大会联系句容实际情况，研究落实 1972 年全县工农业生产计划任务和措施。根据当时春耕大忙特点，各公社在县三级干部会后，首先用 2 至 3 天时间狠抓了当前生产；接着以大队为单位，由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向中央 3 号文件规定的对象传达中央 12 号文件。各公社普遍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公社党委组织力量分头下去帮助。如城东公社抽调 52 人，每个传达点有 2 人。第二，各大队都召开了党的支委会、党员会，层层培训和扩大了骨干队伍。第三，公社先抓一个点进行试讲，帮助传达文件的同志备好课。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准备充分，群众发动较好，因而使中央 12 号文件在 4 月 9 日就传达到群众，全县批林整风出现了新高潮。据磨盘、天王、城东、亭子 4 个公社统计，应

听传达 48640 人,实际听传达的 44475 人,占应听人数的 91.4%。

7 月 16 日至 30 日,省委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在批林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公社以上领导干部整风。8 月 5 日,镇江地委召开区县(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为贯彻省和地委会议精神,8 月上旬,县委成立了批林整风办公室。8 月 13 日至 23 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参加的有 975 人,会议分 4 段进行。第一段,动员。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省委干部会议精神,明确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重大意义和目的要求,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第二段,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和有关“批林整风”的文件。第三段,宣讲中央 24 号、25 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历史罪行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第四段,学习有关整风文件,座谈体会,部署当前工作。县委还对贯彻这次会议的时间、步骤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全县从 9 月 5 日开始普遍贯彻,到 15 日告一段落。而后县社两级党委开展整风。县委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切实抓紧、抓好、抓到底,要把“批林整风”和生产、工作统一安排,达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两高涨。9 月 1 至 5 日,全县共训练学习中央关于批林文件宣讲骨干 18245 名,县委以缫丝厂和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作为工厂和农村开展运动的试点,先行一步。各公社在 8 月底也都进行了试点。按上级要求,批林整风,重点在批林,整风只在县、社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

1972 年 9 月 18 日,县委出台《关于县、社两级开展整风的计划》。20 日至 24 日、10 月 7 日至 8 日,县委两次召开常委会议,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总结检查近两年来的工作,围绕方向、路线和作风方面的问题,互相交心通气,各自自我解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此同时,县委发动县级机关提意见,帮助常委整风。接着召开了各组局负责人参加的整风汇报会,听取全体机关干部的意见,在统一思想、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

上,10月9至13日,召开了有公社党委书记、县机关组局和县属厂矿、场圃负责人参加的县委全委扩大会议。会议首先学习整风文件,接着县委向大会作整风检查,到会人员和县机关干部向县委领导提意见。据统计,县委扩大会议提意见154条,县机关干部帮助县委整风提意见165条。在此基础上,县委研究了整改措施,部署了当前工作。会议还专门对县委某常委严重违反党的政策、腐化堕落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县委常委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成立30人的工作队,由常委和组局长带领,奔赴各地帮助公社党委整风。

按照县委部署,10月15至20日,各公社党委普遍开展了整风,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召开党委扩大会,听取各大队党支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批评意见。

1973年,县委把“批林整风”与“批陈整风”结合起来,作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内容。1974年2月,“批林整风”转为“批林批孔”。

句容的“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认清林陈反革命集团的真实面目,揭露其罪恶行径,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很多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本身产生了疑虑。当然,在不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批林批陈”只是不得要领的形式主义。

第二节 纠正极左错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197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列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反对极左思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利导,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展

开对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工作的调整和整顿。中共句容县委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落实干部政策,整顿经济秩序,开始纠正极左错误。

一、调整党政领导机构和落实干部政策

调整党政领导机构。1968年3月28日,句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一元化领导,替代县委、县人委职能,并大力精简机构。全县各公社和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1969年5月,县革委会增设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联合等革委会,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及商业、农业、工交、财税、教卫、水机电等7个系统革委会;撤销邮电局革委会,设立邮政局革委会和电信局。

1970年11月,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县委,县委工作机构与县革委会工作机构合二为一,县革委会主任由县委书记兼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1971年1月,撤销7个系统革委会,设立劳动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水电局、物资局、体育局、气象站、农林局(同年11月划分为农业局和林业局)、商业局、工业局、财政局、粮食局、交通局等工作机构。1972年5月,恢复县级机关党委。1973年10月,撤销县革委会政法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复设公安局、人民法院等工作机构。1975年6月,撤销县革委会政工组,设立中共句容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革委会办事组改为中共句容县委办公室、县革委会办公室。9月,撤销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增设工商行政管理局、人事局、文化局、农业机械管理局、矿业局、社队企业管理局、畜牧肥料办公室(同年11月改为局)、沼气办公室,复设计划委员会,撤销体育局,设体育运动委员会。1976年,增设工交办公室、农水办公室、地震办公室、广播事业局等,水电局改为水利局。

落实干部政策。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针对大批老干部长

期受到迫害,不能工作的情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把握机会,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当时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阐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据此,全国各地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句容的老干部多数被打倒。县和公社、部门革委会成立时,一部分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但大多数干部被隔离审查,或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县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并对干部进行调查、考察、甄别,分期分批安排工作。至1969年4月24日,县委委员、副县长14人,已解放结合的4人,已解放未结合的4人,打倒的6人;县委正副部长、人委正科局长37人,已解放结合的9人,已解放未结合的19人,打倒的5人,正在审查的4人;县人委副科局长24人,已解放结合的6人,已解放未结合15人,打倒的1人,正在审查的2人;县所属企事业(包括工厂、场圃、学校)单位主要领导22人,已解放结合的9人,已解放未结合的3人,正在审查10人;公社党委正副书记、正社长66人,已解放结合的44人,已解放未结合的15人,正在审查7人。全县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共163人,已解放结合的72人,已解放未结合的56人,打倒的12人,正在审查的23人。是年年底,全县科局长以上干部已解放89%,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占解放干部总数的57.2%。1972年开始,遵照中央和省、地委指示,句容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步伐。至7月19日,对921名下放干部进行了全面了解,为逐步分配使用打下基础。省委管干部5人已结合使用4人;地委管干部121人,

除在干校学习、到外地工作、下放劳动、病退休 20 人,在清队中自杀 1 人,正在审查 5 人外,其余 95 人,都已结合使用。在县“五七”干校的县管干部,已分配工作 35 人。

1972 年 8 月始,随着党政领导机构的调整及中共中央 12 号文件贯彻,句容加快了干部政策的落实,各级干部陆续得以任用,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这对句容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整顿经济秩序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全国大多数企业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管理混乱,纪律废弛。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批判了曾一度肆虐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中央于 1971 年 12 月至 1972 年 2 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上,周恩来首次提出整顿任务,并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批判。在对工业战线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1971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否定了在农业方面一些“左”的错误做法。

1972 年,句容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地委的部署,组织开展了经济领域的纠“左”整顿。是年年初,县委将化肥厂作为企业整顿试点单位。县化肥厂原来是个“老大难”单位,无政府主义比较严重,企业管理混乱,责任制度不健全,生产一直上不去,产量低、煤耗高、电耗高、成本高(简称“一低三高”),长期亏损,是全县闻名的“一低三高”后进单位。县委组织有关人员进驻该厂后,依靠和发动群众,狠批林彪、陈伯达一伙鼓吹的“制度无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排问题、查原因,从建立规章制度入手,狠抓企业管理,使厂里面貌很快发生变化。化肥月产量超千吨,1—3 月比上年同期增长 58%,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 23%,企业开始转亏为盈。

县委及时把化肥厂企业管理试点经验,向全县工交、财贸单位推广。5月7日至11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交、财贸计划工作会议,工厂、矿山、交通、财政、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单位班组以上干部共350多人出席。会议传达省、地计划会议精神,贯彻镇江地区革委会《关于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建管理的意见》,并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重点批判林彪鼓吹的“制度无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反动谬论及无政府主义。会后,工业、商业、物资、矿山各条口先后组织蹲点小组,进驻天王农具厂、天王国营商店、城郊粮油站、东风砖瓦厂、磁山头铁矿等单位,贯彻会议精神,帮助落实计划,开展企业整顿。此后,县委又下发《关于整顿和加强工厂企业管理的意见(草案)》,要求各工厂企业把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作为经济战线的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抓好。按照县委和县革委会的部署,在句容化肥厂等单位的带动下,全县各工厂、企业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在这项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一)深入批修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二)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三)狠反无政府主义,纠正不正之风;(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五)清仓查库,清产核资。通过对企业的整顿和加强管理,全县工业产量和质量有了提高。1972年,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3389万元,比上年增长29.10%,比1966年增加137.49%。1973年,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4427元,比上年增长30.6%。

在农业战线上,1970年中央北方农业会议后,特别是197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下达后,句容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加强了人民公社的管理工作,全县各地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批判了林彪一伙在经营管理上推行的平均主义和假共产主义,建立健全劳动组织,改进劳动管理。与此同时,对在社队企业工作的人员实行“劳动在厂、收入归队、评工记分、合理补贴,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制度,

使务工社员在等量劳动时间的收入与务农社员大体平衡,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1973年,全县完成农业总产值13190万元,比1971年增长5.19%;粮食产量在面积减少1.53万亩(扩种棉花)情况下,仍达24.32万吨;棉花660吨,是1971年的15.71倍;油料3371吨,比1971年增长31.53%。

三、群众团体组织的恢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句容县的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均受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大多被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7月至1973年6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对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进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恢复活动。句容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地委部署,先后召开青、工、妇、贫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恢复各群众团体的活动。

1971年,各基层团组织开始恢复。是年4月25日,城东公社新团委成立;6月9日,行香公社新团委成立,截至11月,24个基层新团委全部成立,共有团支部433个,团员18734人。1973年3月18至22日,召开共青团句容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807人。会议听取了团县委负责人在会上作的题为《以路线为纲,生气蓬勃地开展共青团工作》的报告,选举产生了由31人组成的共青团句容县第七届委员会。经随后召开的团县委七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团县委常委11名、书记1名、副书记2名。会议还选举了出席镇江地区团代会代表57名。

1973年5月,县总工会组织恢复。8月,建立健全了57个基层工会,恢复和发展会员(籍)4392人。是月21至23日,句容县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36人,列席4人。会议听取了县工会负责人在会上作题为《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句容县总

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县总工会四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9名常务委员、主任1名、副主任2名。

1973年9月26日至29日,句容县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795人。会议听取了县妇联负责人在会上作题为《全县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3人组成的县妇联第七届妇女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县妇联执委会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9名常务委员、主任1名、副主任1名。在此前后,全县各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均建立了妇女组织,配备了专(兼)职妇女干部,负责妇女工作。

1974年3月29日至4月4日,句容县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到会正式代表734人,列席470人,特邀7人。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5名委员组成的句容县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选举产生常委13人、主任1名、副主任3名。此后,根据县委有关整顿、建立贫协组织的要求,各公社、大队、生产队相继建立了贫协组织。县第二届贫协成立后,发动贫下中农参加“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配合有关部门实行“四管一教育”(管理财务、学校、医院、商店和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句容县贫下中农协会继续开展工作,直到1983年1月进行机构改革时停止活动。

这一时期先后召开的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召开的,贯彻的是“左”的路线和方针。但是,已经瘫痪多年的群众团体毕竟通过召开代表大会初步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这对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平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1970年至1973年,句容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制造了大量

冤假错案,对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

1974年8月31日,中共江苏省委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意见》对审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遗留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凡不是“五一六”的,应宣布排除;原结论不当的,予以纠正;凡错定为“五一六”的,予以平反。《意见》还对一些善后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镇江地委召开各县(市)委书记会议,对省委文件精神进行贯彻、部署。镇江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结合全区实际情况,要求各地认真做好“五一六”问题的书面平反结论及材料的处理。

早在1974年4月上旬,句容县委就对清查“五一六”工作进行了调查。4月18日,在县委召开的两委扩大会上,县委书记徐界清宣布了县委常委讨论的4条意见,对句容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所犯错误承担了责任。

9月18至20日,句容县委召开四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文件,传达省、地委有关会议精神,会上,县委书记徐界清对省委《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地委对此项工作的要求进行贯彻和部署。10月23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句容的清查工作作进一步调查。12月2至5日,县委召开公社、机关组局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和省、地委会议精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认真落实清理“五一六”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政策,提出“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落实好党的政策,对在清查‘五一六’工作中被清查和触及的所有同志给予平反”。12月9日,县委成立由马文钦、顾尔钥为正副组长共5人组成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17日,又增补8名同志为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对句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和政策落实工作。县委要求“各个单位、各个有关公

社也要相应地组织一个小班子,由副书记或副主任抓这项工作”。此后,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以句容县中学为试点,先行一步,推动面上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句容县中学有教职工 83 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 24 人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审查,有 22 人被错定为“五一六”分子,审查面约占 30%)。

1975 年 1 月 11 日至 7 月 25 日,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先后发出书面《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平反决定和批复》168 份,为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各种形式审查和错定为“五一六”的 407 人平反恢复名誉,对自杀身亡的人员除了予以平反外,还按政策规定发给抚恤金。9 月 30 日,县委又以句发〔1975〕153 号文,撤销原错定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句容犯下的六起重大反革命罪行事件。至此,全县被错定为“五一六”分子的人员全部平反,落实政策。

五、落实党的统战、文化、教育、卫生、体育领域政策

1969 年至 1973 年,句容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同时,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在其他领域开展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艰难工作,使这些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统战领域。1971 年 9 月九一三事件以后,句容县开始落实党的统战政策,陆续退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抄家的统战对象和无辜家庭的被抄物品。

文化领域。1969 年 12 月,组建了句容京剧团,有演职员 32 人。1971 年秋,恢复县文化馆建制。文化馆开办了图书室,开始添置图书,为重建图书馆作准备。1972 年 11 月,县京剧团招收学徒 45 人,建立“小京班”,演职员达 104 人。同年,天王、葛村、东昌、行香、黄梅、下蜀 6 个公社文化站恢复活动。全县多数公社都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全县年放映电影近万场,观众达 158 万人次,放映收入 81 万余元(至 1977 年,全县共有放映单位 36 家,工作人

员 102 人)。人民电影院也于同年 10 月 1 日建成。

教育领域。1972 年起,全县中小学统一使用省编教材,注重文化课的教学,提倡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开展了教学教研活动,恢复了考试制度。

卫生领域。县人民医院在恢复建制的基础上,于 1972 年 11 月新建了门诊楼,添置医疗设备。1970 年至 1973 年,全县有公社卫生院 22 个,办大队合作医疗保健站(卫生室)344 个,城镇和有血吸虫病的疫区公社兴建了无害化公共厕所,以灭蚊、灭蝇、灭鼠为主的除“四害”和血防、妇幼保健工作均取得新成绩。1971 年至 1974 年,全县每年组织妇女病普查,查出病人 6 万多人,治疗率在 90% 以上。

体育领域。1970 年至 1972 年,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和一度中止的篮球运动再度兴起。许多基层单位都组织了篮球、排球、乒乓球队,经常举办比赛。仅 1970 年县体育馆就举办了 250 多场篮球比赛。1973 年 6 月,县革委会同意在县城举办青少年业余体校。全县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和青少年学生体育都有发展。有的项目在县和地区比赛中曾获奖。是年,陈武公社赵庄大队被评为镇江地区农村体育活动先进集体。

第三节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批林批孔”

1971 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动思想的渊源是“孔孟之道”,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3 年,毛泽东在有关场合多次提到批判孔孟之道问题,并对先秦的法家大加赞扬。1974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首次公开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 月 18 日,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

1974年1月28日至29日,江苏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随后,镇江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交流前阶段“批林整风”运动情况,部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月底,县委按照省、地委部署,召开由公社党委书记、机关组组长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传达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讲话和中央转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迅速动员起来,积极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去。据不完全统计,到2月10日止,全县共培训骨干34370人,开大批判会4591次,写大批判文章40521篇,出大批判专栏4994个。2月12至18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四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县委常委、候补委员,县机关各组局、公社党委、县属厂矿、场圃、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县人武部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共202人。会议传达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文件,分析全县“批林批孔”形势,提出如何将“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具体意见:(一)认真学习,进一步深刻认识“批林批孔”的重大意义;(二)开展革命大批判,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三)深入发动群众,正确解决联系实际的问题;(四)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会议强调,要认真办好政治夜校、联户学习组和各种类型的学习班,采取上辅导课、组织讨论、出板报和墙报等多种形式,组织和帮助干部、群众学习;大批判要突出批判林彪宣扬孔子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生而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观点;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推动各项工作。县委决定抓好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县农

机一厂、句容县中3个点,运用典型,推动一般,并要求各公社都要抓一个点,以点带面,搞好“批林批孔”运动。4月10日和4月20日,县委召开县机关组局长、场圃负责人会议和县委、县革委会扩大会议,贯彻省、地委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批林批孔”运动如何深入的问题,要求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7月17至20日、9月18至20日召开的县委四届八次、九次全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结合句容运动进展情况,对“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深入、普及、持久下去作出部署。在县委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县委要求进一步加深对“批林批孔”运动性质和意义的认识;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把领导机关的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同时抓好基层单位的运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批林批孔”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县委四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对下步“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要求是:(一)掀起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努力掌握“批林批孔”理论武器。(二)把领导机关的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同时搞好基层的运动。(三)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74年10月9至14日,县委召开有1100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上,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和农业学大寨的有关材料。县委书记徐界清代表县委作《深入批林批孔,决心改变山河,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阶段》报告。会上,县委还决定组织“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后来称“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帮助基层把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决定全县22个公社分四批,每批半年,两年搞完。今冬明春全县先搞八九十个大队。其中县委派工作队搞东昌、陈武、行香、白兔四个公社,其他每个公社自己组织工作队搞两个大队。

县委对点上组织工作队,帮助基层开展“批林批孔”、进行党的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十分重视。点上“批林批孔”工作队的大致情况是：(一) 工作队的组织情况。县委成立工作队领导小组，由 9 人组成，县委副书记周亚民任组长，负责领导点上 4 个公社运动。每个公社成立队部，大队成立工作组，在党委(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作队配备正、副队长和正、副指导员若干人。队长参加公社党委，每个公社都确定一名领导负责抓运动，参加工作队的领导工作。每个大队工作组配备正、副组长，党员组长参加大队党支部。县委共组织工作队员 284 人，加上 4 个公社自己组织的工作队员 62 人，参加县工作队混合编组，计有工作队员 346 人。除了工作队领导小组和公社工作队队部工作人员外，每个大队工作组实有队员 5 人。(二) 运动的大体做法和时间要求。运动大体分五步进行，搞半年时间。第一步，大动员、大发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充分准备，时间安排一个月。第二步，发动群众，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时间安排 20 天。第三步，大摆资本主义表现，开展两条道路对比教育，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时间安排 35 天。第四步，根据“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时间大体安排一个月。第五步，坚持社会主义总路线，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时间大体安排 25 天。

面上 18 个公社组织工作队员 309 名，共搞 36 个大队和 7 个社办企事业单位，方法参照点上做法进行。

县委“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自 1974 年 11 月 11 日进村工作，至 1975 年 6 月底结束，历时 7 个多月，比原计划延长了 1 个多月。

中共中央〔1974〕14 号文件下达后，县委又及时进行贯彻，在全县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批判的高潮。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

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指示，全县各级党委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和毛泽东哲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建立理论学习小组 420 多个，参加学习的人数 7960 多人。

二、“评法批儒”

1974 年夏天，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发展成“评法批儒”运动。6 月 12 日，江青等人在接见他们御用的写作班子时，提出了“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论点。此后，“四人帮”又多次提出要“批儒”，“批现代的大儒”，炮制了大量的“评法批儒”的文章。他们伪造历史，影射现实，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对周恩来在 1972 年前后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正确的措施、安排一批老干部重新工作和发展经济等做法进行恶毒攻击。

1974 年 7 月，中共句容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就全县开展研究儒法斗争史、将“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作出部署。此后，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议，组织学习儒法斗争史，讨论有关儒法斗争问题。9 月 18 日至 20 日，县委召开四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把学习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检查、交流作为一项重要议程。会议要求，要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10 月 30 日至 31 日，县委召开全县宣传工作会议，110 多人出席。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974〕26 号文件，传达了中央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规划座谈会和省、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参观陈武公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现场，讨论并明确全县宣传工作任务。在形成的《会议纪要》中强调要“进一步开展群众性评法批儒活动”。11 月 26 日，县委以句发〔1974〕128 号

文向全县各基层党组织批转了《会议纪要》，并要求贯彻执行。

会后，大部分基层单位虽然也组织学习关于儒法斗争和“评法批儒”的一些文章，但由于“评法批儒”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挂钩本身就十分牵强附会，因此大批判就显得空洞乏力，流于形式，最后不了了之。

这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理论与学术问题上造成了群众思想混乱。不仅如此，因反击“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的发动，致使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出现混乱。

第二十章

全面整顿与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后,1975年2月,邓小平临危受命,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句容县委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整顿领导班子为重点,整顿各行各业,推动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全面整顿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扑。“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全县干部群众很不理解,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和抗争。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果断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第一节 全面整顿

一、领导班子的整顿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发动乱后,毛泽东也希望结束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国家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逐步把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重任移交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继而又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要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从批判和消除派性入

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以改变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

1975年3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975年9号文件),着手进行铁路整顿。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肯定了铁路整顿的经验,强调9号文件的精神适用于一切工作部门。

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句容县委迅速贯彻。3月下旬,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传达到全县共产党员和一般群众。5月上旬,县委召开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要求狠抓重点单位和薄弱环节的整顿。全县由党内到党外,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进行了大发动,认真学习毛泽东“三项指示”,广泛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即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6月20日至21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公社党委书记、县机关各部、组、局负责人以及县属厂矿、场圃等单位领导同志参加,传达中央〔1975〕13号文件及中央负责同志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听取省委负责同志在省级机关和南京市13万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会议在初步学习和讨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贯彻部署意见,确定分两步走:第一步,6月底7月初之前,坚持先党内、后党外,进行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使中央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第二步,七月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把县、社两级领导骨干集中到县,通过进一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县委实行开门整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问题,然后解决公社及县直单位领导班子问题。县委扩大会后,县级机关干部集中学习几天,解决一个摊子问题。不论是机关还是学校,是工厂还是农村,在传达贯彻中央13号文件的过程中,指导思想都比较明确,就是紧紧围绕中央13号文件提出的七个“是不是”和中央首长提出的需要重点解决

的四个问题,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继续深入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的群众运动,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落实党的政策,增强革命团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为了彻底解决县委领导班子内部的资产阶级派性和软、散、懒状况,更好地落实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县委于7月4日至8日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央文件,联系句容实际,以整风的精神,在常委班子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在此基础上,11至16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革委会党员委员、公社党委委员和脱产的党员干部,县机关干部、办、组、局长,县属厂矿、场圃党支部委员和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负责人共604人参加(县机关干部344人,列席了会议),帮助县委常委整风。这次会议在学习中央13号文件、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以大会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揭发批判全县“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县委个别领导人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为主,做到扩大会与常委会有机结合、大会揭发批判与小组漫谈讨论相结合、会内与会外相结合。会议基本上达到预期要求,“句容‘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也基本清楚了”,原来资产阶级派性比较严重的一些同志,认识有了提高,态度开始转变。此后,县委又召开了县、社干部会议,揭发批判县委内部个别负责人存在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以及县委班子存在的软、散、懒方面的问题。

县委在解决自身领导班子问题的同时,对县直属机关和一些重点单位也进行了整顿。为贯彻中央17号文件和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9月19日,县委发出“学习理论抓路线,扫除派性促大干”的号召,要求各级干部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搞好团结,要“拆墙填沟解疙瘩”。期间,县委对闹派性搞不团结、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如农机二厂、化肥厂、运输公司等单位进

行了调整。10月12日,县委召开县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8号文件和邓小平副总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号召进一步深入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运动,提高对资产阶级派性危害性和整顿机关必要性的认识。

通过整顿,县委和一些重点单位领导班子的状况有了较大转变,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了沉重打击,领导班子中软、散、懒的现象基本得到克服。

二、各行各业的整顿

1975年,句容县委在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的同时,着手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

在农村,主要纠正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制形式,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全县各公社和大队,基本上全部恢复了生产队评工记分制度,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9月4至7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学习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规划,落实任务,研究措施,明确大干快上的部署和要求。10月26至28日晚,县委在天王公社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制定建设大寨县和大寨式社、队的具体行动规划,以及狠抓当前,组织冬春大干的各项措施。以后,县委又几次召开大会,部署和促进秋播、拉框格方(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会战等工作。在县委的带领下,全县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是年,虽然遭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仍然取得较好收成,不少地方增了产,农业收入比1974年增长8.75%,并出现一批三麦、油菜、水稻高产社、队典型。

在工业战线,针对当时工厂企业普遍存在的乱和散的问题,首先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

现代化,是工业生产的重大任务。要求各工厂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建立责任制,抓好产品质量等。是年9月28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10月5日,全县召开决战四季度工业誓师大会,要求学理论、批派性、讲党性、促大干,各工交企业生产上要有指标、有措施,迅速掀起革命和生产两个高潮,确保完成全年任务。12月20至30日,县革委会又召开全县社队企业管理干部会议,学文件,学先进,制定发展社队企业的规划和措施。通过整顿,全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工业总产值均比上年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有关资料显示,是年1至8月份,全县工业产值已完成年度计划的74.5%,比上年同期增长6.1%。到8月底,完成年度计划70%以上的有铁矿石、铜精矿、钨精矿、饮料酒、白厂丝、硫酸铝、植物油、脱粒机、出口服装、面粉、饲料等11个品种。其中铜精矿、饮料酒已提前完成年度计划。1975年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991万元,比1974年增长13.2%。

根据全省科技工作经验交流会的要求,句容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县委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重建句容县农业科学研究所(4月8日重建),建立健全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技网络。县建良种场、大队建立种子田、高产田、进行良种推广。公社成立农科站,建立农科基地,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成果。是年,全县社办农科站21个,科技人员65人;大队农科组320个,农技员320人;生产队农科组3323个,农技员6646人;国家农技员32人,共有农业科技人员7063人。在工矿企业,建立了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科技攻关小组,进行开沟机、插秧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的试制和推广。天王农具厂试制成功的71—2型大小苗两用手扶插秧机在省内外得到推广。

与此同时,县委对教育战线、文化领域等进行整顿。教育战线的整顿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教育秩序,提高办学水平。

整顿工作的成效和全县工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新成绩,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保持社会稳定和坚持生产的重要性。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社会上成为比较强烈的呼声。

三、抗灾防震

1974年6月17日晚,宝华、亭子、下蜀、大卓、黄梅、石狮、三岔、郭庄、葛村、后白、二圣、城东、城镇等13个公社受到龙卷风和冰雹袭击,风力9—12级,冰雹小如黄豆、大如鸡蛋。全县倒塌房屋2185间,损坏房屋35359间,死亡1人,轻、重伤43人,损失严重。县委常委在第二天一早即分头到受灾各公社发动群众,加强对救灾和生产工作的领导。县委成立了抗灾领导小组,并抽调30余名干部到重灾区帮助工作;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建立了救灾和生产两套班子。地委书记李执中特地到句容,对抗灾工作作了指示。

7月30日8时至31日12时,句容全县骤降暴雨374毫米。暴雨之后山洪暴发,水位猛涨,圩田受涝,山田被冲,淹没村庄55个,被洪水围困群众3000多人……情况十分危急。灾情发生后,县委常委召开紧急碰头会议定抗洪措施后,县委书记徐界清首先出发,涉水赶赴重灾区,县机关干部127人由常委带队奔赴抗洪一线,县城各工厂1000余名工人扎木排泅水到城东公社三台阁、白阳门、肖杆大队抢救群众,并组织22辆汽车向受灾公社运送抗洪抢险物资。句容周围驻军闻讯后,纷纷赶来救援。海军学院军政干校学员和202工地的解放军50多人泅渡在城东公社受淹村庄,把群众救出。6526部队当天上午派2台水陆两用装甲运输车,绕道到石狮公社平桥大队和土桥大队抢救群众。6527部队派51名指战员开来3台车,带着4个折叠舟和1个机械操作舟到石狮公社平桥大队,帮助救人,抢运粮食,当天就把受淹村庄的群众运送

到安全地带。6330 部队 220 名指战员和三岔公社群众一起,手挽手、筑人墙、挡洪水、堵缺口,抢修险段保圩堤。8 月 1 日上午,6456 炮兵部队 200 名指战员,带 5 辆卡车到石狮公社,突击抢运粮食。下午 6427 部队 200 名指战员到后白公社闸头大队和葛村公社经村埠,奋战险工地段,确保万亩圩不倒。全县各行各业投入抗洪抗灾斗争。交通部门抢修公路,商业部门输送物资,农业和粮食部门调运种子,城镇各个饭店连夜蒸馒头,炸油饼,送往灾区。

镇江地委书记李执中亲临句容,对抗灾工作作出 4 条指示,地委其他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也及时赶赴句容,省委在一天之内派来 2 个工作组,指导句容抗灾。

据灾情统计:全县 21 个农村人民公社受灾的有 20 个公社、237 个大队,较严重的有 85 个大队。被洪水淹和被洪水围困的有 120 个村庄、299 个生产队、6991 户、29959 人。淹死 3 人(三岔 1 个妇女,葛村 1 个妇女,磨盘 1 个男孩);大牲畜死亡 4 头。农作物受灾总面积 152869 亩(其中内涝 97006 亩,山洪冲刷 55863 亩),粮食受损失 1687 万多斤(早稻 1685 万斤,麦种等 2 万斤)。“三水一萍”(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绿萍)被冲走 1204 万多斤。倒塌房屋 5511 间(集体房屋 1271 间,社员房屋 4240 间),破、淹圩 31 个(其中面积 500 亩以上的 14 个,500 亩以下的 17 个),被冲倒的小水库 4 个(南塘、尹巷、郭西塘、戴贝坝);冲垮的塘坝 1265 个,冲破的涵洞 173 个、桥梁 69 座(内有宁杭线公路桥 1 座)。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息传来后,句容县委从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接待伤病员)上做好支援灾区的充分准备,派出 11 人组成的医疗小分队随同省医疗队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医疗小分队于 31 日晨到达灾区玉田县亮甲店医疗站。3 天 3 夜诊治了 200 余名伤员,使 57 名重伤员转危为安。以后又深入农村巡回医疗,为病人送医送药上门。圆满完成救治伤员任务后于

8月24日返回句容。

是年8月19日,省、地委发出了防震抗震指示,县委即于21日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县人民防震抗震。25日,县委成立了抗震防震领导小组,下设抗震防震办公室。县委电话会后,全县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个快贯彻、快落实、快行动高潮。从机关到厂矿,从城镇到农村,各级党组织都把防震抗震工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做到防震抗震知识家喻户晓,抗震的各项措施具体落实。城乡居民按照县委的指示,在室外搭起了防震棚,夜晚全移居棚内。农机修造厂党总支落实措施边生产边抗震:成立了防震指挥小组;组织4支抢险队伍(抢险队、医疗队、汽车队、组织50名基干民兵队伍),随时听候县委调配;做好群众性测报工作和水电供应准备,并搭好芦苇棚;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做好抗震抢救准备工作;商业部门保证市场供应。全县广大干群奋战“两晚”(单季晚稻和双季后作稻)田间管理、坚持工作岗位,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防震抗震。这当中出现了许多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团结战斗、互相关心、坚守岗位、搞好工作的动人事迹,至今,在人们的心目中还留有深刻影响。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

一、“农业学大寨”

1964年2月,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句容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9年,句容县革委会,通过各种会议,大力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意义和“大寨精神”,激发广大农民学大寨的愿望和热情。

1970年8月,中央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全县作了认真学习和贯彻,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发展。是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层层召开

会议,认真贯彻省委和省革委会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的指示,把“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整顿领导班子。是年11月,县革委会制定了《关于“农业学大寨”三年规划(草案)》。12月12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委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内容八条:(一)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大造舆论,广泛宣传“农业学大寨”的重要意义。(二)学大寨,必须学根本。(三)要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抓紧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四)要把大寨经验普遍推开,必须继续认真搞好整党建党,切实解决社队领导权和各级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问题。(五)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排除右的或“左”的干扰,保证学大寨群众运动健康发展。(六)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七)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在三年内基本实现排灌、脱粒、加工、植保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机耕面积扩大到60—70%,五年内全部实现机械化,并向林牧副渔发展。天王公社1971年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八)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当好大跃进的促进派。1972年3月,镇江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后,县委于4月3日专门召开常委会,围绕“农业学大寨”运动如何统一思想、定出规划、干部转变作风、实行三分之一下乡等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1974年10月9日至14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参会的有县委、县机关组局和县属厂矿、场圃、水库负责人等共1100多人。会上,学习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一系列指示、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和“农业学大寨”的有关材料,听取县委书记徐界清代表县委所作的《深入批林批孔,决心改变山河,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报告和县委副书记宋敏所作《关于当前和今冬明春工作》的报告,并有16个单位作典型发

言,介绍“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会议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革命团结,鼓舞斗志,狠抓当前,大战冬春,把我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阶段,尽快建成大寨式县”。

据统计,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全省农业会议精神贯彻后,至1974年9月,全县新建水库23座,整修塘坝6708个,新建涵闸、桥梁188座,新建和培固堤防95.77公里,新挖和疏浚河道34公里;新建机电排灌站62座,装机容量4378马力,发展小水电站10座、259千瓦,平整土地4万多亩,改善农田灌溉能力8.6万多亩;造林20.7万多亩,四旁绿化3577万多株。四年来,全县农田基本建设共完成土石方3625万立方米,平均每个劳动力完成191立方米。东昌公社是句容东部缺水比较严重的一个公社。解放后,生产条件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仅是修修补补,搞搞小塘小坝,并没有解决缺水问题。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省农业会议后,他们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参观了外地治水经验,提出“举旗抓纲学大寨,东昌山河重安排”的战斗口号,公社领导根据群众迫切要求,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开挖一条全长15公里的东干渠规划,把仑山水库的水引向东流,彻底解决全公社灌溉用水问题。他们依山挖渠,遇洼填方,逢垌凿洞,没有石头自己开,没有黄沙自己淘,砌渡槽没有支撑,就用土堆,砌好后再扒掉。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共开挖土石方36万立方米;钻山洞6个,长630米;建2孔、5孔、17孔、36孔渡槽各1个,长325米;造涵闸、农桥29座,电站1个,当年施工,当年收益。广大干部群众赞扬东干渠是翻身渠、幸福渠、战备渠。袁巷公社根据本社实际,因地制宜地拟定“逢洼筑库,沿山开沟,沟库相连,长藤结瓜”的全面治水方案,经过四个冬春的奋战,完成土石方130多万立方米,兴建、扩建大小水库9座,拦水坝3座,囤水库1个,劈开9米高的石峰穿山引水,开挖环山渠道22公里,增加蓄水量700多万方,加上原来蓄水量,每亩水田平均有水750多方,出现了“小型水

库遍山沟,绿水清清沿山流,东西南北能调变,山区年年稻丰收”的喜人景象。白兔公社经过一年的苦战,挑土 24 万多立方米,开通了 12 年没有完成的胜利河,把长江水翻上山岗,重新打好了被扒掉的幸福水库,开挖了 6 公里长的灌溉渠道,使全公社 50% 以上的农田旱涝保收,改变了易旱的落后面貌。1973 年兴建 400 米长的隧洞 1 座。1974 年春节后 10 天时间,挖土 9 万多立方米,改建河道 2500 多米,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变,连续四年大丰收,1973 年粮食比 1970 年增长 41%。葛村公社制定将全公社 21 个大小圩合并为 2 个大圩的规划,迫使秦淮河水改道,缩短防洪排涝战线。这一年他们组织万名水利大军,摆开十里战场,就地扎营、食宿露天,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把下马岗、小立山等四个山头劈开两半,堵河 6 处、填塘 16 个,完成土方 75 万立方米,胜利完成秦淮河改道第一段工程。1973 年突击大战南河,完成土方 40 多万立方米。既保证了 2.1 万农田旱涝无忧,又为全县圩区治水闯出了一条新路。

1975 年 1 月 12 至 15 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传达省、地委有关会议精神,分析 1974 年革命与生产形势,围绕回答学大寨、赶昔阳“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今年是最后一年了”的问题,开展大讨论,明确 1975 年的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提出要“大讲团结、大鼓干劲,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新高潮,为把句容尽快建成大寨式的县而奋斗”。

1975 年 4 月 2 至 4 日,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县委以 3 天时间在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召开由 450 多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郭庄公社百丈大队为重点交流了党支部如何“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的经验,并现场参观了这个大队的春耕生产情况。9 月 4 至 7 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共 5257 人。会议学习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文件,传达贯彻

地区两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落实任务,研究措施,明确大干快上的部署和要求。会议还向全县发出了四级干部大会决心书。县委书记王云海在会上作《认清形势迈大步,大干快上赶昔阳,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报告,提出全县 1976 年的战斗口号是“学习理论抓路线,决心大干促大变。麦子猛攻三百关,早稻种好三十万。总产夺取六个亿,实现亩产千斤县。林牧副渔业齐飞跃,打响‘五五’第一炮”。为此,必须立足常年,狠抓当前,采取果断措施,实现明年农业的新跃进。此次会上,县委决定成立“农业学大寨运动样板指挥部”,确定从黄梅公社到袁巷公社宁杭公路两侧共 7 个公社的 39 个大队,作为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样板(县委原来的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宝华公社楠江大队、白兔公社兔东大队、陈武公社赵庄大队四个点也属于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样板的范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蹲点抓样板,并从机关抽调三分之二的干部到样板点里工作。县样板指挥部设在后白。各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也要分别选择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作为自己学大寨运动的样板,公社和大队书记亲自蹲点抓好。此次会议后,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高涨。

1975 年 10 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期间,镇江地委对 1970 年制定的《规划》目标进行了修改。要求 1976 年除了继续巩固提高学大寨比较好的武进、高淳两县外,重点帮助扬中、句容初步建成大寨县。为响应地委要求,县委书记王云海代表全县人民在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提出“乘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强劲东风,迈开大步赶昔阳,苦战一年面貌变,力争实现大寨县”。实现明年:棉过百,猪达《纲》(农业发展纲要),粮超千,总产六个亿,社队工副业大发展。会议结束回来后,连夜召开常委会,学习会议文件,领会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

10 月 26 至 28 日晚,县委在天王公社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

议,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天王公社党委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带领 7000 干群,奋战三十六宕冲,30 多天时间,挖土 42 万多立方米,格田成方 4000 亩。原来这里有 3 个山岗、66 个土墩,174 个水塘,现在变成了:平展展土地排四行,划分五区田成方,中间一条机耕路,灌排渠道分两旁)。县委常委、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县机关部委办局和县属厂矿场圃水库负责人以及县、社农业水利部门的干部共 646 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县委书记王云海关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讨论,参观了天王、后白、袁巷、磨盘四个公社平整土地的现场和秋播样板,部分同志还去溧阳、金坛县的先进公社学习取经。在 28 日下午的会议上,县委提出了“狠抓根本学大寨,迈开步伐赶昔阳,苦战一年面貌变,力争建成大寨县”口号。29、30 日连续两晚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干部群众进行传达贯彻。全县上下一个结合秋播,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拉框格方、平整土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学大寨运动热潮进一步掀起。县委组织的 319 人的工作队,进驻沿宁杭公路 6 个公社(磨盘公社除外)的 38 个大队,帮助基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批林批孔”,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向纵深发展。县委常委蹲点带面,县级机关实行“三三制”,361 名机关干部,先后抽出 236 人下乡,占 65%。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下到基层帮助工作的干部有 597 人。各行各业全力以赴支援农业。学校的师生也上了阵,不少工厂白天做工,晚上支农。据统计,半个多月时间(10 月中下旬),共下乡 7568 人次,做了 4.5 万多个劳动日。县农机一厂工人晚上乘卡车到二圣公社参加格田成方劳动。全县拉框格方 16 万多亩,平整土地 3 万多亩,挖土方 266.5 万立方米,比 1974 年同期增加五倍多。

1975 年 11 月 18 日,中共镇江地委以镇发〔1975〕111 号文,向全地区各县、市党委批转了中共句容县委《关于贯彻全国农业学大

寨会议的情况汇报》，指出“中共句容县委《关于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情况汇报》，总结汇报了前一阶段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情况。他们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决心是大的，行动是有力的，大战当前，大干冬春的打算也是可行的”。12月8日，县委出台《苦战一年面貌变，努力建设大寨县—句容县一九七六年规划（草案）》，重申“鼓足干劲学大寨，迈开步伐赶昔阳，苦战一年面貌变，力争建成大寨县”战斗口号，提出实现明年（1976年）“棉过百，猪达《纲》，粮超千，总产六个亿，社队工副业大发展”目标和十项主要任务，要求80%以上社队在1976年建成大寨式社队，其余20%社队在1977、1978年分别建成。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县级机关干部积极响应县委号召，纷纷报名到农业第一线，为力争一年建成大寨县贡献力量。经县委批准，首批到大队担任党、团支部副书记的有13人。12月9日下午，县机关召开欢送大会，下乡和留机关工作的同志都推选代表在会上发言，向县委表决心。12月10日，县委向省委、镇江地委上报了《关于一九七六年建设大寨县的规划的报告》。同月1日和22日，县委又先后在磨盘公社、天王公社两次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来第一个战役的情况，部署二、三战役任务。县委书记王云海在22日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全党全民动员起来，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报告中指出，“要通过总结和检阅前后两个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认清形势，端正态度，鼓足干劲，乘胜前进，抓住根本，大战当前”。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于1976年1月16至21日进行整风。整风中，县委常委按照“三要三不要”原则，对照“大寨县”六条标准，进行“四批三查”。2月11至17日，县委召开四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800多人）。县委副书记、县长汪天恒代表县委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回击右倾翻案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报告,要求“必须自始至终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到大批促大干”。

1976年7月16至19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领导,还有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革命干部、青年、民兵、妇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全体县级机关干部,共5600人。会议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交流了半年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听取了全国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县委工作报告,表扬了219个先进单位和53名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参加了批斗、宣判大会;还参观了县城附近城东公社杨家巷大队的积肥现场。会议期间,县委负责同志还分头召开理论骨干、青年干部、知识青年、先进单位、饲养员代表和物资后勤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倾听他们意见。据会议材料反映,是年上半年,全县有四个“超历史”,即农田基本建设完成1700万立方米的土方,超历史;三麦总产6712万斤(实际5919万斤),超历史;社队工业产值完成2900万元,超历史;以生猪带头的多种经营的发展,也超过了历史记录。各行各业正在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外流的劳力,65%左右已经归队,清理“三支一宥”收到初步效果;农村比较突出的方向道路问题,有的作了认真处理。

1976年11月27日,县委以句委〔1976〕46号文下发《中共句容县委关于认真做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考核验收的意见》,对考核验收的指导思想、内容、力量组织和方法、时间安排、县直工交财贸单位的考核验收等作了具体规定。是年12月,《句容县建成大寨式社(镇)队实况和规划统计表》反映:1976年基本建成大寨式公社17个(城东、石狮、黄梅、大卓、亭子、宝华、下蜀、陈武、春城、二圣、三岔、郭庄、葛村、后白、天王、磨盘、袁巷),大队270个,拟在1977年建成大寨式公社5个(东昌、白兔、行香、茅

西、城镇),大队 53 个,合计 22 个公社 323 个大队。

全县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是农田基本建设有所发展;二是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三是“五小”工业(即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水泥、小煤窑)和社队工业有所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快了步伐;四是农机革新和培育良种取得一批成果。

“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在运动中存在“左”的一套:如生产上搞大呼隆,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将自留地种植和副业生产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缺乏科学规划等。县委所制定的农业学大寨规划,有些指标不切实际,如提出全县五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从 1970 年起),1976 年建成大寨县等,实践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工业学大庆”

196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自此,句容和全国各地一样,“工业学大庆”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70 年 1 月 5 至 9 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交战线“学首钢,赶先进,夺取 1970 年革命生产新胜利”誓师大会,会议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学习首钢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建议,听取和讨论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形势任务的报告以及先进单位的介绍,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总结和交流了 1969 年工作情况,研究和讨论了 1970 年的任务。

1971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业学大庆》社论后,因“文化大革命”初受到冲击的“工业学大庆”运动重新兴起。9 月,县革委会召开“工业学大庆”誓师大会。会议组织学习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人民日报》社论和毛主席有关指示,传达地区工业交通会议精神,并以“工业学大庆”的要求总结检查上半年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会上先进单位交流了经验,会后工交战线掀起了“工业学大庆”新高潮。

1972年,工交战线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3月20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强调加强企业管理,恢复七项制度,加强纪律,防止事故。5月7至11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交财贸计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厂、矿山、交通、财贸、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的负责人和基层单位班组以上干部共350多人。会议传达贯彻地区计划会议精神,讨论落实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重点讨论了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重要意义和大体做法,并由县化肥厂在会议上介绍了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狠抓企业管理,扭转“一低三高”局面经验和清仓核资工作。会议还向工交战线职工发了倡议。5月下旬,县委又在化肥厂初步建立岗位责任制、原始记录、设备维修和保养制度,20天时间生产化肥1007吨基础上,召开县属工厂经验交流会议。由化肥厂重点介绍突出路线教育,大揭、大批、大反无政府主义,修订规章制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经验,同时也参观了增产节约的展览。至9月,县属工矿企业都比较普遍建立了岗位责任制、质量检验制、安全生产制、考勤制等方面制度,并取得一定效果。是年1—8月,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1836.51万元,完成全年2500万元计划的73.45%,比1971年同期增长8%。在36个计划产品中,完成全年计划60%以上的有16个品种,在18个可批产品中,比1971年增长的有14个品种。硫铁矿、铜精矿、钼精矿、饮料酒、6寸水泵、6寸钢皮水管、机动脱粒机等,已接近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1973年,全县工交战线广大职工高举“鞍纲宪法”,学大庆、鼓干劲,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和以优质、高产、低耗、安全、多品种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交通战线开展了安全、优质、快装、快运的群众运动,使全年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比1966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1975年2月20日,县委以句发〔1975〕15号文形式,明确一名县委副书记抓工交战线的革命化,并以农机厂为“工业学大庆”的

点。10月,县委召开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传达地区工业会议精神,交流工交战线学大庆经验,组织有关单位报喜,表决心。要求全县工交战线学理论、鼓干劲,加快“工业学大庆”步伐。12月20至23日,县委召开社队企业管理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示和有关文章;参观了武进县社队工业展览馆、邹土区公社社办工业和无锡县梅林公社的社队工业;听取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关于全县发展社队企业的初步打算发言;在分组讨论、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各公社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展社队企业的初步规划。县委负责同志作总结,地区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到会讲话。

1976年2月20日,中共句容县委“工业学大庆”领导小组成立。成员由宋敏等14位同志组成,宋敏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计划委员会。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动下,句容县化肥厂、句容县制革厂、句容县酒厂、句容县剿丝厂、句容县化工厂、句容县水泥厂、句容县制药厂、句容县电子应用厂等一批骨干企业相继建成;1800型稻麦两用脱粒机、5.5千瓦电动机、东风—25型拖拉机、71—2型大小苗两用人力手扶插秧机等一批农用和工业配套机械问世,农药、化肥生产和铁(铜、钼)矿石等开采也取得一定成绩。全县涌现出许多“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有的还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省表彰(1977年工业局系统有7人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句容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缺少科学的规划,一哄而上;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难以实现;片面强调“五小”工业,因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低下。

第三节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一、全县干部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全县干部群众从广播、电视里知道这个噩耗后,都为失去敬爱的总理周恩来而悲痛,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担忧。由于“四人帮”仇视周恩来,特地下达了“三不准”(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不准人民群众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广大群众只能自发地、出自内心地用佩戴白花、扎花圈、设灵堂等形式,来悼念周恩来的逝世。1月16日,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含泪收听收看周恩来总理逝世追悼大会的实况,并以各种形式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1月,毛泽东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就发动了一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使持续9个月的各行各业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整顿中提出并施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也受到批判。一批坚决拥护和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打击。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句容县委的许多领导感到很突然,觉得难以理解,普遍认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各方面工作抓得很有力,怎么又要“批邓”?他们担心经过这段时间的整顿而取得的国民经济恢复和有所发展的大好形势,会因为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丧失。但作为地方一级党委,又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

1976年2月11日至17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中央〔1976〕1、2号、〔1975〕23号、36号文件和省委领导人在地委书记碰头会上的讲话,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修正主义纲领来批判。此后,“批邓、反击

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县展开。4月2日至5日,县委召开有机关各部门及公社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指示及中央〔1976〕4、5、7号文件,贯彻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发批判所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4月8日,县委召开公社、厂矿、场圃党委(总支、支部)及部委办局负责人电话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下午,县委召开在城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人员参加的大会,宣读中央的两个决议,要求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7月16至19日,县委在召开的有5600多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进一步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交流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农业学大寨”的经验,突出学习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阶级斗争论述。此后,县委和各基层党委还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出批判专栏、学习小靳庄开赛诗会等形式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于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各单位的所谓“批判”也是抄抄报纸、流于形式。

三、悼念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离去。全县人民心情格外沉痛。9月18日,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逝世追悼大会(全县各公社、单位也在同日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的有县机关、各公社及省、地驻句容各单位的代表共13234人,敬献花圈258个。通过收听广播,按北京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实况的程序举行追悼仪式。18日下午七时半,县委分别召开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15个座谈会,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悼念一代伟人。全县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四、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句容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句容城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集会游行的人群络绎不绝。全县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农村社队等基层单位纷纷举行庆祝会、声讨会。22日上午,句容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工农兵群众1万余人,在县体育馆广场隆重集会,传达贯彻中央〔1976〕16号文件,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

粉碎“四人帮”后,句容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县开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号召全县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把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第四节 句容人民对“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的抗争及历史反思

一、句容的国民经济在艰难中发展

农业经济略有发展。从粮食生产来看,由于农业科技的推广,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全县的粮食生产在稳定中有增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为18.9万吨,1970年超过20万吨,1976年达24.47万吨,平均每年增产2.9%。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人均占有粮食,略高于1956年,有些年份还低于1956年。从农业产值看,1976年为12519万元,比1965年9487万元多3032万元,增长31.9%,年均增长3.1%。

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也有改善和加强。墓东水库是座中型水库,原在1958年开工兴建,1960年因资金困难而停工,1973年续建,至1976年完成。1966年至1976年10年间,先后兴建了王

庄、中心、龙山、马埂等4座小(一)型水库,五里冲、仑环库、团结、东庄、戴培塘、邹培塘、何家坝、龙塘、戴木坝、南塘、茅陈、白云观、石东、五墟、金山、迎春、栗西、四清、青菜地、草塘、青年、白沙、上杆、龙海、杨家坝、跃进、东湾等27座小(二)型水库。这10年兴建的小(一)型水库占全县小(一)型水库总数的28%;小(二)型水库占全县小(二)型水库总数的62.8%。1974年,县发动18个公社5.6万民工投入进一步整治赤山湖工程,完成新湖堤16.15公里,共完成土方336.59万立方米。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1972年贯彻全国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全县开展以治水改土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等全面规划、综合治理。1974年起,根据省提出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标准,县、社、队都因地制宜搞规划,一块一块实施。从1974年至1976年,共平整千亩以上大片土地面积2.24万亩,挑挖土方420.8万立方米。

工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在全民工业方面,1966年筹建县化肥厂,次年投产;1969年新办县酒厂;1970年建立句容县剿丝厂;1971年建成浮山果园酒厂;1976年新建句容县制药厂、电子应用厂。集体工业也有所发展,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兴建了句容县化工厂、句容县水泥厂、下蜀公社18门轮窑厂、黄梅公社20门轮窑厂、城东公社18门轮窑厂、后白公社剿丝厂等。据统计资料显示,1966年至1976年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4.7%,1965年全县工业产值为1787万元,1976年为6328万元。1976年工业产值是1965年的3.5倍,平均每年增长25.4%。

二、句容的社会事业在大灾难中艰难地维持生存,在某些领域也有所发展

文化领域是重灾区之一。县文化馆与广播站、图书馆、新华书店等共同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公社文化站于1969年撤销,1972年开始部分恢复,1974年才逐步建立。句容县锡剧团于

1966年8月停止演出,1968年3月,县决定将县锡剧团改为工农兵文工团。1972年又建立“小京班”。“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节目就是8个样板戏。电影也主要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少数几部影片,文艺创作是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群众性的演唱京剧样板戏片段较为普遍,大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布城乡各地。由于强调无产阶级占领舆论阵地,有线广播入户率和通响率较高。1976年9月县还首次成立广播事业局。在体育方面,1970年全县中小学开设军体课,1973年开始向体育院校输送培养教练员,1976年把1958年盖的竹木结构体育馆改为砖木结构,可容纳观众1300人,并逐步增添了体育设施。

教育更是受“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重灾区。开始时“停课闹革命”,教师是“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游街,有的被折磨致死。恢复上课后,又盲目发展中学,要求做到“上小学不出村,进初中不出队,读高中不出社”,多数完小办成七年制学校(小学5年,初中2年)。全县21所公社中学都设有高中班,还增设39个高中点。1973年,全县有中学106所,其中完中22所,初中84所,275班,学生15737人;高中77班,学生4684人,造成中等教育事业“虚肿”。取消考试升学,搞推荐和选拔“工农兵学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中的卫生工作,重点贯彻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南京、镇江等城市大医院部分医生下放到句容工作,客观上加强了句容医疗队伍的技术力量,医疗水平得到提高。1972年11月,县医院新建了门诊楼;1974年11月建造了病房楼,并增添了救护车、200毫安X光机、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大队卫生室建设得到巩固,“赤脚医生”为农民防病治病,进行预防接种、妇幼保健、普及卫生知识,为建立初级农村卫生保健制度起过一定作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度停顿,1970年贯彻中央〔1970〕2号和99号文件,组织了近百名医务人员、“赤脚

医生”、卫生员查出钉螺面积 2165 万平方米,并提出“十万大军,南北开战,一鼓作气,送走瘟神”的口号。夏、秋两季,全县共投入灭螺的劳力达 68 万人次,175 万个劳动工日,灭螺面积 1651 万平方米,占当年查螺面积的 76.2%。据统计,从 1970 年至 1976 年,共查出有螺面积 5710.7 万平方米,投入查螺、灭螺 661.7 万个工日,完成灭螺面积 7977.5 万平方米。1970 年至 1976 年查治血吸虫病统计,共实检人数 47.19 万人次,查出患血吸虫病 2.29 万人次,治疗 2.64 万人次,其中早中期病人 2.51 万人次。

三、历史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灾害是严重的。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受到极大的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到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县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从经济发展上讲,农业虽有发展,但速度远低于 1963 至 1965 年;粮食虽有增产,但多种经营,林、牧、副、渔业几乎全部砍光。从工业上看,1966 年至 1976 年工业产值平均递增 14.7%,远低于前 10 年(1956 年至 1966 年)工业产值递增 25.5%的水平。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的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句容党组织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抵制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没有间断。从干部来看,无论是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

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县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句容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一定的发展,社会事业在某些领域某个阶段还有进步,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而是句容党组织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抵制、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句容会发展得更快、更和谐。

“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中共句容县委作为县一级党组织,在这个统一的大党里,如何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认识,增强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性。

第 四 编

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 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第二十一章

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结经验教训,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县委带领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清查帮派分子和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党政机构,推进整党整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政治方面实现初步的拨乱反正;农业、工业、交通业恢复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但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全县各项工作仍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和落实党的政策

一、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清查帮派分子和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

1976年10月22日,句容县委召开万人大会,县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工农兵群众一万多人,在县体育馆集会,县委副书记宋敏传达了中共中央16号文件精神,县化肥厂等八个单位作了表态发

言,县委书记王云海作报告,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清形势,提高认识,积极投入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反党篡权阴谋、彻底清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的斗争。

1976年12月至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三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句容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根据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和省、地区的部署,分三个步骤,逐步推进。

第一阶段(又称第一战役),为1976年10月至1977年3月,主要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1976年12月10日,中央印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县委按照地委12月25日紧急会议要求,专门成立清查“四人帮”历史罪行材料工作领导小组,确定重点清查单位。在7天时间里,共查阅敌档资料和档案8671份,敌、伪书籍208本,敌、伪报纸2300份。对868名下放干部进行了审查,调查可疑对象5名,未发现与“四人帮”有关的历史罪行材料。同时,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讲、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证的运动。为进一步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及其反革命面目,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从县到公社、大队,层层培训宣讲骨干,成立宣讲团、宣讲队、宣讲组,深入工农群众,宣讲“四人帮”的各类罪证,联系实际进行揭批。各级党组织、单位纷纷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座谈会,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迅速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揭发的热潮,全县城乡上下到处成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战场。

第二阶段(又称第二战役),为1977年3月至1977年9月,主要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1977年3月6日,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句容县在第一阶段宣讲揭批运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第二阶段的宣讲揭批运动。自5月份起,在全县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即发动群众一讲“四人帮”的罪行,让大家把对“四人帮”的心头怒火讲出来;二讲自己是怎样同

“四人帮”斗争的；三讲跟“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各级领导带头“三大讲”。为保证效果，县委于10月5日至14日举办县级机关干部学习班，集中开展“三大讲”，有35个单位、508人参加。在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央相关文件及中央报刊重要社论、省委及镇江地委领导讲话的基础上，由单位到条口、到全体机关干部，层层开展“三大讲”，进一步提高对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性质意义的认识。通过提罪行、批谬论、查流毒，分清了一些路线是非，促进了大治快上。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7月23日，县委召开万人大会热烈庆祝，拥护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拥护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决定。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决议，从政治上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给“四人帮”以粉碎性打击。

第三阶段(又称第三战役)，为1977年9月至1978年12月，主要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左路线。1977年9月23日，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全县再次掀起狠揭猛批“四人帮”的高潮。

全县广大干群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斗争中，句容县采取群众运动和专案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基本查清了句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农村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步骤地开展了“双打”(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运动，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社会基础，巩固了无

产阶级专政。10月至12月,先后两次集中机关干部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批斗帮派骨干宋××、徐××,共计38天。多次召开“说清楚会”,还两次集中工交、财贸、宣教等基层单位的领导同志进行学习并全面发动,揭发批判句容帮派骨干的罪行,推动本系统的清查运动。1978年1月,用9天的时间把机关、公社的干部集中到县城,进行全面清查,着重清查公社干部中有牵连的人和事。经过清查,句容县共清查处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15人。其中帮派骨干3人,参与部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6人,与帮派骨干有牵连、犯有政治错误的6人,受“四人帮”流毒影响说错话做错事的13人。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句容县委于1977年11月18日召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中心会场设在体育馆广场,各公社分设20个分会场,全县3万多名干部群众参加大会。会上,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巡回批判小分队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在江苏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曾邦元、施兆祥拉帮结派、“三搞一篡”(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罪行。当晚,出席大会的各单位认真组织座谈、讨论。

在基本查清句容帮派组织与“四人帮”及其在江苏代理人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基础上,县委按照“抓得准,斗得狠,执行政策稳”的要求,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利于大局稳定的工作思路,遵照“三个严格区别开来”的原则,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扩大教育面,缩小执行面。帮派骨干定敌我矛盾性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2人,开除出干部队伍的1人;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给予党纪处分的2人,行政纪律处分的2人,党内免于处分的2人;对犯有政治错误的6人,做结论,不给处分,已经说错话做错事的13人均已宣布解脱。

二、落实党的政策,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干部群众被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受到严重的迫害,很多人含冤而死,他们的子女及亲友,在各个方面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随着思想政治上的初步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他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为了拨乱反正,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首先狠抓了干部政策、对敌斗争政策的复查和落实。1977年,县委成立专门班子,抽调专职工作人员,配合有关部门,着重对“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进行复查;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在县社机关,通过对7个典型案例的讨论,广大干部统一了政策思想,加快了落实政策的进度。全县属于复查落实政策的干部293人、职工89人,上半年已经落实政策的干部56人、职工30人。为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县委抓紧对县社机关干部考核,对其中27名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及时作了安排;同时,还把敢于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表现突出的113人,充实进县、社领导班子。

此外,县委还狠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下决心解决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原句容锡剧团老艺人的政策落实问题,使之各得其所;有13名教师从其他战线回到教师队伍,从事教学工作;对全县科技人员现状进行了普查,原来工作专业不对口或不完全对口的80名科技人员工作进行调整,基本做到学用一致。

“文化大革命”以来,句容县被审查的干部共有733人,已复查结论的725人,其中属于冤假错案的69人。社会上需要复查的政治案件420件,已经复查结论的371件,其中属于冤假错案的196

件。林彪、“四人帮”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一些受到迫害的人得到平反昭雪。全县有 159 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其中 87 人安排了工作。1977 年，对 6205 名职工的工资进行了调整。知青招工 246 人，留退学生分配 714 人，落实政策和其他原因安排 154 人。

第二节 恢复和整顿各职能机构

一、党政机构的整顿和调整及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基层党组织（包括句容）党不管党，许多党员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对此现状，党的十一大提出“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

1977 年 8 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年 9 月 10 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78 年 5 月，县委党校恢复。7 月，县委同意县委宣传部《关于建立健全党的宣传网，成立宣讲团的意见》，以县、公社二级领导为骨干，县设总团，公社设分团，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分别担任县社二级宣讲团团团长。据统计，1977—1978 年，以揭批“四人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中心内容，共举办学习班 9 期，参训的县、社干部，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共 1675 人。对于与“四人帮”和句容小帮派有牵连、犯有政治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着重进行思想批判，促使他们把问题说清楚，提高觉悟，接受教训，取得群众的谅解，并调离领导岗位。问题严重、态度不好的，给予党纪或行政处分。对于懒、散、软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选拔、培养中青干部，实行老中青三

结合。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照大庆经验和工业三十条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班子、生产指挥班子、科学技术班子、后勤供应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在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加强职工队伍建设,逐步培养一支思想红、干劲大、技术精、作风好、纪律严的铁人队伍。

这次整顿,以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指针,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紧紧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中心内容,以思想整顿为重点,切实解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领导班子内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能够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建设成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所要求的硬班子。

二、县、社机关进行整党整风

为解决党内不同程度的“三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制度及作风建设,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中,句容县县、社、大队三级认真进行了整党整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进行整党整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艺术,注意工作方法,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的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县机关干部由领导带队,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调查研究,帮助工作,社队干部基本上都在农田基本建设的第一线,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受到广大社员的热情欢迎和支持。1977年春节前后,数九寒天,冰天雪地,及时组织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

3773人,逐个访问11518户烈军属、“五保户”、鳏寡孤独和其他社会困难户,把政府发放的救济费和实物送到困难户的手上,认真解决他们生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句容各公社党委围绕着路线、团结、干劲、作风等问题,普遍进行了整风;3月份,县委又进行了内部整风和开门整风。在县、社两级领导班子的带动下,大队、公社及城区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也认真进行了一次初步整风,点上和面上搞运动的大队还讲评了党员。按照县委作出的关于改进县社队三级干部作风的决定,许多公社干部改变了那种“早出晚归”的状态,住到大队生产队,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大家参加劳动,调查研究,联系群众,抓点带面,分类指导,组织竞赛,等等,出现了“各级领导上前线,四级干部到田间,干部群众并肩干,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动人景象。通过整党整风,增强了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密切了干群联系,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三、群众团体整顿及工作的开展

1978年9月至10月,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被拖延了10多年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会议选举了新一届领导成员,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制定了新的工作章程。工、青、妇组织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句容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整顿中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逐步健全,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县总工会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带领全县各级工会组织狠批“四人帮”散布的“工运路线黑线统治论”及工会组织是“福利工会”、“全民工会”等反动谬论。积极配合省总工会、妇联、团省委巡回批判小分队组织揭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并与团县委、县妇

联组织小分队,对句容追随“四人帮”及江苏的代理人帮派骨干分子开展批判斗争。与此同时,县总工会还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举办“二七”工人大罢工 53 周年纪念活动,对广大职工进行阶级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1976 年 6 月,县工人文化宫大楼建成使用。

1977 年 1 月,县总工会在全县各基层公会组织开展“工业学大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新高潮。1977 年 4 月,与县贫下中农协会、县妇联、团县委一起,在全县各公社、厂矿、场圃、企事业单位开展学习雷锋群众运动。1977 年 6 月 4—9 日,召开句容县工会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和省工会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工会工作。结合整党整风运动,对全县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改选,于 1977 年 12 月底全部完成。1977 年 11 月 6 日—8 日召开县工会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为县工会全体委员及基层职工代表共 72 人,传达贯彻江苏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讨论研究 1977 年工会总结等工作。

1978 年 10 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县总工会大力宣传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新风尚。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总工会根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积极引导广大职工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全国职工守则》,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开展向赵春娥等先进人物学习活动,并以工交、基建等系统为重点,开展了以增产节约、安全生产为中心,以“树理想、当主人、学本领、献计策、反浪费、作贡献”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会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发挥重要的作用。

1976 年,全县各级团组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深入批判“四人帮”散布的“团委要与党委对着干”、“青年团斗倒‘还乡团’”等反动谬论,分清是非,在不断强化组织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各项

活动。1978年,句容县各级团组织广泛开展“共青团工作必须分清路线是非”和“共青团在完成新时期总任务中所肩负的责任”的大讨论,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把理想信念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各级团组织还广泛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学“硬骨头六连”等活动,广大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此同时,团县委还组织宣讲团和宣传队,广泛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1978年年底,团县委组织全县青年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当新长征突击队”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县妇联带领全县妇女围绕生产中心,积极开展“三八红旗手”竞赛活动、“五好家庭”创建活动。组织开展“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六十六周年”活动及开展学习雷锋群众运动。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广泛组织开展“银花组”、“女饲养能手”、“女子红专农科队(员)”等生产劳动竞赛活动,积极投入以田管为中心的“四个大战役”,为夺取夏季作物丰收献计献策,夺取三麦、棉花、水稻高产。城镇妇联发动广大女职工和职工家属认真学大庆、赶韩桥,积极参加“百日红”革命竞赛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做好“五节一储”活动(即:节约用粮,节约用电,节约用水,节约用钱,一储蓄)。

与此同时,县妇联还组织发动广大妇女开展以“三赛三比”(赛学习比思想,赛团结比风格,赛干劲比贡献)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业系统大搞超产节约运动,以节约求速度,以挖潜力求增产;农业战线在1977年金花、银花赛基础上,积极开展以“三赛三比”为中心的一、二、三级拔尖赛活动。全县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的号召,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好妇女扫盲工作。同时,全县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妇女人才,基本建立起一支稳定、有较高素质的妇女干部队伍,保证妇女工作的有效开展。

第三节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碎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全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广大干群强烈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社会事业的混乱局面。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工作步履艰难,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句容县恢复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进展迟缓,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脱离实际,全县各项工作仍在徘徊中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句容县委紧紧抓住批判“两个凡是”,利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这个突破口,在思想认识上实现拨乱反正。在县级机关读书班上,部分县委常委参加学习,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学习体会,认真组织、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对开展这场讨论重大意义和目的的认识;县委党校举办短期轮训和冬训班。1979年冬训内容就是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为中心,集训11000多人。在群众宣传工作方面,通过有线广播、文艺宣传、报告会等形式,大力宣传破除“两个凡是”以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从1979年—1980年11月,主要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真理标准问题等。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精神,在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理基础上,结合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完整、标准、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明辨是非,肃清流毒、解放思想。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马克思

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讨论,广大群众懂得了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包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以及领袖人物的文章、讲话和批示等,它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通过学习和讨论,句容广大干群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实际出发,干好句容的各项工作,必须在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必须以本地实际出发,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样,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逐渐把广大人民群众从多年盛行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明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两年多来句容县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为随后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十二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 初步恢复与发展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句容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各项事业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在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县委在经济建设按照上级部署，进行拨乱反正工作，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加快工业和队社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潮泛滥，在农村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取消劳动定额，推行大寨式记工，结果是劳动能干的评不过能说会唱的。在生产布局上强调“以粮为纲”，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高喊“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大批促大干”，生产上“大呼隆”，分配上“一拉平，大锅饭”。1975年句容县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各种“左”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严重挫伤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由于句容县广大干群顶住压力，排除

“左”的干扰,坚持生产,1977年、1978年两年期间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等仍有所发展。

1977年1月9—15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了句容县一年来农业学大寨情况和经验,提出了1977年建成大寨县的任务和措施。3月中、下旬,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组织870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115个大队和82个集镇单位;镇江地委也派出13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一个公社。是年,县委几次召开会议,对照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找差距,订措施。1977年,农业战线在揭批“四人帮”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42200万斤,是句容历史上第八个粮食产量超4亿斤的年份,全县有401个生产队比上年增产增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两个改革(旱改水、单改双)、增加三肥上做文章;另一方面,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尤其是句容河、大道河、朝阳洲工地,及宁杭公路一条线,东西南北八大冲以及袁巷、磨盘交界处的“轿子顶”农田整治土地。10万治水大军顶风冒雨,一举完成土石方1575万方,占地区分配任务的65.6%,比1976年同期增加3倍多。与此同时,扎实开展以越冬作物田间管理为重点的冬季生产运动,全县所有社队都因苗制宜,分类促进,分别采取泥浆泼浇、滚麦镇压、退施提苗肥、敲土壅麦等措施,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1978年,是县委提出的“三年内大见成效”的关键年。农业方面,县委提出“三个大搞”(即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肥料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及“三个增加”(即农业对国家贡献增加、农业公共积累增加、社会分配收入增加)的目标。是年,句容县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旱,春旱连夏旱,夏旱连秋旱,时间长、范围广、灾情重,1至10月份降雨量只有365毫米,在抢栽后作稻的紧要关头,全县55座小型水库及62000多个塘坝,均已干涸,县属八大水库干了7座,很多地方连人畜饮用水也发生困难。在严重的干旱面前,全县广

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革命化、水利化和机械化的威力,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组织千军万马、千车万机,向旱魔展开了一场顽强的、持久的战斗。县委常委包片,部局长定线定站,带领1800多名三级干部和15万抗旱大军,在抗旱斗争第一线,查旱情,排水源,定线路,抢做翻水机台,开挖引水沟渠,完成土方273万余方,通过多级翻水,把长江水翻到最干旱的地区。亭子公社胥王大队架机22级,把北山水库的水翻到海拔147米高的钉耙山岗上。由于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严重干旱,粮食总产超1977年,是句容县解放后第9个粮食总产超4亿斤的年份;棉花产量成倍长,工副业产值翻一番;绿化造林取得了新的成绩。据统计,当年全县粮食总产44769万斤,比1977年增产2000万斤,出现了增产1000万斤的郭庄公社、增产100万斤的3个大队、增产10万斤的58个生产队;棉花单产53斤,总产32000担,比1977年翻一番,生猪圈存量18.8万头,比1976年同期增长11%。

二、工业和交通业的恢复与发展

1976年,句容县工交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高举工业学大庆的旗帜,坚决贯彻“鞍钢宪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6328万元,比1975年增长26.8%。小农机、小水泥、小化工、小五金、小百货等企业433个,比1975年增加118个;工业产值达2510多万元,比1975年增长55%以上,铜矿石和铜金属量百分之百完成了国家计划。硫精矿超额完成计划11%,石灰石超额完成计划7%,白泥超额完成计划24%,石灰超额完成计划2.8倍。为巩固壮大社队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积累资金、支援农田水利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交通运输业为农业服务做出了贡献。县交通运输业开展“农业要大上,工业要大干,交通运输要多拉快跑、快装快卸”的劳动竞

赛,1976年超额完成运输计划115%,比1975年增长24.38%,计划周转量24330万吨/公里,超额完成计划周转量16.3%,比上年增长14%。

1977年,全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继续推进,各项事业较上年均有较大起色。工业战线努力克服煤、电、原材料不足等困难,大干快上,完成总产值6498万元,占年度计划的108%,比1976年增长30.6%。突出的是化肥生产,下半年保持日产70吨的高产纪录。农机部门加强农机管理,配合工业部门生产了一批盖麦机,试制成功压麦机,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1978年,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动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深入开展,企业整顿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通过“赶韩桥,创百日红”及“质量月”等活动,工业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全县上半年完成工业生产总产值35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83%;社队工业上半年新办企业66个,完成总产值23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交通运输系统,完成货运量26.79万吨,周转量1712.4万吨/公里,分别为年度计划的50.55%、60.3%,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9.7%、32.3%。1978年工业战线在缺电缺煤和其他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225万元,社队企业产值5440万元,比1977年增长50.5%。交通运输系统全年完成货运量53万吨、装卸量90.8万操作吨、周转量2840万吨/公里,提前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全年财政收入1090万元,比1977年增长11.1%;农村产品收购总数1633万元,比1977年增长29.7%;商品购销总额6054万元,比1977年增长16.8%。

三、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1977年以后,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大。197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4216万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69元,分别是1949年的4.43倍(未考虑物价指数,下同)、2.56倍;财政收入1091.90

万元,人均 20.33 元,分别是 1950 年的 2.42 倍、1.40 倍;金融机构存款 2562 万元,其中居民储蓄 251 万元,人均分别为 47.69 元、4.67 元,分别是 1950 年的 170.80 倍、125.50 倍,人均分别是 1950 年的 99.35 倍、77.83 倍;国民收入总值为 12722 万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9.5%),人均国民收入为 237 元(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88.1%)。1978 年全县国民收入使用额为 12617 万元,积累总额为 2939 万元,积累率为 23.3%。1978 年,全县消费总额为 9678 万元,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 76.7%,其中居民消费总额为 9011 万元,占全县消费总额的 93.1%。人均消费 169 元,社会消费 667 万元,占消费总额的 6.9%。

落实工资政策。1977 年年底,按上级文件要求,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国营农林场圃、县属集体单位,对 1971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6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进行调资,调资面为 40%。全县有 12699 人职工工资升、靠级,月增工资总额 2.66 万元。1978 年,全民单位按全部职工人数 20% 比例,对工作成绩突出、工资较低的 294 名职工、110 名干部进行调资升级,月增资总额 2387.7 元。

第二节 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分重视科技队伍中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工作,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迫离开科研岗位的科研人员回到科研岗位。其中为 22 名干部平反昭雪,为 53 名教学人员和 34 名医务人员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时还安排社会闲散科技人员 155 人。对 167 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调整使用 41 人。从科技人员中选拔担任单位业务领导 11 人。

1977年底召开的句容县科学大会,奖励了16项科技成果,表彰124名先进科技工作者。1977年4月恢复句容县科学技术委员会,1979年5月恢复句容县科学技术协会。

1976年8月成立句容县农业机械研究所,主要任务是农机具的小改小革、新式农机具的试制、考核、引进、推广。1978年,配合镇江地区农机化研究所,在天王公社前进大队设农业机械化试验点(系省、地、县三级基点),重点对新式农机具试验使用、选择、改进。并在下蜀农具厂、天王农具厂、天王农技站设农业机械试验基地,测试、改制农机具。

为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县广播站于1977年创办了《科学常识》(后改名为《科技与信息》)和《紧要农事》两项专题节目。《科学常识》节目内设“田老师谈生产”、“本周农事”、“良种介绍”、“农家致富经”、“农民信箱”等栏目,由县农业科技人员根据农时季节,系统介绍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句容县科协、科委在城镇街头合办科普画廊两处,共24块版面,每月刊出一期,主要内容有科学常识、技艺传播、卫生保健和生活知识等。有18个乡(镇)科协也在当地举办科普画廊。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句容县进一步充实科技情报工作力量,各厂矿先后建立科技情报组55个,有情报员156人。

句容县林场经过四年反复的研究试验,于1971年配制出防治白蚁草药烟剂和化学烟剂。草药烟剂通过23万巢的灭蚁剖析,效率达100%,这一灭蚁方法属国内首创。1976年,在南方八省三市的白蚁防治工作会议上受到与会代表一致好评,并得到推广使用。1978年,此项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对“两个估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客观总结教育事业的成就和教训，为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句容县委审时度势，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教师的认识和积极性，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加强了对学校领导班子的整顿和调整，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教师重返教育岗位。至1978年春，全县各学校基本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恢复和提高。

1978年，全县停止使用1969年县内自编1—7年级教科书和教学大纲，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恢复小学六年制和初、高中三年制的过渡，调整学校布局，全县3班以上的小学由292所调整为265所，单式班由1417班调整为1152班，复式班从469班调整为503班。1978年，全县共有中小学235所（其中完中35所），在校小学生36931人，教职工2101人（其中民办教师913人）。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教师队伍建设，把师资队伍建设列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项关键工作来抓。1978年，句容县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恢复发展各类成人教育。1978年9月县教师进修学校开设函授班，分设中师、幼师、大专班，逐步形成扫盲、业余教育、电大、自考大学等多层次、多途径的成人教育体系。同时，全县教育部门以农村扫盲为重点，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双线”承包制：由各级政府层层承包，列入目标管理内容；教育部门层层承包，将扫盲列入农村学校岗位责任制考核内容，实行“双向包教包学”合同制，脱盲3.5万人。

1977年10月，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全县高中毕业生 1977 年，被高校录取 30 人、中专 26 人、中等师范 38 人；1978 年录取高校 71 人、中专 28 人、中等师范 36 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明显提升，也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求学之门，重新掀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

粉碎“四人帮”后，句容县各项社会事业进入百废待兴的新时期，其中，县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促进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县委进一步加强对卫生事业的领导，对卫生工作进行了整顿，健全完善医院的规章制度，一大批遭受各种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医务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卫生系统 9 名同志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为 47 名在“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落实了政策，对 6 名解放以来遗留的历史问题按政策予以解脱，对 1961—1965 年精简下放的卫生工作者重新安排工作。1975 年，句容卫校恢复招生，办学规模逐年扩大，成为省教委认定的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农村“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继续发挥为农村群众防病治病的积极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句容卫生事业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新局面。

1976 年 10 月，原句容县革命委员会血防领导小组改名为中共句容县委员会血防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第九次血吸虫病流行区病情普查，共检查 68 个大队，抽查 81028 人，300225 人次，查出病人 2165 人，治疗 2008 人。1977 年，血防组织了查治病（第十次）查灭螺会战，抽查 71 个大队，计 82910 人，查出阳性 1091 人，治疗 1054 人。1978 年，血防工作在全县抽调 150 人组成 30 个粪检组，在全县 30 个大队开展第十一次查病会战，检查 32476 人，查出病人 358 人（连同前遗留共计 798 人，治疗 434 人），查出有螺面积 749636 平方米，完成灭螺土方 355931 平方米。自 1970 年始，经过连续 9 年的群众性查、灭螺和查、治病大会战，于 1978 年达到

了中央规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

自 1977 年起,句容县对 7 周岁以下儿童实施计划免疫。同时加强对传染病的管理,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网络,制定各种急性传染病防治方案和技术规程,句容县传染病防治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1977 年 1 月,县人民医院开展心电图检查,并陆续为基层医疗单位培训心电图专业技术人员 35 人。3 月,句容县药品检验所成立。是年,县疟疾防治工作打了 3 个战役,休止期根治 23882 人,阶段清理复治 21785 人,全民预防服药 1452161 人次;进行了结核病普查,为 12 万人作了胸透,查出病人 6203 人。1978 年 1 月,句容自来水厂完成投资改造 35 万元,日供水 5000 立方米。全县完成各项预防接种 699952 人次。

三、文化、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句容县文学艺术逐步繁荣,文化机构和文化场馆逐步建立并恢复正常工作。

群众文化日趋活跃。“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俱乐部被文化室取代,1976 年以后,又逐渐恢复俱乐部,开展正常活动。作为组织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事业部门和主要阵地,句容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文化馆、站的建设,在 1974 年全县 15 个建立民办公助文化站的基础上,1978 年又在句容县城和茅山镇建立 2 个国办文化站,每站 1 人。至此,全县 23 个乡镇都有了文化站。长期以来,文化馆、站及农村俱乐部,紧密配合中心任务,运用黑板报、幻灯、读报组、展览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组织开展文艺活动。1978 年,县文化馆主办参与多次较有影响的活动,如 1978 年排演大型话剧《于无声处》,演出 10 余场。

文艺创作方面,县文化局于 1978 年成立专业性的创作组,创作组成员一面个人创作,一面辅导众多的作者,群众性的创作活动

蓬勃开展。1978年,县文化馆创作的现代戏剧《柳玉芳》参加镇江地区专业剧团现代戏创作剧目会演,荣获创作一等奖,同时还获得剧本奖、作曲奖、舞美奖、导演奖和演出奖,并被推荐代表镇江地区参加省专业剧团会演,并由《江苏戏剧》发表。

电影戏剧有序发展。1976年,各公社先后建起自己的电影队,大的厂矿企业单位也成立电影放映组,到1977年全县共有放映单位36家,工作人员102人。197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在北大街建造1500座的句容影剧院,于次年10月竣工开业。

1978年,句容县城880平方米的书店营业楼建成,增设了门市部,图书品种、销售量大幅提升。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改体育课为军体课,有的学校以劳动代替体育,或以军事徒手操、投弹、射击、野营拉练取代体育课。1977年后,学校体育逐步走向正常,中小学生经常开展体育锻炼,体育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1975年5月,《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颁布实施后,县体委印数千册,及时发至全县各中小学普遍推行,达标率逐年提高。1977年恢复句容县少年业余体校(后改名句容县华阳学校),设田径班,学员40人。1976—1978年,句容县体育事业经费均为16000元/年。

1977年,在镇江地区首届知青篮球比赛中,句容县知青男篮荣获第三名,女篮获第九名。

结束语

1949年4月23日，句容解放。从此，句容揭开历史的新篇章。

在句容解放后的头七年，中共句容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省、地委的部署，领导句容人民开展剿匪肃特、组建地方人民武装、打击不法投机、稳定市场物价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进行民主改革，着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全县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1953年后，中共句容县委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从1956年党的八大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十年，是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句容同全国一样，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引下，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创20世纪50年代的句容历史纪录。1957年，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致使工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句容县委贯彻党

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总结 195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全县的国民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1963—1966 年全县每年粮食总产超历史最高产的 1956 年，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极左思潮横行，句容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党的领导被否定，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大批群众受到诬陷与迫害，句容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遭受十分严重的破坏。句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采取各种方式的抵制，坚持奋战在生产一线，努力降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受损程度，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句容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各项社会事业重现生机，国民经济在两年徘徊中有所发展。1978 年，句容县地区生产总值 1.42 亿元，人均 269 元，分别是 1949 年的 4.43 倍（未考虑物价指数，下同）、2.56 倍；财政收入 1091.90 万元，人均 20.33 元，分别是 1950 年的 2.42 倍、1.40 倍；金融机构存款 2562 万元，其中居民储蓄 251 万元，人均分别为 47.69 元、4.67 元，分别是 1950 年的 170.80 倍、125.50 倍，人均分别是 1950 年的 99.35 倍、77.83 倍。

从以上的数字分析可以看出，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的 29 年，尽管出现“左”的错误，但在纠正错误之后，经济仍有较大发展。

句容解放 29 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二是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和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

段,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而阻碍生产力发展;三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而不能搞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急躁冒进。四是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依法治国,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五是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绝不能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句容解放后 29 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 29 年的历程中,虽然党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党能够自己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29 年的历史证明,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什么时候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就遭挫折、受损失。

29 年的句容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句容解放后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句容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句容人民才能彻底摆脱贫穷与落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句容党组织一定能够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带领句容人民谱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附 录

大事索引

(1949年4月—1978年12月)

1949年

4月23日 句容解放。

4月26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镇江专员公署。同日句容县人民政府对句容县国民党政权全面开展接管工作。

4月下旬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布告。

5月2日 镇江地委公布:洪天诚、迟明堂、程文、储玉祥组成中共句容县委员会。洪天诚为书记,迟明堂为副书记。

6月3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肃清武装散匪安定社会秩序严禁偷盗恢复生产”的布告。

6月12日 镇江专署公布:洪天诚为句容县县长,程文为副县长。

6月30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民禁字第一号布告,严禁吸毒、贩毒、赌博等社会恶习。

是月 句容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城乡开展城镇筹款、农村借粮工作。凡有土地23.5亩以上的粮食富裕户都向外借粮,并用累进办法进行。计划借粮150万斤,实际完成171万斤。

7月6日 苏南军区镇江军分区任命洪天诚为句容县总队政治委员,何畏为副总队长。

8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0月1日 县城各界群众在城中小学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7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1949年秋季征收公粮》指示,对征收办法与负担标准、减免等问题作出规定。

10月9—12日 句容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11月6日 中共句容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区委正、副书记,区委委员及正副区长、粮库主任会议,研究秋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2月2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句容划归南京市所辖,1950年1月仍划归镇江专员公署。

12月17日 中共镇江地委决定成立句容县治安委员会,由洪天诚等5人组成,洪天诚为书记;同时成立县财委会,洪天诚为书记。

1950年

1月6—8日 句容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就政府工作、开展冬学运动、购买胜利折实公债、优待烈军属作出4项决议。

1月14—18日 句容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有关减租、生产备荒、冬防、治安等决议;选举迟明堂、魏永贵等41人组成县农民协会。

3月8—14日 六区虬山、高阳乡,三区古隍、中心乡及二区

伯群乡先后发生少数坏分子煽动抢劫国家粮库事件,被抢稻谷 7.5 万斤,后追回 6 万斤。事后,煽动抢粮的主犯赵天福等 5 人被处决。

是月 全县人民踊跃认购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人民折实公债。第一期任务为 2 万份,实际售出 2.25 万份。

4 月 2—4 日 句容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内容为贯彻以生产度荒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结合讨论剿匪肃特、增加税收等工作任务。会后,句容县政府发放以工代赈大米 10 万斤,救济粮 26 万斤,解决部分受灾农民的暂时困难。

5 月 14 日 中共句容县委决定成立土地改革工作队,并首先在四区延福、淮源两乡进行土改试点。

6 月 20—23 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首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是月 为适应即将全面开展的农村土地改革的需要,句容县 9 个区、75 个乡镇改划为 10 个区、92 个乡镇。

7 月 鲁光任句容县县长。

8 月 7 日 县土改干部轮训班开学。共办 3 期,学员总数 855 名。

8 月 15 日 在职干部整风学习,共 165 人参加,9 月 25 日结束。

8 月 17 日 中共句容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迟明堂为书记。

10 月 28—31 日 句容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是月 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重点打击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反动势力。

11 月 25 日 句容县成立人民法庭,洪天诚任审判长;各区成立分庭。

是月 由工、农、青、妇、文教、医务、工商等各界代表 29 人组

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句容县分会”。全县 10 个区、3 个乡镇先后成立了支会。

1951 年

1 月 贯彻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精神，人民群众开展诉苦、斗争。全县共斗地主 1080 名、恶霸 107 名。在土改中，群众自愿加入农会的有 43859 名（妇女 16622 名），加入青年团 231 名，加入民兵 6786 名，扩大县、区武装 117 名。

3 月 8 日 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1958 年更名为县妇女联合会。

3 月 13 日 武装土匪吴立恒等在二区下甸乡一带活动，民兵围捕并将其击毙。

3 月中旬，全县土地改革基本结束。63448 户、179637 名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耕地和其他胜利果实。

4 月 22—25 日 句容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继续、普遍地深入开展抗美援朝活动、镇压反革命、大生产运动、政府工作报告等决议。

5 月 1 日 全县有 15 万人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活动，广大群众纷纷在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书上签字。

6 月 9 日 县委首次召开市镇工作会议。会上依据各地人口与工商业状况确定了城区、龙潭、下蜀、桥头、东阳、天王寺、三岔、葛村、新塘 9 地为集镇。

7 月 2 日 句容县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7 月 5—8 日 句容县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成立句容县总工会。

7 月 30 日 县召开宣判大会，共宣判案犯 80 人，其中处决 3 人。

9月12日 鲁光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11月11日 成立县工农业业余教育委员会,开展冬学运动。

11月14—17日 句容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建新作政府工作报告。

11月20—22日 句容县工商业联合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2月4日 全县共有10个区、92个乡、343823人;中共党员293人(党支部27个),其中老区党员234人,解放后新发展53人。

12月5日 县委确定城东乡为建党试点乡。

12月24日 句容县专业建设委员会成立,陈建新兼任主任。

12月底 县委召开机关干部党员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号召全县党员和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下同)运动。

是月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精神,全县组织临时互助组2061个,季节性互助组546个。

△ 陈建新任句容县长。

1952年

1月 由刘伯承指挥的诸军兵种协同的现代化作战演习,在行香与陈武两乡交界处展开,历时1天。县机关干部和城区、二区、三区的部分干部应邀参观。

1—2月 全县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教育,24户有违法行为的工商户被处理。

2月29日 全县农村组织和恢复互助组1688个,5月16日

增加至 6696 个。

3月6日 根据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县、区一律停止‘三反’，全力领导生产”的决定精神，句容县即行转变。

4月4日 县召开互助组长代表会议。会上发起了爱国增产竞赛。

7月30日 县委通过农民协会举办互助组长训练班，第1期195人，第2期285人，8月21日结束。

10月8—10日 县委召开乡党支部书记和传授站站长联席会议，91人出席。

12月4—6日 县召开评选优抚模范代表大会。

12月7—10日 县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

12月12—16日 县委召开城工会议。

12月26日 县委决定对县级机关党组织开展整党工作，时间1个月，着重整顿党员思想、作风问题。

是月 陈建新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 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人民武装部成立。

1953年

1月2日 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参军工作。会后，全县掀起了参军热潮。

1月18—20日 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内容为继续贯彻“抗美援朝、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三大任务。讨论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民主建设、贯彻婚姻法、认真做好财经工作等决议。

1月中旬 县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要是贯彻《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检查执行情况。

1月27日 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在

县、区、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简称“新三反”)的指示。

2月9日 全县成立第一个信用互助组——张庙乡第五行政村滕万程信用互助组。39户、145人参加,决定每人缴股金5角。

2月19日 取缔反动会道门。全县9718名道徒退道。

3月15日 县委以干部会议形式,集训区、乡干部,开展“新三反”斗争。共分两批集训了642人,至4月4日结束。

春,大同乡(今属华阳镇)铃塘村试办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5月23日 县在城东乡和下蜀镇进行民主普选工作试点,于7月11日结束。至1954年3月18日普选结束,选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21名,分别召开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6月19日 龙潭镇划归南京市。

9月20—23日 县委召开县、区、乡干部扩大会议,部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1月21—23日 县委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11月24日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会上布置了粮油统购统销任务。

11月28日 县委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省、地、县205名干部下乡,分片向广大农民宣传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宣传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确保统购统销任务的完成。12月16日,全县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全县紧紧围绕粮食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化运动开展了整党工作,至1954年2月底结束。参加整党的共68个党支部、950名党员。结果清除出党8人,留党察看3人,撤销职务2人,说服退党2人,严重警告10人,劝告1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10人,延长候补期20人。

是月 郭志强任句容县县长。

12月5—21日 县委试点乡一区大同乡(今华阳镇)连续两

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及粮油统购统销任务。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迟明堂作《关于总路线与总任务》的报告。县长郭志强等人分别作了提示说明,县委书记陈建新作总结。

1954年

2月13日 县举办农业合作训练班。共举办3期,919人参训。

4月7日 县烈军属,残废、复员、转业军人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187人出席,贯彻拥军优属工作和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

4月19—21日 县首次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55名。

6月 曹云兰任句容县县长。

7月11—15日 句容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是月 入夏以来连降大雨,天王镇水深2尺,句溧公路交通中断,全县倒圩28个。县委号召各级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斗争。

11月11—18日 县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贯彻了以统购统销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

是月 根据上级党委通知,中共句容县委设立常务委员会,首届常委由陈建新、李永月、曹云兰、张新光、张立业5人组成。

是年 县血吸虫病防治所成立(1956年改为“县血防委员会”)。

1955年

2月25日 全县对试行义务兵役制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受

教育的人数达普选人口的85%以上。首次征召新兵809名,3月31日入伍。

3月21—27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

是月 李永月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4月1日 县委作出《关于处理自发社的决定》(草案)。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自发社有531个。

4月15—20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具体布置整社、统销补课工作,以及对粮食实行定产、订购、定销的“三定”工作。

4月22—25日 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县长曹云兰作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3人,曹云兰任县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5月13日 从1954年10月至1955年5月上旬,全县农业社建立党支部15个,发展党员900名,各乡均有党支部。

5月28日 县人民检察院成立。

是月 国家监察部农村工作调查组赴句容县调查乡村干部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等问题。

△ 县召开首届手工业者代表会议。

6月2—4日 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乡党支部书记会议,贯彻省委继续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面积增产运动的精神。

6月25日 为加强各财经企业单位的领导,成立县财粮贸办公室,曹云兰负责领导,下设四个组。

7月14日 据统计,一年来,全县共建农业社594个,18131户入社,占总农户的22%。

7月18—22日 县召开复员建设军人代表大会。

7月中旬 句容县粮食定产、订购、定销到户工作开始试点。

10月9—17日 县委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主要内容是以整风精神总结工作,发动全体党员团结全县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为强化党的纪律工作,会议通过了“撤销纪律监察委员会、成立县委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推选7人组成监委会。

10月22日 县委批转团县委《关于三台阁农业社建立青年突击队的报告》,指示“各区委在秋种中认真领导团委,由点到面逐步推向全面建立青年突击队”。

10月28—31日 县委召开互助合作工作队及区委副书记、驻社指导员会议。会上贯彻了地委关于对农业社“停止发展,全力转入巩固”的指示,对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作了检查,讲明了提高老社、巩固新社的重大意义。

10月29—31日 县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11月 句容县兵役委员会成立,李永月为主任委员。

12月 年终统计,全县已组织初级形式的农业社1551个,49878户入社,占全县总农户的61%。

1956年

1月27—31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省委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提出一切都是为了增产,当年粮食亩产要达到570斤,争取600斤。

是月 全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形成热潮。1250户工商业者获准公私合营或经销代销;个体手工业者已组织生产合作社(组)50个,入社人数占89.1%。76.2%的木帆船户也被批准入社。

2月18—25日 县委召开高额丰产社代表会议。会议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精神制定了规划,开展高额丰产竞赛。

3月12—14日 召开全县工业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工业工作会议精神,着重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

3月30日 全县已结束7个落后乡和31个落后选区的改造工作。

4月10日 区、乡建制进行调整。原9个区、1个县属镇、92个乡调整为5个区、1个县属镇、50个乡。

4月25—28日 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409人(其中妇女代表36人),列席代表46人。大会听取了李永月代表上届县委所作的《一年来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等决议;大会选出委员29人、候补委员7人,组成县委会。县委一届一次全会共选出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县委书记李永月,第二书记曹云兰,副书记傅众一、宋敏、戎定和。会上还选出了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4人。

6月 句容县委增设政法部与林业部机构。

7月1日 中共句容县委机关报《句容报》创刊发行。1961年1月1日停刊,共出版731期。

7月16日 国家监察部农村检查组周景芳作《关于句容县强迫命令违反乱纪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在1954年的粮食征、购、销运动中,某些干部未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坚持耐心说服教育群众的方针,发生了很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参加运动的550名干部(不包括村干部)犯错误的共有125人,占22.73%。”“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迫使部分农民出卖了口粮(后来虽然供应,但每人每月只有10斤口粮),生活陷入困境。”“结果全县农村的供应面达到47129户,占总农户的56.45%。”

7月28日 全县首批“肃反”单位(县党、政、群单位)学习结束,有12人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占学习人数的2.24%。

7月29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第一书记李永月传达了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8月23日 全县第二批“肃反”单位(县、区企事业及区党政群单位)学习结束,有29人被错定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占参加学习人数的1.9%。

8月14日 撤销区级行政建置,原东昌、黄梅、下蜀、天王、赤山五个区公所撤销。全县设置21个乡、1个镇。

是月 门盛德任句容县县长。

10月5—11日 县召开区、乡干部及全体农业社长会议。

11月27—30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12月3—10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指出1956年农业增产是战胜4次台风、3次大水及严重病虫等自然灾害后获得的,粮食总产量比1955年实际增加1482万斤。县长门盛德在会上宣布,全县农村已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99.6%,其中高级社占98.09%。

12月27—29日 县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应到代表214名,实到代表197名,列席代表16名。宋敏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传达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讨论对6个圩区遭灾后的救灾措施,作出关于当年冬春工作任务的决议,选出人民委员会委员14人,门盛德为县长。

1957年

1月28日 县有线广播站对全县开播。

2月12—19日 县委召开1957年增产节约动员大会。

3月6—8日 县委在天王乡蔡巷社召开乡总支书记会议,研究如何争取夏熟生产丰收,落实“三包一奖”工作。

3月8日 县委举办哲学讲座。

3月19日 县委通报了黄梅乡火炬农业社如何推行“六定”（定田、定人、定活、定质、定量、定工）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及经验。

4月2—5日 县农、林、水、畜牧等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会议在县城召开。

4月4日 县召开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

5月15—17日 县委举办县机关科局长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学习班。

6月24日 县委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县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干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帮助党整风。下半年开展反击右派斗争。

9月21—24日 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因县长工作调动，补选曹云兰为句容县人民委员会县长。

10月14日 从4月份开始的县级机关增产节约和精简机构工作告一段落。撤销和合并了17个部门，448名干部到农业第一线或充实基层。11月22日 省级机关27名干部下放到句容当农民。

10月30日 县委发文，对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作出计划安排。

10月11—14日 县委开全县第一次物价会议。

10月12—16日 县召开烈军属、残复军人代表会议。

12月底 全县粮食总产159851吨，人均占有粮食437.3公斤；饲养生猪130149头，年底圈存87987头。

1958年

1月9—10日 县召开社会主义农业高额丰产模范会议。208名农业高额丰产模范代表与会。

1月25日 县举办的首次农业展览会揭幕。展览会设有农、林、水、文教、卫生等馆,系统介绍句容解放后8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展览会展出50天,接待观众达15万人次。

1月26日 全县组织4万余人,开展以除“四害”(麻雀、老鼠、蚊、蝇)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2月1—6日 中共句容县第一届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

2月12日 县城2500人集会,欢送县机关首批42名干部下乡当农民。

3月9日 句容县委决定建立在统一领导前提下分工负责制。

3月20—21日 县委召开有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乡党委书记会议。总结前阶段工作,开展评比竞赛,会议提出“千斤粮食万斤山芋百斤棉,决心赶上和超过常熟县”、“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

3月 全县面积最大的二圣水库动工兴建。集水面积103.5平方公里,总库容6530万立方米。

4月15日 县委成立技术指导委员会,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永月等13人组成,李永月任主任。乡成立技术推广站,社成立技术研究小组,生产队有技术员。

5月11—15日 县委召开乡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发动全县人民鼓足干劲争上游。会议决定抽5%—10%的全县劳力,会战全县时称8大水利工程,力争7月底前竣工。

5月15—18日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县人民委员19人,第二届省人大代表3人。曹云兰连任县长。

5月30日 是日起,全县严重干旱68天,部分地区百日无雨,受旱面积19.40万亩。全县开展抗旱斗争。

6月16—18日 县委召开现场会,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与会人员参观了大卓乡云塘社和宝华乡楠江社。会议提出“保证水稻亩产3000斤,力争秋后上北京”、“指标七倍跳,措施十倍跳,干劲百倍跳”。

6月21—24日 县委召开兴办地方工业跃进会议。7月中旬,成立工业远征采矿团,组织万人上山采矿,两个月全县就兴办各种厂、矿5353个。

6月26—28日 县委召开有11328人参加的全县建设社会主义英模跃进大会。会议评出三麦一、三等丰产乡各1个,一、二等三麦丰产社各4个,三等丰产社5个,丰产队95个,评出各种英雄模范293人。27日公布二圣乡西城社21队1.56亩小麦,亩产3263斤,为“高产区卫星”(实际用几十亩田里的小麦拼凑,骗取出席全国农业丰产经验交流会机会)。

7月 三岔乡在每个生产队办起集体食堂,全乡2358农户都参加食堂吃饭。

8月1—4日 县委召开由1051人参加的工业战线上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

9月7日 全县第一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黄梅人民公社成立。时隔3天,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

9月15日 经国家林业部评定,句容县为“全国林业先进单位”。

9月20日 句容、溧水、高淳及武进常备民工5万多人,在县城西郊西庙北建“小、土、群”钢铁基地,用铁锅、生铁、矿石土法炼钢铁,不久关闭,124万元付诸东流。全县山林遭严重砍伐。

9月21日 据不完全统计,自春节后开展的除“四害”运动,共投入人力184.17万人次,捕鼠238.43万只,灭蚊2359公斤,灭蝇蛹14.12万公斤,捉麻雀196.06万只。

9月23日 县委决定,县成立民兵师,下设8个团、1个直

属营。

9月24日 句容县“肃反”运动检查验收结果的报告上报。句容县“肃反”运动自1958年4月中旬试点,5月初全面展开,8月底基本结束。涉及5260人,分布22个乡镇。经过运动,共清查反革命及坏分子共144人。

10月6—7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10月大决战任务,会议传达镇江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阐述10月份大决战的意义,深入思想动员,力争项项工作放“卫星”。以25%的劳力干工业,75%的劳力干农业,保证10月底产铁1208吨,产钢20吨—30吨。

10月29日 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句容视察张庙第一养猪场。

11月5日 句容县委对各人民公社分配工作提出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必须办好食堂,包括老人食堂、儿童食堂和普通食堂。

12月 葛村公社掀起冬季造林运动,下马岗2.5万亩桑园成林后,经济效益好。林业部组织北方16省、市代表前来参观。几年后,“以粮为纲”退桑还田,桑园被毁。

是月 全县粮食总产127135吨,比1957年减产32716吨;人均占有粮食346.1公斤,比1957年减少91.2公斤;全年饲养生猪177054头,年底圈存95436头。

1959年

1月23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句容县委关于宝华人民公社仓头、铜山两个大队近一年来人口死亡情况及其原因的调查报告,指出:这个别的突出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则带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省委要求“务必防止再发生这类令人痛心的事件”。

2月18—25日 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546人,列席代表663人。18—23日为预备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省三届三次党代大会精神,联系句容实际,统一思想认识;24—25日为正式会议。曹云兰代表句容县委作工作报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肯定1958年的“大跃进”,并要求“更大跃进”;选举第二届县委会,在二届一次全会上,李永月当选县委第一书记,曹云兰当选县委第二书记。

2月27—28日 句容县召开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中央科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省科协会议精神;成立句容县科协,选出31名科协委员,李永月当选县科协主席。

2月 茅山水库大坝合龙蓄水。

3月19—21日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通过成立句容县人民公社联社等决议。

3—4月,县委召开有生产队长参加的6000人大会、8000人的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纠正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简称“一平二调”)的偏向,宣传实行“分级管理,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政策。

4月3日 句容县委针对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通过会议共同研究制定了五项规定,作为公约,自觉执行。内容包括:对上级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走群众路线;人人搞试验田,个个学农业技术;参加体力劳动;严格组织生活,共5项17条。

4月12—16日 县委召开全县工业、交通、邮电、厂矿企业职工誓师大会。

4月下旬—9月中旬 县委分四批召开党员扩大会(10037人),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清算经济账和作风账,火烧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打击强迫命令和浮夸风,大破贪污浪费。会议讨论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等问题。

5月15日 句容县委对防治浮肿、干瘦等病作出紧急指示。

包括：必须加强对防治浮肿病工作的领导；对浮肿病人的生活要认真照顾；大力发展副业生产；管好食堂等。

5月19日 经省和常州地委同意，句容恢复原来一乡一社，原黄梅公社是四乡合一（黄梅、大卓、城东、石狮），现仍改一乡一社，全县由19个公社调整至22个公社。

是月 句容水库、仑山水库大坝合龙蓄水。

7月8—12日 县委召开全县市场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缓解市场供应紧张的措施是大力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

9月 中共句容县委党校成立。

10月5—10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精神，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错误地开展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谓反党行动，进一步“反右倾”。

11月22日 历经4年，分为两大阶段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结束。

12月10—24日 中共句容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重点揭发批判县委第二书记曹云兰的所谓“右倾错误”。

是年 7—10月干旱，未降透雨，全县受旱面积34.7万亩。据统计，全县全年粮食总产71135吨，比1958年减产56000吨，每人占有粮食199.4公斤，比1958年减少146.7公斤。

1960年

1月13日 县委报送句容县翻引长江水灌溉工程计划。提出新建北山长江水灌溉工程，从长江桥头港便民河翻引江水入北山水库，调节北山南部的全部山区水库，居高临下灌溉。此项计划

直到 1978 年才开始实施。

1 月 18 日 北山水库(原名普渡桥水库)大坝合龙蓄水。

1 月 19—23 日 县委召开句容县大办县社工业誓师动员大会。

1 月 25 日 县委召开句容县春季造林誓师动员大会。1959 年,句容造林 7.62 万亩,四旁植树 266.6 万株、育苗 3833 亩、养蚕 7293 张、产茧 2484 担。

2 月 15 日 县委要求搞好农田肥库基本建设,5 亩 1 个草泥塘,10 亩一个沤肥坑,100 亩 1 个贮粪池。达到遍地草塘化,农田肥库化。

2 月 17 日 中央国家机关水利电力部北京勘察设计院 80 多人,下放到句容县劳动锻炼。

3 月 6—12 日 句容县召开 1959 年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和 1960 年春耕播种誓师大会。

4 月 11 日 县委作出抽调常年民工进行水利工程的指示,计划要求抽调占全县总劳力的 6% 常备民工共 8203 人,对几项大型关键性的水利工程进行常年施工。

4 月 16—19 日 县文教系统召开群英会。

4 月 18 日 袁巷乡武装基干民兵连长余永贵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中央军委授予半自动步枪一支。

5 月 6—11 日 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党员干部大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委六级党员干部大会精神,从句容实际出发,重点解决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明确以队为基础,发展社有经济;在此基础上,布置以夏收夏种为中心的四夏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6 月 22 日 县级机关在商业局进行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试点。8 月上旬全面展开。

9 月 13 日 县委召开 1300 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总结

检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等严重问题。

是月 全县开始调整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和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年底精简下放职工 1466 人，接收外地回县的下放职工 184 人。人民公社内部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力 13300 多人。

10 月底 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工作组在城东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

12 月 28 日 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计 5000 余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历时 17 天，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精神，检查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五风”特别是“一平二调”、“共产风”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危害。县委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破产还债，坚决退赔”的具体措施，取信于民，保护和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

1961 年

1—2 月 继续整顿、压缩城镇供应人口，至 2 月底又有 345 人回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

2 月 23 日 句容县委统计，全县已退物资折合金额 127.49 万元，占无偿调拨折合金额 423.38 万元的 30.11%；土地已退还 18837 亩，占平调 24434.4 亩的 77.1%；耕牛已退 137 头，占平调 150 头耕牛的 91.3%，家禽退抵占 70%，各公社所占劳力都按规定下放。

2 月 27 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句容工作组关于句容县农用物资的检查报告，对句容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推广。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又批转江苏省委工作组关于句容县清理物资

的两次报告,把句容的做法在华东地区推广。

是月 县委部署县级机关全面清理物资,对“一平二调”账进行退赔兑现,共清理出各种退赔物资 11.23 万件,价值 145.7 万元。

4月 县委在城东公社试点,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 60 条),调整生产队规模,解决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和家庭副业等问题。

4月28日至5月5日 句容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5月19日 建立下蜀、黄梅、东昌、天王、赤山五个区工作委员会。

8月25日 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市场。

9月4日 镇江地委同意调整句容县委常委的意见,县委常委由蒋继奋、李永月、门盛德、宋敏、潘湘云、葛钊秉、张新光七人组成,原常委周振森、阎发学、戎定和、侯春林因已下放公社工作,不再担任县委常委。

9月21日 县委同意调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全县新划生产大队 120 个,生产队由原 2468 个调整为 3662 个。

11月下旬 句容县委首先在杨塘岗、三台阁、西庙三个大队试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工作,后又在城东工作全面推开。
12月15—24日 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全面部署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

1962 年

1月17日 镇江地委批转句容县委关于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肯定了句容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

是月 句容新增后莘、北山、仓头、白兔、太平、长城、张庙、虬山、谢桥、高阳、浮山、唐陵 12 个人民公社。

5 月 6 日 句容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总结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工作。

6 月 15 日 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的指示精神,做好战备工作及支援前线的准备。

7—9 月 句容遭暴雨袭击,雨量达 840 毫米。全县受涝面积 12.3 万亩,9 月 6 日又遭台风袭击,损坏房屋 5454 间,伤 50 人,政府发救灾款 33400 元,帮助受灾群众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8 月 19—23 日 句容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平调社、队和社员私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退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加强农业第一线等 3 项决议。

10 月 县委对 1958 年以来受到处罚斗争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受过处分的 1538 名党员干部,全部给予平反的占 42%,部分纠错的占 28%。

△ 县级机关进行精简,行政机构由原来 40 个减少为 33 个,直属企事业单位由原来 70 个减少到 54 个。新定编制为 2247 人,比原来人数减少 19.84%。

12 月 28 日 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县城召开。正式会议为 1963 年 1 月 9—11 日。

1963 年

1 月 12—13 日 县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几个文件。

1 月 28 日 中共句容县三届一次全委会召开,选举县委书记

记、副书记及常委；选举县委监委书记。

1月31日 句容县委、县政府召开欢送下放干部大会。

是月 省、地、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在城东公社试点。2月11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句容县委关于城东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

3月29日 县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介绍雷锋事迹，县委领导号召全体职工向雷锋同志学习。

是月 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指示后，全县迅速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驻军部队、各学校首先带头开展学雷锋做好事。

4月 省委农工部在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试点。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三台阁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试点情况的报告，推广句容县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的做法。

6月19日 县人委布告开放粮油集市贸易，城镇、下蜀、天王三处设置粮油市场。

7月11日—11月22日 句容县委首先在后白公社进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7月—11月中旬，县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即五反）运动。

11月9日 句容县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行香、太平两个公社展开。至1964年2月9日结束。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1964年3月4日开始，至5月24日结束，共有白兔、伯群、东昌、陈武、长城、春城6个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年 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全县粮食总产177482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社员收入比1962年增64.2%。

1964年

1月11日 句容县委转发农工部“关于张庙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调查报告”的通报。

2月6—11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心任务是学习及总结1963年工作,研究如何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先进经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比学赶帮活动,组织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2月23—27日 县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选举李永月为县长。

3月24—30日 工交、财贸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进一步掀起比学赶超的“五好”竞赛运动。

4月22日 句容县委拟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计划。

5月1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请驻句容部队介绍政治工作经验,开展向解放军、大庆油田工人的学习活动;在农业上开展向大寨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8月16—21日 句容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计划在秋收秋种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进一步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12月中旬 江苏省委组织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进驻全城乡机关单位,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7个月,至1965年7月底结束。工作团有中央、省、南京、常州、扬州、镇江地区及县和部队、高校等单位参加,共20618人。

是月 据统计,句容县农业生产再获丰收,粮食总产达187701吨,再创历史新高。

1965年

5月 经省委同意,撤销黄梅、下蜀、东昌、天王、赤山五个区工委。

6月27—30日 句容县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在县城召开。全县有学习小组2500个,3万多人。

7月31日—8月4日 县贫下中农协会在县城召开,代表814人。选举产生43名委员组成的县贫下中农协会(贫协)。全县22个公社也都建立了公社“贫协”。

8月1日 经江苏省军区批准,句容县民兵师成立。

8月18—21日 县境遭台风、暴雨袭击,冲毁桥梁14处、倒塌房屋1700间,10万亩农田受灾。

9月23日 国家卫生部决定在句容成立农村卫生工作队,下设城东、天王、葛村、行香分队和血吸虫病防治队。

10月13日 经省人民委员会同意,撤销后莘、张庙、北山、伯群、太平、长城、唐陵、浮山、高阳、谢桥、虬山、仓头12个农村人民公社。

11月18日 句容县委发文决定在所有社队建立“四大民主”制度。即: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12月 县委、县人委决定县级机关精简。党委部门由12个单位合并为政治部、纪委、县委办公室(即一部一委一室),县人委部门由21个单位合并为农委、文委、财委、计委、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即四委二室),行政干部编制由278人减为140人。另成立一支20人的工作队,搞调查研究。

1966年

1月5—15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研

究讨论句容县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建立政治工作网络,抓好党的建设等问题。副省长欧阳惠林到会讲话。

1月17日 县委向各公社转发县委政治部西庙工作组《关于城东公社西庙大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报告》,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好。

2月6—20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党代会议精神;总结和检查1965年的工作,开展为革命种田和改变句容丘陵山区面貌的大讨论;制定落实“三五”规划。

2月12日 县委下发《关于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通知》。

2月25日 县委决定,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由5人组成,下设办公室,设在文教卫生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

4月11—16日 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4月26—30日 县召开卫生员代表会议。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到会讲话。

6月5日 县委转发县计生委《关于今春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要求加强领导,宣传教育,制定计划,提倡晚婚晚育,移风易俗,使计划生育达到省委提出的到1970年全省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7‰的指标要求。

6月中旬 文教系统开展声讨“三家村”(作家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于60年代初在《前线杂志》开设“三家村”杂记专栏,十年内乱开始,“三家村”被诬为“反党集团”)活动,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

7月5—8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指示,并以一定时间总结夏收夏种,讨论争取秋熟丰收,研究开展以“双超”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7月10—14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县委副书记黄选能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县长、县委副书记原克振作关于《分析农村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7月23日 县委发出“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刘英俊同志活动的通知”。

7月29日 县委向省、地委上报《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就全县“文化大革命”进行部署。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织、整训215人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秋前在县级党政机关、文教、卫生等26个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7月底 “文化大革命”在各单位相继展开,学校和一些单位出现大字报,基层领导和部分群众开始遭到批斗。

8月10日 县委作出《关于撤销句容县中、后白中学工作组的决定》。

8月24日 城镇公社所属4个居委会和26条大街小巷改名,换上带有政治意义的名称。

8月26日凌晨4点多钟,县中60多名红卫兵会同机关团委部分干部上茅山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次日凌晨3点,县中600多名红卫兵上宝华山“破四旧”。

8月29—30日 县中红卫兵、县机关、邮电局、县医院、印刷厂及街道居委会部分干部、职工和群众400余人将揪出来的34名所谓“牛鬼蛇神”戴上高帽子,进行游街示众。

是月 全县各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城乡上下以所谓“革命”、“造反”的名义,掀起破“四旧”狂潮,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有价值的图书资料被毁弃,部分教师和知识分子被诬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游街。

9月1日 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学习“十六条”座谈农村“文化大革命”形势,要求广泛深入地宣传、掌握和运用“十六条”。

9月6日 下蜀、后白2所中学分别成立文化革命筹委会。

10月上旬 全县组织近千名学生和教职员代表与江宁、高淳、溧水、溧阳四县学生和员工代表组成一个总队，赴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18日下午在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检阅。

11月1—8日 县委召开第二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全县第二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

11月3日 后白中学部分学生来县，以斗大字样口号形式的大字，分别在汽车站、句容大街、县委门口等处张贴。主要内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炮轰宋敏”等等，并在县委大字报栏内张贴一张县委副书记宋敏的大字报。

12月2日 县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和宣传蔡永祥同志英雄事迹的通知”。

是年冬 全县各单位成立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大字报铺天盖地，采用打倒、罢官、开除党籍、戴高帽、游街等手段，批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全县党政机关和学校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1967年

1—2月 在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的影响下，句容县造反派组织开始对许多领导干部“罢官”、揪斗和戴高帽子游街。从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到部分部委办局领导和公社党委正、副书记，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者计21人。党、政、企各单位的领导权相继被夺，组织机构陷于瘫痪。

2月5日 县造反派成立江苏省句容县生产委员会、江苏省句容县生产监督委员会。

3月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成立,作为县级“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机构。

3月28日 经镇江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成立句容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张新光任主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取代县委、县人委。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撤销。

4月8日 县化肥厂建成投产。

4月12—15日 全县工业、交通、财贸工作会议召开。

4月16—19日 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召开。

5月22—26日 县军管会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落实全县“四夏”工作。

5月30日 句容县军管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

6月5—9日 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

7月 由于派性膨胀,县内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个造反派组织,即以红色造反军县级机关总部和政法总部为核心的句容县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和以句容县中学井冈山公社、东进中学赴句造反纵队、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为核心的句容县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筹)(简称“革联”)。

7—8月 句容两派在南京、镇江“观点”相同造反派支持下,派性斗争日趋严重,县内武斗不断发生,以致发生冲击县机关、冲击驻军仓库、抢夺武器弹药等事件。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和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9月25日 县军管会发出平反公告,为“句容县文化馆‘鲁迅’战斗队”、“句容县农机五金厂红色工人造反队”、句容县城镇“西南山砖瓦厂红尖兵纵队”等“造反组织”平反。

10月30日 县军管会同意新华书店关于发给职工《毛泽东选集》的报告。拟发给职工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普及本1—4卷,定价2.00元),建议农村社员每四户发一套,每一户发《毛主席

语录》一本(定价 0.45 元)。

12月8日 县军管会发出决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和职工要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在生产工作岗位”。

12月13日 县军管会举办“句容县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革联”、“红联”勤务组负责人(各抽 10 名)、县级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每单位 1 名)、公社干部(每公社 2—3 名)参加。

1968 年

2月24日 句容两派(“革联”、“红联”)实现革命大联合。

是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进驻句容参加“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工作。

3月4—6日 县军管会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贯彻省军管会召开的“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电话会议和专区军管会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研究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问题。

3月28日 成立了由军队代表、造反派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的句容县革命委员会(以下革命委员会均简称革委会),杜孟祥为主任。县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群众专政组(后改为政法组)等工作机构,行使原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职权。

3月31日 茅山、宝华、郭庄公社革委会成立。到5月底,除白兔公社外,其他公社革委会也相继成立。8月底前,全县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先后成立。行使原公社和企事业单位的党、政、财、文职权。

4月下旬 造反派在县体育馆组织空前规模的万人批斗大

会,16人被批斗。其中2名科技人员轮流头顶《韦氏英语大辞典》,以示对所谓“崇洋媚外”思想的惩罚。批斗后,又将批斗对象戴高帽押上街游斗。

4—7月 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学校、商店,普遍“清理阶级队伍”,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全县有10156名干部和群众被揪斗,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有7219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惨遭迫害,223人含冤致死,多人致伤致残。

5月19—23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原县委书记蒋继奋等人被批斗。

是月 县革委会决定把中学下放到公社、小学下放到大队、生产队管理,实行一元化领导。

6月底—10月中旬 县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被集中在小衣庄部队营房,举办长达3个多月的“斗、批、改”学习班,又有一批领导干部遭到错误的批斗和残酷迫害。

7月26日 县革委会出台《关于整顿社、队办工业的意见(草稿)》。

8月15—19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和部署当前工作。

8月18—23日 县革委会举办各公社、基层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对敌斗争专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8月24日 县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组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

9月4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整党建党工作初步意见》,部署在全县开展整党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事宜。

9月5—10日 县革委会举办“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11日 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3个群众组织在县城体

育馆召开代表会,成立句容县“三代会”。

10月下旬 县革委会在石山头茶场办“五七”干校,集中原县机关党政群干部 360 多人在此劳动、学习,同时继续进行“斗、批、改”。

是月底 全县 21 个农村公社,已有 20 个公社进行整党建党试点工作。

11月18—24日 县、社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12月下旬 全县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将 1966—1968 年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 689 人(简称“三届生”)全部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同时还接受和安置南京、镇江等城市 4597 名知识青年插队落户。

1969 年

1月21日 句容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

1月25日 省革委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句容,分 3 个小组进驻石狮公社机关和该公社的光明、河桥两个大队,参加农村“斗、批、改”的试点工作。

1月27日—2月2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专区革委会全委扩大会议精神,杜孟祥作过去工作和今后任务报告。

1月30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插队知识青年动员和安置工作的意见》。

2月 句容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杜孟祥任组长。

3月20—26日 县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 开始进行所谓“吐故纳新”的开门整党。全县原有 491 个党支部,通过整顿,逐步恢复了组织生活,并建立了一些新支部。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也先后建立。

△县、社革委会先后组织 2900 多人参加的有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农村社队进行整顿，建立健全了社、队领导班子。

5月14日 县东山良种场、小果园、高庙茶场划归镇江专区办“五七”干校，1980年1月重归句容。

5月21—24日 县革委会召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大会。

6月4—10日 县革委会举办全县教育革命专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听取形势报告和上级会议精神传达报告，讨论交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意义、经验，制定开展教育革命规划，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7月1—7日 县革委会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杜孟祥致开幕词，兰挺作大会报告，邱学臣作会议结束讲话。会议还选举出席专区“积代会”代表 150 名。

8月2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及意见》，通报省革委会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在句容 20 多天慰问情况，总结大卓会议后全县上山下乡工作情况，要求克服存在问题，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

8月12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的意见》，要求迅速煞住无政府主义妖风，更有力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9月5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的决议》。

9月9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批转“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解决好落户知青住房、生产、生活等具体问题。

9月13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转发亭子公社革委会“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合作医疗前进的方向”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对实行

合作医疗情况进行一次总结,解决存在问题,使之得到巩固和发展。

9月15—23日 县革委会召开“贯彻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三级干部会议。

10月5—20日 县革委会举办机关干部落实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10—15日 县革委会组织162人的慰问团(划为5个分团21个慰问小组),对有下放人员的21个公社、253个大队进行了走访慰问。慰问了645户、1778人。对早期下放的5000余人通过座谈会形式集体慰问,共召开座谈会547次。随同县慰问团一起对下放人员进行慰问活动的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共4150人。18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的5000余人大会,并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40万人民作慰问汇报,进一步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

11月16日 郭庄公社新农、高阳、西释、光明4个大队7460亩土地、4800人口,划归江宁县周岗人民公社。

11月25日 县革委会在体育馆隆重举行群众大会,欢迎省、专区下放同志和欢送本县本年度首批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去农村插队落户。

12月21日晚 县革委会在县体育馆召开大会,欢送全县第三批1401名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民赴农村插队落户。

是月 陈武公社赵庄麻场的全部土地、人员划归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体育学院3所院校举办“五七”农场。1978年4月重归句容,由赵庄林苗场管理。

是年冬 机关干部431人,城镇居民590户2135人下放到农村落户,同时还接收南京、镇江、常州等地城镇居民1096户4461人,外市县干部396人插队落户。这项工作延续到次年春。

是年 撤销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联合等革委会,成立毛泽

东思想宣传站及工交、农林、水机电、财税、商业、教育卫生等 7 个系统革委会,撤销邮电局革委会,设立邮政局革委会和电信局。

1970 年

1 月 5—9 日 县革委会召开工交战线学首钢,赶先进,夺取 1970 年革命生产新胜利誓师大会。

1 月 7 日 “句容县民兵独立团”成立,下辖 4 个营(包括农村),县机关民兵属城镇武装连。

1 月 7—13 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贯彻专区革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总结 1969 年工作,讨论落实 1970 年的任务。

1 月 30 日 经中共镇江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复:中共大卓人民公社委员会成立。这是党组织生活恢复后按照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委。随后,各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新党委。

是月 兰挺任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2 月 16—19 日 有 1500 多人参加的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在县城召开。县革委会部署了“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是年冬,县委和各公社党委组织了由上千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队和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3 月 3 日 下午,县革委会在城镇冒雨召开全县由 5 万多人参加的批斗宣判大会,宣判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其中宣布判刑 6 人,判管 7 人,教育释放 2 人,拘捕 4 人,枪毙 1 人。

3 月 18 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深入地猛烈地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3 月 22 日 兰挺任县革委会主任。

3月22—26日 县革委会召开有11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传达省、专区会议精神,交流“一打三反”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经验,研究进一步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的措施。

4月27—30日 县革委会在行香公社召开全县教育革命现场会议,162人参加。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交流“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教育革命经验,斗批了所谓隐藏在教育战线上的反革命分子,总结前阶段运动开展情况,找差距,落实措施。

5月7—11日 县革委会召开由1500余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周恩来讲话和《全国一九七〇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传达纲要》和《江苏省一九七〇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听取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关于《句容县一九七〇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讨论稿)》、当前“抓革命、促生产”报告和专区电话会议,明确狠抓当前和实现“四五”规划关系。

5月17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座谈会议精神的意见》。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大卓公社进行整党组织处理的试点,在天王公社对整党差的党支部进行补课试点。

5月28日—6月1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办有公社和县属部分单位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和各系统革委会负责人共37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

6月11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学习贯彻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纪要》,对全县整党建党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

夏、秋两季 县革委会两次组织了灭螺大会战,共出动68万人次,消灭钉螺面积1651万平方米。对8万人进行体检,查出血吸虫病患者1.1万人,其中5500人得到治疗。

7月14—17日 县革委会在大卓公社召开上山下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

8月25—31日 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0月5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开展学习肖德龙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

11月17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改变小矿山体制的通知》，从1970年11月1日起，将县社联营的团山铁矿、磁山头铁矿、天津山猛铁矿、老人峰煤矿改为县办。原县社联营的斗篷山铁矿下放给黄梅公社，东培山铁矿下放给亭子公社。

11月22—28日 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会议正式代表822人。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兰挺所作《高举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旗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加强县委革命化建设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兰挺为书记。

12月12日 县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和全省农业会议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2月24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要求“抓住今冬明春有利时机，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971年

1月6日 下午，县委召开会议，在城的县委委员、革委会委员、各大组、局负责人参加。兰挺作进一步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五一六”群众运动报告。

1月12日 县革委会撤销各系统革委会，设立劳动民政局、工业局、交通局、物资局、商业局、粮食局、教育局、卫生局、邮政局

等工作机构。

2月4—7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省、地委文件,传达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句容革命和生产形势,提出了当前任务、要求和措施,包括反对居功骄傲,提倡廉洁谨慎,“农业学大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计划生育等。

2月7日 全县开展“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此运动一直进行到1973年底。先后有402人被隔离审查,94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许多干部、教师受到迫害,造成假案。粉碎“四人帮”后,全部平反。

3月7日 县革委会作出暂行规定,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公社建立由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师生代表三结合的教育革命委员会,大队建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3月27日 县革委会出台《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革命暂行规定》。

4月29日 县革委会召开批斗所谓“五一六”分子、“五一六”分子坦白交待落实政策大会。

5月16日 县委举办“批陈整风”学习班,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5月26日—6月13日 县委召开县委、县人武部党委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中途因突击抢收,7、8、9日3天会议暂停,10日复会)。根据省、地委开展“批陈整风”的指示,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上批判了“先验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整风的重点是县委、县人武部党委的领导成员。

9月23日 镇江地委以镇发〔1971〕49号文转发《句容县委认真整顿领导作风的情况报告》。

9月24—27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学习中央1971年28号文件,传达周总理在全国“人防”会议上所作的形势报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宜兴“五

七”农大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庄孟林传达,听报告的有4000多人)和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就贯彻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进行了讨论和规划。

10月7日 上午,县委在人民剧场召开“批修整风”学习班动员会。

10月12日 下午,县委在人民剧场召开批判、声讨陈伯达反党罪行大会,会上有10人作批判发言。

10月16—18日 县委召开了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1971〕57、61、62、64、65号文件。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揭露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

11月6日 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央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全县145名知识青年被推荐后得到批准,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是年 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斤,比上年增长22.4%,其中天王公社孙家边一队平均单产1202斤,比上年增长52.8%。

△全县组织了25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197个农村大队和62个社办企事业单位。

1972年

2月3—6日 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4号文件,为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培训骨干。县级机关、县人武部和出席县教育卫生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共300多人参加听传达。到2月7日,全县培训骨干1.2万人。听传达人员达26.9万多人。

2月19日 县委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在县“五七”干校劳动的干部进行清理,该退休的退休,该分配工作的进行分

配,使“五七”干校成为轮训干部的基地;“继续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斗争”。

3月28日—4月3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精神。会议还听取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的传达,明确全年经济建设任务和努力方向,研究措施,决心夺取全年农业生产大丰收。

5月9—11日 全县工交、财贸会议召开。

是月 县级机关党委恢复。

7月3日凌晨,县境北部猛降暴雨,6小时降雨300毫米,山洪暴发,江河横溢,宁杭、镇句公路中断,东门、南门两座大桥淹没,冲倒黄梅桥等桥梁69座,倒圩12个,万余亩早稻冲毁,颗粒无收。驻句容部队战士戴建国,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光荣牺牲。

8月7日 县委出台《关于传达贯彻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试点计划》,决定在三台阁、缫丝厂试点。

8月13—23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为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培训骨干。957人参加会议。

9月1—5日 全县共培训宣讲骨干18245名。各公社在8月底也都进行了试点。“批林整风”重点是批林,整风只是在县社两级领导中进行。

9月20—24日、10月7—8日 县委两次召开常委会议,互相交心通气,各自自我解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发动县级机关帮助常委整风。

10月15—20日 各公社党委普遍开展了整风。

12月7日—1973年1月26日 县革委会抽调75人组成小分队,对大卓公社的9个农村大队和6个集镇单位进行“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定案政策复查试点工作,历时50天。

是年 句容林场以工人为主体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成立。治蚁成果显著,在南方八省白蚁防治协作会议上专题介绍其经验,受到

与会者的好评。

1973 年

1月12—23日 县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685人出席),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1972年工作,部署1973年任务。

2月18—20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农、林业生产会议,贯彻农林部春季造林电话会议精神,部署全县春季绿化造林和春耕生产任务。

3月18—22日 共青团句容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8月21—23日 县总工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9月14日 县委常委会研究,撤销政法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复设公安局、人民法院等工作机构。

9月26—29日 县妇联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10月15日 经省革委会同意,茅山公社的华兴、成村、玉晨、农林、茅山、五墟、夏林等7个大队和东井林场的3个工区划归常州市领导(1979年1月1日重归句容),原茅山公社未划出的4个大队与天王、后白公社划出的6个大队另建立茅西人民公社。

12月7—10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868人参加),总结当年工作,研究年终分配,部署冬春任务。

是月 兰挺调回部队工作,徐界清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是年 全县继续组织30万人(次)查螺灭螺,查螺灭螺面积350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人11689人次。

1974 年

2月12—18日 县委召开四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202人出席),传达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部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3月26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转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章程〉的通知》。

4月16—20日 县委召开“两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文件,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6月13—16日 县委召开工人理论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

6月17日晚,宝华、亭子等13个公社遭到龙卷风和冰雹袭击,风力9—12级,冰雹大者如鸡蛋。全县倒塌房屋2185间,损坏房屋35359间,死亡1人,轻、重伤43人,损失严重。县委常委第二天一早即分头到受灾公社发动群众,加强对救灾和生产工作的领导。

7月17—20日 县委召开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文件和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通知,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分析形势,对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双抢”期间如何抓大事、促大干进行部署。

7月27日 县召开工业、交通、财贸战线“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动员大会,学习中央21号文件,听取县革委会副主任阎发学工作报告。

7月30—31日 全县骤降暴雨374毫米,淹没村庄55个,被洪水围困群众3000多人。县委在家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抗洪措施,驻句容部队积极参加抗洪抢险斗争。

8月27日 县委下发《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意见》。

8月28—31日 县委召开全县政治工作会议。

10月9—14日 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

10月31日 县委组织的“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开始集训,635人参加。

11月5日 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徐界清和驾驶员孙绪和在一次恶性交通事故中遇难,另有3人受重伤,吉普车烧毁。

11月11日 县委组织的“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284人和4个公社组织的工作队62人,共346人,进驻东昌、陈武、行香、白兔4个公社的56个大队和4个集镇,帮助农村开展“批林批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面上18个公社也组织工作队员309名,进驻36个大队和7个企事业单位开展运动。运动于1975年6月结束。历时7个多月。

是月 王云海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12月9日 县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12月28—30日 县委召开组、局、公社、厂矿、场圃负责人会议,重点学习中央和省有关文件,部署落实政策、批林批孔、安排好下放人员生活和当前生产等工作。

1975年

1月12—17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有关文件,传达贯彻省、地委会议精神,分析1974年革命与生产形势,明确1975年的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

1—3月 18个公社的五六万民工会师赤山湖工地,开展赤山湖整治工程,并改造连接赤山湖的南、北、中河。

1月30日—7月25日 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对全县的所谓“五一六”分子一一行文平反。

4月1日 省委畜牧业家禽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函)苏委牧

〔1975〕006号，转发句容、滨海两县关于饲料生产情况的函，介绍了句容县陈武公社大华大队抓好饲料生产，发展集体养猪的做法。

4月2—4日 县委在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百丈大队为重点，交流“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的经验，参观现场、部署工作。

4月8日 县重建农业科学研究所。

4月15—17日 全县社、队集体养猪饲养员代表会议召开。

4月22—25日 县第一次广播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全县有广播线路2350公里，广播喇叭10万多只，县城至公社都加设了水泥杆专线。

6月16日 撤销县革委会政工组，设立中共句容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革委会办事组改为中共句容县委办公室、句容县革委会办公室。

6月20—21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13号文件及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钢铁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听取省委负责人在省级机关和南京市13万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7月11—16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的重点是帮助县委常委整风。

9月4—7日 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会议学习毛泽东三项指示及中央有关文件，传达贯彻地区“两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句容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落实任务，研究措施、明确大干快上部署和要求。

9月10—12日 县委集训理论学习运动工作队（后来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参加集训者319人。9月13日，工作队到6个公社的38个大队开展工作。

9月19日 县委为贯彻党中央17号文件和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发出了“学习理论抓路线，扫除派性促大干”的号召，要求各级干部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搞好团

结,要“拆墙填沟解疙瘩”。对于闹派性搞不团结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10月12日 县委召开县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8号文件和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继续深入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提高对资产阶级派性危害性和整顿机关必要性的认识。

10月26—28日 县委在天王公社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为一年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

11月15日 县委发出《关于抽调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的通知》,决定成立句容县北山水利工程指挥部(下分3个兵团,即北山长江翻水站水利工程兵团、北山东干渠水利工程兵团、环山渠沟水利工程兵团),抽调专业队人员4000名,以加快“农业学大寨”步伐。

12月4—9日 县委对地、县共同组织的468人(地区84人,县384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作队进行集训,并于12月10日进驻袁巷、天王、后白、二圣、城东、黄梅6个公社沿公路的30个大队和6个集镇以及县直机关工交、财贸等单位,帮助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2月9日 下午,县机关召开大会,欢送13名县委批准首批到大队担任党、团支部副书记的县机关干部下乡工作。

12月20日 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句容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领导小组”。全县划分5个片,常委分工负责,并以宁杭公路的黄梅、城东、二圣、后白、天王、袁巷6个公社为点,派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行具体工作。

12月20—30日 县召开社队企业管理干部会议。

12月—1976年1月 县委通过召开常委会、三级干部会、常委扩大会,贯彻中央9号、13号文件,实行整风,帮助常委端正思

想政治路线,解决领导班子软、散、懒和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1976年

1月16日 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含泪收听收看周恩来逝世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和电视,并以各种形式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

△ 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县委常委进行整风。首先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风的论述和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按照“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对照建成大寨县的6条政治标准,联系句容实际,排差距,揭矛盾,研究整改措施。21日结束。

2月11—17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月20日 中共句容县委“工业学大庆”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计划委员会。

4月2—5日 县委召开有县机关各部门及公社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1976〕4、5、7号文件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案风”。

7月16—19日 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上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交流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突出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阶级斗争论述。

7月29日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县革委会组织11人的医疗小分队,赴灾区抢救治疗,8月24日返回句容。

8月21日 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县人民防震抗灾夺丰收。

8月25日 由10人组成的句容县地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9月9—18日 全县干部群众沉痛哀悼毛泽东逝世。18日下

午,13234人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敬献花圈258个。

10月22日 全县万人集会,庆祝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结束。

11月27日 县委出台《关于认真做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考核验收的意见》,明确考核验收具体事项。

是月 县革委会工作机构增设广播事业局。

12月13—17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1976〕24号文件和省委会议精神,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开展揭发、批判、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活动高潮。

12月29—30日 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央15、16号文件,学习中央、国务院和省有关领导讲话。

1977年

1月9—15日 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动员大会。

2月26日 在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王云海根据省和地委指示,部署了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等工作。

3月11—14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听取了王云海关于县委常委整风情况的汇报,对照建成大寨县的6条标准,对县委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会上,县委作出改进县、社、队三级干部作风的10项决定。

3月中下旬 县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会议,组织870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115个大队和82个集镇单位;74人组成的工业学大庆工作队进驻部分县属厂矿,帮助基层整风。镇江地委派出13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一个公社。

5月8日 在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县委号召全县人民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落实华国锋的所谓“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八条标准”,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句容地区的影响。

5月26—29日 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句容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8月8日 县委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全面整党整风的初步意见》。这次整党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为中心内容,分3批进行,次年“四夏”大忙前完成。

9月10日 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部署了当前工作。

11月18日 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揭批小分队来句容,揭批句容帮派头目。县里设22个会场,组织了3万人收听。

是年 句容县工业总产值6498万元,比上年增长22.77%;农业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212723吨。

1978年

2月8日 10万水利民工冒着雨雪会战句容河、大道河、朝阳洲,历时18天,完成土方384.6万立方米。

3月13—17日 县委召开“学大寨、赶先进”会议。

6月24日 解放军驻句容部队在两个炮点用“三七”高炮,连续两次发射碘化银催化炮弹216发,进行人工降雨。

7月2日 县委发出《关于1978年粮棉油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办法》。

7月18日 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建立全县的宣传网、成立宣讲团的意见》。

7月26—27日 县委召开总任务宣传经验交流会。

8月 中共句容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统战部恢复建制。

11月7日 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王云海要求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又红又专的人才。

12月5日 全县组织10万民工,会战句容河、洛阳河、天王河、茅山河和北山河引灌区提水工程。到1979年1月15日,基本完成预定任务,计土石方564万立方米。

12月22日 县委批转宣传部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意见。

是年冬一次年2月 全县冬训干部7894人,占应冬训人数的72%。主要内容是紧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狠批极左路线,区别对象,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句容县 历届县委领导人名录 (1949. 4—1978. 12)

中共句容县委员会(1949. 4—1956. 4)

- 书 记 洪天诚(1949. 4—1951. 9)
鲁 光(1951. 9—1952. 12)
陈建新(1952. 12—1955. 3)
李永月(1955. 3—1956. 4)
- 副 书 记 迟明堂(1949. 4—1950. 5)
魏永贵(1952. 6—1953. 7)
李永月(1953. 10—1955. 3)
尚福春(1955. 4—1956. 4)
- 常 委 陈建新(1954. 11—1955. 3)
李永月(1954. 11—1956. 4)
曹云兰(1954. 11—1956. 4)
张新光(1954. 11—1956. 4)
张立业(1954. 11—1955. 1)
尚福春(1955. 4—1956. 4)
门盛德(1955. 8—1956. 4)

中共句容县第一届委员会(1956. 4—1959. 2)

- 书 记 李永月(1956. 4—1959. 2)
第二书记 曹云兰(1956. 4—1959. 2)
副 书 记 傅众一(1956. 4—1959. 2)
宋 敏(1956. 4—1959. 2)
戎定和(1956. 4—1959. 2)
周振森(1958. 9—1959. 2)
门盛德(1958. 9—1959. 2)
常 委 李永月(1956. 4—1959. 2)
曹云兰(1956. 4—1959. 2)
傅众一(1956. 4—1959. 2)
宋 敏(1956. 4—1959. 2)
戎定和(1956. 4—1959. 2)
周振森(1956. 4—1959. 2)
门盛德(1956. 4—1959. 2)
阎发学(1956. 4—1959. 2)
张新光(1956. 4—1959. 2)

中共句容县第二届委员会(1959. 2—1962. 12)

- 第一书记 李永月(1959. 2—1960. 6)
蒋继奋(1960. 6—1962. 9)
书 记 蒋继奋(1962. 9—1962. 12)
第二书记 曹云兰(1959. 2—1960. 4)
郭志强(1960. 4—1960. 5)
李永月(1960. 6—1962. 9)
副 书 记 傅众一(1959. 2—1960. 3)

- 戎定和(1959.2—1961.2)
周振森(1959.2—1962.2)
门盛德(1959.2—1962.12)
万本文(1959.2—1959.6)
阎发学(1960.6—1961.2)
潘湘云(女,1960.7—1962.9)
王益众(1960.9—1961.9)
孙国宝(1961.2— 未到职)
宋 敏(1961.8—1962.12)
李永月(1962.9—1962.12)
王玉亭(1962.9—1962.12)
常 委 李永月(1959.2—1962.12)
曹云兰(1959.2—1960.4)
门盛德(1959.2—1962.12)
傅众一(1959.2—1960.3)
戎定和(1959.2—1961.9)
周振森(1959.2—1962.2)
阎发学(1959.2—1961.9)
万本文(1959.2—1959.6)
张新光(1959.2—1962.12)
侯春林(1959.2—1961.9)
刘玉喜(1959.12—1960.6)
郭志强(1960.4—1960.5)
蒋继奋(1960.6—1962.12)
潘湘云(女,1960.6—1962.12)
王益众(1960.9—1961.9)
宋 敏(1961.8—1962.12)
葛钊秉(1961.9—1962.12)

王玉亭(1962.9—1962.12)

中共句容县第三届委员会(1962.12—)

- 书记 蒋继奋(1962.12—)
- 副书记 李永月(1962.12—1965.8)
- 门盛德(1962.12—1965.12)
- 宋敏(1962.12—)
- 许和庭(1964.11—1966.4)
- 原克振(1965.8—)
- 薛家骥(兼,1965.12—)
- 王延序(1966.4—)
- 黄选能(1966.4—)
- 常委 蒋继奋(1962.12—)
- 李永月(1962.12—1965.8)
- 门盛德(1962.12—1965.12)
- 宋敏(1962.12—)
- 潘湘云(女,1962.12—)
- 葛钊秉(1962.12—)
- 张新光(1962.12—)
- 戎定和(1962.12—)
- 许和庭(1964.11—1966.4)
- 原克振(1965.8—)
- 薛家骥(1965.12—)
- 王延序(1966.4—)
- 黄选能(1966.4—)

中共句容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1969. 2—1970. 11)

组 长 杜孟祥(1969. 2—1970. 1)
 兰 挺(1970. 1—1970. 11)
副 组 长 邱学臣(1969. 2—1970. 11)

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1970. 11—1978. 12) *

书 记 兰挺(1970. 11—1973. 12)
 徐界清(1973. 12—1974. 11)
 王云海(1974. 11—1978. 12)
副 书 记 宋 敏(1970. 11—1977. 9)
 奚华凤(1970. 11—1975. 2)
 尚克东(1974. 11—1975. 12)
 马文钦(1974. 11—1975. 10)
 周亚民(1974. 11—1977. 8)
 阎发学(1974. 11—1978. 12)
 张启西(1974. 11— 未到职)
 汪天恒(1975. 12—1978. 12)
 郭富春(1977. 8—1978. 12)
 辛国发(1977. 8—1978. 12)
 邹启宽(1977. 8—1978. 12)
常 委 兰 挺(1970. 11—1973. 12)
 宋 敏(1970. 11—1977. 9)
 阎发学(1970. 11—1978. 12)

* 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的任期到1982年8月,这里只收录了1978年12月前的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以上领导人的名录。

- 金成义(1970. 11—1976. 10)
杨 诚(1970. 11—1972. 10)
赵志农(1970. 11—1978. 12)
奚华凤(1970. 11—1978. 12)
曹扣珍(女,1970. 11—1978. 12)
谭桂林(1970. 11—1978. 12)
周亚民(1973. 1—1977. 8)
戴文福(1973. 1—1977. 8)
尚克东(1973. 8—1975. 12)
徐界清(1973. 12—1974. 11)
王云海(1974. 11—1978. 12)
马文钦(1974. 11—1975. 10)
张启西(1974. 11— 未到职)
汪天恒(1975. 12—1978. 12)
董木金(1976. 10—1978. 12)
邹启宽(1977. 8—1978. 12)
郭富春(1977. 8—1978. 12)
辛国发(1977. 8—1978. 12)
彭 云(1977. 8—1978. 12)

后 记

编撰出版《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中共句容二卷》)是句容市 2014—2016 年党史工作规划确定的重要工作目标。在中共句容市委的正确领导和镇江市史志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通过全市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共句容二卷》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了。这也是句容市史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继出版《句容革命斗争史》即《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一卷(1927—1949)、《句容解放五十年》后,推出的第三本中共句容地方史性质的著作。

1995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74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前夕,句容市史志办公室完成了《句容革命斗争史》的编纂出版工作,基本完成句容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出版工作。按照省委党史工办和镇江市党史办的要求,在全市展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编出版工作。1999 年,句容市史志办公室抓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句容解放 50 周年的契机,启动编纂出版《句容解放五十年》,内容包括:句容解放五十年发展简史、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人物、中共句容历史大事记四部分内容。《句容解放五十年》获全省党史优秀成果一等奖。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正本开始列入议事日程。2013 年前,主要做了《中共句容二卷》篇目考虑及部分资料收集工作。

2014 年 3 月成立写作班子,正式启动《中共句容二卷》编写工作。为了少走弯路,《中共句容二卷》编写组先后去丹阳市、金坛市

史志办学习取经,修订编写工作方案。从是年3月起,《中共句容二卷》编写组系统查阅1949—1978年句容县委、县政府的永久及长期档案及有关各部门的档案,至2015年2月,完成《中共句容二卷》初稿的编写。又经过互审修改,是年5月,《中共句容二卷》征求意见稿完成,分别呈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主要领导,市委、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镇(管委会)、街道党委,及部分老同志征求意见;是年8至10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进行修改,最终形成送审稿,于2015年12月正式报镇江市史志办公室评审定稿。2016年3月,组织召开《中共句容二卷》评审会,镇江史志办公室吴海平主任、张国平副主任及党史处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提出了中肯的评审意见和建议。会后,组织总纂班子进行认真梳理和消化吸收,并结合句容实际精心打磨,于4月中旬成稿并报镇江市史志办公室审阅定稿。经中共句容市委批准,《中共句容二卷》于2016年7月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句容二卷》共分4编,30万字。全书的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编(建立人民政权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4月—1956年9月)的1至8章,由刘明亮执笔;引言、结束语和第二编(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的9至16章,由朱延生执笔;第三编(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17至20章,由谭树春执笔;第四编(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1976年10月—1978年12月)的21至22章,由许朝斌执笔。全书由许朝斌、朱延生负责统稿。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欧红卫主持书稿的编写工作并审定全部书稿。

本书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上级党史部门、市各有关单位及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市委副书记商震多次听取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对本书的编写给予肯定和支持。镇江市党史工办的领导和专家先后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

意见。黄选能、王云海、李永月、阎发学、樊家才、吴克文、戎文亮、邵荣炳、周绪超等老领导、老同志认真审阅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向支持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的省、镇江市党史部门和句容市档案馆,向中共党史出版社及所有为本书的编写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全市党史工作者集体智慧的产物。由于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有限,加上资料不足,本书的疏漏、不足和错误之处,请领导、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6年4月

